策　　划：树　旺
主　　编：张迪杰
装帧设计：听　伊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澤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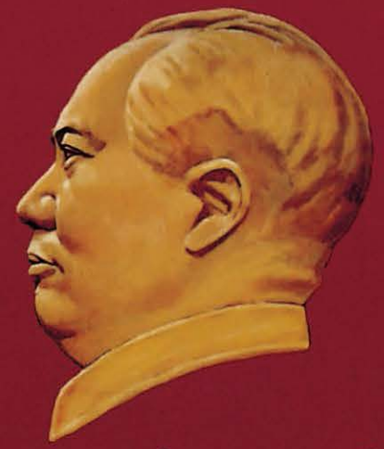
润东出版社

总定价：港币$26,800
ISBN：978-988-12907-0-0
9 789881 290700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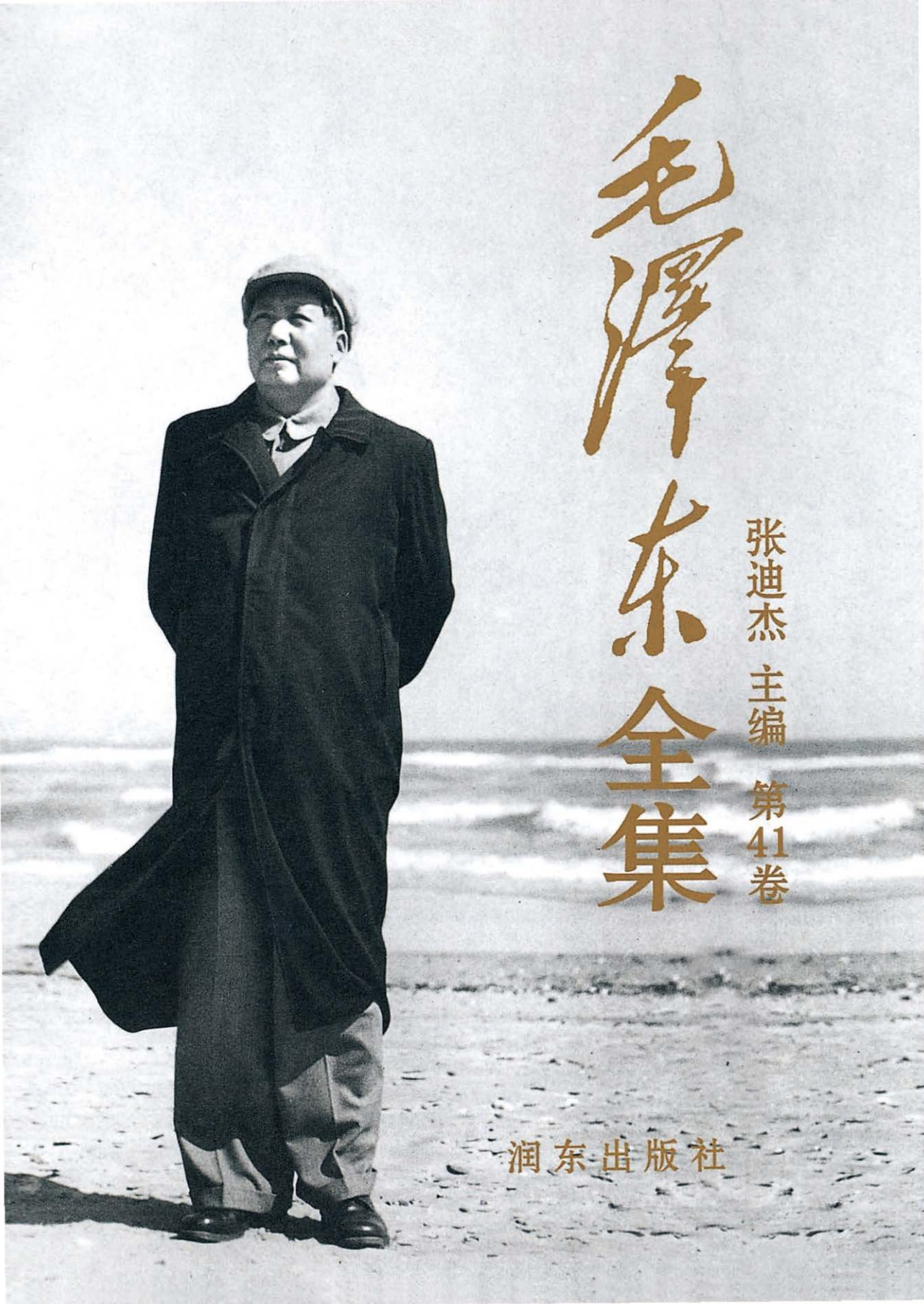
马恩百科（资料库）工作组

www.MEBK.org

收集 · 整理

感谢ZhuChengrui同志赞助购买本套《毛泽东全集》

毛 泽 东 同 志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41卷

润东出版社

毛泽东全集

MAO ZE DONG QUAN JI

主　　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编　　审：黄惠丽

主　　编：张迪杰
副 主 编：宋　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桉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桉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骂人问题给吴芝圃等的信……1
（1958年11月29日）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3
（1958年11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 ……8
（1958年11月）
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的批语 ……10
（1958年11月）
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 ……12
（1958年11月）
写在《参考资料》上的刘禹锡的一首诗 ……13
（1958年11月）
对李普曼《苏联的挑战》一文的批语和批注 ……15
（1958年11月）
为印发杜勒斯批评我国人民公社言论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7
（1958年11月）
为印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8
（1958年11月）
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20
（1958年11月）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22
（1958年11月）
接见金日成时的谈话 ……23
（1958年11月）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24
（1958年12月1日）
关于注意各地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批语 ……29
（1958年12月1日）
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 ……31
（1958年12月1日）
为红线女题词 ……33
（1958年12月1日）
关于我国决定同苏丹建交的复电 ……35
（1958年12月1日）
祝贺加涅夫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36
（1958年12月1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37
（1958年12月5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批语 ……39
（1958年12月5日）
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40
（1958年12月6日）
印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三篇文章的批语 ……46
（1958年12月7日）
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 ……47
（1958年12月7日、10日）

对农业部党组关于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情况报告的批语 ……50
（1958年12月8日）
对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 ……52
（1958年12月8日、9日）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55
（1958年12月9日）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61
（1958年12月9日）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76
（1958年12月12日）
对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79
（1958年12月）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的批语 ……81
（1958年12月18日）
复霍查电 ……82
（1958年12月18日）
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 ……83
（1958年12月21日）
关于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的批语 ……89
（1958年12月22日）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91
（1958年12月23日）
祝贺苏丹独立纪念日的电报……105
（1958年12月29日）
在共同社、英新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两篇评论上的批注……106
（1958年12月）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 ……109
（1958年）
对大跃进报道的指示……129
（1958年）
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130
（1958年）
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131
（1958年）
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题名……132
（1958年）
四言韵语·养生十六字诀 ……133
（1958年）
七绝·刘蒉 ……135
（1958年）
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 ……136
（1958年）
为《鲁山报》题写报头……137
（1958年）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141
（1959年1月3日）
对福斯特来信的批语和复信……142
（1959年1月11日、17日）
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批语 ……144
（1959年1月15日）
给黄炎培的信……146
（1959年1月21日）

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147
（1959年1月22日）
对中央关于动员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49
（1959年1月22日）
在西藏军区关于边坝等地叛匪活动的电报上的批语 ……151
（1959年1月22日）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批语 ……152
（1959年1月22日）
致苏共二十一大贺词……153
（1959年1月23日）
印发陈伯达关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面几个问题的来信的批语……156
（1959年1月25日）
对新华社关于广东新会县人民公社劳动效率下降的报道的批语 ……157
（1959年1月25日）
对新华社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的报道的批语……158
（1959年1月25日）
对新华社关于四川省委加强工业战线工作的报道的批语……159
（1959年1月25日）
印发谭震林关于目前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60
（1959年1月25日）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161
（1959年1月25日）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报告的批语……163
（1959年1月26日）

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摘录）……164
（1959年1月27日）
对驻苏使馆关于约夫楚克若干哲学观点的报告的批语……165
（1959年1月）
在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67
（1959年1月）
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168
（1959年2月2日）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172
（1959年2月2日）
祝贺锡兰国庆的电报……180
（1959年2月3日）
对驻英代办处关于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的批语……181
（1959年2月12日）
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转发这一文件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82
（1959年2月13日）
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86
（1959年2月13日）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88
（1959年2月14日）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呈递国书时的答词……193
（1959年2月17日）
祝贺尼泊尔国庆的电报……194
（1959年2月17日）

两次失败使我们学会了打仗……195
（1959年2月17日）
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99
（1959年2月18日）
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平叛情况报告的批语和修改……200
（1959年2月19日）
在关于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报告上的批语……202
（1959年2月19日）
对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的批语……203
（1959年2月20日）
和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204
（1959年2月21日）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208
（1959年2月21日）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的电报……210
（1959年2月21日）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211
（1959年2月22日）
对《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诬蔑中国的谰言》
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14
（1959年2月22日）
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给刘子厚的信……217
（1959年2月24日、27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219
（1959年2月）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223
（1959年2月27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233
（1959年2月27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241
（1959年2月28日）
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和注文……250
（1959年2月28日）
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语……253
（1959年2月28日）
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255
（1959年2月）
在河南九县讨论郑州会议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256
（1959年2月）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257
（1959年3月1日）
郑州会议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等的三封信……263
（1959年3月1日、2日）
祝贺柬埔寨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268
（1959年3月3日）
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269
（1959年3月3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278
（1959年3月5日）
郑州会议纪要……288
（1959年3月5日）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289
（1959年3月）
关于传达湖北省委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报告的两个批语……291
（1959年3月8日）
对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讨论情况的综合材料的批语……293
（1959年3月8日）
党内通信……295
（1959年3月9日）
介绍安徽的经验……300
（1959年3月9日）
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301
（1959年3月9日）
介绍广东的经验……303
（1959年3月10日）
祝贺丹麦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305
（1959年3月10日）
接受缅甸联邦新任驻华大使貌貌觉温呈递国书时的答词……306
（1959年3月12日）
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的批语……307
（1959年3月13日）
党内通信……315
（1959年3月15日）
在安徽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的批语……318
（1959年3月15日）
关于注意给达赖复信问题的批语……320
（1959年3月15日）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的批语……321
（1959年3月15日）
关于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给王任重的两封信……323
（1959年3月16日）
党内通信……325
（1959年3月17日）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328
（1959年3月17日）
转发《山东的经验》的批语……329
（1959年3月17日）
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331
（1959年3月18日）
转发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经验的批语……335
（1959年3月18日）
祝贺突尼斯独立纪念日的电报……339
（1959年3月18日）
毛泽东等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电报 ……340
（1959年3月19日）
对《四川的经验》的批语……342
（1959年3月19日）
介绍河南的经验……344
（1959年3月19日、24日）
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提纲……346
（1959年3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348
（1959年3月）

关于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的批语……350
（1959年3月20日）
对《山西省委的经验》的批语……351
（1959年3月20日）
对河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十二条措施的批语……352
（1959年3月20日）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353
（1959年3月21日）
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354
（1959年3月23日）
转发《四川的经验》的批语……356
（1959年3月24日）
转发《福建的经验》的批语……357
（1959年3月24日）
对浙江省委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的批语……358
（1959年3月24日）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提纲……360
（1959年3月）
关于请上海会议各同志阅读薄一波发言稿的批语……361
（1959年3月26日）
介绍安徽的十项规定……362
（1959年3月26日）
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364
（1959年3月27日）
党内通信……368
（1959年3月29日）

对人民银行总行党组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370
（1959年3月29日）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371
（1959年3月30日）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375
（1959年3月、4月）
关于同意董必武辞去现职改换工作的批语……379
（1959年3月30日）
对班禅额尔德尼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命令的电报的批语……381
（1959年3月30日）
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几条原则……382
（1959年3月31日）
第一批反映……383
（1959年3月）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385
（1959年3月）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386
（1959年3月、4月）
对上海会议纪要修正稿的批语和修改……389
（1959年4月）
介绍麻城的经验……392
（1959年4月2日、3日）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395
（1959年4月3日）

关于是否担任政协名誉主席问题的批语……397
（1959年4月4日）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398
（1959年4月）
生产增长速度有高有低，是波浪式的前进……400
（1959年4月5日）
给汪锋的信……401
（1959年4月7日）
对印度新闻社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的批语……403
（1959年4月7日）
关于发表国外对西藏叛乱反应的材料的批语……405
（1959年4月8日）
关于西藏平叛……406
（1959年4月15日）
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414
（1959年4月15日）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两个批语……416
（1959年4月15日、16日）
中央转发吴芝圃关于分期分批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报告
的批语……418
（1959年4月16日）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420
（1959年4月17日）
转发周小舟关于处理少数违法乱纪干部的意见的批语……425
（1959年4月17日）
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426
（1959年4月19日）

工业界的新事……429
（1959年4月）
对陶铸关于广东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的批语……433
（1959年4月20日）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的批语……434
（1959年4月21日）
在陈赓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安排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36
（1959年4月21日）
在李先念关于吕泗洋风暴事故后最近情况报告上的批语……437
（1959年4月24日）
关于调演豫剧《破洪州》给周恩来的信……438
（1959年4月24日）
为阅看《关于〈三国演义〉》前两部分给林克的批语……440
（1959年4月24日）
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441
（1959年4月25日）
对外交部就印度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给驻印使馆的指示稿的
批语和修改……444
（1959年4月25日）
关于妥善安排渡过春荒的批语……446
（1959年4月26日）
对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稿的批语……447
（1959年4月28日）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449
（1959年4月28日）

转发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报告的批语……452
（1959年4月28日）
对《光明日报》发表《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资料的批语……453
（1959年4月29日）
党内通信……454
（1959年4月29日、5月2日）
工作方法十六条……460
（1959年4月）
党内通信……469
（1959年5月2日）
关于反击挪威报纸侮辱我国领袖问题的批语……471
（1959年5月4日）
关于注意逃缅蒋军配合西藏叛乱在我边境扩大骚扰的批语……473
（1959年5月4日）
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的谈话……474
（1959年5月6日）
对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77
（1959年5月6日）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484
（1959年5月7日）
对中央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491
（1959年5月7日）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国庆的电报……493
（1959年5月8日）

对中央转发湖北等省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的批语……495
（1959年5月8日）
对驻印使馆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语…496
（1959年5月9日）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的情况报告的批语…497
（1959年5月9日、11日）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499
（1959年5月10日）
给周世钊的信……504
（1959年5月10日）
中央转发孝感地委关于贯彻农业方面六个问题指示的情况报告的批语……505
（1959年5月11日）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分配自留地的规定的批语……507
（1959年5月11日）

关于调查处理乡村干部中的打骂人问题给吴芝圃[1]等的信

（1958年11月29日）

吴芝圃同志，并请转寄河南省委的同志们：

一封信[2]送上，长葛县的，值得注意。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少数乡村有，可能不到百分之几的乡村，但是仍然要注意，要加以调查研究，作出处理，通报全省，引起注意。如能在省报公开揭露，则更好。但要分析原因，讲清道理，不要以使人害怕的态度去公布和处理。处理要细致。否则犯错误者，主要是那些犯了较轻微错误的同志们，会感到恐慌的，你看是不是呢？现在农村中，有一部分村乡，权力还是掌在反动分子手里，长葛县那件事可能就是这种性质的，也说不定。可能写信人有所夸大也难说，但是似乎真有那样的事情似的，从信的气氛可以感觉得到。究竟

---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2] 指河南省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的一封群众来信。信中反映，该社的社队干部打骂人的现象非常严重，被打的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党、团员和队干部，许多人偷跑在外。一些坚持党的政策而没有打人的干部也被另外一些干部扣上斗争性不强的大帽子，公社的领导对此不深入了解情况，也盲目提出批评。来信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从县到乡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有责任，要求上级机关派人进行调查。

如何，待查实方能见分晓。请酌处。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月廿九日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一）[1]

（1958年11月30日）

做什么事情都要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相结合，这么一种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的方法，否则搞不好。这次是不是泼李富春的冷水？计划要积极可靠，放在稳妥的基础上，还要鼓气，不要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接受一九五六年的教训。地方也有条条与块块的关系。第一书记是块块，分工的书记是条条，也要结合，第一书记要和工业书记结合。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总理插话：确非神秘、并不简单。□□：钢铁的指标各地还可研究，减一点对国家的计划不会受影响。钢、电、交按第二个方案，其他指标按第一个方案。）

六号、七号开中央全会，要不要提纲挈领讲一下，计划搞一个时期再看看。明年七月一日再定。粮食原来并没有计划翻一番，开了几次会议就提上去了。农业的“八字宪法”只管地，不管天（管不了日照和空气），天、地是对立的统一。好的东西不要字数太多，老子一辈子只写了五千多字。工业与农业不同，工业方面的相互关系牵制很多，搞钢必须搞煤、电等等，缺一环也不行。农业方面相互关系牵制比较少一点，党、群众、技术人员三结合，试验田、高产是对人类的一大解放。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三三制打破了许多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11月30日下午和武汉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保险系数，还是写进去好，时间上再灵活一些，再修改一下，全国大多数地方每人一亩左右。

人民公社再讨论两天，作好修改。这次很多问题展开了，回答了城市要不要办公社，肯定要办。民兵和家庭问题，杜勒斯攻击我们，说我们是奴隶劳动，破坏了家庭。资本主义早破坏了家庭，金钱关系，父不认子，各人开解。我们现在公社会养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工资差额略为展开一点，四倍左右或者更多一些。认为农民有平均主义倾向，不能过重悬殊，但也不能没有差额。苏联的工资差额悬殊太大，我们不照样学。将来，这样一点工资算什么？十五元算什么？总得有三十元，四十五元了，都提高到几十元差别就没有了，这是指的乡村，城市的差额还会更多一些。这是必要的，城市里不要砍掉黄炎培、梅兰芳、教授的工资，将来社会产品丰富起来，低工资提起来，完全接近了，就进入共产主义了。所讲按劳取酬和各取所需的问题，如何平均？由下长上去。

作风问题，以半天时间谈一下。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强迫与报假，枣阳县一个文盲未扫除，报告说是消灭了。强迫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阶级异己分子，一部分是蠢人。强迫命令的人究竟有多少？百分之一、百分之五还是百分之十？今年十二月或明年一月，各地都要开党代表大会，谈谈作风问题。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人民公社文件是从郑州会议搞起来的，有所准备，计划会议是条条搞的。华东现在走下坡路，过去没有想那些条件，有煤炭也运不出来。

一九五九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粮食是七千五百亿斤，明年增到

三千亿斤，达到一万零五百亿斤，每人平均一千五百斤以上。苦战三年，达到每人两千斤，薯面也还要有一点。今年来一个以多报少方针，留有余地。棉花今年报六千七百万担，明年一亿担。粮食收成到底有多少？是不是增加一倍左右？可以写增加百分之九十左右比较妥当。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各地议一议。

国际形势。赫鲁晓夫开记者招待会，在柏林问题上搞了一手，你不撤，我撤。赫鲁晓夫也懂得了搞紧张局势。我们也搞点紧张局势，使西方要求我们不要紧张了，让西方怕搞紧张局势，对我们有利。中苏会谈公报发表以后，台湾就开紧急会议，其实会上没有谈一句台湾局势问题。四国首脑会议不召开了，也说是受中国影响。其实会上也没有说四国首脑会议的问题。如果出远门，是不是安全？斯大林神经不健全，从前哪里也不去。各种材料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也没有了。杜勒斯十八日的谈话说，你们共产党人搞人民公社不要出那个范围，你们只管你们的事，不要管你们以外的事，我们就放心了。你不犯我，我不犯你。杜勒斯说我们搞奴隶劳劫，搞集权主义，说我们积累太多。他说总收入扣除工资，就是积累，他把这种积累叫做资本。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是列宁的公式。好好看看杜勒斯十八日的讲话。他承认我们的积累多，组织性强，哲学搞不赢我们。杜勒斯谈话的调子低，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不说了，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英国人老奸巨猾，美国人比较暴躁。英国人经常作战略和战术指导。杜勒斯讲世界五大问题：民族主义、南北两极、原子能、

外层空间、共产主义。这个人是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世界秩序研究会议，三千七百万教徒发出一封信。主张承认我们。杜勒斯说教会只要规定道德原则，细节不要管。

北戴河会议谈的八个观点灵不灵？还是灵的。北大西洋公约，向民族主义和本国共产主义进攻（重心是进攻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对社会主义阵营是防御的，除非出了匈牙利事件。但我们在宣传上是另一回事，还要说他是进攻的。不要自己被自己蒙蔽。李普曼写了一篇文章，说不是进攻，但说服不了苏联人民。谁怕谁多一点？李普曼主张把印度扶植起来抵制我们，看来惧怕我们，怕我们在亚洲、非洲争取领导权，很怕我们经济高涨。紧张局势归根到底对我们有利。戴高乐出现，横竖要出现，出现了，比较对无产阶级有利。中东美军早撤好，还是晚撤好？只有一个多月就走得光光的，证明他们撤走。台湾打炮有好处，不然民兵不能组织这样快。禁运、进联合国、和、战、打原子弹问题，比较对谁有利？怕好还是不怕好？横起一条心，不怕反而好，在一起议一议就不怕鬼了。杜勒斯好战。挨骂是假象，不是真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赫鲁晓夫过于谨慎，过于不平衡，是“铁拐李”。不是两条腿走路。人民生活才二百卢布，比我们稍微高一点，重工业偏大，偏于中央不重地方，偏于行政，缺乏群众路线。

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一点，松一点，比较集中，只搞两个文件。纸老虎问题，党内外尚有许多人不了解。有人说既然是纸老虎，为什么不打台湾？为什么还要提出赶上和超越英国？我写一篇短文回答这个问题，是真又是假，暂时现象是真的，长远看来纸

的。我们从来就是说，战术上要重视它，战略上要藐视它。不但对阶级斗争应当这样，对自然斗争也应这样，除四害、扫盲、绿化、血吸虫，不是一年可以实现的，要几年去搞才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三告台湾同胞书[1]

（1958年11月）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鉴于金门群岛国民党军队广大官兵的良好反映，本部关于双日停止炮击金门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这四种军事目标的规定，现在宣告推广到其他一切地区的军事目标，逢双日都不打炮，打炮一律于单日行之。有些目标，例如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单日也不一定打炮，但你们的飞机船只以不来为宜，免受可能的损失。禁止美国人护航，仍如历次文告所规定。周恩来总理两年以前即向你们建议举行和谈，合理解决国共两党历史纠纷，和平解放台湾地区，未获你们积极响应。美国人下死劲钳制台湾当局，不许他们和我们举行和谈，一心一意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人非常惧怕和平，非常惧怕国共两党重新接近，谈出一个和平局面来，妨碍他们孤立台湾和托管台湾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击破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有一天甩掉美国人那只钳制魔手，派出代表，举行和谈。我们的和谈是真和谈，谈成了，内战就可以宣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起草的三告台湾同胞书稿。后未发表。

告结束，全体中国人团结起来，一致对付外来的威胁，岂不是一件好事吗？美国人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团结、互信云云，讲讲而已，归根到底是靠不住的。尽管申明一千次，连你们自己也不相信。同胞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在美国人要把国民党置之死地的时候，国民党就会觉悟过来，和谈就有可能成功，对于这件事悲观是没有根据的。亲美派散布出来的一切悲观言论，希望你们最好不要听。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

在一份摘录斯大林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的批语[1]

（1958年11月）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

（一）增加社会产品，首先是生产资料；

（二）将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能掌握全部社会产品；

（三）高度文化水平，全面发〔展〕体、智，为此，必须：

（1）减少劳动时间至每天六小时、五小时；

（2）实行综合技术教育；

（3）改善居住条件；

（4）增加工资至少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其办法是：

（甲）直接增加货币工资；

（乙）重要『重要』是降低物价。

意见：基本点是极大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品。问题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增〔加〕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产品，没有政治挂帅，没有群众运动，没有全党全民办工业、办农业、办文化教育，没有几个同时并举，没有整风运动和逐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斯大林的三个条件是不易达到的。有了这些，加上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过渡条件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写在一份抄录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论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的材料上。斯大林的这段话是："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宣言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第一，必须切实加以保证的，不是神话般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而是全部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第二，必须用实行起来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来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其他某个社会经济中心能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来为社会谋福利。第三，必须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如果认为用不着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便可以达到社会成员的这种强大的文化高涨，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六小时，然后再缩短到五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自由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及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为印发宦乡报告重拟的标题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帝国主义内部矛盾重重，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宦乡报告）[1]

二

请小平印发。

毛

[1] 这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宦乡1958年11月26日给外交部的报告重拟的标题。宦乡在报告中说：自苏联提出关于结束四国占领柏林法规的动议后，西方恐慌困惑。这个动议，虽然只涉及一个柏林地位问题，但在实际上却牵涉到谁赞成德国真正和平统一，谁反对德国真正和平统一的问题。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过去口头上一直叫喊德国统一，但骨子里却力图加深德国的分裂，并使之永久化。德国人民对此是非常不满的。统治阶级中许多人士对此是不安的。目前在欧洲问题上，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十分突出。上与下的斗争方兴未艾，反对美英联盟操纵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风浪还在继续汹涌，现在德国问题和欧洲安全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又因柏林问题而重新激化起来。帝国主义阵营内部既然矛盾重重，国际政治斗争的主动权，无论从远东看，或从欧洲看，又都证明了只操在社会主义阵营手里。帝国主义者的日子是不好过的。

写在《参考资料》上的刘禹锡的一首诗[1]

（1958年11月）

高髻危冠宫样装[2]，
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
断尽苏州刺史肠。[3]

杜鸿渐　扬州

[1] 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11月10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〇四期上抄录的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诗《赠李司空妓》。这期《参考资料》中，以《美官员竭力诬蔑我人民公社运动，但承认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并说南十分注意这一发展》为题，刊载了合众国际社的电讯，其中说："毛泽东已经使他的国家野心勃勃地执行过去从来没有执行过的共产主义原则。这比苏联曾经试过的任何办法要厉害得多，而中国的统治者们的成败取决于这个办法是否成功。""毛泽东正在孤注一掷，看这个制度是否能养活这个国家。鉴于一再发生的旱灾和水灾——这些灾害已经使中国的饥荒，几乎成为司空见惯

的事——这是一种冒险的计划。”“这位共产党中国领袖正在把社会组织成最有效的生产单位——在纸面上。但是他也是在把潜在的反革命基础聚集起来，在事情不顺利时推翻他。这个制度的成功或失败所产生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中国的疆界。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的’共产党人，正如渴望从莫斯科获得较多的自由的东欧卫星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关切地注意着这一发展。”毛泽东在这几段文字下面划了横线，或作有着重号。他抄录的刘禹锡的诗就写在这篇电讯的天头和旁边。

[2]　刘禹锡原诗为“高髻云鬟宫样妆”。

[3]　《全唐诗》注：“禹锡赴吴台，扬州大司马杜公鸿渐开宴。命妓侍酒……刘于席上赋诗……杜韦娘，歌曲名。”

对李普曼[1]《苏联的挑战》一文的批语和批注

（1958年11月）

一

此件[2]印发。值得一看。

毛泽东

---

[1] 李普曼，美国专栏作家。当时任《纽约先驱论坛报》“今日与明日”专栏特约撰稿人。

[2] 指1958年11月14日出版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一二期刊载的新华社日内瓦12日电讯稿《李普曼说共产主义国家的力量在于苏中树立的实例，显示了把落后国家人民的力量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道路，西方的军事集团和基地包围政策不能遏止共产主义的发展》。电讯稿摘要报道了李普曼在1958年11月12日《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苏联的挑战》一文的内容。

二

注意：进展顺利。[1]

三

注：不见得，我是基本上相信的。[2]

---

[1]　毛泽东这个批语，加括号写在李普曼文章中以下一段文字之后："我们之间的基本争端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联——现在与它一起的还有共产党中国——在取得亚洲和非洲的领导权方面进展顺利。"

[2]　李普曼的文章说："苏联的疑心的内在动力是这样一种看法：美国和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决不容许——除非被迫——俄国和中国来完成它们在亚洲和非洲所领导的革命。在莫斯科——无疑在北京也是如此，当我们坚持说德国和土耳其的重新武装以及维持一个空军基地包围圈的做法是防止它们进行军事侵略的防御措施时，它们不相信我们的话。"毛泽东的批注，加括号写在这段文字之后。

为印发杜勒斯[1]批评我国人民公社言论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杜勒斯批评我国的人民公社，他向亚洲人宣传共产主义的坏处和资本主义的好处，杜勒斯大谈其政治经济学，表示他对我国大跃进感到恐慌。[2]

二

此件请小平[3]印发。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 这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上的演说重拟的标题。杜勒斯的演说全文载于1958年11月14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一三期，题为《杜勒斯在西雅图商会发表演说，大肆攻击和诬蔑我集体劳动和公社化，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幸福”，以抵制我国伟大成就对亚洲的影响》。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印发杜勒斯演说[1]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放心了。

---

[1] 指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958年11月18日晚在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说。1958年11月19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二三期刊载了杜勒斯演说的全文，题为《杜勒斯叫嚷在台湾海峡地区继续搞“不依靠武力”阴谋，为此甘冒“战争或疏远朋友”的危险，惊呼对社会主义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不能“防御”，须加紧颠覆和干涉》。其中说：共产主义的统治正在产生一个在工业上和科学上现代化的强大的国家。如果自由世界对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有效的抵抗，中苏统治者多关心自己人民的福利，少关心为了扩张主义的目的而剥削人民的日子就会更快地到来。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幸运地为一向存在于俄国和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自然的诚挚而友好的精神所支配。这个材料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

二

注意：作为11月18日杜勒斯演说的题目。

为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提要）和批语

（1958年11月）

一

美国一大批教会领袖主张承认中国

他们说，这样做有四大利益

他们想把我国拉过去，而他们自己则向中国钻进来

美国资产阶级已感到恐慌，感到被动，想要设法脱出这种情况。[1]

二

此件请小平[2]印发。

---

[1] 这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参考资料》的一则电讯稿重拟的标题。电讯稿原题为《美一批教会领袖妄图制造“两个中国”，佯称

主张承认我国和恢复我联合国席位》，刊载在1958年11月24日新华社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五三二期上。电讯稿转引中央社纽约11月22日英文电说：《纽约时报》从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报道，“美国新教领袖们”昨天一致通过一项声明，赞成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并且接纳它进入联合国，同时保障“台湾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权利”。这个声明是一封5000字的《致各教会书》的一部分，是由纽约市联合神学院院长约翰·贝奈特牧师领导的一个二十三人委员会起草的。声明说：“关于中国，基督教徒应该敦促我们的政府重新考虑它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台湾人民和朝鲜人民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同时也应该采取走向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和我国政府承认它的步骤。”“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赞成它。这种外交关系应该构成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更加广泛的关系的一部分。把中国大陆上的有效政府，目前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以外，在很多方面对这个大家庭都是不利的。这样做会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中国人民心中形成一种假象。这样做会使我国人民对中国发生的事情茫然无知。这样做将妨碍裁军的谈判。这样做将限制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我们强烈希望，恢复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关系，也可以使得恢复他们的教会和我们的教会的关系成为可能。”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人民日报》的两段指示

（1958年11月）

从九月份以来，宣传的火力比较集中。九月份以前，中心还不突出。《人民日报》总要冷静些。《人民日报》在三年困难时期，登了那么多鬼戏，宣扬有鬼无害论，至今没有进行批判，欠了账不还是不行的。迟早都要还。

《人民日报》一方面宣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方面又宣传有鬼无害论，自己把自己置于什么位置。

接见金日成时的谈话[1]

（1958年11月）

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是巩固的，今天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推翻我们这个国家，能够推翻我们这个党。我们好好地搞，是可以继续巩固的，但是我们还没有最后巩固，有可能我们来一个大失败，敌人全部地占领上海，占领武汉，占领北京，占领郑州这一条线，我们要退到西北西南山区，有这个可能。但是，我们保证能够经过几年的战斗，最后能够恢复我们中国，最后战败帝国主义。不能只看到现在发展顺利，我们随时要做好这个准备。

[1] 这是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时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

（1958年12月1日）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

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见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向阶级敌人作斗争是如此，向自然界作斗争也是如此。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十二年科学发展纲要[1]。这些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关于宇宙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发展的两重性，关于事物总是当作过程出现而任何一个过程无不包括两重性，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对立统一的观点出发的。一方面，藐视它，轻而易举，不算数，不在乎，可以完成，能打胜仗。一方面，重视它，并非轻而易举，算数的，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经艰苦奋斗，不苦战，就不能胜利。怕与不怕，是一个对立统一法则。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来。学生们怕考试，儿童怕父母有偏爱，三灾八难，五痨七伤，发烧四十一度，以及“天有不测风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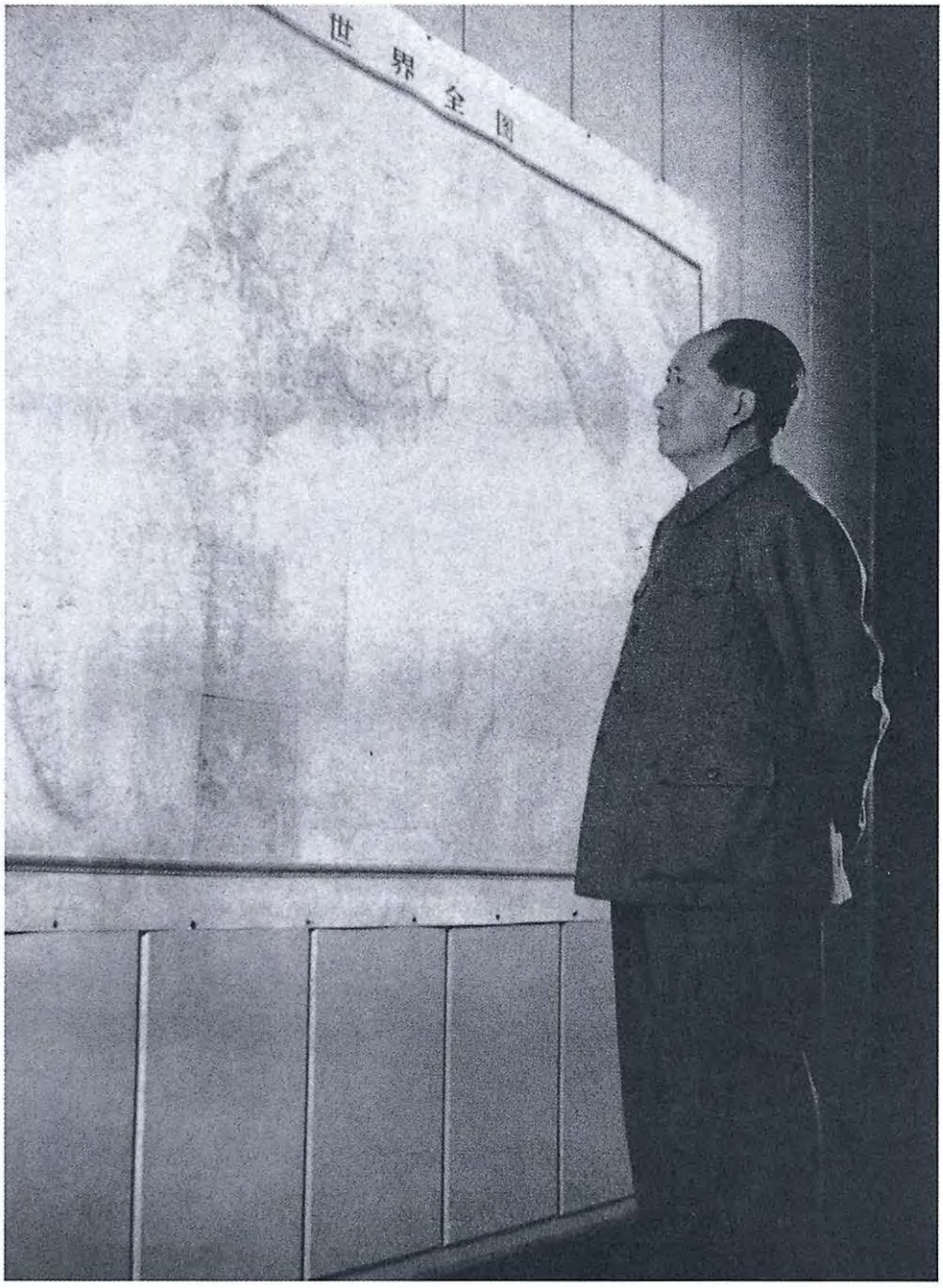
[1] 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这个草案是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的指示精神，从1956年4月开始，组织600多名中国科学技术专家，并邀请20多位苏联专家，经过半年的研究和讨论制订的。规划提出了国家建设所急需的57项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616个中心问题，并指出了各门类科学的发展方向。这个规划的实施，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迅速发展。

人有旦夕祸福”之类，不可胜数。阶级斗争，向自然界的斗争，所遇到的困难，更不可胜数。但是，大多的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首先是共产党人，除掉怕死鬼以及机会主义的先生们以外，总是将藐视一切，乐观主义，放在他们心目中的首位的。然后才是重视事物，重视每件工作，重视科学研究，分析事物的每一个矛盾侧面，钻进去，逐步地认识自然运动的法则和社会运动的法则。然后就有可能掌握这些法则，比较自由地运用这些法则，一个一个地解决人们面临的问题，处理矛盾，完成任务，使困难向顺利转化，使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使革命的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化，使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年产几百万吨钢向年产几千万吨钢乃至几万万吨钢转化，使亩产一百多斤或者几百斤粮食向亩产几千斤或者甚至几万斤粮食转化。同志们，我们就是做这些转化工作的。同志们，可能性同现实性是两件东西，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1]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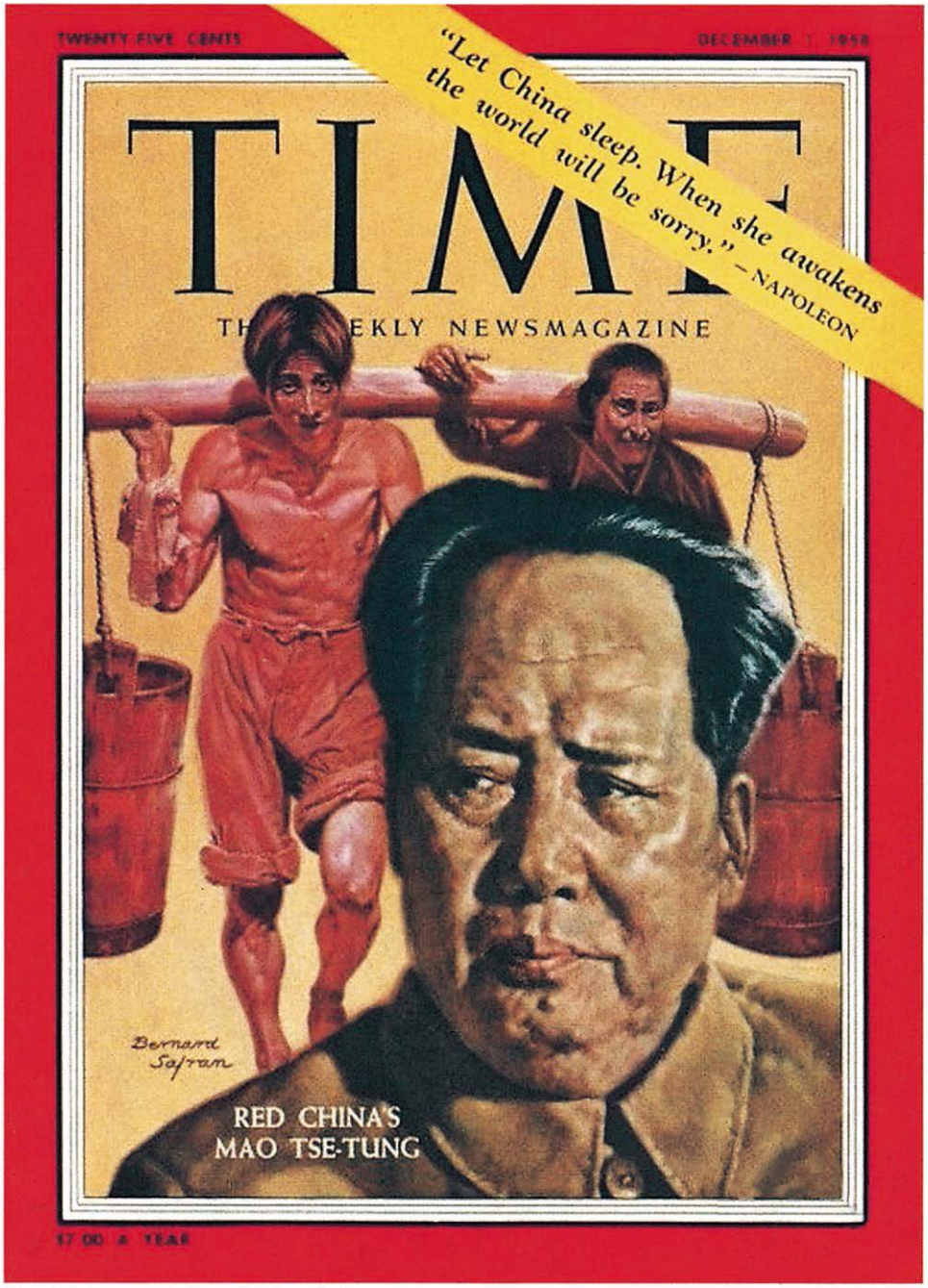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在武昌

---

[1]　在这句之后，原文还有“观潮派，算账派，属于这一类”。1961年9月16日，毛泽东在审阅一本干部学习材料中收录的这段话时，删掉了这十一个字。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撰写《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图为毛泽东在看世界地图。



1958年12月1日，毛泽东第三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关于注意各地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批语

（1958年12月1日）

一

最近几期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载了许多件各地（一部分人民公社）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材料，很值得看一下，请各同志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二

此件[1]请小平[2]同志印发。

毛

[1]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8年11月28日向毛泽东报送的

关于湖北省随县金屯乡干部弄虚作假，搞“六万斤卫星”试验田情况的报告。报告说，今年9月，随县县委在得知金屯乡光大九社的一亩中稻试验田放出六万斤的“卫星”后，到现场调查，结果发现，这块试验田是乡社的一些负责人强迫群众用一天一夜时间将9.75亩中稻拔掉移栽上去的。问题弄清后，县委对这个乡进行了整顿，并对有关干部作了处理。现在干部的作风有了很大转变。毛泽东的批语及这个报告作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文件在会上印发。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印发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和批语[1]

（1958年12月1日）

一

共产党捉不完，反动派大恐慌，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大体相同的情况，不只是吴庭艳[2]一块地方而已。

---

[1] 本篇第一部分是毛泽东为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一份关于南越政治、军事情况动态而拟写的标题。这份情况动态原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印的刊物上。情况动态中说，南越吴庭艳统治集团在伊拉克革命爆发和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紧张的形势下，暴露了恐慌不安的情绪。南越报纸提出“美国应该坚决守住中东、金门和东南亚”，但表现出对美国缺乏信心，忧虑自己的命运。不仅如此，南越统治集团更害怕内部不稳爆发反吴事变和畏惧人民及北越的力量。最近，它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如加强“诉共”活动和武装扫荡，以破坏越南劳动党的组织和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在行政部门中成立了“行政人员考核委员会”，又在各省成立有军事人员参加的“安全委员会”，并在最近的国会中大力酝酿通过“反共法”。总之，南越吴庭艳集团惧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形势，一方面竭力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军事上的防御力量；同时也不放松对北越进行阴谋破坏活动。

[2] 吴庭艳，当时是南越政府总统。

二

请小平[1]同志印发。

毛

十二月一日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红线女[1]题词

（1958年12月1日）

一九五七年，香港有一些人骂红线女，我看了高兴，其中有黄河。他骂的是他自己，他说他要灭亡了。果然，已经在地球上被扫掉，不见了所谓黄河。而红线女则活着，再活着，更活着，变成了劳动人民的红线女。一九五八年，在武昌，红线女同志对我说：写几个『个』字给我，我希望。我说：好吧。因写如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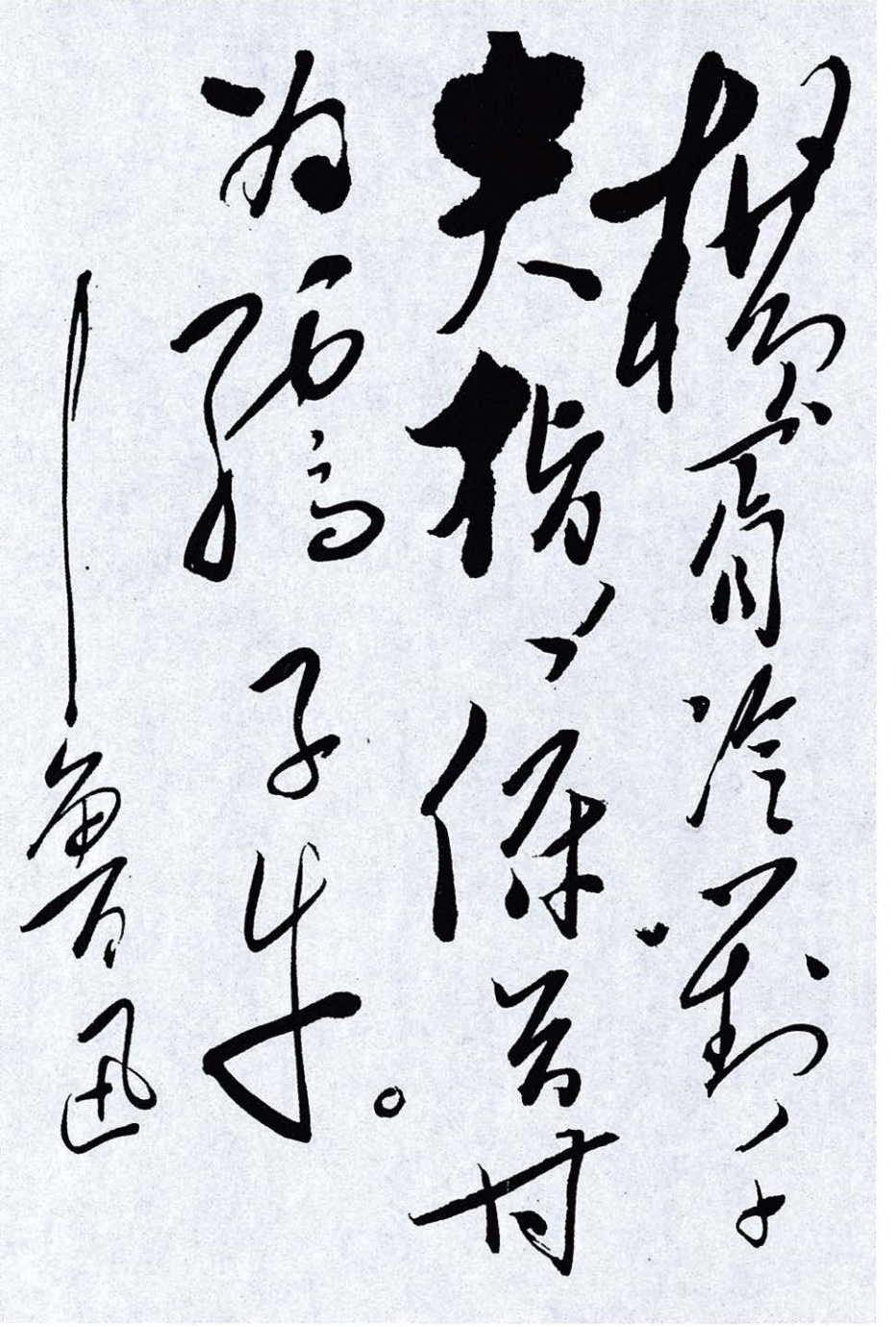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鲁迅

[1] 红线女，原名邝健廉，粤剧艺术家。抗日战争胜利后去香港，1955年年底回广州，加入广东省粤剧团。



毛泽东为红线女的题词。

关于我国决定同苏丹建交的复电

（1958年12月1日）

喀土穆

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了阁下1958年11月30日的来电[1]。我深信苏丹共和国对我国的承认将导致贵我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地发展。我谨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祝苏丹共和国繁荣，人民幸福，并祝阁下和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维护苏丹人民利益的事业上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于北京

---

[1] 指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中将1958年11月30日给毛泽东的电报。电报中说："在我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露出曙光的时候，我高兴地通知阁下，苏丹共和国已经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期望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代表苏丹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苏丹政府和人民，祝阁下和中国人民幸福、昌盛和永远安宁。"

祝贺加涅夫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的电报

（1958年12月1日）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吉·加涅夫同志：

欣悉你光荣地获得保加利亚人民的重大信任，当选为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衷心的祝贺。

中保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全面合作对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事业将起着重大的作用。祝你在保加利亚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捍卫人类和平的事业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对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12月5日）

一

即送小平、乔木同志：

此件[1]写得很好，比起《人民公社决议》[2]来，好得很多。可即印发付讨论。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上午八时

---

[1] 指胡乔木1958年12月4日向毛泽东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稿。决议稿提出，动员全国人民为1959年的2200万吨钢、1400万吨钢材、10500亿斤粮食和其他一系列伟大的目标而奋斗，为1959年钢、铁、铜、铅、机床、发电设备等产品的产量超过英国而奋斗。决议稿还说，1959年计划的决定，是一个既反对太冷又反对太热的过程。它是一个跃进计划，是一个苦战计划。非跃进，非苦战，我们的国家不能较快地过关。它又是一个比较有根据的计划，它的指标比1958年拟议的一般要低得多，因为不作这种调整，就缺少实现的客观可能性。这个决议后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

[2] 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二

注意："教导""指示"这类字面，用于个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气氛，使人看了不顺眼，以后不可再用。[1]

三

钢铁战线上的"小土群"转向"小洋群"，这是群众运动的必然的前进过程；但是土铁、土钢、土钢材、土机械、土铁路等等，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特别是在地方工业、公社工业中，仍将起重大的作用，千万不可以小看了它的作用，小看了就会犯错误。同时，工业战线上的小型、土法的群众运动，还必须在炼钢、炼铝、采煤、发电、化工、轻工等方面继续发展。同志们须知：一万年〔后〕还会有跟大企业并行的中小企业的，还会有那时的"小土群"和"小洋群"，还会有"土洋结合"这种事情。不过那时所谓"小土"的内容和形式，跟现在大不相同了吧。宇宙是一个统一的多样化的宇宙，这是马克思主义宇宙观的一条法则。[2]

---

[1]　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的草稿中，有"毛泽东同志很久以来就教导我们""毛泽东同志又指示我们"这样的话，毛泽东审阅决议草稿时，分别将其中的"教导""指示"改为"告诉"，并写了这个批语。

[2]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议稿中的一段文字。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河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报告的批语

（1958年12月5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可印发，供参考。

毛泽东

十二月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8年11月28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报告说，我省农村在今年9月上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建成公社953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9.95%。从9月下半月开始，在农业丰收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我们从改革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组织群众的集体生活和加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三个方面进行巩固人民公社的工作。（一）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确定在全省农村公社中普遍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这个新的分配制度比以前的按劳动日计工付酬的分配制度有更大的优越性，现在全省各公社正在推行，到今年12月可以全部完成。（二）关于群众的集体生活问题。到10月下旬统计，全省建成食堂23.5万多个，参加食堂的人数达3482万人；建立托儿所213217个，幼儿园101633个，入托儿童440多万；建立幸福院13599个，入院老人近10万。（三）关于加强对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0月间即作了具体布置，现在正向普遍和深入发展。

关于当前宣传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1958年12月6日）

一、反对浮夸作风。不是追求责任，而是接受教训。自大跃进以来，在通讯社、报纸、广播的宣传工作是取得一定成绩的，对推动大跃进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宣传也有些问题，使思想上发生了一些混乱现象。这是由于大跃进形势来得很猛，我们又缺乏经验。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很难免的。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作风。不追究责任，而是要取得教训。一定要作些检查，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我们的大跃进。过去强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苦战三年。放“卫星”“三化”，起了很大作用。总的方面是对头的，就是在宣传的分寸上有些问题，界限掌握得不很准。

二、放“卫星”对不对？在开始是好的，但老是放下去就值得研究了，长期下去会造成人为的紧张，不见得好。特别是有些单位放的钢铁卫星。人民日报登“这个省、县能做得到，那个省、县为什么做不到”，对各地压力很大。运动搞起来了，不要这样干，人民日报在宣传广西鹿寨县炼钢时，连续写了两篇社论，大家都去参观，但事实上数量没有那么多，质量也很差，很多是烧结铁，影响不好。宣传工作中光讲成绩，不讲缺点。如河南今年成绩很大，缺

点也不少，只讲成绩，会助长下边的浮夸作风，急躁情绪，这是不对的。文艺界放“卫星”时，不要这样宣传，因为放出了“卫星”后，还要群众承认，还是先搞出来以后，群众说“卫星”才算是“卫星”。

三、宁可少说，不可多说。对于生产成绩的数字，各省都公布出来了，但很难对起总数，今后发表统一的数目就行了。今年粮食产量翻了一番多，但究竟多少，说法不一，有说一万亿斤，有说九千亿斤，也有说七千五百亿斤的，我说就七千五百亿斤的好。报道中究竟说多好呢，还是说少好呢？说少好，说少了，顶多落个干劲不足，说少了结果多，粮食还在。说多了，事情就不好办。粮食翻一番，在全世界是少有的，现在有些人就不相信，如果说多了，拿不出东西来，不单对你那个数字不相信，而且会把我们整个成绩都推翻了，对党的威望有损失。

四、郑州会议后，宣传工作中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

（1）防止夸大消极面，不要认为过去我们都是搞“左”了，现在又要纠偏，不要只讲坏的不讲好的，不要说紧张得不得了，不要说过去糟得很，不要造成一种纠偏空气，要实事求是。实际上成绩是主要的。

（2）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在宣传中不是要泼冷水，而是在水缸里放些明矾，使水澄清一些。

（3）要考虑国际影响，现在国外许多人怀疑我们大跃进的成绩。我们不能说这是浮夸，那也是浮夸，你说了，人家就更不相信了，为了防止副作用，要从正面宣传。如说关心群众生活，不要说过去生活搞得糟，要说一面抓生产，一面抓生活，民主与集中要结合讲。不要说过去不民主，要说管理民主化。

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同志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越论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本来准备结束这一讨论，现在要继续讨论三个月，有教育意义。郑州会议有些东西不宜宣传，有些内容在党内宣传，有些内容在党外宣传。搞不清楚的不要急于宣传，应请示。

五、破除迷信。不是要否定科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要很好结合。现在宣传工作中提倡敢想、敢说、敢干，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报纸的标题比较生动，能吸引人，这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但有些不很正确，不管什么都加以诗化。经济工作和写诗不一样，要切实，浪漫主义有一定限度，反对浮夸。运用群众语言有进步，但有些滥用，群众语言变成文字时，一定要求正确性、确切性、科学性。

六、对中央各领导同志到各地视察时的报导的问题。中央报纸很注意这些报道，对各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把领导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作风传播出去了，但也有些缺点，把负责同志的每句话、衣服的颜色、笑了一笑、什么时候点了一下头等小动作，写了又写，不必要。有的写群众等领导同志，等了很长时间，给人以官僚主义的印象，有些将领袖写神化了，这样报道不好。有些领导同志在视察中对一些问题，随便点点头，并没有肯定或者考虑要推广的，但报纸上就加以肯定了，有些事就造成被动。报道□□同志在河南视察，周总理在清华大学视察时，都有类似现象，今后对中央负责同志视察的报道，由中央规定。

（1）只限于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同志；

（2）写成后必须交本人审阅，不能随便发表；

（3）中央报纸不得随便转载地方报纸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宣传问题。好的方面是主要的，但在宣传中也有片面性，违反中央精神的也有，有些问题只讲搞劳动，不讲搞学习。现在有的中学与大学把许多基础课程都放松了，这是一种危险。学校在基础课上打不好基础，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的。另外，我们现在的学校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一般的大中学校，以学习为主，另一种是红专学校，以劳动为主。但现在人们中有一种趋势，想将两种学校搞成一种红专学校，要纠正。两种学校都要，否则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行的。在学校中过分强调社会化，强调学生住学，这作为方向是可以的，有的做得过急，会造成不好的结果。

八、对家庭问题的宣传有很多缺点，强调了斩头去尾，男女分居，各地对此反映非常反感，有些人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对“家庭”两个字都不可以提，可成立父母兄弟姐妹“小组”。这些东西现在不要宣传，将来的家庭，到底是什么样式，还不清楚，不宣传它，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也没有什么妨碍，宣传了实际意义不大，反而造成混乱。

九、对城市公社化的宣传问题。城市公社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农村中地主富农都被消灭了，但城市中还有资产阶级，要集中起来搞生产还没有把握，究竟怎么搞还没有经验，现在可积极试办，但不宜在人民日报宣传。阳泉市大量调整房子的事，这在小城市当然可以，因为房子质量差不多，但在上海、北京就不行，在城市中还有一部分人生活悬殊很大，住宅不一样，还有一部分人不从事生产，要调整房子会天下大乱，所以暂不要宣传。

十、对农业问题的宣传。农村大跃进以来，农业跑到工业前面，这是一种实际情况，农业过了关，这是一种实际情况，但也有

一些人造成错觉，认为农村先进，城市落后，农民老大，工人老二。究竟农民先进还是工人先进呢？这要从三方面看：（一）从所有制看。工人是全民所有制，农民是集体所有制。（二）对国家的贡献来说。鞍钢一个工人一年生产一万八千元，所得工资八百元，贡献很大，而农民是无法和工人比较的，农民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丰收地区，对国家可拿出贡献来；一种是刚刚可以供给自己生活的；还有一种是国家要补贴的，如灾区。（三）农民组织纪律性不如工人阶级。所以今天农民还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共产党来领导。

十一、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不要公开对外宣传。该书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些缺点，苏联把这本书批判得很差，如我们公开讨论，那样就不好。

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所有制的标准，不要宣传，最好要慎重。我们和苏联的标准不一样。苏联是一九三六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它有两个条件：一条是消灭阶级，一条是工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七十，如果宣传了我们的标准，那么等于说苏联现在还未建成社会主义。

1958年12月7日，毛泽东在洪山宾馆和红安、麻城县委书记座谈。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住地。

印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三篇文章[1]的批语

（1958年12月7日）

印发。极好看。请小平[2]即刻处理。

毛泽东

十二月七日上午十时，在武昌

此件用后退毛。

---

[1] 《参考资料》专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中的三篇文章是：《捷红色权利报载文谈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成就，说我国巨大的革命发展对于全人类有重大意义，认为毛主席的帝国主义寿命不长了的论断符合世界的发展》《捷红色权利报驻京记者热情赞扬北京全民炼钢运动盛况》《瑞士劳动党书记范桑著文谈我大跃进，说我全面大跃进是对“马克思主义硬化”的滥调响亮的回击》。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为印发《张鲁传》写的批语[1]

（1958年12月7日、10日）

一

晋、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当〈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为印发《张鲁传》写的两个批语。

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是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来得及将农民中的上层和中层造成资本主义化，但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却在几十年中将大多数农民造成了一支半无产阶级的革命军，就是说，替无产阶级造成了一支最伟大、最可靠、最坚决的同盟军。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七日，在武昌

二

张鲁传

（陈寿三国志·魏志·卷九，裴松之注）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冯〈洪〉太尉误走魔鬼”有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往〉，同志们看过了吧?），张修，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三世，行五斗米道。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其法，『信教者』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于武昌

对农业部党组关于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8年12月8日）

[1] 指农业部党组1958年11月20日关于全国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情况给中共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后附有全国土壤普查工作现场会议关于开展全国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的意见和关于群众性土壤普查鉴定技术要点。农业部党组的报告说，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深耕改土和肥料问题的指示，我部责成中国农业科学院会同农业部土地利用局，于10月21日至11月5日在广东省新兴县召开了一次土壤普查鉴定工作现场会议，会议的基本情况和提出的建议是：（一）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已成为推动农业连续跃进、不断增产的重要措施之一。现在全国已完成10个专区209个县的土壤普查，其中广东省已基本搞完，部分省区正在由点到面的展开，大部分省区已进行过试点或正在进行试点。（二）土壤普查鉴定工作带来的好处是：（甲）摸清了土地资源和土壤分布情况，为人民公社和县以上各级党政机关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提供了必要的资料。（乙）摸清了土壤的底细，打破了以往不切实际的一般推测，为深耕改土、因土苗施肥找到了对症下药的科学依据。（丙）打开了群众和干部的眼界，增强了更大跃进的信心。（丁）在农民中培养了大批的土壤科学技术干部。（戊）在群众性的土壤普查鉴定的基础上，为克服我国土壤学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性，发展反映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实际情况的农业土壤学、土壤耕作学、土壤改良学、农业化学，以及绘制全国的大比例尺土壤图创造了条件。建议尚未进行土壤普查鉴定的地区，各级党委应在今冬明春将这项工作列入日程。

小平[1]同志：

请问一下，此件印发没有？如未，请发，让同志们带回去看。因为此件很有用。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对同意毛泽东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决定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8年12月8日、9日）

一

请小平同志即刻印发。

毛泽东

十二月八日

二

退小平同志印发各同志。请各有关同志今晚即以电话将此件通

[1] 本篇收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稿时写的三个批语和对决定稿的修改。其中：本篇一写在全会决定的初稿上；本篇二写在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印发决定稿给毛泽东的信上；本篇三写在毛泽东最后修改的全会决定稿上；本篇四是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他不作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这个决定于1958年12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知各省市自治区，在明后两天至迟大后天（十二月十二日）开完电话会议，传达到人民公社。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下午五时半

三

小平同志：

有几个字的修改，不要再印，只在发表时照改稿登报就是。阅后，请交尚昆[1]办理。

毛泽东

十二月九日

四

几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曾经多次向中央提出，希望不再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务。中央全会在经过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虑以后，决定同意毛泽东同志这个提议，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不再提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候选人。中央全会认为，这完全是一个积极的建议。因为毛泽东同志不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样，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都更为有利。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人民公社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8年12月9日）

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八届六中全会

第一个问题：人民公社的出现。

第二个问题：保护劳动热情的问题。

对犯错误的干部90%以上，耐心说服，不予处分，叫他们作些自我批评就够了。

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2%～3%～4%～5%，则要加以轻重不同的处罚。

对谎报也如此，90%以上，说服，1%～2%～3%，分别处罚。

总之，处罚的极少，教育的极多，就能保护广大干部的劳动热情。

对干部如此，对群众也是如此。

第三个问题："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这个口号的问题。

这个口号是否适当呢？能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吗？"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不是好些吗？在南宁会议，原来就是这样提的，何时推广到"全国"去了的呢？没有经过认真的分析和集体的决定。

三年可能搞3,000万～4,000〔万〕吨钢，这就可以算作“基本改变全国面貌”吗？

到1962年，5,000万～6,000万吨钢，叫作全国基本改变面貌，不是好一些，不是较为切合适〈实〉际些吗？此事值得商量一下。这样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至十五年彻底改变，即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我们内盘〈部〉如此设想，不登报，不是较为好一些吗？

五年基本改变，这样提，而其结果是三年或四年基本改变了，有何坏处呢？

学习曾希圣的“机会主义”：

土石方8亿～16亿～32亿～64亿，有何不可？

我以为马克思是赏识这种“机会主义”的。[1]

第四个问题：党内争论问题。

几十万干部性急了一点，没有作历史的，全局的，国际主义的分析。

冲天干劲，革命热情，极可宝贵。

其缺点，可以在实践中，同志们的辩论中，在几个月内，大体得到解决。

可能有几万干部，忧心忡忡，为了向共产主义事业负责，建议

---

[1] 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毛泽东讲话中说：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工作中，开始计划搞8亿土石方，曾希圣提议翻一番，变成16亿。8亿是“机会主义”，16亿是马克思主义。可是没有几天又提高到32亿，16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最后到了64亿。我们把改变全国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我愿意当，当了有味道。马克思会赏识这种“机会主义”的，不会处罚我们。

不要太急了吧，有些问题等一年二年去作结论，不是较为稳当些吗？这类同志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懂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问题已经成熟了，国内国际都十分迫切地要求答复许多问题。不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蔓延开去如何得了呢？

作这样两方面的分析，可不可以呢？

第五个问题：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

研究斯大林（他是第一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虽然有许多缺点和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第一、二、三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样几本书。

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五〈六〉个问题：研究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在我国，在1958年有一个很大的发展。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

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思想，确立了。

中央统一领导与地方各级（直至公社的生产队）分级管理的思想，确立了。

大洋群，中洋群，小土群，洋土结合群，总之，大型与中小型企业的对立统一，洋与土的对立统一的思想，确立了。

农业中，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三三制的耕作制，以深耕为中心的水、肥、土、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的思想，确立了。

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内：社会主义的时代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对立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

并且也包含了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这些思想被提出了。

提出了大集体、小自由的思想

提出了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思想

在武昌，提出“实事求是”地制定1959年经济计划，又热又有冷，雄心与科学分析相结合，避免了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而产生的不切实际的缺乏根据的3,000万〔吨〕钢的可能是孙悟空式的危险，把我们的脑筋压缩了一下，留有余地。如果1959年可能的话，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这个计划吧！

联系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世界上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必要性，提出一定要让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而我们则一定要后进入。在可能性上，我们也可能只能后进入，不可能先进入。这样设计，就避免了一个违反国际主义、有利于帝国主义、不利于共产主义的错误。是不是一个错误呢？可能是。

第七个问题：十五年纲要，目前是否可能作出来的问题。

我们可以每年议一次，在1959年、1960年两年内，或者还要加1961年，共三年，才可能制定。

因为在可能和需要两个问题上，我们都缺乏根据。10年，4亿吨钢，有什么根据呢？大概到1962年，就可能做出一个长期计划了，例如10年。

第八个问题：

1958年的军事有一个大发展，大整风，军长当兵，参加生产，大办民兵师，这是几件大事。

第九个问题：

1958年，改革了教育制度，实行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件大事。

第十个问题，谈一下两种可能性：

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巩固和垮台两种可能都存在。垮台是部分的和暂时的。

党的巩固和分裂，都可能。小分裂是必然的，几乎每天都有，无此不能发展。大分裂也有可能。大、中分裂都是暂时的。

人民共和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如果有灭亡的情况出现，它只是暂时的，而世界上资产阶级的灭亡，则是永久的。

个人要准备随时有灭亡的可能，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第十〔一〕个问题，辞掉共和国主席：

要做一个正式决议[1]

要请大家在三天内用电话会议立即做一次宣传

是为了积极奋斗，而不是临阵脱逃。

群众中，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要预料到。宣传工作做得不好，可能使我们处于被动，犯错误。

第十一〈二〉个问题：

1958年的国际形势有大发展。烂下去，好起来，经过长期曲折，估计战争可能性。（完）

中央委员会离开首都在武昌开会，有极大好处。

---

[1] 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即将作出的《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二

（1）成绩是主要的，不能估计过低

（2）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进入全民所有制的问题，即大约两个五年计划时间内进入，一部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进入，大部分在第二〈三〉个五年计划内进入

（3）不忙于宣布消灭阶级

消灭剥削与消灭阶级问题（思想上与政治上的地主、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仍然存在）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的危险性

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的结合。

（4）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有矛盾，按全国一盘棋原则去解决

（5）57亿～67亿的进出口，比去年增20%

对外贸易方针：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主〈辅〉，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帮助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独立经济。

对外贸易只能起辅助作用，主要靠国内市场

1959年70亿元～80亿元的进出口数量

（6）条件于〈与〉可能出右倾

没有第三阶段

看若干历史问题决议

（7）美、南大骂：大跃进；人民公社；东风压倒。

从农业中抽15%的劳动力是可以的（四川3,000万劳动力中抽500万）

明年二月再开会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1958年12月9日）

讲些意见，不是结论，决议就是这次会议的结论。

一、人民公社的出现，这是四月成都会议、五月党代表大会没有料到的。其实四月已在河南出现，五、六、七月都不知道，一直到八月才发现，北戴河会议作了决议。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也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我们曾经说过，准备发生不吉利的事情，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和党的分裂。但也有些好事没料到。如人民公社四月就没料到，八月才作出决议。四个月的时间在全国搭起了架子，现在整顿组织。

二、保护劳动热情问题。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一百斤报五十斤，不怕，本来是五十斤报一百斤就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怎么处理？犯错误的人在干部中是少数，对于犯错误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采取耐心说服的方法，一次、二次……不予处分，作自我批评就够了。大家议一议。不能以我一个人的意见就作为结论。对于严重违法乱纪，脱离群众的干部，约占县、区、乡干部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

之三、百分之四、百分之五到此为止。各地情况不同，应加以区别。对这一些人，应该予以处罚，因为他们脱离群众，群众很不喜欢他们。没有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不处分的方针，就不能保护干部。就会挫伤干部的热情，也会挫伤劳动者的热情。没有对严重违法乱纪的一部分人，经过辩论，区分情节，给以轻重不同的处分，也会挫伤群众的热情，有些特别严重的要作刑事处理。总之，要有分析，其中有些是阶级异己分子，有些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但情节恶劣的，如打人、骂人、押人、捆人，要给予处分。湖北已经撤了一个县委第一书记，他在旱情严重时，没有抗旱，而谎报抗旱。总之处罚的要极少，教育的要极多，这就是能保护干部的热情，也就保护了劳动者的热情。对群众中间犯错误的人，方针也是如此。

三、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哪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曾希圣想说服我，拿出三张河网化地图，说农村可以基本改变。农村也许能够办到，至于全国，我看还要考虑一下。三年之内，大概能够搞到三千万到四千万吨钢，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搞三四千万吨钢能说基本改变了面貌？这个标准，我看提得低了一点，不然，以后就没有什么改头了。以后五千万、六千万、一亿、二亿，算什么呢？我看大改还在后头呢！因此三年内还不能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到一九六二年大概有五六千万吨钢。那时也许说基本改变了全国面貌。那时就有英美今天的水平了，是不是到那时还不说基本改变。因为六亿多人口的国家，面貌改得这样快，化装都化好了？到底怎么说好，值得

商量一下，因为报纸已在大宣传。或者提五年基本改变，十年到十五年彻底改变，如何最好，请同志们考虑，或者超过英国叫基本改变，超过美国叫彻底改变。勉强去超，累得要死，不如稍微从容一点。假如不要这么多年，三年、四年就完成了怎么办？能提前实现也好嘛！提前的时间长一点，结果时间缩短了，我看也不吃亏，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四、党内外某些争论问题：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概有几十万、几百万干部在议论，有一大堆问题搞不清楚，一人一说，十人十说，没有作全面分析，深入分析。国际上也有议论，大体上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性急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有了这个决议，经过这个决议，经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他们在实践中、辩论中可以大体上搞清楚。“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可能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跤，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这个决议主要锋芒是对付性急的，也给了观

潮派、算账派以答复，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现在国内国外对这个问题议论甚多，杜勒斯也在论议，他说我们搞奴隶劳动，破坏家庭，说我们剥削太多了，积累太多，因而建设的速度快，他们剥削少，所以速度慢。中间阶层、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也都在议论纷纷。各国无产阶级、外国同志出来为我们辩护，他们的根据就是北戴河会议和报纸上的消息。我们如不作答复，一大堆混乱思想就会蔓延开来，社会出现很多无政府状态，各搞各的，省、地管不了县，县管不了社，成为脱缰之马，所以一方面反对太急，一方面答复这个问题。

五、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在这几个月内。读一读斯大林的《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拿出几个月时间，各省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目前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郑州会议我曾经提过这个建议，我写了一封信建议大家研究。

六、研究辩证法问题。郑州会议时，不知是哪位同志提出“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提法很好。如果“大自由，小集体”，杜勒斯、黄炎培、荣毅仁都会欢迎的。

要抓生产，又要抓生活。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

属于辩证法范畴的。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例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这几种思想，在我们党内已经确立了，这很好。小土群、大洋群也是并举的，还有中洋群，例如唐山、黄石港不是中吗？有没有小洋群？也有。还有洋土结合群。总之，复杂得很，这些事在社会主义阵营，有些国家认为是不合法的，不许可的。我们许可，在我们这里是合法的。许可好还是不许可好？还要看几年。但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啥也没有，穷得要命。搞些小土群也好嘛！全是大的太单调。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种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人不喝不行，植物不喝也不行。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斯大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把三种所有制，即集体所有

制、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绝对化，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产生疑问。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万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万吨至二千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地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这里也要联系到国际主义，要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联系起来。要和整个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团体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不要抢先。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

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苏联的科学家有一百五十万，高等知识分子几百万，工程师五十万，比美国多。苏联有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还只有这么一点。他积蓄的力量大，干部多，我们才开始。所以可能性也是成问题的。赫鲁晓夫提出的七年计划，还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提出两种所有制，逐步合一，这是很好的事。一个不应该，一个不可能。即使我们可能先进也不应该（先进）。十月革命是列宁的事业，我们都不是学习列宁吗？急急忙忙有何意思？无非是到马克思那里去请赏。如果那样搞，可能在国际问题上犯错误，要讲辩证法。要注意互相有利，辩证法有很大的发展，就涉及到这个问题。

七、郑州会议搞的十五年纲要，这次搁下没有谈，可能不可能，需要不需要，都缺乏根据，不仅缺乏充分的根据，而且缺乏初步的根据，苏联和美国的经验，都不能证明搞那么多，是不是可能？就是可能了，也找不到买主。因此目前不定这个纲要，我们可以每年到冬季拿出来谈一次。明年、后年、大后年都不作这种长期计划。大概到一九六二年可以作一个长期计划，再早是不行的，全党全民办工业搞了几年，可能和需要的问题也许到那时可以看出一点。这次会议没有谈。收起来了，有些同志失望了。

八、一九五八年军事工作有相当大的发展，一是大整风，二是官长下连队当兵，三是参加生产，四是大办民兵。自从六月在北京开整风会议后，各级一直开下来，到现在可能已经开得差不多了。训练，这件事，也不能丢，如果全去整风、生产、炼钢、搞公社、搞水利，那也不行，军队总是军队，训练是经常任务。

九、关于教育制度的改变。实行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当然也发生了一点问题。例如，有的学生不想读书，劳动搞出味道了，如果很多人不想读书就成了问题。成了问题就开会，开了会又会读书。

十、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东西。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巩固与垮台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如果不准备，就会大垮台。巩固与垮台是对立的两面，我们的决议是为了使它巩固，如果不垮几个就不好巩固。譬如，托儿所死几个娃娃，幸福院死几个老头，幸福院不幸福，还有什么优越性？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也不会垮，是不切合实际的。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时，一个中央分裂为两个中央，在长征中与张国焘分裂，高饶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经常的。去年以来，全国有一半的省份在领导集团内发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脱发、脱皮，这就是灭亡一部分细胞。从小孩起就要灭亡一部分细胞，这才有利于生长。如果没有灭亡，人就不能生存。自从孔夫子以来，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你说不做，实际做了。精神上要有准备。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灭亡总会有的。没有分裂，不利于发展。整个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整个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党和国家，是要灭亡的。但在它的历史任务未完成前，是要巩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准备分裂。没有准备，就要分裂；有准备，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暂时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饶事件、莫洛托夫事件是中型的。

每个支部都在起变化，有些开除，有些进来，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错误。永远不起变化是不可能的。列宁经常说：国家总有两种可能，或者胜利，或者灭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列宁是不隐讳灭亡这种可能性的，我们人民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性，不要否定这种可能性。我们手里没有原子弹，打起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占北京、上海、武汉，我们打游击，倒退十几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时代。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准备，大搞钢铁，搞机器，搞铁路，争取三四年内搞几千万吨钢，建立起工业基础，使我们比现在更巩固。我们现在在全世界名声很大，一个是金门打炮，一个是人民公社，还有钢一千零七十万吨这几件大事。我看名声很大，而实力不强。还是“一穷二白”，手无寸铁，一事无成。现在不过有一寸铁而已，国家实际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们是强国，在军事装备上和经济上是弱国。因此我们目前的任务是由弱变强。苦战三年能否改变？三年恐怕不行。苦战三年，只能改变一部分，不能基本改变。再有四年，共七年时间，就比较好了，就名副其实了。现在名声很大，实力很小，这一点要看清楚。现在外国人吹得很大，许多报纸尽是大话，不要外国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飘飘然了。其实今年好钢只有九百万吨，轧成钢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万吨。不要自己骗自己，粮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后是八千六百亿斤，我们讲七千三百亿斤，即翻一番多点，那一千一百亿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亏。东西还存在。我们只怕没有，有没有，没有查过，在座的诸位都没有查过。就算有八千六百亿斤，四分之一是薯类。要估计到不高兴的这一面，索性讲清楚，把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县开个会，吹一吹，有什么不可以，别人讲不爱听，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

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还有点阿Q味道，但是一点阿Q味道也没有，也不好活。

十一、关于我不担任共和国主席问题。这次要作个正式决议，希望同志们赞成。要求三天之内，省里开一次电话会议。通知到地、县和人民公社，三天之后发表公报，以免下边感到突如其来。世界上的事就这么怪，能上不能下。估计到可能有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不赞成。群众不了解，说大家干劲冲天，你临阵退却。要讲清楚，不是这样。我不退却，要争取超美后才去见马克思嘛！

十二、国际形势。今年这一年有很大的发展。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每天的报纸都证明这一点。真正丧气的是帝国主义。他们烂、乱、矛盾重重、四分五裂。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好过的日子过去了。在他们没有变

成帝国主义之前，只有资本主义时代是他们的好日子。现在的时代是帝国主义灭亡的时代，我们的情况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有那么一些人想冒险，最反动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大多数是不愿打的。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毛泽东在武汉主持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图为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讲话。

1958年，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江汉饭店观看文艺演出。

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代表团会谈。

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和匈牙利、阿尔及利亚客人一起接见正在洪山礼堂开会的干部群众。

1958年12月11日，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接见以雷维斯上将为团长的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军事代表团。

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二）

（1958年12月12日）

（一）公报问题。西方可能四分五裂，看样子会四分五裂，但是也还不准。欧洲大陆一个集团，对付英美，但内部矛盾重重，德法有矛盾，英美也有矛盾，他们是又团结又斗争。斯大林分析资本主义内部要打仗。我们早已说过，一九四六年我们写的文章，发明美国和苏联的中间地带，争夺中间地带是主要的。为什么不打中间地带，先打苏联呢？以反共为名，去搞蚕食政策，对中间地带侵略，引起中间地带的反抗，有广大中间地带，他们走不过来。包括美、法、德、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他们的后方。欧、亚、非在闹乱子，美国如何脱出手来打苏联？

剥削是剥削人，剥削人才能剥削地球，有人才有土，有土才有财，把人都打死，占了它干什么？我想不出为什么要打原子弹，还是常规武器。我们想，只要不打原子弹，德、法、意都赞成，许多国家都不怕美国，不能订个条约互相不使用？垄断资本存在，不打仗是不行的，因为没有原料，没有市场。

公报中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帝国主义一定要四分五裂，而且自己要打仗。尼克松说：要搞经济竞赛，要把印度扶起来。印度如何能扶植起来呢？西方是一股悲观气氛，我们是一股高兴气氛。四分五裂这句话要斟酌一下，四分五裂是真理，但一讲，是否会引起

他们警惕，可是又没有办法。美国在台湾要把自由主义分子挤进去。伊拉克很紧张，这几天捕了一大批反革命，但是胜负还未决定。主要是美、英、土耳其、伊朗在搞阴谋（卡赛姆——为什么解散工会？怀疑伊拉克为什么消息灵通）。

（二）三个文件，已定稿。辞职问题："偶像"总要有一个，一个班要有一个班长，中央要有个第一书记。没有微尘作为核心，就不会下雨。与其死了乱，不如现在乱一下，反正有人在，没有个核心是绝不行的，要巩固一下。搞死了便成为"偶像"。要破除比较难，这是长久立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也许以后职务可多少，可上可下。实际上只作了半个主席，不主持日常事务。

五九年计划搞二个月再说，二月半再议一次。

人民公社如何？二月一日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或在北京，或在成都，或在上海。

香港报骂蒋介石"仓惶辞庙，逃往台湾"。

人代会三月十五日开。

二月一日开会，除检查两个决议外，另外，整顿国家机构是必要的，安排人代会报告，还有教育问题，人民公社再搞点内部指示。

人民公社对宪法有破坏没有？例如政社合一问题，人代大会没有通过，宪法上没有。宪法有许多过时了。但现在不改，超过美国后再搞个成文宪法，现在学美国，搞不成文宪法。美国是不成文宪法，一篇一篇凑起来的。

进入共产主义，需要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搞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少则三四年，是指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多则五六年，是指第三个五年计划。

（三）人民公社文件还要修修补补，还要想一想，十五、十六、十七三天时间修改，十八号发表公报和主席辞职问题，十九号发表人民公社决议。

主席辞职问题，如果还有疑问，还可再开一次电话会议，解释解释。

（四）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是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陈炯明在东江和一个县的税务局长凑股子，选举一个人当局长。抓两个股一摸。

还有两句话："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横联是"政治挂帅"。

下午必须开一次会。出告示，要专政。省委书记要会做。无非是落后，已经落后了。再落后几年，有什么问题，做省委书记要全面，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与地方积极性相结合，还有矛盾，服从全国的利益。顾全大局有最高的品德，这种最高的品德，并不吃亏。凡不顾全大局的，就要吃亏。杨一辰就是不顾大局，想趁机而起，打倒周、陈等，想搞这一套。凡是想搞这一套的，都是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有一帮人，不顾全大局。历史上一切不顾大局的人都没有好下场，如杨一辰、高岗、罗章龙。

准备自己受了冤枉，还要顾全大局，杨一辰有多少马列主义？一毫也没有。

有些省穷得要命，再穷几十年也不要紧，实际上不会穷几十年。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红娘晚上站在外边，并且挨打，为了什么？

对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8年12月）

一

乔木[1]同志：

此件[2]可以定稿。只在第三页增了几个字。请用电话把修改处告诉北京，准备十七日下午广播，连同『志』主席问题决议[3]一起，十八日见报。

毛泽东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十时

二

今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证明了党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稿。公报于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

[3] 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重工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在工业战线上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工业方面的集中领导必须同在工业方面大搞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针，一句话，用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不是一条腿或者一条半腿走路的方针，这样的一整套方针是正确的。[1]

[1]　这是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稿中的一段文字，文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的批语

（1958年12月18日）

林克[1]：

1普特等于多少公斤[2]，请即查明告我。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上午一时

此件[3]先给陈伯达[4]同志看一下，如果他今天不走，下午可以谈一下。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普特，苏联用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千克）。

[3] 指1958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刊载的塔斯社报道的苏共中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其中说，提高谷物生产的任务仍然是主要的任务。要完全满足国家的消费，每年需要有100亿到110亿普特的粮食。粮食收获量的决定性来源就是提高谷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4]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

复霍查电

（1958年12月18日）

地拉那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亲爱的恩维尔·霍查同志：

你在1958年10月9日面交我国大使罗士高同志转给我的信已经收到了。

十分感谢你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有关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发展经济和文化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国人民一向关怀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且为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你在来信中提到，为了顺利完成你们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希望中国方面给予新的贷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给予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五千五百万卢布的贷款，并且已经经过我国外交部通知了巴利里大使同志。有关贷款和供应各项主要物资的具体事宜，将由我们两国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商谈。谨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1958年12月18日

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的批注[1]

（1958年12月21日）

一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是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2]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

---

[1] 这是毛泽东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的批注。

[2] 引用的鲁迅的这句话，是毛泽东凭记忆写的。鲁迅1927年在广州编校《唐宋传奇集》，作《序例》，文末题记说："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唐宋传奇集》上册1927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次年2月续出下册。

试仿陆放翁[1]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

二

击水：游泳。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2]

三

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3]，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4]

---

[1] 陆放翁，即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七绝《示儿》："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2]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击水"的批注。

[3] 指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

[4] 这是毛泽东对《菩萨蛮·黄鹤楼》一词中"心潮"的批注。

四

踏遍青山人未老：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1]

五

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以下诸篇，反映了这一种心情。[2]

六

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3]

---

[1]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会昌》一词中“踏遍青山人未老”一句的批注。《菩萨蛮》，指《菩萨蛮·黄鹤楼》。

[2] 这个批注写在《忆秦娥·娄山关》一词那一页的天头上。以下诸篇，指《十六字令三首》（1958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忆秦娥·娄山关》排在《十六字令三首》之前）、《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

[3]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长征》一诗中“水拍”“三军”的批注。

七

苍龙：蒋介石，不是日本人。因为当前全副精神要对付的是蒋不是日。[1]

八

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2]

九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3]

---

[1] 这是毛泽东对《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苍龙”的批注。

[2] 这是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一词的批注。1957年《诗刊》一月号首次发表的这首词和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本词下阕的第八句作“一截留中国”，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中，照毛泽东的意见，将这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

[3] 这是毛泽东对《沁园春·雪》一词的批注。末三句，指这首词的最后三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十

三十一年：一九一九年离开北京，一九四九年还到北京。旧国：国之都城，不是State，也不是Country。[1]

十一

乐奏：这里误植为奏乐，应改。[2]

十二

长沙水：民谣：常德德山山有德，长沙沙水水无沙。所谓无沙水，地在长沙城东，有一个有名的“白沙井”。武昌鱼：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官僚、绅士、地主及其他富裕阶层不悦，反对迁都，造作口号云：宁饭扬州水，不食武昌鱼。那时的扬

---

[1] 这是毛泽东对《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中“三十一年还旧国”一句的批注。

[2] 这是毛泽东对《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词中“奏乐”二字的修改意见。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原作“万方奏乐有于阗”，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照毛泽东的意见，作了修改。

州人心情如此。现在变了，武昌鱼是颇有味道的。[1]

十三

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2]

---

[1] 这是毛泽东对《水调歌头·游泳》一词的批注。其中所说“三国孙权一度从京口（镇江）迁都武昌”一典有误。198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选》和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对“武昌鱼”的注释是：“据《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记载：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这里化用。武昌鱼，指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称团头鳊或团头鲂。”

[2] 这是毛泽东对《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的批注，指“舞、虎、雨”这三个韵脚字跟上文的“柳、九、有、酒、袖”不同韵。

关于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知识分子的批语

（1958年12月22日）

陆定一[1]同志：

建议将此件[2]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

---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部长。

[2]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8年12月19日编印的《宣教动态》第一六五期刊载的《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的材料。材料指出，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的党员在讨论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时反映出一些不正确认识，表现在：（一）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二）认为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所有的统战对象都是促退派，把他们摆在这里，只是为了树立对立面。（三）认为从工人阶级的利益出发，应当走阶级路线，在学校中提群众路线是不妥当的。为了划清界限，宁可“左”一些。（四）认为现在党的威信和群众觉悟都提高了，到了党员可以取而代之的时候了。由于存在这些错误认识，这个党支部在工作中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清华大学党委及时发现并检查纠正了这些错误做法。1958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毛泽东写给陆定一的这个批语和清华大学的材料。

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1958年12月23日）

要培养新生力量，没有年轻的哪能写好文件？

过去不是有人说干军队没有奔头吗？军队还是有奔头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战时有奔头，就是平时也有奔头，可以成为多面手，一专多能，学会很多有用的技术。

金门打炮对部队士气有没有影响？还是不要打？（答：部队情绪高）闹个人主义的时候再打他一下。我们对台湾海峡地区的这个政策，大家赞成不赞成？是不是很得人心？要就拿过来，要不一个也不要。单是金门我们就不拿。杜勒斯说，中国人不好谈，对金马无兴趣。假如杜勒斯丢下金马走了，我们怎么办？请你们想一想，你们都是政治家，一个办法是去占，我们可以控制台湾海峡一半。便于南北的海运，一个是不去，搞个无人地带，以表示我们兴趣不在这里，而在台湾。这时一定会有很多舆论，舍不得。我们不去，很可能蒋介石又来占领，这更好。我们不要他走。我们一打炮，蒋介石就有理由不走。他会说，你看，共产党还打着炮，我们在炮火下撤退。你美国人多没面子啊！

现在有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为什么称贵我双方？为什么不打敌人司令部，为什么还答应在对方请求的时候供给他们“以固

守”？同志们可以议一议。如果金门的敌人叫我们供给，那倒是好事，那一点兵我们养得起。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广州和参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高级干部座谈。

在此次军工会上，可拿一天时间谈谈形势问题。过去，《人民日报》的同志对我们对台澎金马的政策问题想不通，新华社的同志也讲不通，周总理报告了，分头研究，才搞通了。在此次政工会议上可以大鸣大放一天。这是政治问题，国际形势，离开形势，政治工作不好做。过去的规矩，第一是讲国际形势，第二是讲国内形势，第三是本部队。过去那些有点形式主义，如一点不搞就不好了。形势问题至少讨论一天。

四国共管柏林，是德苏战争结束，苏联打得精疲力竭时，斯大林同意了的。尤金大使曾告诉我，苏德战争中苏联死了两千万人，可能包括战区的男女老幼。苏联近两亿人口，就算他有五千万壮

丁，作战死去一千万壮丁，问题不算小。苏联同志们，斯大林在那几年中能取得那样的胜利，已经了不起。斯大林为什么不要我们和国民党打仗呢？因为国民党就是美国人。一方面他把美国夸大了，另一方面把我们看小了。后来斯大林承认他错了（一九四九年夏）。他曾问过□□□，他说的话在中国有无影响？□□□说，没有影响，因为你们提出的，我们没有执行，也不能执行。一个共产党指挥一个共产党，奇事。因为当时没有第三国际了。其实蒋介石硬要打你，你不打怎么办……美国也怕我们——怕我们蛮干，不怕死。别的他也知道，无非是手榴弹那一套。还怕我们的将来，今年是钢翻一番，粮食那么多。真让我们搞七八年，可了不起。

杜勒斯怕人民公社，而且怕得很。他总研究人民公社，骂我们两条。一叫拆散家庭，二叫强迫劳动。这也是战士关心的问题。家庭要不要拆散？有没有这个问题？劳动是不是强迫？如蒋介石强迫老百姓那样，还是自愿？我看基本上还是自愿的劳动，老百姓看到了这样的劳动结果能迅速增产。只要我们让他们睡足觉，每天睡八小时。一定要强迫，你不睡不行。

过去出工，自由主义，阴一个，阳一个，我们学军队的办法，准备出发，十分钟可以完吗？出发很快，整整齐齐。是整整齐齐好，还是阴一个阳一个好？过去各家吃饭，这家煮得早，那家煮得晚，上工稀稀拉拉要三小时。现在一个食堂吃饭、议事，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方便。上工整整齐齐，只要一小时。

政工会上要谈谈人民公社问题，看看有些什么问题。（众答：房子问题，男女分居问题……）分居有几个星期，扎野营你不分居怎么办？这次人民公社运动比合作化要顺利些。由个体到集体比较难。合作化和现在的变化哪个大？

（谈到部队内民主作风时）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这样整整齐齐的军队还这样，公社刚办起来，有点缺点就议论纷纷。公道不公道？过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三个月不搞就忘得干干净净，天下大乱。还不是每天搞，每个礼拜搞？

小锅子还是要恢复。可以炒菜、做饭，大集体，小自由嘛！自由主义搞光了不行。

对领导方法简单的农村工作干部要说服教育。过去，军队里的官长只要兵不听话就打，把打人当作最后的手段。后来我们实行官长不打士兵。许多班长就没办法了。经过说服教育慢慢地就改过来了。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兵还是可以带走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不是写一个文件吗？现在看那样的文件，哪有现在这样进步？问题那么多，没有发挥。

公社一个连长要领五百人，实际上是一个营。有男女老幼，不如军队好带。

去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讲，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合作社。第二个五年计划巩固合作社。现在五六年至五八年。加上明年四年之内使人民公社上轨道。使干部学会带兵——男女老幼，又管生产，又管生活，又管思想，又管精神，又管物质。

把过去的区乡干部转为公社干部。政社合一，县政府就不要了，县级干部转为县联社的干部。县委全就是县联社党委，加上下放干部。

武王伐纣，实行三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那时打仗从陕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吗？得有三化。姜太公当政委，武王是司令员。那时恐怕还是奴隶时代。三化是军队发明的。组织不军事化怎么打仗？从来军队都是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组

成的。为什么公共食堂军队能搞得好，乡村搞不得？广州市有没有公共食堂？死了人没有？（朱光答：有食堂，死的都是该死的。）公共食堂一不死人，二不瘦人，甚至还胖一点，这点不会犯原则错误吧。

我没有想到今年搞人民公社，也没有想到过农村搞公共食堂。帝国主义那边造谣，说这都是我出的主意。

有些事情的发生是可以预料的，但有些也很难预料到。一九五五年搞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候，谁料到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一整波匈事件，一两周之内，天下大乱。这是坏事，没有料到。有好些事也没有料到，如今年的大跃进。去年九月中央全会恢复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去冬今春大搞积肥和兴修水利运动，这一搞，粮食增产□□□□斤以上，共□□□□亿斤，砍掉□□□□亿斤，算□□□□亿斤，有个保险系数。这件事我就没料到，人民公社也是没有料到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北戴河会议时都没有想起人民公社。七月份还是没有想过。

钢铁翻一番的问题。是在游泳池里和王□□同志吹的。我说试试看，他就发命令了。没有料到真正翻了一番。

还有军队起变化。今年一月份我找几位部队同志谈话时，罗荣桓同志讲有落后之感。地方向前走了，军队存在一些问题。多年来我也没有管军队，其实解决问题也很容易，军委开了五十五天会，以后军区开，军、师开，一下子问题解决了。现在空气不是改变了吗？还不是有希望吗？你们这次政工会议搞八个文件，是去年就计划好了吗？我不相信。还不是在今年形势发展的基础上才搞出来的。大跃进，干部当兵，民兵大发展是从北戴河会议之后搞起来的，一个多月，北京搞了几十个民兵师。许多事情都是这样。许多

好事、坏事，事先不可能完全料到。只能大体上料到。

（谈到看问题要看到两种可能性时）坏事无非是打世界大战，扔原子弹。我们一个也没有。再有就是共产党分裂，分成两个中央、三个中央。有的省委分成两个是可能的，你们广东就有省委书记想搞分裂嘛！我们的国家还有灭亡的危险没有，不准备就被动。列宁总是不避讳。他常常说：要么胜利，要么灭亡。现在还有这么大的帝国主义，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解决。是帝国主义灭亡，还是我们灭亡，中苏社会主义十二个国家是共同命运，无论如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胜利，一个是暂时灭亡，部分灭亡。敬老院、公共食堂，也会崩溃一部分。没有坏处，这部分的失败有好处，可以从中得到教训。

你们准备垮台就不会垮台，至少是垮得少。你们可以进行整顿教育。你如果没有垮台的准备那就危险。

社员有退社的自由。我们这次决议上没有写。工厂的工人可以跳厂。鞍钢那么大，工人自己一个人要成立一个鞍钢是困难的。

上面讲的这些情况，似乎与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等论点不符合了。这还是符合的。

因为什么事情都有两个可能性。巩固或者崩溃，托儿所如此，敬老院如此，公社如此，甚至省委、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如此。彻底崩溃是不会的，我们总还可以打游击，还有民兵在手里。回到延安，到四川去，到云南去。我与民主人士讲过，他们都笑笑而已。我对他们说，你们要准备，还是留在北京搞维持会呢，还是和我们一起去打游击呢？这样好像与美帝是纸老虎不符合了。所谓纸老虎，并不是他现在已经死了，不打是不会死的。武王不伐纣，纣不会倒。帝国主义还活着，经过斗争，到最后它就死了。要经过斗

争，中间有曲折，不会没风浪。

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不让敌人登陆。登陆了，可以打败它。或者就是登了陆也只占领少部分地方，这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崩溃。苏德战争，德军打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不是苏联崩溃。但那是危险的。第二个可能也要估计到，要受损失，部分的，暂时的。

美、英、法、西德统治阶级闹别扭，对我们有利。资产阶级分两部分，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有矛盾。西方世界闹别扭，不带革命性；纳赛尔反帝是有革命性的，但是他们一面反帝，一面本国又有反动的部分，如印尼右派。

把各国因素合起来看，巩固因素第一。七年、十年、十五年不打仗有可能，但是也不能写保票，总还有百分之一的危险性，所以莫斯科宣言就把这种危险性写上了。

活老虎能转化为死老虎，铁老虎能转化为豆腐老虎。估计两种可能性，说东风压倒西风，说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就说通了。在座诸位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不是说你一年也不害一次感冒。害病和健康两方面都要估计到。

你们对我所讲的这些可能性有没有准备？河南有一个地委书记，听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崩溃的危险，他的面色发白。如果大家都不警惕都不好。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

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我的讲话也有两种可能性，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可以议一议。一个人也有两种可能性，活下去，或者死了。广州军区一千台汽车三个月之内运输了许多物资是好事，但是有□□人伤亡了，你事先想到了没有？有个县委书记被碰伤了，他事先也没有想到呢？部分的、暂时的损失随时都要准备。三个月之后总要进步一点，老是这样搞还行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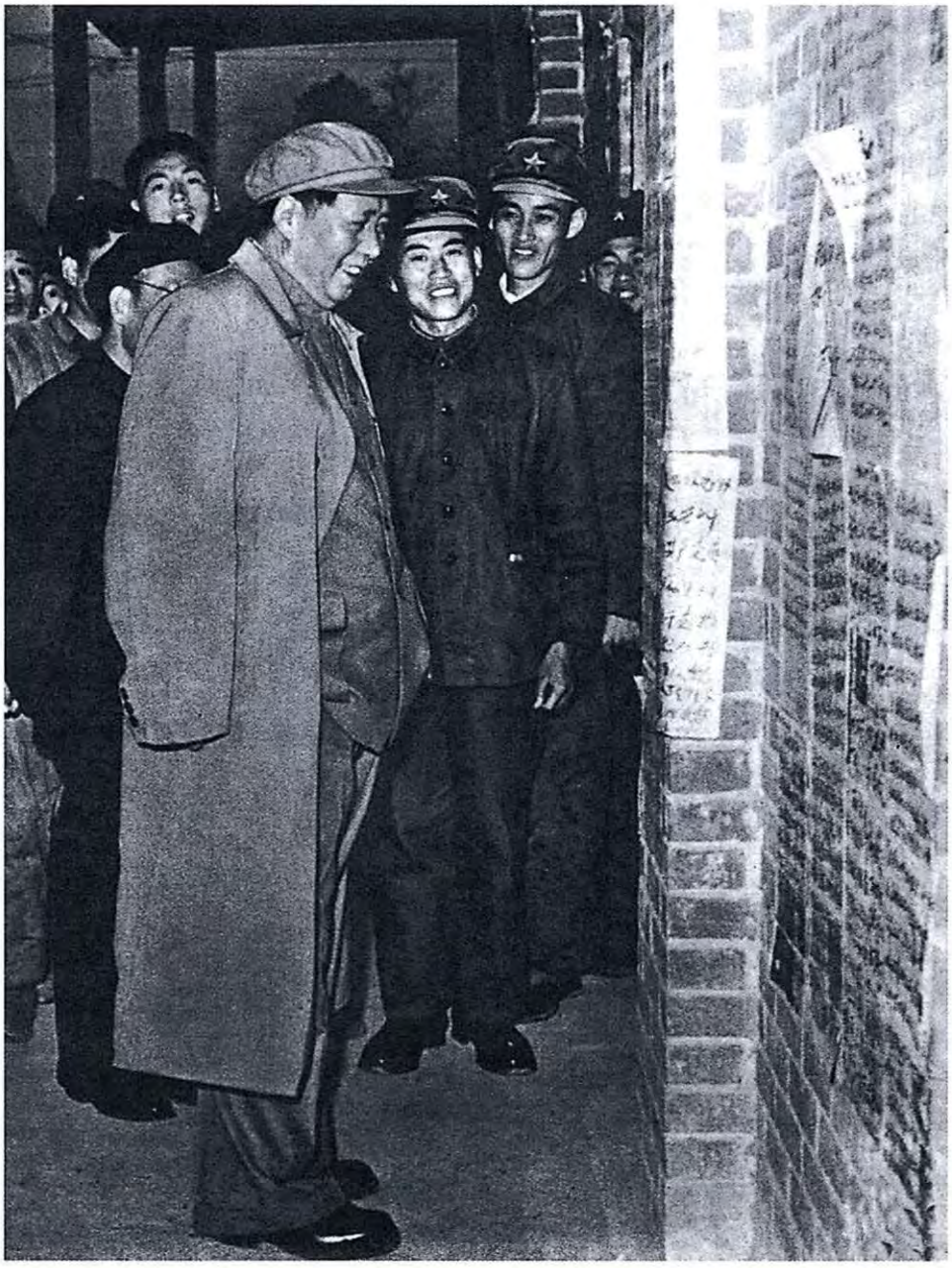
朝鲜打仗，研究时有时觉得主意也不多。在三八线有一个师不是被吃掉了一些？那不是活老虎？会吃人的。战术上，具体工作上绝对不要轻视敌人，一点也不能放松。

《毛主席夸咱能文能武》（油画）

《温暖》（油画）

《伟大的教导》（油画）

《谆谆教导》（油画）



1958年，毛泽东在解放军某军部看大字报。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65岁寿辰时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院内留影。

1958年12月，毛泽东接见武汉市公安局局长谢滋群等。

1958年12月，毛泽东和中共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握手。

1958年12月28日，毛泽东和中共武汉市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代表合影。

祝贺苏丹独立纪念日的电报

（1958年12月29日）

喀土穆

苏丹共和国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布德将军阁下：

欣逢苏丹共和国国家独立纪念日，我谨代表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苏丹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苏丹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在共同社、英新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两篇评论上的批注[1]

（1958年12月）

一

【共同社东京21日电】评论资料："人民公社的几个问题"。作者：桥本正邦。

新华社18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这篇东西发表以后，为全世界所注意的人民公社的方针已经基本上确定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决议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是，说明（?）"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以及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的形式"，另一个意义是，"纠正对于人民公社的错误想法和偏差"。

基本正确

人民公社从今年夏季开始出现以来，在全世

[1] 本篇两部分开头的一段话，是毛泽东的批注。共同社、英新处的两篇评论，刊载在新华社1958年12月22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特辑《外国报刊关于中国的反应》第四十期上，文内的横线、三角、圆圈等符号是毛泽东加的。

界，善意的和恶意的批评纷飞，莫衷一是。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了一步”，而加以注意；△又有人认为“人民公社是违反人性的制度，是一定要失败的。”△人民公社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最初是在中国人民间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自发的产生的。○唯其如此，似乎中国人自己过去也没有把它的意思弄清楚。何况是从外面观察的人，他们不大了解，那恐怕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认为（人民公社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了一步”的人们着眼于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采取两种分配制度：工资制和供给制（不用钱配给）。听说由于粮食大增产，中国已经能够做到“人人都吃得饱”；无论谁都可以去人民公社的食堂不花钱吃饭。○这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劳动，谁都可以吃到一份饭。△这也就是有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和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且，人们也就进一步设想过，假如继粮食之后，布匹充足了，住宅建筑得多了，那么，这些东西也可以不要钱，分给大家了，○那样也就可能分期分批地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

二

【英新处伦敦19日电】中国共产党决定暂时不实行在大城市建立公社的计划。“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兴办公社，这个事实说明党中央委员会在实行公社计划时遭到了困难。

只有一部分对

关于推迟在城市建立公社的决议是中央委员会在12月10日通过的并由北京电台在12月18日广播的。决议还承认，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并不是像过于性急的党员们所想的那样，不久就能实现的，它的实现……。但是同时，中央委员会同意公社制度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好形式。

如果说在过去在中国大力推行新计划时控制得比较轻松的话（?），这一次运动的速度之快已经使某些地区失去了控制（揣译）。现在中国人用六个月的经验研究这个运动中出现的好的和令人不满的现象，并且已经作出他们认为是解决公社计划中出现的比较困难的问题之一的最好办法。

看来，公社肯定继续巩固和扩大，成为□□联盟，最后城市将同乡村地区一致。群众受到鼓动以后产生的最初的热情现在看来是消失了，△△△这大概是因为在过度地工作以后的身心方面的疲劳，并且人们□□这种计划□□□幻想破灭。△△△△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批注[1]

（1958年）

对于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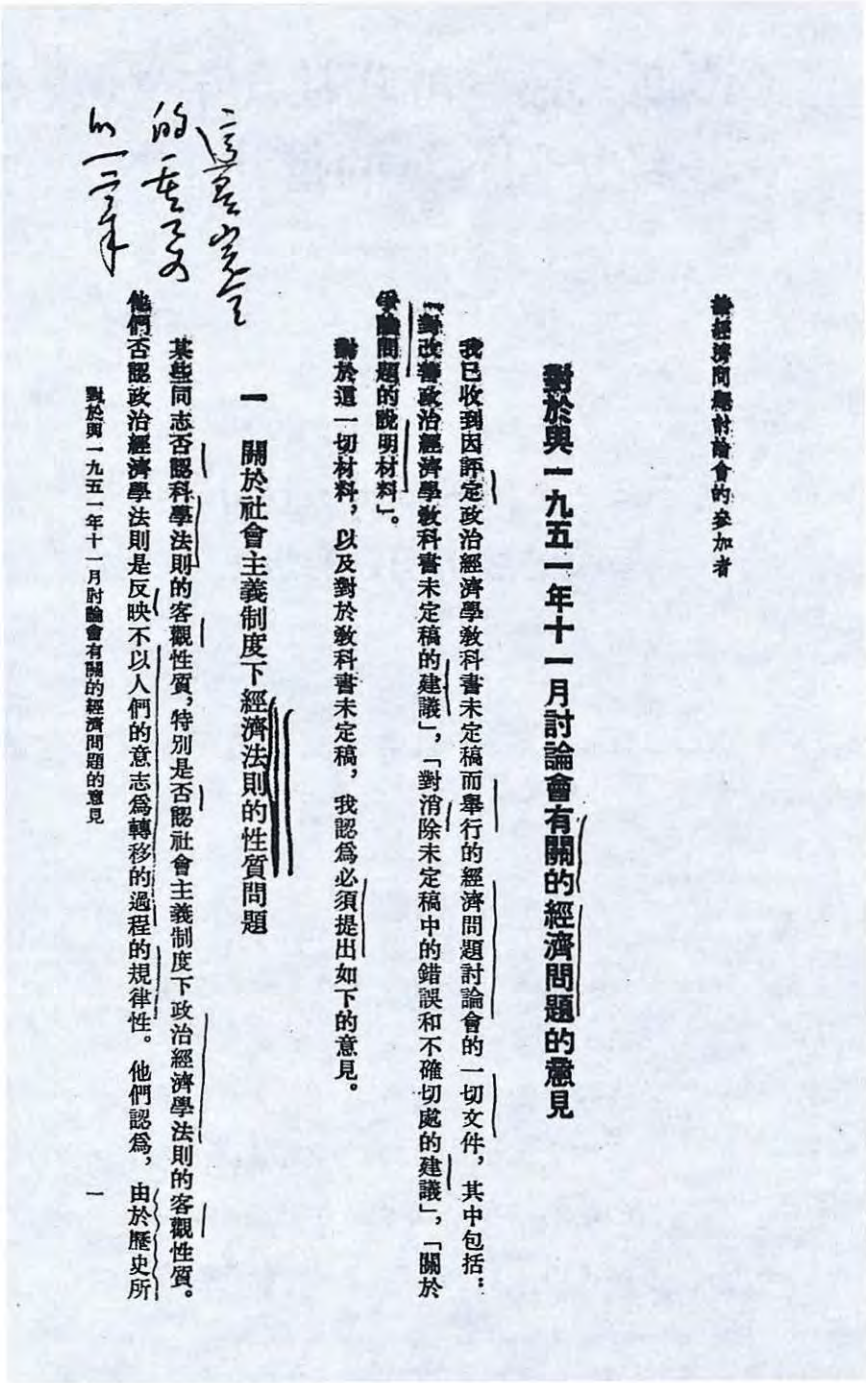
这是完全的重要的一章。

一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题

……[第1页]

政治经济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法则与自然科学的法则不同，不是长久不变的；政治经济学法则，至少是其中大多数，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发生作用的，在此以后，它们就让位给新的法则。但是原来的这些法则，并不是被消灭，而是由于出现了新的经济条件而失去效力，退出

[1] 这是毛泽东1958年三次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的批注。



給經濟問題討論會的參加者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我已收到因評定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而舉行的經濟問題討論會的一切文件，其中包括：「對改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未定稿的建議」，「對消除未定稿中的錯誤和不確切處的建議」，「關於學論問題的說明材料」。

對於這一切材料，以及對於教科書未定稿，我認爲必須提出如下的意見。

一　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某些同志否認科學法則的客觀性質，特別是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法則的客觀性質。他們否認政治經濟學法則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過程的規律性。他們認爲，由於歷史所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一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舞台，让位给新的法则，这些新的法则并不是由人们的意志创造出来，而是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

自由与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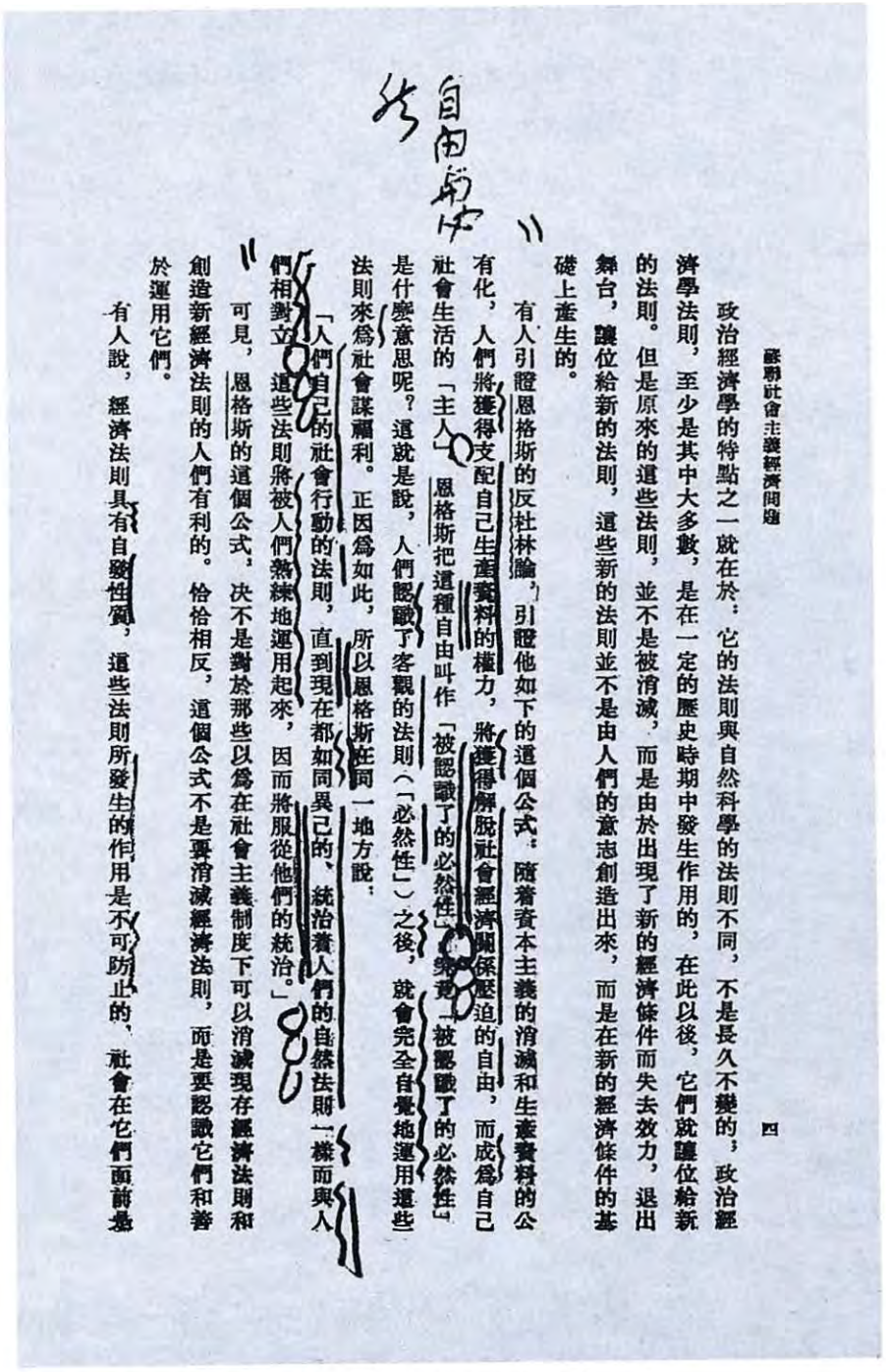
有人引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引证他如下的这个公式：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人们将获得支配自己生产资料的权力，将获得解脱社会经济关系压迫的自由，而成为自己社会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这种自由叫作“被认识了的必然性”。究竟“被认识了的必然性”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人们认识了客观的法则（“必然性”）之后，就会完全自觉地运用这些法则来为社会谋福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说：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法则，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法则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这些法则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

可见，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决不是对于那些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消灭现存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经济法则的人们有利的。恰恰相反，这个公式不是要消灭经济法则，而是要认识它们和善于运用它们。[第4页]

……

苏维埃政权的特殊作用，是由下列两种情况来决定的：第一，苏维埃政权不是以另一种剥削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四

政治經濟學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的法則與自然科學的法則不同，不是長久不變的；政治經濟學法則，至少是其中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此以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法則。但是原來的這些法則，並不是被消滅，而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讓位給新的法則，這些新的法則並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

有人引證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引證他如下的這個公式：隨着資本主義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化，人們將獲得支配自己生產資料的權力，將獲得解脫社會經濟關係壓迫的自由，而成爲自己社會生活的「主人」。恩格斯把這種自由叫作「被認識了的必然性」。然而「被認識了的必然性」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人們認識了客觀的法則（「必然性」）之後，就會完全自覺地運用這些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正因爲如此，所以恩格斯在同一地方說：

「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法則，直到現在都如同異己的、統治着人們的自然法則一樣而與人們相對立。這些法則將被人們熟練地運用起來，因而將服從他們的統治。」

可見，恩格斯的這個公式，決不是對於那些以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可以消滅現存經濟法則和創造新經濟法則的人們有利的。恰恰相反，這個公式不是要消滅經濟法則，而是要認識它們和善於運用它們。

有人說，經濟法則具有自發性質，這些法則所發生的作用是不可防止的，社會在它們面前是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形式去代替—种剥削形式，如像以往革命中的情形那样，而是消灭了任何剥削；第二，由于国内缺乏任何现成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萌芽，苏维埃政权当时必得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经济形式。

我们有先例

这个任务无疑是困难而复杂的，是没有先例的。然而，苏维埃政权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但是，它之所以完成了这个任务，并不是因为它似乎消灭了现存的经济法则，“制定”了新的经济法则，而仅仅是因为它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当时我国的生产力，特别在工业中的生产力，是具有社会性的，但所有制的形式却是私人的，资本主义的。苏维埃政权依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这个经济法则，把生产资料公有化了，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财产，因而消灭了剥削制度，创造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如果没有这个法则，不依靠这个法则，苏维埃政权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第5～6页]

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

?

……

这是一个客观法则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不能把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跟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客观经济法则混为

一谈。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之所以发生了作用，是因为只有在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经济法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才能进行。这就是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使我们的计划机关有可能去正确地计划社会生产。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现实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就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不能说，我们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都完全反映出这个经济法则的要求。[第6～7页]

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

注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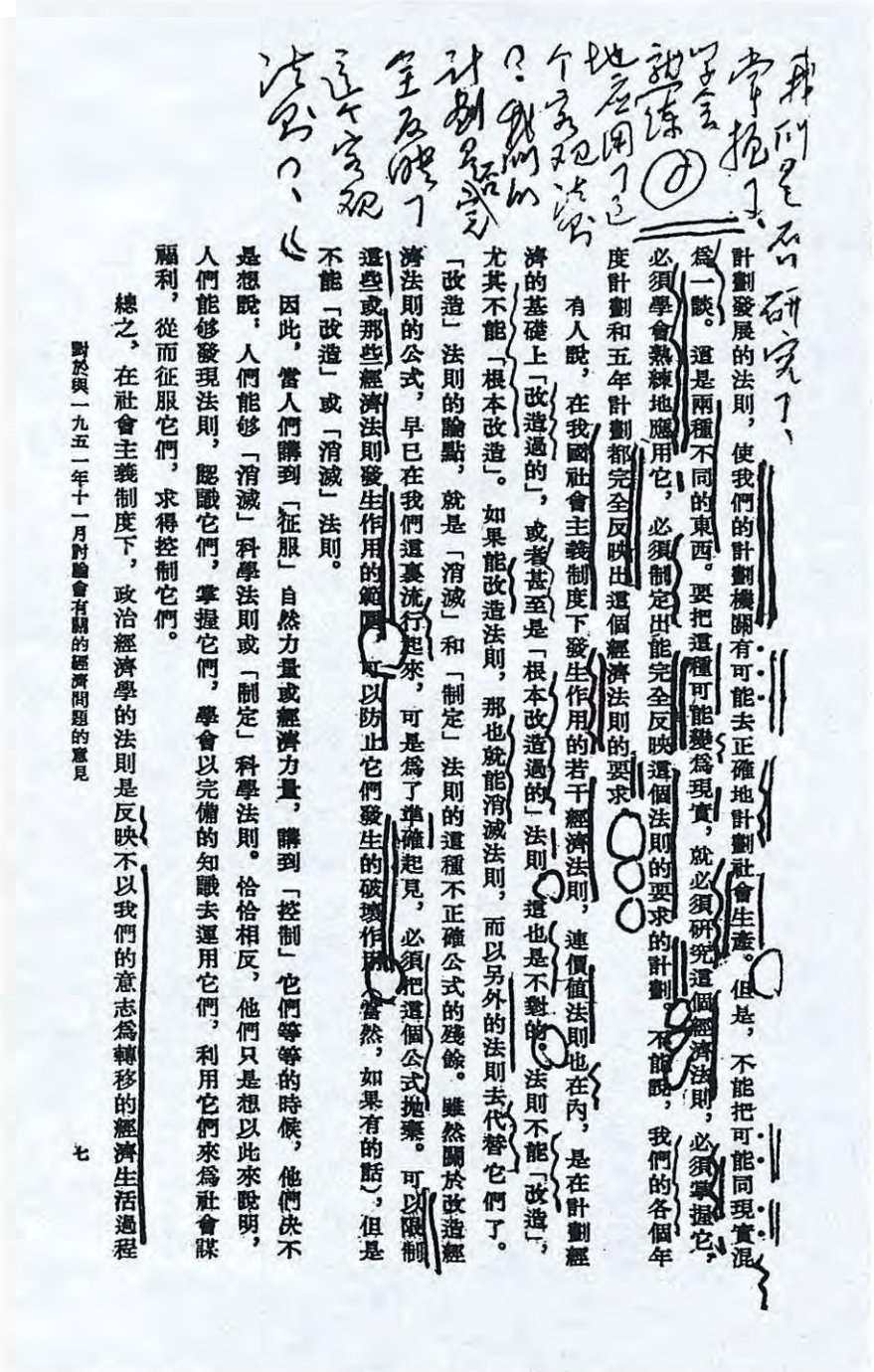
二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某些同志断定说，党在我国取得了政权并把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还保存商品生产，是作得不对的。他们认为，党在当时便应当消除商品生产。关于这点，他们引了恩格斯如下的话来作证明：

不明确

我们也有〔这〕样的人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那末商品生产



計劃發展的法則，使我們的計劃機關有可能去正確地計劃社會生產。但是，不能把可能同現實混爲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要把這種可能變爲現實，就必須研究這個經濟法則，必須掌握它，必須學會熟練地應用它，必須制定出能完全反映這個法則的要求的計劃。不能說，我們的各個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都完全反映出這個經濟法則的要求。

有人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發生作用的若干經濟法則，連價值法則也在內，是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造過的」，或者甚至是「根本改造過的」法則。這也是不對的。法則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則，那也就能消滅法則，而以另外的法則去代替它們了。「改造」法則的論點，就是「消滅」和「制定」法則的這種不正確公式的殘餘。雖然關於改造經濟法則的公式，早已在我們這裏流行起來，可是爲了準確起見，必須把這個公式拋棄。可以限制這些或那些經濟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可以防止它們發生的破壞作用（當然，如果有的話），但是不能「改造」或「消滅」法則。

因此，當人們購到「征服」自然力量或經濟力量，購到「控制」它們等等的時候，他們決不是想說：人們能够「消滅」科學法則或「制定」科學法則。恰恰相反，他們只是想以此來說明，人們能够發現法則，認識它們，掌握它們，學會以完備的知識去運用它們，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從而征服它們，求得控制它們。

總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政治經濟學的法則是反映不以我們的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生活過程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七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见《反杜林论》）

这些同志是大错特错了。

我们现在还只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

我们来分析一下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吧。恩格斯的这个公式不能认为是十分明确的，因为其中没有指出，究竟是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还是只占有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还是仅仅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个公式可以理解成这样，也可以理解成那样。

在《反杜林论》的另一个地方，恩格斯讲到占有“一切生产资料”，讲到占有“生产资料的全部总和”。这就是说，恩格斯在他自己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

一切归全民，才能废商业

因而产品充分发达

由此可见，恩格斯所指出是这样的一些国家，在那里，不仅在工业中，而且也在农业中，资本主义和生产集中都充分发达，以致可以剥夺全国的一切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因而，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这当然是正确的。

直到现在，

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

只有英国一国。

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英国是否能废商业，还是一个待研究的问题。

看来还得生产商品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后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美、法、德、瑞、挪、丹、荷、比、卢都不如英吗？

甚至，不仅在十九世纪末叶，而且在现时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是已经达到了像我们在英国所看到的那种程度。至于说到其余的国家，虽然那里的农村中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可是农村中却还有人数相当众多的中小私有生产者阶级，这些人的命运是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应该予以确定的。[第8～10页]

……

如果可以公有化的不是一切生产资料，而仅仅是一部分生产资料，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又已经具备，那将怎么办呢，——无产阶级是否应该夺取政权，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必须立即消灭商品生产呢？

……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的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简括如下：

（甲）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乙）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丙）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丁）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戊）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开展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第11～12页]

……

列宁的五条，我们都做了，并且建立了人民公社，以全力发展工业、农业和商业，列宁是要以全力发展商业，问题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必须谨〔慎〕小心。

不要怕资本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

主义，因为不会再有资本主义。

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并非在任何时候，也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如此！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只有存在着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只有劳动力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资本家能够购买它并在生产过程中剥削它，因而只有在国内存在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时，商品生产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是在这样的场合开始的，即生产资料是集中在私人手里，而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没有这种情形，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

但是，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不，不可以这样认为。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商品生产是否有用的工具。

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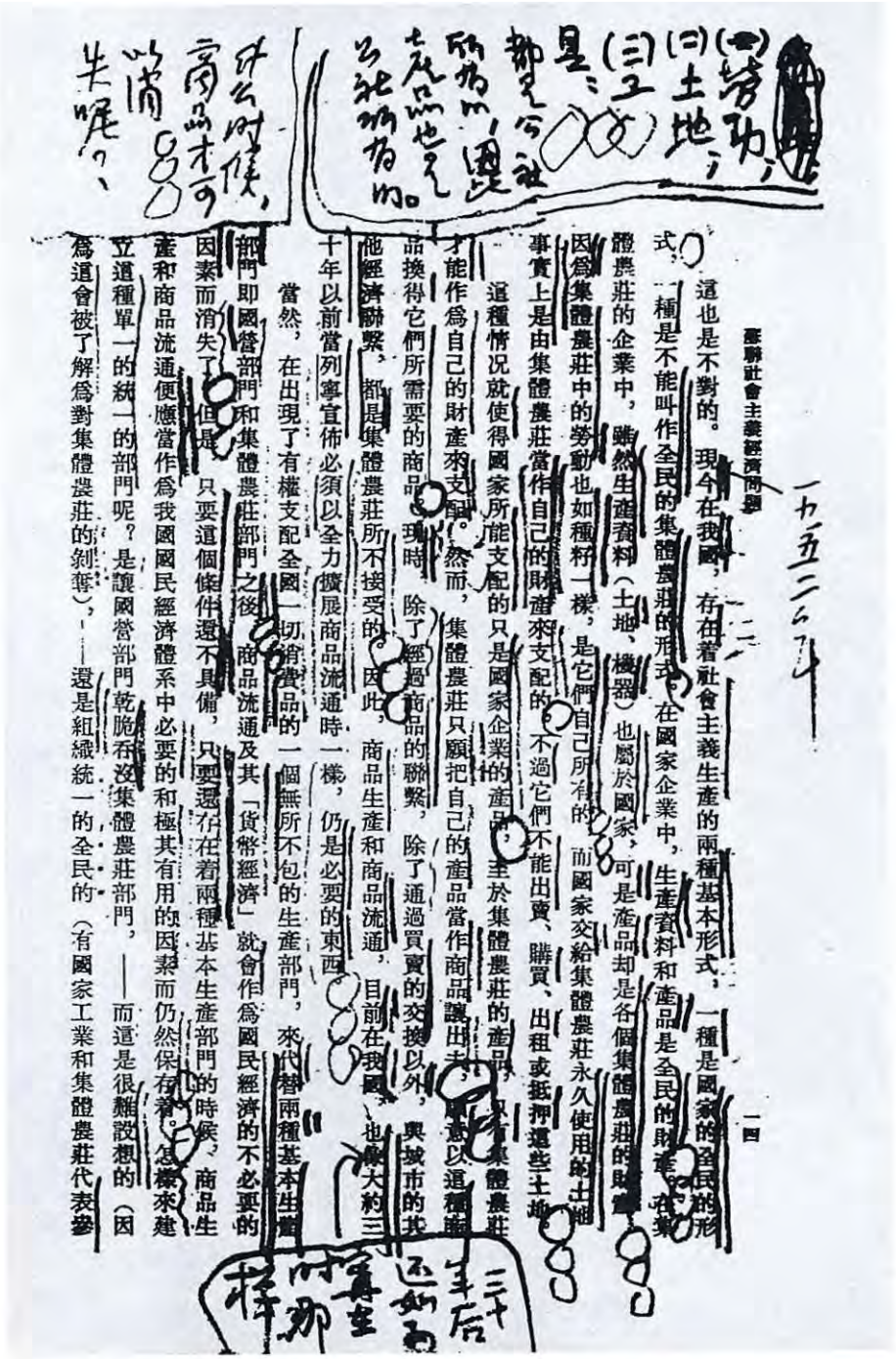
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如果注意到，在我国，商品生产没有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漫无限制和包罗一切地扩展着，它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等决定性的经济条件，而受到极严格的限制，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

（一）劳动；（二）土地；（三）工具：都是公社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的。

有人说，在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建立，而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已被消灭以后，商品生产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就应该消除商品生产。

一九五二年

这也是不对的。现今在我国，存在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国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种是不能叫做全民的集体农庄的形式。在国家企业中，生产资料和产品是全民的财产。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各个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籽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实上是由集体农庄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不过它们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一九五二年

一四

這也是不對的。現今在我國，存在着社會主義生產的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國家的全民的形式，一種是不能叫作全民的集體農莊的形式。在國家企業中，生產資料和產品是全民的財產。在集體農莊的企業中，雖然生產資料（土地、機器）也屬於國家，可是產品却是各個集體農莊的財產。因爲集體農莊中的勞動也如種籽一樣，是它們自己所有的，而國家交給集體農莊永久使用的土地，事實上是由集體農莊當作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的。不過它們不能出賣、購買、出租或抵押這些土地。

這種情況就使得國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國家企業的產品，至於集體農莊的產品，只有集體農莊才能作爲自己的財產來支配。然而，集體農莊只願把自己的產品當作商品讓出去，願意以這種商品換得它們所需要的商品。現時，除了經過商品的聯繫，除了通過買賣的交換以外，與城市的其他經濟聯繫，都是集體農莊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國，也像大約三十年以前當列寧宣佈必須以全力擴展商品流通時一樣，仍是必要的東西。

當然，在出現了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基本生產部門即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之後，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爲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但是，只要這個條件還不具備，只要還存在着兩種基本生產部門的時候，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便應當作爲我國國民經濟體系中必要的和極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樣來建立這種單一的統一的部門呢？是讓國營部門乾脆吞沒集體農莊部門，——而這是很難設想的（因爲這會被了解爲對集體農莊的剝奪），——還是組織統一的全民的（有國家工業和集體農莊代表參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不能出卖、购买、出租或抵押这些土地。

这种情况就使得国家所能支配的只是国家企业的产品，至于集体农庄的产品，只有集体农庄才能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然而，集体农庄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当作商品让出去，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经过商品的联系，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联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三十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

三十年后还如列宁在时那样。

什么时候，商品才可以消失呢？

当然，在出现了有权支配全国一切消费品的一个无所不包的生产部门，来代替两种基本生产部门即国营部门和集体农庄部门之后，商品流通及其“货币经济”就会作为国民经济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但是，只要这个条件还不具备，只要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生产部门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便应当作为我国国民经济体系中必要的和极其有用的因素而仍然保存着。怎样来建立这种单一的统一的部门呢？是让国营部门干脆吞没集体农庄部门，——而这是很难设想的（因为这会被理解为对集体农庄的剥夺），——还是组织统一的全民的（有国家工业和集体农庄代表参加的）经济机构，即起初有权统计全国一切消费品，而经过一个时期也有权，例如以产品交换

方式来分配产品的经济机构呢？这是一个特别的、需要单独讨论的问题。

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特别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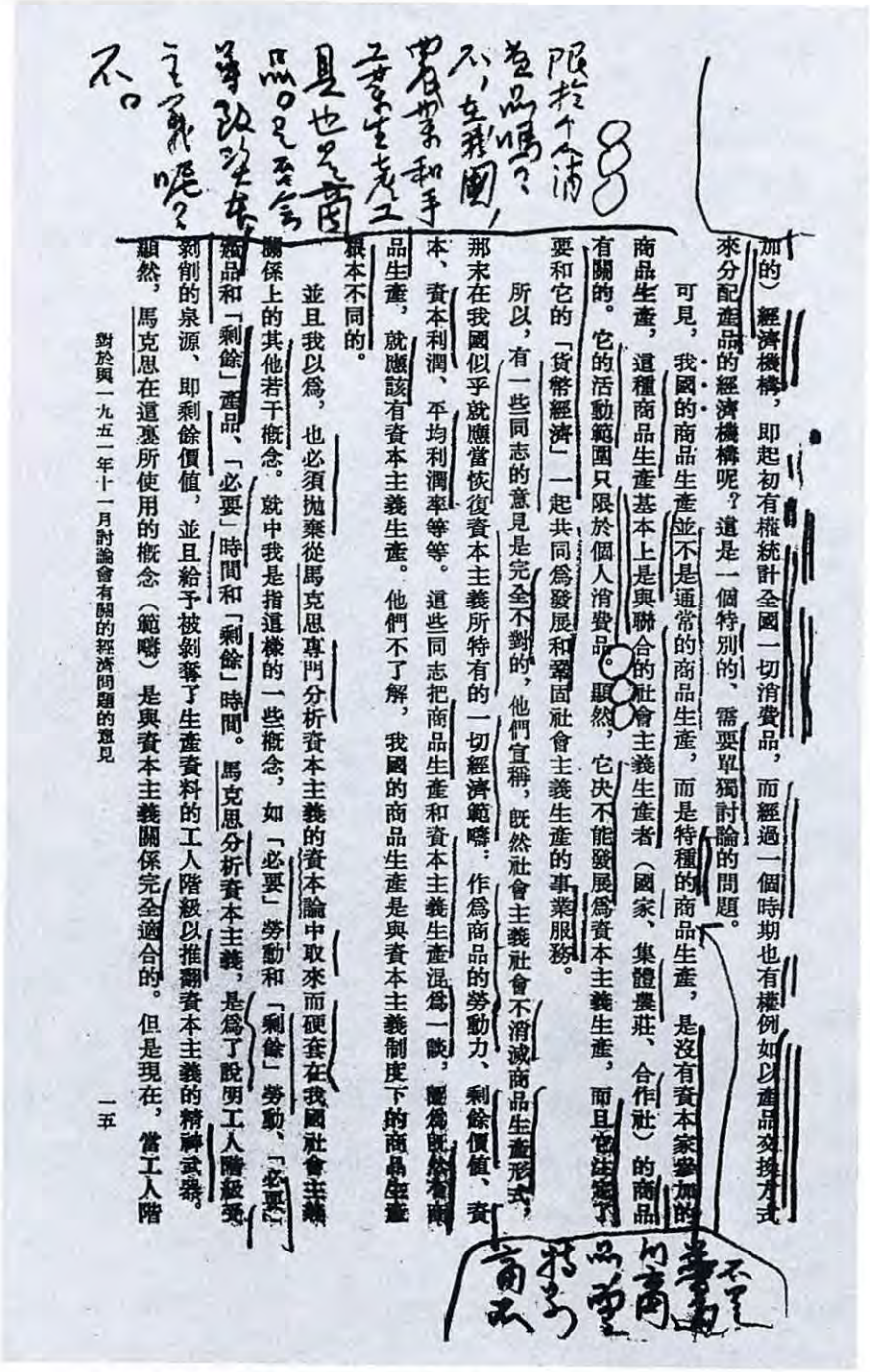
限于个人消费品吗？不，在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也是商品。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呢？不。

可见，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第12～15页]

两种劳动都是必要的。

……现在，在我国的制度下，说劳动力是商品，说工人“被雇佣”，这真是十分荒谬的，好像占有生产资料的工人阶级自己被自己雇佣，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自己一样。现在讲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也是令人非常奇怪的：仿佛在我国条件下，交给社会去扩大生产、发展教育和保健事业以及组织国防等等的工人劳动，对于现在掌握政权的工人阶级来说，并不是像用来满足工人及其家庭的个人需要的劳动那样必要的。[第16页]

……



加的）經濟機構，即起初有權統計全國一切消費品，而經過一個時期也有權例如以產品交換方式來分配產品的經濟機構呢？這是一個特別的、需要單獨討論的問題。

可見，我國的商品生產並不是通常的商品生產，而是特種的商品生產，是沒有資本家參加的商品生產，這種商品生產基本上是與聯合的社會主義生產者（國家、集體農莊、合作社）的商品有關的。它的活動範圍只限於個人消費品。顯然，它決不能發展爲資本主義生產，而且它決定不要和它的「貨幣經濟」一起共同爲發展和鞏固社會主義生產的事業服務。

所以，有一些同志的意見是完全不對的，他們宣稱，既然社會主義社會不消滅商品生產形式，那末在我國似乎就應當恢復資本主義所特有的一切經濟範疇：作爲商品的勞動力、剩餘價值、資本、資本利潤、平均利潤率等等。這些同志把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混爲一談，認爲既然有商品生產，就應該有資本主義生產。他們不了解，我國的商品生產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根本不同的。

並且我以爲，也必須拋棄從馬克思專門分析資本主義的資本論中取來而硬套在我國社會主義關係上的其他若干概念。就中我是指這樣的一些概念，如「必要」勞動和「剩餘」勞動、「必要」產品和「剩餘」產品、「必要」時間和「剩餘」時間。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是爲了說明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泉源、即剩餘價值，並且給予被剝奪了生產資料的工人階級以推翻資本主義的精神武器。顯然，馬克思在這裏所使用的概念（範疇）是與資本主義關係完全適合的。但是現在，當工人階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三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法则问题

……

……在我们的企业中，这样一些问题，如经济核算和赢利问题、成本问题、价格问题等等，就具有现实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企业是不能不而且不应该不考虑到价值法则的。

这好不好呢？这并不坏。在我国现今条件下，(1) 这的确不坏，因为这种情况教育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来合理进行生产，并使他们遵守纪律。(2) 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计算生产量，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并且同样精确地估量生产中的现实事物，而不去侈谈凭空想出来的“大概数字”。(3) 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寻求、发现和利用生产内部潜在的后备力量，而不去糟蹋它们。(4) 其所以不坏，是因为这种情况教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不是经过一些时候，才会被改造得适合于生产力的性质。[第 1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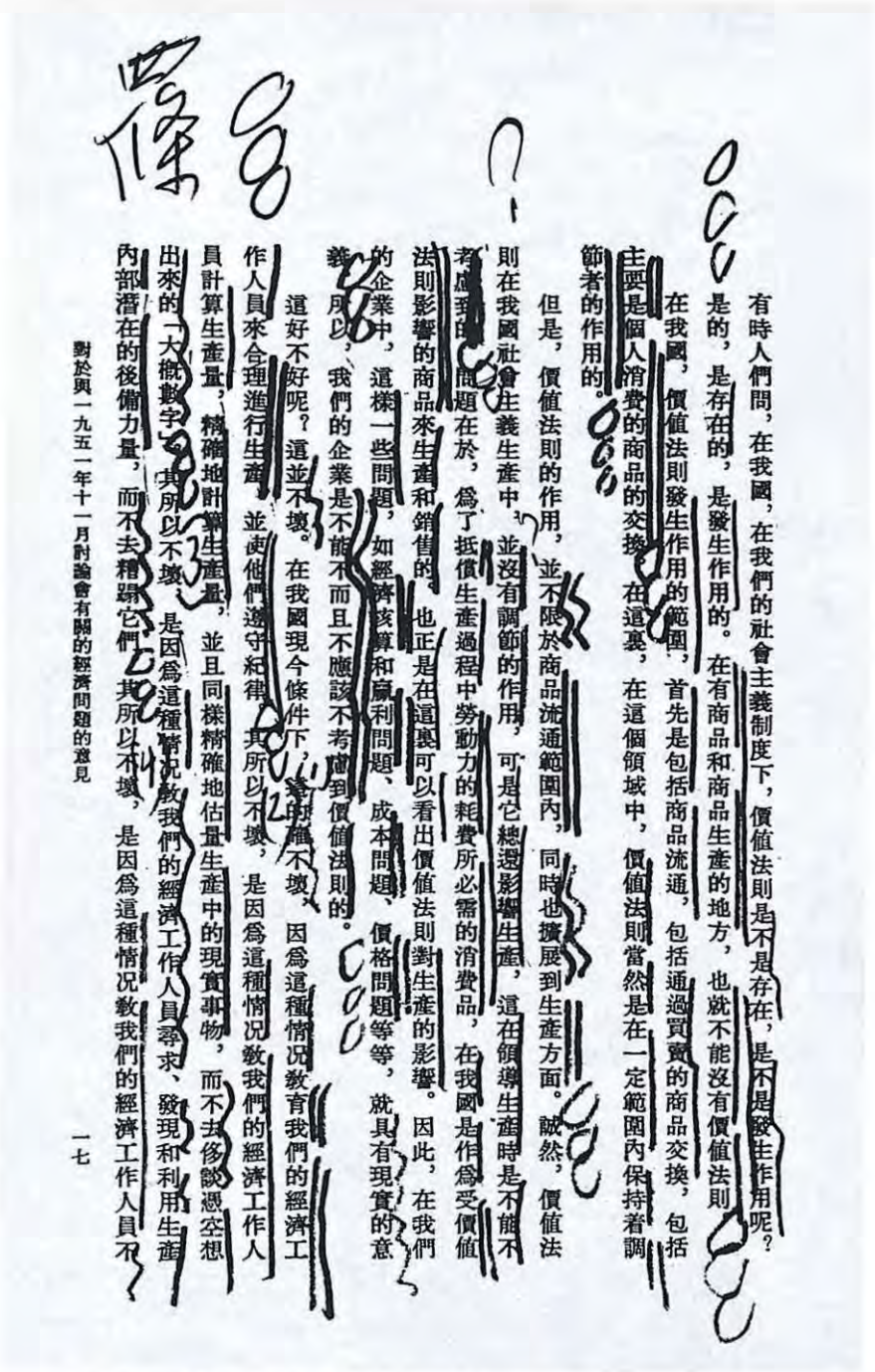
四条

……

下面这个论断也是完全不正确的，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经济制度下，即在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第一阶段上，价值法则仿佛调节着各个不同生产部门间劳动分配的“比例”。

值得研究

假如这是正确的，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



有時人們問，在我國，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法則是不是存在，是不是發生作用呢？

是的，是存在的，是發生作用的。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也就不能沒有價值法則在我國，價值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首先是包括商品流通，包括通過買賣的商品交換，包括主要是個人消費的商品的交換。在這裏，在這個領域中，價值法則當然是在一定範圍內保持着調節者的作用的。

但是，價值法則的作用，並不限於商品流通範圍內，同時也擴展到生產方面。誠然，價值法則在我國社會主義生產中，並沒有調節的作用，可是它總還影響生產，這在領導生產時是不能不考慮到的。問題在於，爲了抵償生產過程中勞動力的耗費所必需的消費品，在我國是作爲受價值法則影響的商品來生產和銷售的。也正是在這裏可以看出價值法則對生產的影響。因此，在我們的企業中，這樣一些問題，如經濟核算和贏利問題、成本問題、價格問題等等，就具有現實的意義。所以，我們的企業是不能不而且不應該不考慮到價值法則的。

這好不好呢？這並不壞。在我國現今條件下，這種情況不壞，因爲這種情況教育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來合理進行生產，並使他們遵守紀律。其所以不壞，是因爲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計算生產量，精確地計算生產量，並且同樣精確地估量生產中的現實事物，而不去侈談憑空想出來的「大概數字」。其所以不壞，是因爲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尋求、發現和利用生產內部潛在的後備力量，而不去糟蹋它們。其所以不壞，是因爲這種情況教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不

對於與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討論會有關的經濟問題的意見　一七

毛泽东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的手稿。

我国，没有用全力去发展那比起往往赢利较少而且有时简直不能赢利的重工业说来是最能赢利的轻工业？[第20页]

……

答A·И·诺特京同志

……

商品是这样的一种产品，它可以出售给任何买主，而且在商品出售之后，商品所有者便失去对商品的所有权，而买主则变成商品的所有者，他可以把商品转售、抵押或让它腐烂。生产资料是否适合于这个定义呢？显然，是不适合的。第一，生产资料，并不“出售”给任何买主，甚至不“出售”给集体农庄，而只是由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企业。第二，生产资料所有者——国家，在把生产资料交给某一个企业时，丝毫不失去对它们的所有权，相反地，是完全保持着所有权的。第三，企业的管理，从国家手中取得了生产资料之后，不但不变成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反地，是被确认为受苏维埃国家的委任，依照国家所交下的计划，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的。[第46页]

可以出售给人民公社

……

价值法则对于农业原料价格的影响无论如何不会是有调节作用的。第一，我国农业原料的价格是固定的，由计划规定的，而不是“自由”

应研究　　的。第二，农业原料的生产规模并不是由自发的力量，不是由什么偶然的因素来决定，而是由计划来决定的。第三，为生产农业原料所必需的生产工具，不是集中在个别人或个别集团手中，而是集中在国家手中。既然这样，还有什么价值法则的调节作用呢？[第49页]

对大跃进报道的指示

（1958年）

要实事求是，不要浮夸。要作冷静的促进派，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冲天的干劲要与严格的科学的态度相结合。

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1]

（1958年）

早就应该这样做，过去（分社）省也管不了，现在这个办法是适应国家的情况的。省委管比你们有办法，分社也就不孤单了，就有依靠了。

[1] 1958年，新华社国内分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站合并。这是毛泽东在听取关于此事汇报时，对地方党委领导新闻事业的指示。

关于造船方针的指示

（1958年）

在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力量的建设不仅要作好积极防御的准备工作。同时还要准备一旦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时，在打败敌人之后实施战略反攻和战略追击。把侵略者赶回他们的本土，坚决、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解放那里的人民，以便侵略战争永远不再发生。为此，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建设以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题名[1]

（1958年）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

毛泽东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题写的厂名。

[1]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是我国唯一生产新闻纪录电影的专业厂。1953年7月7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在北京正式成立。毛泽东于1958年为新影厂亲笔题写厂名。

四言韵语·养生十六字诀[1]

（1958年）

遇事不怒，
基本吃素。
多多散步，
劳逸适度。

[1] 这是毛泽东谈及自己的养生之道时，总结出的健康十六字诀。

《孤儿找到了母亲》（油画）

七绝·刘蕡[1]

（1958年）

千载长天起大云，
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2]
万马齐喑叫一声。[3]

---

[1] 刘蕡（？——842）字去华，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人。中唐大和二年（828），举贤良方正，刘蕡对策称："宫闱将变，社稷将危""阍寺持废立之权""四凶在朝，虽强必诛"。痛论宦官专权，能废立君主，危害国家，劝皇帝诛灭他们。考官赞赏刘蕡的文章，但惧怕宦官的专横，不敢录取他。令狐楚、牛僧孺都征召他为幕府从事，后授秘书郎。终因宦官诬陷，贬为柳州司户参军，客死他乡。毛泽东在读《旧唐书·刘蕡传》时，对刘蕡的策论很赞赏，旁批："起特奇。"

[2] 孤鸿铩羽悲鸣镝，孤鸿，孤单失群的大雁，喻指刘蕡。铩羽，羽毛摧落，这里比喻受挫、失意。鸣镝，也叫响箭，这里比喻宦官对刘蕡的中伤和打击。

[3] 万马齐喑叫一声，万马齐喑，亦作"万马皆喑"。喑，哑。苏轼《三马图赞引》："振鬣长鸣，万马皆喑。"谓骏马抖动颈上的鬃毛嘶叫时，其他的马都鸦雀无声。后用来比喻一种沉闷的局面。叫一声，喻指刘蕡冒死大胆攻击宦官，名动一时。

七绝·改梅白《夜登重庆枇杷山》[1]

（195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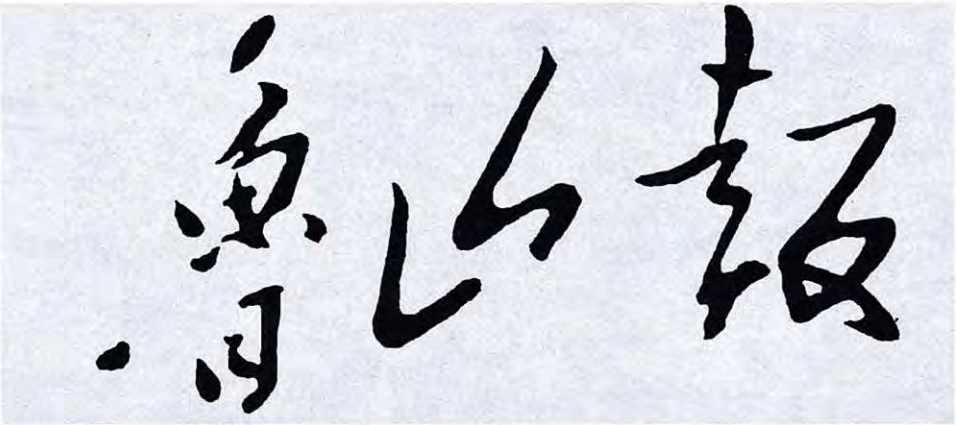
我来高处欲乘风，
暮色苍茫一望中。
百万银灯摇倒影，
嘉陵江似水晶宫。

[1] 1958年，毛泽东视察三峡，梅白跟随在他身边。毛泽东见梅白写的一首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颇有兴致，就对梅白的诗做了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1）苍茫，原诗为辉煌。（2）百万，原诗为几万。（3）摇倒影，原诗为流倒影。（4）似，原诗为比。

为《鲁山报》[1]题写报头

（1958年）

鲁山报



毛泽东为《鲁山报》题写的报头。

[1] 《鲁山报》是鲁山县创办的一份报纸，于1955年3月试刊，当年12月14日正式发行。1958年任鲁山县张良乡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文香兰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当年她去北京参加会议，受县领导委托，请毛泽东为《鲁山报》题写报头。会议期间，她将写有“请毛主席给俺写个《鲁山报》报头”的字条提交给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大会秘书处将毛泽东题写的《鲁山报》报头交给了文香兰。

1959

1959年，毛泽东接见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祝贺缅甸联邦国庆的电报

（1959年1月3日）

缅甸联邦总统吴温貌阁下：

在贵国国庆的时候，我谨代表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缅甸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祝缅甸联邦繁荣富强，祝中缅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阁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三日

对福斯特[1]来信的批语和复信

（1959年1月11日、17日）

一

少奇、小平、乔木[2]同志阅，退王稼祥[3]同志处理。

可照小平意见[4]办。复信作了一点文字方面的修改[5]。

毛泽东

一月十一日

---

[1] 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当时任美国共产党名誉主席。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3] 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4] 邓小平1959年1月10日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公开发表福斯特来信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说："我同意来信在《红旗》上发表，主席复信除用公开电发去外，亦可在《红旗》上同时发表。"福斯特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后来均发表在1959年《红旗》杂志第三期上，并载于1959年2月2日《人民日报》。

[5]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拟的复信稿时，主要是对其中的第三段作了一些修改。

二

亲爱的福斯特同志：

十分感谢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的来信。从您的充满热情的来信中，使我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共产党的灵魂，看到了伟大的美国工人阶级和美国人民的灵魂。

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在美国人中间，虽然有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坏人只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好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1]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

美国共产党虽然暂时还处于不大顺利的地位，但是你们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将来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黑夜是有尽头的。美国反动势力现已到处碰壁，显示着他们的寿命不会很长了。你们那里目前敌强我弱这种形势，完全是暂时的现象，它一定会向相反的方向起变化。

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您——美国工人阶级光荣的战士和领袖，致以衷心的问候，并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如果您有可能的话，我热诚地欢迎您到中国来医疗和休养。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七日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对驻苏使馆关于中苏关系中一些问题的处理意见[1]的批语

（1959年1月15日）

[1] 指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9年1月13日关于中苏关系的意见给外交部的报告。报告说，最近一年多以来，苏联报刊的宣传表明，苏联同志对我国的重大方针政策主要是赞扬和支持的，但对其中的一些问题还有着一定的保留或怀疑。我们认为，苏联同我国在基本方向和许多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和政策的完全一致是肯定的，在个别问题的看法和作法上出现某些不同也是自然的。对此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起苏联同志的误会，也会被国际上的敌人利用进行挑拨离间的宣传。因此，目前在宣传工作和处理中苏关系及事务中，就不能不特别谨慎。近来我们有些同志在对外接触中，言谈不够谦虚，认为苏联不如我们有办法，无所可学。不适当地强调我国的成就，甚至夸大我国的建设速度，不负责任地随便透露未经确定的远景指标。有的甚至态度傲慢，使苏方难堪。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和消除中苏关系中的上述消极影响，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参加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我党代表团阵容，以能充分表现我党的重视和中苏两党的团结无间为宜。（二）今后派遣来苏的各种业务性质代表团，应注意成员情况，加强领导，强调友好与业务合作。（三）代表团同苏方商定协定以外的各类事项时，应多考虑对方情况，以免强人所难。（四）对苏联某些不同意见，应尽量避免在报刊或群众场合公开表露。（五）对国内的苏联专家应多做工作，态度谦虚。

刘、邓[1]：

此件所提内容值得重视，请书记处讨论一次，如何？

毛泽东

一月十五日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给黄炎培[1]的信

（1959年1月21日）

任之先生：

惠书及大作早已收读，甚为感谢！连日小病迟复，幸谅。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一日

[1] 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对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通知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1月22日）

一

先发，再送少奇同志阅。

毛

---

[1] 指中共中央宣传部1959年1月20日报批的《中央关于目前报刊宣传工作的几项通知》代拟稿。通知稿说：在目前的报刊宣传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应继续进行充分的宣传。宣传中应注意科学分析，力戒浮夸，但不能冷冷清清，而应当热烈、有劲。（二）宣传上必须继续注意鼓足干劲，但对各地今年的计划指标不宜公布过多。（三）今年上半年内，报刊上只着重宣传工作中的成就和积极的方面，一般不报道消极的方面。（四）在宣传中要继续保持谦虚的态度，不要随便宣传超过国际水平，在宣传科技成就时不得贬抑兄弟国家。

[2] 毛泽东在审阅这一通知稿时，在其中的第三条后面加写了一段话，即本篇二，并将通知稿的日期改为“一九五九年一月廿二日”。同日，中共中央下发了这一通知。

二

鉴于1956年反冒进时期，对工作的缺点，宣传过多，给群众热情以很大打击，造成了马鞍形。而所谓缺点，事后检查，不过是十个指头的一个指头，或者还不到一个指头。那时有些人却大惊小怪，惊惶失措，是一种右倾情绪的表现。这个教训，千万不要忘记。

对中央关于动员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1月22日）

一

送刘、小平、德怀、克诚[2]阅后，尚昆[3]办。我在尾上增了一段[4]。

毛

一月廿二日

---

[1]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1月20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动员两千青壮年入藏屯垦生产的指示稿。1959年1月24日，中共中央给四川省委并西藏工委正式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小平，即邓小平。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即本篇二。

二

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几年之后，例如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之后，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西藏统治者原有兵力很弱，现在他们有了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有可能最后用战争解决问题。但是（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武斗争中予以完成。

在西藏军区关于边坝等地叛匪活动的电报[1]上的批语

（1959年1月22日）

这种战争，很有益处，可以发动群众，可以锻炼部队。最好经常打打，打五六年，或七八年，大举歼敌，实行改革的条件就成熟了。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部1959年1月14日关于边坝、扎木、雪喀、山南等地区目前叛匪的主要活动及企图给总参谋部等的电报。电报说，目前叛匪在这些地区集结，伏击我军，围攻守点分队，企图截断交通要道，气焰非常嚣张。我守点分队被迫进行了还击。鉴于当前叛匪活动较前猖獗，军区分别于去年12月25日和今年1月10日下达了《对敌情的分析判断及对行车备战组织的指示》和《各守点分队注意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守点分队及外出执勤人员的掌管部门，认真研究贯彻，严防遭敌伏击，确保安全。

对《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批语

（1959年1月22日）

送胡乔木[1]同志：

此件[2]可用，照发。

毛泽东

一月廿二日

---

[1]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1月21日送审的《人民日报》社论稿《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后载于1959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致苏共二十一大贺词[1]

（1959年1月23日）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和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表示热烈的兄弟的祝贺，向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表示诚挚的衷心的敬意。

自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来，苏联人民在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在共产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巨大成就，在联合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共同斗争中作出了许多的重大贡献。最近，苏联发射宇宙火箭的成功，又一次显示了苏联的科学技术已经达到光辉灿烂的高峰。

现在，苏联共产党根据建设共产主义的伟大纲领，提出了1959年—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将在物质条件方面和精神条件方面为苏联过渡到共产主义建立巩固的基础，并且将以建设共产主义的宝贵经验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这个计划的实现，还将进一步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更加有利于争取世界

[1] 这是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致苏共二十一大的贺词，由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周恩来1959年1月28日上午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宣读。

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伟大的七年计划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无比优越性，证明了社会主义在和平竞赛中必然胜过资本主义。

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人民从来就是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的光辉榜样。我们相信，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鼓舞之下，各国无产阶级和整个进步人类将更加信心百倍地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自从1957年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以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以苏联共产党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无论在保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在一切斗争中互相支持、互相鼓舞方面，在彼此互相学习、交流经验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社会主义各国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工作和斗争中都取得了不少新的成就。尽管帝国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还在玩弄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阴谋，但是这种阴谋必将同以往一样遭到可耻的失败。

现在，帝国主义正遭受着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严重打击，他们的殖民体系正在进一步瓦解，他们的内部正在逐渐走向四分五裂。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所支持的民族独立运动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汇合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垂死挣扎绝不能挽救他们最后的灭亡。

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去一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通过这个胜利，中国人民对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更加坚强的信心。中国人民在建设和保卫自己的国家的斗争中，从苏联得到了一贯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

谨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向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表示衷心的感谢！

祝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成功！祝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在进行共产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获得新的伟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印发陈伯达关于人民公社生产方面几个问题的来信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同志：

此件[1]请印发到会[2]各同志。同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作参考。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指陈伯达1959年1月18日请中共福建省委转交毛泽东并中央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他在考察广东、福建两省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情况时提出的一些看法：（一）现在除了应推广密植的方法到那些还是稀植的地区外，还应注意密植的适当程度，根据不同的土质、气候等条件，密植程度应有不同。（二）深耕程度应照顾地方的不同条件，在不同地区、气候和季节，应注意深耕的不同尺寸。（三）应将粮食底子向群众公开，节约用粮。力争丰年吃好，歉年吃饱。（四）不论生产或生活问题，都应反复同群众商量，不宜只由干部单方面独断。不要勉强群众去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五）去年大跃进中，有些地方提出要压这个、跨那个的口号，这样做并不一定会使自己成为先进，并且往往会使自己陷于落后。（六）今年这里的农业生产指标，可以考虑提翻一番，或稍低些，力争超过，不要提得过高。报纸公布去年完成的数字，也应该是严肃的。（七）公社要有一套逐步完善的关于劳动组织、定额和报酬的生产管理制度。195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将陈伯达的这封信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2]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对新华社关于广东新会县人民公社劳动效率下降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同志：

此件[1]极有用，请印发到会各同志阅读，想一想，研究这个问题。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新华通讯社1959年1月19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八八期上登载的这则报道说，广东省新会县一些人民公社在发放第一次工资后，出勤率、劳动效率普遍下降，否定供给制的言论又有所抬头，有些人进而要求完全恢复高级社时按劳取酬的分配方法。一部分基层干部也因此而消极起来，对落后现象不敢进行坚决斗争，有的甚至随波逐流，对今年更大的跃进缺乏信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主要是分配比例不合理，供给部分过多，工资部分太少。一般社员认为多劳不能多得，干多干少一个样，抱着“按酬付劳”的态度，积极性受到压抑。（二）劳动组织和责任制不健全，形成人无事做、事无人做的现象，这是造成窝工浪费和消极怠工的重要原因。（三）对人民公社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这也是群众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与某些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也有很大关系。目前中共新会县委正按照八届六中全会决议精神，采取调整分配比例、健全责任制和加强共产主义教育等措施改变这种情况。

对新华社关于内地对香港副食品供应量锐减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有用，请印发到会[3]同志们一读。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新华通讯社1959年1月22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一期上登载的该社香港分社记者组写的这一报道说，香港副食品绝大部分历来是依靠内地供应的。最近一个月来，内地对香港供应量锐减，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波动。在广大的中间、落后居民中，流露着一种恐惧、彷徨和不满情绪，糊涂看法很多；在进步人士中，认识还算比较清楚，但也有各种疑虑；反动派目前也在利用这个机会大肆进行反动宣传。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对新华社关于四川省委加强工业战线工作的报道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1]同志：

此件[2]极好，应当仿行。请印发到会[3]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新华通讯社1959年1月23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六九二期上登载的这则报道说，中共四川省委今年1月12日、19日两次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各市委确定“一开头就抓紧、自始至终抓紧”的领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工业战线上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克服一部分领导干部中存在的松劲情绪，以扭转当前钢和钢材产量下降的情况。为了保证完成今年以钢铁为中心的整个工业计划，省委要求各市委都要做好各项具体工作，订出切实可行的措施。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印发谭震林[1]关于目前农村情况和农业生产问题的报告[2]的批语

（1959年1月25日）

小平[3]阅，印发到会[4]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五日

---

[1] 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谭震林1959年1月24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各地传达、讨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已深入到县，整社试点工作也已经普遍进行。农村中虽然出现了各种困难和混乱现象，但估计经过四五个月的整顿后，一切都会转入正常。只要我们不让人民公社垮台，它就绝不会垮台。今年农业生产任务是很艰巨的，决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目前各地对少种的看法尚不一致，有的地方少种的步子大了一些。我认为没有高产的实现，不宜少种过多。今年农业生产高潮尚未形成，六中全会决议的宣传还不够有力，克服虚报浮夸把许多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都“克”掉了，这是最大的危险。至于劳动力紧张的状况，今年还会继续下去，经过合理安排可能会好一些。1958年的分配工作尚未做好，这对群众的生产情绪有很大影响，在压缩空气后，又发生了瞒产私分的现象，增加了分配工作的困难，尚须努力一段时间，才能做好。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4]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祝贺印度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9年1月25日）

印度共和国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阁下：

欣逢贵国国庆，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阁下和伟大的印度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印度人民幸福，国家繁荣。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五日

1959年2月12日，毛泽东、刘少奇和来访的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交谈。

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报告[1]的批语

（1959年1月26日）

请小平[2]同志印发到会[3]各同志。

毛泽东

一月廿六日

---

[1]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1959年1月24日请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转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这次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着重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问题。具体内容如下：（一）关于劳动力分配规划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会议认为，解决今年劳动力紧张的关键是在首先保证实现钢、煤、粮、棉四大指标的前提下，合理地分配使用劳动力。同时通过继续大搞工具改革、改善劳动管理等项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二）关于公社分配问题。会议提议：（1）保证90%的社员增加收入，其余的不减少收入；（2）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占一半；（3）公社分配收入和家庭自产收入，大约保持9:1的比例；（4）工资尽可能按月发放。（三）做好公社的初步整顿等项工作，加强对公社的领导。毛泽东在审阅时，对这个报告还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3] 指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摘录）

（1959年1月27日）

在中国人民中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是长期的事情。这些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用他们，没有他们，我们不能进行工作，没有他们就没有工程师、教授、教员、记者、医生、文学家、艺术家。又用他们，又同他们作斗争。所以是很复杂的工作。不能只用他们而忽视斗争性的一面，不然过了一个时期，他们又会出来反对党。匈牙利事件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在中国搞了几千个小匈牙利。北京有三十四个高等学校，我们让他们造反。有一个时期他们占上风，闹得天昏地暗，好像共产党就要灭亡了。这时候，我们准备反攻。经过几个月的辩论，驳倒了他们的谬论，多数人争取了过来，站在我们这一边。当然你们那边不能这样做，因为你们离敌人太近了。在我们这里，在每一个大学、中学、工厂、政府机关，右派想怎么做就让他怎么做，让他们尽量讲，我们一个月没有说话，并且给他们登报。这就给他们照了相，再也收不回去了。然后，我们就组织队伍，进行反攻，抓住了他们的尾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搞这一手，对社会主义是很危险的。右派的政治资本没有了，可是中间派当中还可能有人反对我们，世界上有混乱的时候，他们又会再来，我们要有准备。

对驻苏使馆关于约夫楚克[1]若干哲学观点的报告[2]的批语

（1959年1月）

送交林铁、陶鲁笳、张仲良、张德生、吴芝圃、舒同、曾希圣、王任重、周小舟、陈伯达[3]同志阅，阅后退毛。

---

[1] 约夫楚克，当时任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大学哲学史教研室主任。

[2] 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12月25日给外交部的这一报告说，约夫楚克本月23日向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四、五年级学生作了关于七年计划中的哲学问题的报告，其中谈到了有关中国的一些问题。约夫楚克说，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不应生硬搬用，不能把中国的经验机械地搬到苏联来。中国人认为人民内部存在矛盾，而苏联不同。如果说苏联人民内部有矛盾的话，那也只是在部分官僚主义分子和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他强调列宁关于没有物质利益原则就不能进到共产主义的话，指出一些外国人认为这一原则会产生资产阶级思想，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是不对的。产品的分配不能按平均主义办法进行。他说，有些人强调主观能动性，要拼命地干，其实主观包括党、领导、政策、路线和正确的计划等，这

虽然不能忽视，但也不能脱离物质生产的规律和原则。约夫楚克在报告中还讲道：外国有人认为国家应立即消亡，这是修正主义观点；马林科夫等人要强调集中，这也是错误的；在教育问题上，说服不是唯一的办法，强迫也不只是针对敌人的。

[3]　林铁，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当时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当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

在关于张国焘[1]最近情况简报[2]上的批语

（1959年1月）

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毛注。

---

[1] 张国焘，192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曾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1931年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1935年6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2月到达陕北。1937年9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1959年时正寓居香港。1979年死于加拿大。

[2] 1959年1月5日印发的这份内部情况简报说，张国焘去年10月表示愿意为新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

关于谈哲学等问题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

（1959年2月2日）

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同志们：

你们今日走，我想留下你们一天，谈一点哲学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诸问『问』题，觉得有必要。你们意见如何？昨天我讲了一些观点[1]，含意未申，不深不畅，未能畅所欲言，觉得余事未尽，心里过不去，老是想，不能入睡。因此想把你们掇回来，今天不要走，如何呢？留一天，你们虽然归心似箭，也不会了不起吧！一定留下。我现在睡。下午三、四、五时开会。务一天虚，时间不长！离春节还有好大几天，呆住不过一天，大概也可以吧！有几个深切的辩证法问题要谈[2]，与总路线、大跃进有大关系。请你们上午吹一吹当前实际问题的辩证法，打点底子。这个问题不想通，不开朗，不搭起架子，总路线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失败，或者半失败的。大跃进，干部大提高一步，群众也大提高一步，可能在我国造成一个有益于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善心的劳动人民的团结与奋进，大有益处。如荷同意，就请照办。阅后，立即送少奇、小平[3]等参加会议的中央各同志，传一下，中午十二时传完，请小平办。

倚枕书，毛泽东

1959年2月2日上午6时 Good morning!

---

[1] 毛泽东1959年2月1日下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一）在高潮中有些人怀疑，不足为奇，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一部分是敌对的，要加以分别，不要以为都是坏事情。做这么大的事，总会有些缺点。讲些怪话，不足为奇。去年11、12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要紧，可以再鼓足干劲。（二）有几个方面的失调，包括副食品、日用百货、原材料等，还有农产品未收上来，棉花也未收齐。必须经过努力，克服这几方面的失调和不足，使1959年的计划指标不受影响。（三）李富春说做个长期计划，我赞成。现在就可以做，但根据不足，明年可以再做一年，还可以加个后年，看究竟能搞多大规模。今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局面。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等条件，不会不跃进的。我们曾经提过一些不适当的指标，包括我自己在内，这在武昌会议上已经纠正了，即由3000万吨钢减到2000万吨。农业社放过一些卫星，报上吹过很多，不实在。实际上没有那么高，也没有那么多，有些是把几十亩田并成一亩拼出来的。（四）要注意几个方面的安排，现在想到的有劳动力、原材料、生活资料、干部教育等。这几方面不安排，单是我们这些人挂帅不行。今后搞大跃进，我们有几个条件：（1）群众的干劲、劳动热情，这是过去几年特别是整风、反右替我们准备下的。（2）有过去几年特别是去年的经验，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3）现在定下来的指标并不十分吓人，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4）今年还有11个月，抓得早些。去年我们专务虚，今年从现在起就务实。（5）今年有了人民公社，而去年大部分时间没有。（6）一年可以抓几次。干部下放，干部参加劳动，这两条今年还要搞。

[2] 毛泽东1959年2月2日下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我们所说的工作方法，看问题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辩证法。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讲主观能动性，两者结合起来讲就好了。现在有些人，一讲起去年的缺点，讲了几十条，一无是处，这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至于结

果坏是另一回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下面加了一段，说明有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和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到共产主义两种不同的过渡，并列举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五个条件。可是人们不注意这一段，只注意“不是遥远的将来”那一句，于是暴露出各种各样的想法，两个月内，鸡、鸭杀了那么多。至于桌椅板凳这些私人家具，还是暂借的好，将来作价分期归还。剥夺地主、富农理直气壮，剥夺富裕中农则理不直气不壮。我们国家贫农、下中农想揩中农的油，历来是跃跃欲试的，一有机会就讲平均主义。不要把富裕中农当做地富反坏去剥夺。这次搞出的计划，比较全面，形而上学较少，看到了其中的联系。如工业与农业、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重工业与轻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日用百货与副食品等的联系，都有所注意和安排，照顾得比较全面一些。我们应当称赞这个计划，宣传这个方法，既两条腿走路，又有重点。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仗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对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对5%以内的违法乱纪的干部，也要分别情节，区别对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了，是不好的。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斯大林曾提出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相统一。我们是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地运用它。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义；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它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变成了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也有两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这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实际的。要区别这两种情况。凡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现在没有蔬菜吃，副食品、日用百货严重不足，就是因为我们脱离了客观规律，过去的安

排缺乏这一方面。搞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无经验。同地球作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和错误。关于反映客观规律，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我是没有解决的。现在我们似乎开始在这里接触这个问题了。请大家接触这个问题，研究研究。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省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

（1959年2月2日）

对事情，在高潮中，有人会怀疑，这是不足为奇的，怀疑年年会有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好心、关心的人，一部分是敌对分子，像罗隆基。地富反坏，要加以区别。人家怀疑或者讲坏话，不要以为是坏事，要注意加以分析。总会有些缺点，有人怀疑不足为奇，而且有好处。

压缩空气已有两个月，现在二月一日，还要鼓足干劲。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干劲要鼓足，如果鼓得不足，应该鼓足……干劲还要鼓足，上游还要争，不要中游，不要下游。十一月、十二月压缩空气，群众也要休息休息，松一点不足为奇，再鼓干劲。

……

现在搞了一年，已经展开了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不是暂时现象？今后若干年是否会年年有跃进？像我们这样的国家，人多、大国、资源、苏联经验，应该是可以的。美国也可以说是个大跃进，一百多年世界第一。是资本主义的，现在不进了。不论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总之，是可以跃进的。不大跃进，会小跃进。恐怕也会年年大跃进的。是否展开大跃进局面？请各位想一想。以后是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我是倾向跃进的。

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还要有个主观能动性，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形而上学有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不把世界看成统一的、互相联系的，而看作是互不相干、互不联系的，像沙子一样。第二，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不从本质看问题，从形式看问题，不从内容看问题。第三，静止地看问题。不从发展看问题，不是透过形式看到内容，透过表面看到本质。新华社的“内部参考”，不可不看，看多了也不好。如一九五七年报道北京大学问题。说是右派猖狂进攻，闹得很厉害。陈伯达去看了，不是那么了不起。又如林希翎的讲演头一天很神气，第二天驳的人多起来了，第三天驳倒了。“内部参考”就说不得了。“内部参考”写的是历史。不可不看，不可多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夫子就不相信。现在我们讲的书就是报纸和刊物，其中有个“内部参考”，不可尽信。听话要兼听。不管我们有多少缺点，归根到底，不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几亿劳动人民，几百万、几千万的干部不会尽做坏事，我相信。我们这些在座的领导干部每天吃了饭尽做坏事，不可想象。在武昌讲过，县、公社、队做坏事的，顶多不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我们在座的和不在座的高、中级干部，都是想做好事的，想做坏事的总不会多。至于想做好事而做坏事的，要加以区别。斯大林的悲剧，是想做好事，结果做了坏事。主观的东西要在客观实践中才能见效。我们要称赞这个计划，大进一步。宣传这个方法：有重点，又是两条腿走路。比如原材料工业，目前是重点。要加一些，加工工业减少一点，增加□□亿投资，□□万美元。□吨钢材搞

轻、化工业是对的。要宣传、讨论、发展这个办法，经济工作很复杂，互为因果，搞不好有连锁反应。要钻进去，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揭露问题，解决问题。不钻下去，只能打皮下，不能打血管。索性不怕它，钻进去，揭露它。不充分揭露这个矛盾，就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问题就是矛盾。许多所谓没有问题，其实是有问题。要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水浒传》“三打祝家庄”，就是探庄，石秀探庄。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另一个问题。打了败仗，瓦解三个庄，孤立祝家庄。第三个问题是祝家庄内部情况不了解。于是派人假投降，内应外合，这是很好的戏，为什么不唱？过去我们打仗都调查情况，每次打胜都是条件成熟了。现在搞建设，向自然作战，也要调查研究。搞建设我们没有经验。我和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抓，以前主要是抓农业，没有抓工业。农业究竟落实不落实？□□斤粮食，□□担棉花，麻、油料、大牲口、小家禽，这几个指标是否落实？是不是夸大？能不能完成？不要采取假报过关，其办法是超额。粮食要搞□□斤，只报□□斤。不搞这么多不行，不然明年不好办，前年搞得早，去年刚好，今年动手晚一些，深耕没有？搞肥料，看报上还不错。河南肥料怎么样？水、肥、土搞得怎么样？水利争三百亿土方。今年我担心肥料这一关。人患浮肿病，就是没有肉和青菜。庄稼不吃肥料，也是患浮肿病。所以要大搞土化肥、菌肥、沤肥、绿肥、熏肥、人粪尿、牲口粪尿，以这些为主，切实搞一下。麦子要追肥、追水、多锄。多锄就是暂时割断毛细管，减少水分的蒸发，今年搞□□□□亿斤粮食。应该是按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的序列，中心是土，有土就有粮。水有了，应该把改良土壤的“土”字放在前面。其次是肥。第三是水，但现在暂时不修改。听说搞肥料所需的人工

要〔占〕一半。工具改革很重要。每个人民公社都要搞一个农具工厂。因地制宜，不要三天风一过，就不行了。要单独搞一个农具研究所（浙江有研究气象、土壤的，就是没有研究农具的），收集、研究、设计、试制农具的学校。要挖这么多土方、运这么多肥料，都用人挑，没有机械是不行的。“收割”应为“割收”。割、运、打、收，没有机械，要人去割，那怎么得了！

……

还有两个问题谈一下。有些人批评我们没有大跃进。富裕中农当中有百分之三十，论调与地、富、反、坏、右接近了。民主人士肚里有意见，口上不讲就是了。对这个问题，武昌会议我也讲过，我们有百分之五的人违法乱纪。至于有些人，衷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人，不能算进这百分之一、二、三、四、五之内。对于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劳动积极性要保护。就是百分之五之内的人，也要区别对待。分别情节，进行教育，改正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夸大化了是不好的。这个经验年年念一下。和尚念经，天天念。这是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对于本来是好人的人，犯了一点错误就夸大起来，就会变成黑暗一片。列宁说，这种话本来说得对，只要略为说过了，就变了质。现在有些好心的人，就是方法不对，分不清部分和全体的关系，缺点一列几十条，就天昏地暗，一无是处。这一点必须警惕。在整社过程中，要让群众把缺点说出来，首先要自我批评，一定要改正，然后讲清楚缺点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但大多数一定要改正缺点。要保护积极性，否则就有“曹营之事不好办”之嫌。

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结论一定要做得恰当，不然要犯错误。对民愤很大的要处罚，当然不一定每个人都枪毙。农村中有些人打人成百，不给以处罚是不好的，会影响群众。但对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要坚决保护过关。这个问题，我们党有几十年的经验，如罗章龙，此人现在在武汉当教授，我很熟。罗当时反对中央很厉害，否定中央，一无是处，就是他正确，自立中央，结果搬了石头打了自己的脚。还有立三路线，也讲只有他对，别人都不对，也是否定一切。王明路线也是一样，都吹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把别人说成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是狭隘的经验论。还有张国焘路线，也是自立中央，编了剧本歌谣，打倒毛、周、张、博，自称是列宁主义，国际路线，结果毁坏了自己，跑到香港，把儿子放在中山大学读书，证明不是列宁主义。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如此，提出六大纲领，声势浩大，根本否定中央的一切，迷惑了许多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他代表好多小资产阶级中的不稳定分子。王明告洋状，说毛有三大罪状，反国际路线；整风中强迫百分之八十的人检讨；搞宗派。武昌会议时，王明写来一封信，比过去好些，讲辞职了。高饶反党集团，他们做绝了，太过分了，反对□、周，重点在□，说有两个中心，两个摊摊，有他们的纲领，迷惑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一点夸大成全部，结果毁灭了自己。没有提过的次要事情是很多的，这些事情还不算在内。历史上有陈独秀路线、罗章龙路线、两次王明路线、张国焘路线、高饶反党集团……这些大事件与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程度不同，性质不同……不论中国外国，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是否定了自己，毁灭了自己。对蒋介石可以否定一切，但是台

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最后，美国也可能不要台湾，把它当个毒瘤沾在他们身上，我们将计就计，只要他这个葫芦挂在我们腰上，总是有办法的，十年、二十年会起变化。给他饭吃，可以给他一点兵，让他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那是毁了自己。在目前批评缺点的时候，讲到这段历史，就是拿历史教育我们的同志。

在南宁会议，提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把问题形象化，最能说服人，就是教育干部顾大局与不顾大局的问题，就是大局与小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

关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问题，我不甚了解，要研究。究竟如何使主观符合客观法则？列宁说，俄国的革命热情与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理论是精神，精神反映了物质，是接近实际的东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普遍与具体是对立的统一。客观规律在每一个国家因历史条件不同就有不同的反映。客观法则要研究它，认识它，掌握它，熟练它。斯大林对这个问题讲了很多，但不照着去做，不按照比例，工大农小，重大轻小，大大中小小。我们现在作翻案文章，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创造工业（包括交通运输）、农业两方面的高涨、跃进，开始找到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法则的门路。一九五五年的合作化以后，人民的热情起来了，开始看到经济发展有希望，反保守，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办到的事情就要努力办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不能办到的就不办，一定要他办到就是主观主义。主观反映了客观，就成了主观能动性，不是主观主义。主观能动性有两

种。一种是脱离实际的，就是主观主义，一种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是符合实践的主观主义。凡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就要受挫折。比如，副食品、日用百货脱节了一部分，如不抓，很危险……

日本人说我们不是人口论，是人手论，我们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做事情。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可能是基本适合的，至于具体数字多一点少一点，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证明是可以大跃进的，每年都可以大跃进，无非是多于一千万吨钢或少于一千万吨钢。苏联一九五八年增产四百万吨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前年只增产了三百万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二十年中只增产一千四百万吨。战后十三年增产了三千七百万吨，以后每年增加五百万吨。我们与他们不同，我们搞大中小，几个并举，有群众路线，两参一改三结合，党与群众相结合，同时地理气候条件好，人口六亿八千万，所以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开展了这样一个大跃进的局面。是否能这样说，像养猪一样，前四个月是搭架子，一九五八年是克朗猪。有了架子，没有多少肉，还不肥，以后养猪……现在我们大跃进就是搭架子。

从一九五五年提出“十大关系”起，一九五八年元旦社论搞了一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成都会议发展成为总路线。现在看这是对的。要不要干劲？要不要鼓足？要不要争上游？还是中游下游？要不要多快？要不要好省（质量），前两句是人的精神状态，是主观能动性。后一句是物质。

当然我们有缺点错误。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像小孩抓火一样，没有经验，摸了以后才知疼。我们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无经验，向地球开战，战略战术我们还不熟。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

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实践中间、斗争中间才认识了客观实际、计划、比例。在一九五八年展开了一条克朗猪，但无一条肥猪。在实践过程中，找到了门路（大跃进）。可能武昌会议的四大指示是接近实际的，但只是写在纸上。不是现实的，粮食还没有拿到手。钢铁、煤只拿到一月份（生产不大好）。要经过努力，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经过这次会议，经过努力，可能各方面的问题解决得更好。有了经验，比一九五八年要好一些，各项工作和人民生活都会好一些，事后诸葛亮变成了事前诸葛亮。劳动力有浪费，大城市副食品不足，没有注意，一部分轻工业注意不足，还有多种经营、运输问题注意不够。一种是没注意，一种是注意不足，以至引起供应不足和部分失调。这几个问题不作结论，当作一个问题，请省委常委研究一下……

从总的看，我们的计划、指标、社论适合与否，总是从实践中找经验的。即使还没有完成，只是经验不足，牛皮吹得大。报纸写诗，我赞成这个空气。完不成也是乐观的，因为可以从完不成中得到教训……无经验，明年再搞一年。苦战三年，我们的经验就多了。不适合，我们就改，让全世界骂一顿。我们总路线也不能改，“降低干劲，力争下游，少慢差费”地建设社会主义总不行。永远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什么叫多，什么叫快，要从实践中去看。现在我们提出十五年建成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行，就更多一点时间嘛！究竟什么叫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问题才开始接触，请同志们研究。

祝贺锡兰[1]国庆的电报

（1959年2月3日）

奥利弗·古涅狄莱克总督阁下：

值此锡兰独立十一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阁下和锡兰人民致诚挚的祝贺。祝中锡两国人民间深厚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祝锡兰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三日于北京

[1] 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对驻英代办处关于英国同美、法、西德等国矛盾发展的初步总结的批语

（1959年2月12日）

此件[1]甚好。林克[2]阅后，送江青阅。

毛

二月十二日

---

[1] 中国驻英国代办处1959年1月5日的这一总结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一）1958年是英美实行所谓“相互依靠”政策的一年，在这种“相互依靠”的形式下面，两国各谋保持并扩大自己的阵地，削弱乃至在必要时牺牲对方来挽救自己；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两国经济领域内的矛盾在过去的一年中有了新的发展，未来一年中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两国的矛盾将更趋深刻化和复杂化。（二）1958年也是英法矛盾发展到白热化和英德矛盾逐步尖锐起来的一年，这种矛盾贯穿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三）1958年英国同美、法、西德矛盾尖锐的原因是：1. 社会主义阵营政治上的团结一致和经济上、科学技术上的飞跃发展，使两大阵营间力量的对比愈加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2. 美国经济危机持续恶化波及西欧，使资本主义世界主要国家间竞争空前激烈。3. 亚非和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增长。4. 西德的再起，打破了战后西欧出现的“均势”。5. 西欧各国人民反对氢武器，反对侵略战争，要求和平共处，加强了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离心倾向。

[2]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转发这一文件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2月13日）

一

略有修改。退周总理、陈毅处理。

二

中央同意中央外事小组“关于1958年外事工作的基本估计和1959年外事工作的方针规划”。现发给你们，希据此安排和掌握有关外事方面的工作，并应组织适当范围的干部，对有关涉外事项，加以讨论，坚持正确方针，纠正错误缺点，贯彻实行。

中央

1959年二月十三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和中央外事小组代拟的中共中央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代拟的中央指示稿的修改；本篇三至六是对中央外事小组文件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三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掌握之下，我国就台、澎、金、马问题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震动全球的胜利斗争。通过这场斗争，我们不仅再一次使美帝国主义的实力地位政策和战争边缘政策遭到失败，而且还运用绞索政策击破了美国从金、马脱身的政策，使美国进退维谷，空前孤立。这场斗争再一次揭露了美国力量虽然强大但就其全局看来它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纸老虎的本质，揭露了美国有其强大的一面又有其虚弱的一面这种实际情况，极深刻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特别是阿拉伯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了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美国和它的同盟国之间的矛盾。

四

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将日益加深，他们将进一步走向四分五裂。美帝国主义将更加孤立和被动，它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将继续显著地起作用。

五

必须虚心地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适合于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对其在历史上所犯某些错误，例如斯大林时期所犯某

些政治上、经济上的错误，则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同时采取积极主动和谦虚谨慎的态度，帮助各社会主义国家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和对外政策，消除某些可能发生的误解。

六

在岸信介[1]不改变敌视我国的政策以前，原则上不考虑恢复中日贸易（对个别生意可以考虑做一点，以支持某些日本中小企业，例如出口少量生漆），对两国民间的往来应当继续进行。在适当时机也容许有某些官方人物的往来。

[1] 岸信介，当时任日本首相。

1959年2月，毛泽东和出席苏共二十一大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胡志明亲切交谈。

对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2月13日）

一

应连同附件，一起发出。[3]

毛泽东

二月十三日

发给哪一些单位，请彭真同志商周陈[4]酌定。

---

[1] 指中共中央外事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1959年2月5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代拟稿。代拟稿后还附送了国务院外事办公室1959年2月3日整理的《关于在对外关系中所表现的骄傲、急躁和轻敌情绪的一些材料》。

[2] 本篇一是对中央指示代拟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中央指示代拟稿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三是在附件中讲到部分同志“拿我们的框子去衡量别人，片面地夸大兄弟国家工作中的缺点”一段后加写的一句话；本篇四是在附件的最后加写的一段话。

[3] 中共中央1959年2月16日正式下发了这一指示及其附件。

[4]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

二

必须继续强调学习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一切适合我国情况的先进经验。对其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有过的缺点，也要从反面学习，引以为戒。

三

过去有些同志对朝鲜同志看缺点较多，看成绩较少，犯了片面看问题的错误。

四

以上材料是不完全的，可能有些同类材料还未收集到。以上材料中，有一些也未核对清楚，可能有说得过分之处。不管怎么样，暴露了这些错误，可以引以为戒，使坏事变成好事。总而言之，1958年，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分不清这个主次，就会犯错误。但既然是缺点错误，而且涉及对外，性质严重，就一定要改正，而且越快越好。其办法，就是向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教育，举行讨论，讲清道理，力戒骄傲、浮夸、急躁，坚决反对极端错误的与党的路线水火不相容的大国沙文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争取1959年的更大胜利而奋斗。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1]

（1959年2月14日）

马特（以下简称马）：我有些理论问题不清楚，想在这里提一提。主席先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家，不知有无时间解答？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你这个说法不对。

马：理论著作我看过很多。我认为只有列宁和您的著作最好。

毛：忙于工作，没有充分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

马：我认为，所谓马列主义是指马克思和列宁两人的著作。其中属于认识论的唯物主义是普遍的真理，还有一部分是属于具体实用的而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考察的学说。就此而言，马列主义中属于后一部分的学说是否需要不断改变？

毛：你这个讲法不合适，马列主义至今未变。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

---

[1] 这是毛泽东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的一部分。

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这正是我要提的问题。

毛：列宁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马：列宁改变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毛：马克思、恩格斯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将在几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同时发生，现在改变了这个结论。例如，俄国经济比西欧落后，却首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是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

马：这本来是没有预料到的，即使是列宁，也是事后才看出来的。

毛：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前就已经发现。

马：但是在二月革命之后。

毛：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马：列宁是在以后才看出的。

毛：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宁说专政只能由一个政党执行，而主席先生说无产阶级专政可以由几个政党联合执行，这是不是离开了马列主义？

毛：不能说离开了马列主义。中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是几个政党联合进行的，但是以共产党为首。中国有两次革命：一九四九年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解决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问题，那时我们没有触动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后一次革命，想必你也知道，就触及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以及个体手工业与个体农业的所有制。对这些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了几个步骤。后一次革命经过几年，已基本完成。这两次革命，都是以共产党为领导进行的。

马：中国解放的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解放以后的事，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却早已知道了。

毛：我们先动买办资本，而对民族资本我们好几年未动。至于个体农民，我们首先分配土地为农民所有，第二步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对于民族资本，我们分几个步骤进行改造，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公私合营。国家采取了和平赎买政策，分好几年赎买。现在，原属民族资本的那些企业都是由国家管理。

中国过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占百分之八十，民族资本只占百分之二十。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资本归国家所有以后，资本的主要部分就已归国家所有了。对民族资本我们采取和缓的政策。

马：很同意中国的做法。

毛：资本家现在同我们合作。

马：还有一个理论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先在东方经济落后的国家取得胜利？

毛：这个道理很简单。东方国家的统治者不能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东方国家人民首要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些国家被西方国家剥削得很贫困。这里讲的东方，包括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即所谓帝国主义的后方。

马：马列主义有关实用的部分，现在有些已不适用了。比如西方国家，社会经济是垄断的，但政治上并不尽然，因为还有自由，这个自由并不影响社会的发展。所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这两个东西，是否可以分开来？

毛：这首先要对专政作分析，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实际上是资本家有剥削的自由。

马：同意。中国是把人们从经济上解放出来。

毛：西方国家的政权不可能由多数人掌握，而只由资本家统治，这就是独裁。

马：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为什么不上台呢？

毛：因为资本家不允许。

马：在智利，共产党上台是有可能的。

毛：今天还是投资产阶级的票的人多。

马：为什么呢？

毛：中国过去也是如此，赞成我们的人开始也很少。经过二十八年，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我们逐渐取得了人民的拥护。

马：西方国家已经经历了好几百年了，再过一百年也还会是那样。

毛：但是今后的情况是会改变的。

马：当然会这样，这就需要一个新的方案。

毛：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

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西方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问题的解决将要受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但是你们说这将是马列主义的胜利，而不说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胜利。如果你们对马列主义采取这种态度，拉丁美洲人民就会怀疑马列主义。

毛：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

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专政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

马：世界观不变，是不是革命理论部分是可以改变的？

毛：要看是什么理论。比如革命将首先在一国或几个国家内取胜的理论，是改变了马、恩的结论的。

马：如果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发表出去，会不会有人认为主席先生背叛了马列主义？

毛：我不认为中国背叛了马列主义。中国的党一贯遵守马列主义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的真理。这是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的问题。

接受罗马尼亚新任驻华大使查哈勒斯库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9年2月17日）

毛泽东主席在答词中说：近年来，中罗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友好合作已经获得很大的发展。中国人民衷心地感谢罗马尼亚人民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因而是牢不可破的。我深信，在我们两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朝着共产主义奋勇前进的康庄大道上，这种真诚的友谊和合作必将日益巩固和发展；这将有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并且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祝贺尼泊尔国庆的电报

（1959年2月17日）

加德满都

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陛下：

欣逢贵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尼泊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我深信，中尼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和巩固，祝陛下和尼泊尔人民在谋求国家繁荣昌盛和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于北京

两次失败使我们学会了打仗[1]

（1959年2月17日）

中国民主政党是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叫做同盟会，孙中山是领导人。中国共产党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二一年是十六年，是在同盟会成立十六年后才成立的。一九一一年举行辛亥革命，当时没有共产党，成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他们失败了，第一个共和国灭亡了。以后就不断地斗争，同军阀买办进行斗争，那时还没有共产党。从一九一一年到共产党成立有十年之久，资产阶级老是失败，找不到出路。我们这些人当时以个人身份参加辛亥革命，我就是参加辛亥革命的，当时参加的还有吴玉章、林伯渠[2]等。后来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还是没有共产党。资产阶级没有出路，就走俄国革命的道路。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和苏联代表越飞[3]签订了孙越协定，这是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的时候，苏联支持孙中山的革命。

一九二三年共产党的第三次大会决定参加国民党，就是一部分

---

[1] 这是毛泽东会见摩洛哥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里·亚塔、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阿卜杜塞·布尔基亚时谈话的一部分。

[2] 吴玉章，1905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前领导四川荣县起义。林伯渠，1905年参加同盟会，同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

[3] 越飞，1922年8月至1923年1月作为苏俄政府特命全权代表来华，并于1923年1月26日与孙中山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党员参加到国民党里面去。国民党接受了，我们就参加进去。它的目的是要“容纳”共产党，就是要把我们化掉。他们有个民生主义可以化共产主义，这是资产阶级的目的。

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薄弱的，抵抗不了帝国主义。在组织上也是薄弱的，不会做组织工作。我们就去帮助他们组织群众，建立支部。这里指改组后的新的国民党。

在国民党中央组织内，每十个委员中只有一个或两个委员是共产党，国民党占绝对优势。孙中山死了，蒋介石来一个政变，同共产党打，发生在广东，那时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根据地都是在广东。蒋介石的军队也是在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下搞起来的。周恩来总理是当时黄埔军官学校的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把我们在中央的权力剥夺了，但是在地方和军队中他们没有做到。因为那里复杂得很，他们搞不下去。因此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是国共合作的。

一九二七年是个大胜，也是个大败，蒋介石争得了领导权，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党内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革命高潮变成了革命低潮，共产党由合法变成非法。大批党员被杀戮。那时我们党缺少经验，只懂得同资产阶级合作，不懂得斗争。要准备同他们斗争，准备失败，但是我们当时没有这个准备。

革命果实落在资产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同农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相反地却受到镇压。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得到了经验，原来资产阶级是这样的，曾经和我们合作，现在打我们。这条经验我看对你们是有用的。

我们就想一想，他杀人，我们就隐蔽起来，搞秘密工作。从前我们不懂得搞秘密工作。第二条是上山，他有枪，我也有枪，跟他对打。

敌人教会了我们两个办法，第一个是做秘密工作。他不杀人，我们是学不会的。第二个是学会了打仗，一打就打了十年。我们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有三十万部队（包括游击队），有三十万党员。这个时候我们又犯了错误，“左”的错误，以为这个时候我们也了不起了，轻视敌人。陈独秀[1]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时犯“左”的错误。一犯错误就很大，三十万军队就剩下两万军队，垮下来，中间经过一个长征，走了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你们也许听说过。党员剩下几万人，十几个根据地剩下北方一个，我们从南方转到北方来。秘密工作因为“左”的错误，也破坏得差不多了。

这是一个失败，很大的失败。但是失败教会了我们，大概这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失败教不会党员。敌人教育我们，“左”右倾机会主义教会我们。

我们有两次大起大落。第一次有五万党员，党在军队中有很大势力。敌人把我们打败了，剩下几百个、千把个党员，数目虽少，但都是很优秀的。有的被杀了，有的叛变了，有的动摇了，总之天昏地黑不好混。在座的有三个就是经过大起大落的党员[2]。第二次大起大落就是刚才讲的，由于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剩下两万军队、几万党员。

这是一个认识中国革命的过程。我们是中国人，就是不知道中国革命要用什么方法。所以在抗战时期，鉴于两次失败，一“左”，一右，做了综合工作，长处和短处，正确和错误，两种经验综合起来。政治、军事、经济搞出一套来了。

从第二次大落到北方，从一九三四年冬季到现在，有二十三年

---

[1] 陈独秀，大革命时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 指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稼祥。

半，就稳步上升，没有什么大起大落了。这中间包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战胜蒋介石，在朝鲜战胜美帝国主义，在国内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们革命有两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把资产阶级和小生产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这个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同蒋介石合作，一共八年，后来又打了，把他打跑了，跑到台湾去了。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干。我们说总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对我们不怕。

我们长期对资产阶级分两个部分搞不清楚。对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应当有不同的政策。

对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我们比较清楚，但反封建要会分析。

在西藏武装叛乱情况简报上的批语[1]

（1959年2月18日）

刘、周、陈毅、小平[2]阅后，退彭德怀[3]同志。

西藏越乱越好，可以锻炼军队，可以锻炼基本群众，又为将来平叛和实施改革提供充足的理由。

毛泽东

二月十八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2月14日编印的《情况简报》第十六号上。这期简报登载了新华通讯社2月2日关于西藏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发展为全面性叛乱的电讯稿。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平叛情况报告[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2月19日）

一

德怀[3]同志：

---

[1] 总参作战部的这一报告说，自1955年年底开始，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西藏等地的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先后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少数民族中的反动上层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帜，在帝国主义指使下欺骗、诱惑、胁迫人民群众，组织武装叛乱。我军遵照中央关于“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平叛方针，3年来积极进行了平息叛乱的斗争。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区的武装叛乱已基本平息。平叛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是：一、根据目前情况，滇、川、甘、青等地区1959年应基本平息本地区的叛乱。西藏地区因情况复杂，应严守中央关于自卫作战的原则。二、一些叛乱分子利用西藏目前的形势窜入西藏，企图与我长期周旋，为此各地应密切组织、协同作战，使敌无隙可乘。三、各军区应认真总结平叛经验。四、其他如装备、战时供应和救护等问题，由各军区提出，有关部门预作准备，逐步解决。

[2] 本篇一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1958年12月27日关于几年来成都、兰州、昆明、西藏军区平息叛乱情况和几个待解决问题的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这一报告中加写的一句话；本篇三是在这一报告中修改的一句话。

[3] 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

此件很好。建议密发西藏工委、军区直至团级，使他们了解全局，明白方针政策。川、滇、甘、青平叛区域，也应发给。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

二

这种叛乱，有极大好处，有练兵、练民和对将来全面平叛彻底改革提供充足理由等三大利益。

三

我们军事方面不但不怕叛乱，而且欢迎这种叛乱，但是必须随时准备和及时地平息叛乱。

在关于英国各界对我撤销出口合同的反应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2月19日）

恩来、陈毅[2]同志：

为什么采取这种政策，是否有利，请查明告我为盼。

毛泽东

二月十九日

---

[1] 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商务参赞1959年2月14日给外贸部并外交部的这一报告说，上海土产公司与英商成交霜黄棉约2000吨，最近该公司以政府不发许可证为由撤销合同，此事已引起英国各界广泛注意和评论。我代办处在对外接触时，对类似上述问题一般不明确说明原因，亦不强调运输问题，有时适当指出贸易发展必须以政治友好为前提，对有些客户，尽量说服其接受撤销部分合约。我们认为，今后如毁约面太广，将对我政治上造成不利影响，故建议国内各公司应尽量缩小不履约的品种和客户范围，确实无法交货，亦应与对方协商解决，置之不理态度，将更会造成对方的对立情绪，采取不利于我的行动。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对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的批语[1]

（1959年2月20日）

退徐冰同志：

与总理和小平、彭真[2]同志商酌定案，我无意见。

毛泽东

二月廿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徐冰1959年2月6日为报送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名单（草案）和说明给毛泽东的信上。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和新、洛、许、信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1959年2月21日）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你们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采取的什么分配办法？那时候是不是有差别，那时候上交是否相等？穷队富队、穷村富村。过去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包工包产，生产多者奖励，就是农业社不是拉平的。苏联5500万吨钢不能和我们1000多万吨钢拉平，那是无代价占有别人的劳动的，那是人民的，是农民的。所以那时候提出土地回老家，鞍钢回老家，那不是剥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就不同了。因为他是朋友，我们对他们是采取赎买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明明是工人阶级生产的，不是资本家的，因为他是朋友，所以尚采取赎买政策，利用他做工作，团结知识分子，有偿收买剥夺工人的财产。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过去高级社就是多有多吃，少有少吃。评工记分是表现人与人劳动结果的关系。包工包产是表现村与村、队与队的关系，这个经验我们没有记取。1956年高级化第一年调粮的经验没有记取就发生此问题，老太婆挡住不叫拉粮食，现在公社第一年又是发生此问

题。现在看今年究竟采取什么办法好，值得研究。今年要宣布几条政策，穷的富的都要干，想办法帮助穷的。把中国提高到苏联水平。西方国家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以后，不能把西方国家的砍下来补亚非国家，还是亚非国家自己提高。当然在亚非国家的投资应该没收，但是不能去欧洲设机器。也就是说，苏联现在发展的水平，不能白白地送给我们。因为苏联有工人，有工人要开工资。机器要搞折旧费，你苏联的砍了给我，你怎么办？还是要搞等价交换（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地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得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河北省一月八号开党代会，想思想统一，想统死。作了决议，但是，到了一月下旬感到不对头。省委赶紧传，下旬开了电话会议，转变了以后，有些地委不通，县委不通，有些公社不通，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积累不超过25%，这就占1／4，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下边隐瞒，实际不至只分配30%。大家都想多积累一点办工业，这也是好心。斯大林就是这样的政策。斯大林从建国到1953年为止的30年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搞了一个集体化，一个机械化。沙皇时代没有集体化，集体化了，没有机械化。机械化了，但是他死那一年的产量和沙皇时代一样，如

果不是赫鲁晓夫改变政策，将来越发展越严重。我们现在不改变，就要犯斯大林的错误。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汇报时反映社办的事情太多。一方面投资太多，再一方面劳动力调得太多）。要改变这种政策，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社里积累不行。过去讲“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现在的百姓就是社，君就是国家。斯大林搞了三十年，是一条腿走路。如果我们70%归国家，和地主一样，群众只得三成，当然我们和地主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多积累一点是搞建设，建设反回来还是为人民嘛。这一点也要分析，要讲清楚他是想迅速工业化，是好心，但是，我们作这是好心不是好主意。我们和地主不一样，不是为了发财。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无非就是这样几条，土地农民不怕，省委、地委、中央你都搬不走，他现在争的是产品和劳动力。我们说土地还是集体所有制，内部搞一个文件说一下，实际是队所有。土地、工具、生产资料加人力和公社只搞25%，你们考虑是不是太少了？现在反对本位主义，造成紧张局势，越造成紧张局势越紧张，实际瞒得15%叫它合法。我们国家和社积累25%，生产费20%，群众分配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把白菜和猪都拉走，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一定要改变。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

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一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评，按劳取酬”。

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1]

（1959年2月21日）

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事实是帝国主义依靠它的走狗，联合非洲的一部分人压迫非洲。目前非洲这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般说来，整个非洲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一不要以为马上可以胜利，明天早上就胜利，要准备长期斗争。如不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而帝国主义那么强大，就要失望。二要以依靠自己力量为主，争取外国援助为辅。我有这两个建议，请你们考虑。我不熟悉非洲的情形，我又不是非洲人。我讲我的意见，供你们参考。

非洲当前的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搞民族解放运动，不是共产主义问题，而是民族解放问题。这点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另外两点：一是胜利的快、慢问题。可能胜利快，也可能胜利慢，无非这两种。两头都准备，就不至于失望。二是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是依靠外国来解放非洲，还是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要依靠非洲人自己解放非洲。非洲的事情非洲人自己去办，依靠非洲人自己

---

[1] 这是毛泽东和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和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青年代表谈话的一部分。

的力量。同时也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包括中国在内。至于中国，一定支持你们。这两点是否对，请你们考虑。

看来，现在的非洲与过去的非洲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九五八年非洲反帝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可以料到，今后非洲的反帝运动会比过去发展得更快。至于各国要帮助你们，那毫无问题。各国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独立了的国家，一定要帮助、支持你们。你们需要支持，我们也需要支持，而且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支持。谁来支持我们？还不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这是支持我们的最主要的力量。支持我们的还有西欧的工人阶级。所以是相互的支持。你们那里的反帝运动就是支持我们。苏联、中国把工作做好一点，也就是支持你们。你们可以考虑，中国可以当作你们的一个朋友。我们能牵制帝国主义，使它力量分散，不能集中力量去压迫非洲。

祝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国庆的电报

（1959年2月21日）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欣逢贵国国庆，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致热烈的祝贺。祝中阿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日益巩固和发展。并祝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人民幸福，国家繁荣昌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一日于北京

中央批转一个重要文件[1]

（1959年2月22日）

一

各省、市、区党委：

赵紫阳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2]及广东省委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指示；本篇二是毛泽东1959年2月15日为印发这一指示初稿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印发这一指示修改稿写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这一修改稿上拟的。

[2] 赵紫阳1959年1月27日的这一报告说，自去年12月中旬以来，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召开以县为单位的生产队长、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主要、最好的形式。在干部大会上，一定要根据群众思想发展规律来进行工作，要把普遍系统深入的思想发动、阶级教育同个别突破、个别交待粮食情况相结合。必须反复交待两条政策：一、粮食政策。明确宣布1959年夏收之前粮食消费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包干，以解除大家对粮食问题的顾虑。二、对待瞒产干部的政策。应明确宣布瞒产是错误的，但只要坦白交待，可既往不咎；拒不交待的，要给予处分，甚至法办。会议后期要在查错漏、查平衡的基础上迅速安排社员的生活，总结思想，整顿组织，纯洁队伍。

的批语[1]，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紫阳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2]，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此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各地、县。

中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二日

---

[1]　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1月31日转发赵紫阳报告的批语说：粮食问题必须解决，这是关系到今年生产跃进和整顿公社的最重要问题。许多地方的事实证明，去年粮食大丰收、大跃进是完全肯定的，粮食是有的。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2]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二

即送刘、彭真、周[1]阅后，即刻印发，或用电报发去，越快快〈越〉好。另印如前示。

三

即送李雪峰[2]同志办。最好用电报发去。另印政治局各同志。常委各同志已看过。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

[1] 刘，指刘少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指周恩来。

[2] 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对《陈毅外长答新华社记者问，驳斥杜勒斯[1]诬蔑中国的谰言》一文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2月22日）

一

陈毅同志：

杜勒斯生病，近日美政府对我无多攻击，目前发表此项谈话，似不适宜。请与总理酌定。

毛泽东

二月廿二日

---

[1] 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不久即因病辞职。

[2] 本篇一写在陈毅1959年2月5日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报告说："两周前我们商定用外长出面，发一篇〔驳斥〕杜勒斯的问答体的文章。此文由新华社与外交部的同志共同起草，已改了三遍。我认为可以发表这一篇，但此事比较重大，请你审阅看可不可用。"这篇文章后来没有公开发表。本篇二、三、四是毛泽东对这篇文章的修改。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二

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证明，我国人民将在一个不是很短但也不是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经济上、文化上繁荣昌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三

我们在大跃进中自然也会遇到一些新的问题或困难。但是，这些是我们前进中的困难，甚至是我们的成绩带来的困难。这些困难，总括成为一点，就是设备的暂时不足。这个问题是完全可以在建设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予以解决的。

四

最近，在美国严密控制下的菲律宾，不满美国横暴干涉的情绪也在高涨。日本人民也是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的。南朝鲜人民，南越人民，泰国人民，老挝人民以及受美国控制或威胁的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蕴藏着不满。所有西太平洋各国人民不了解，处在遥远地方的美国人，为什么，有什么理由，要跑到西太〔平〕洋这些国家来，以其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对这些国家加以控制呢？实在说不出理由的。所以总有一天，不论迟早，如同美国要从世界其他地区放手、缩回家去一样，美国也一定要从世界的西太平洋这部分地区放手，缩回家去。如果美国人自

己不走，硬是要无限期地赖在这些国家的话，那末，总有一天，各国人民要起来把它赶走的。

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给刘子厚[1]的信

（1959年2月24日、27日）

一

刘子厚同志：

昨天谈得相当舒畅，相当好，感谢你们！一月改变整社的方针政策，与党大会的想法不同，是很好的。[2]我觉得你们路线好，但是还有参考别省经验和做法的必要。山西一月决议[3]极好，你们可以打电话叫他们送一份给你们，可能对你们有某些参考价值的。你们有一个整社六个问题的指示文件没有？应当有吧。我极想看，有的话，送一份送〈给〉我，两天内送到济南即可。我在这里有两三

---

[1] 刘子厚，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2] 中共河北省委在1958年12月29日至1959年1月9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曾提出整社到1959年4月底结束。1月中下旬，河北省委召开财贸书记会议和整社工作座谈会，分别对整社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随后省委书记处又作了研究，认为整社和生产必须统一起来，整社工作大体上在3月份基本结束是比较适宜的。有些社，如三类社、问题多的社和农事季节较晚的地区，也可到4月上旬或4月半结束。为了避免把整社的力量搞得过于分散，发生草率现象，除整社试点外，各地要分作两批进行整顿，由点到面，分批进行，波浪式发展。

[3]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1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

天住，来得及的。至祷至盼！

毛泽东

二月廿四日

二

印发各同志。此件[1]很好，可作参考。注意看“第三，分配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1] 刘子厚在1959年2月13日电话会议上传达的省委关于当前整社若干问题的意见，共谈了六个问题，即整社要抓思想、抓生产、抓分配、抓生活、抓政策、抓干群关系。其中第三条“关于分配问题”讲到，分配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基本关键。要坚持实现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对去年收入的分配原则是：在生产有差别的基础上，分配应当有所不同。在公社从各生产队提取一定数额的必须提取的费用后，基本上以生产队（或原小社）为单位进行分配。社本身统一提取的不能太多，以发挥队的积极性。各队之间因生产不同，吃粮标准、工资标准应允许有所不同，社里不能无代价调拨。至于1959年生产收入的分配，原则上要采取包产包任务的办法，生产队上交社的任务完成后，所余完全归生产队自行分配。

在郑州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

（1959年2月）

所有制问题：

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的生产队（即过去高级社）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

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由互助组到高级合作社经过了四年（1953—1956），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四年，或者还到〈要〉多些时间——要五、六、七年。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需要较多的时间。这个过程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还只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阶段，才能完成〈全〉建成社会主义。在这整个过程，其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在（从1958年算起）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到大部分的人民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去。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却在最近四个月内（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大闹粮食油料大不足的风潮。一方面，省、地、县、社党委大批评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瞒产私分；一方面，生产大队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批评公社、上级的平分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的，是合法的，它们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利。一、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办法，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民总产值的7%左右（河南为例），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去的积累太多，如河南，竟占26%，连税收（国家积累）7%，共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公益金、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其中有的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共计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这太少了。公社是1958年秋季成立，括〈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还有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无偿归公共食堂，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中，有些是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食堂房屋用具，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应当不动的，如全部鸡鸭和一部分猪，另一部分猪应当作价归〔社〕，而不能无偿归社。

这样一来，共产风就括〈刮〉起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不能被许可的。我们只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日德意）、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财产（生产资料），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粮食、房屋），而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

并非侵占帝国主义者、地主、官僚资本家的劳动成果，他们是不劳而食的，无所谓劳动成果。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采取了赎买政策。我们怎么可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呢？当然，公社积累不是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公社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建设基金。

劳动分配问题：

土地、人力、产品，三者，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然是也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矿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如此而已。希望也是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将现在实际所有制翻过来，变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部分为生产队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极小的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旁土地、小群果树、家禽家畜等。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设以前，当然是私人的。

现在，农民不怕公社拿走土地，那是拿不走的。怕的是人力、产品两样被拿走。

劳动分配，现在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人太少，工业、服务业和行政人员太多，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多了20%，或更多。服务业应大减。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争人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分配应有差别问题：

队分穷、富、中三等。

吃粮和工资分配应有差等，队队不同。上死下活，死级活评。

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制，一万年还是如此。大反浪费。

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宣布：1959年的公社积累不超过18%，连同国税，共不超过25%，以定民心，提高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下放当社员问题：

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到公社的生产队当社员，每年至少30天，多者45天。一部分下厂矿当工人。

在郑州会议[1]上的讲话（一）

（1959年2月27日）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不论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工业战线上，农业战线上，交通运输业战线上，商业战线上，文化教育卫生战线上，国防战线上，以及其他方面都是如此。特别显著的，是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有了一个伟大的跃进。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农村中普遍地建立了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的建立使农村中原来的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扩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开始带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人民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大得多，并且实现了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的结合，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的农民，尤其是贫农和下中农，对于人民公社表现了热烈的欢迎。广大干部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他们表现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极大的积极性，这是非常宝贵的，没有他们的这种积极性，要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的工作中不但有伟大的成绩，也有一些缺点。在一个新的、像人民公社这样的缺乏经验的前无古人的几亿人民的社会运动中，人民和他们的领导者们都只能从他们的实践中逐步地取得经验，对事物的本质逐步地加深他们的认识，揭露事物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肯定工作中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的成绩，克服工作中的缺点。谁要说一个广大的社会运动能够完全没有缺点，那他就不过是一个空想家，或者是一个观潮派、算账派，或者简直是敌对分子。我们的成绩和缺点的关系，正如我们所常说的，只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有些人怀疑或者否认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怀疑或者否认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这种观点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人民公社现在正在进行整顿巩固的工作，就是说整社，已经或者正在辩论一九五八年有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无优越性两个问题。各级党委在整社工作中，按照六中全会[1]的方针，采取了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肯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然后才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次序，这种做法是完全恰当的。这样做，可以保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干部来说，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的，都是应当加以坚决保护的。

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地加以解决，才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

[1] 指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五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公社成立了，我们有了公社所有制。如北戴河决议和六中全会决议[1]所说，这种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

[1] 北戴河决议，指中共中央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六中全会决议，指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完全肯定了的。如果对于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发生怀疑，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是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我认为，

穷社、穷队，不要很久，就可以向富社、富队看齐，大大发展起来。

公社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就可以实现完全的公社所有制，也就可以进而实现全民所有制。时间大约需要两个五年计划，急了不行，欲速则不达。这也就是北戴河决议所说的，将需要三四年、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然后，再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抗。从一九五八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一个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上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以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

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这样做了以后，公社一级的权力并不是很小，仍然是相当大的；公社一级领导机关并不是没有事做，仍然有很多事做，并且要用很大的努力才能把事情做好。

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

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即是说，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的历史吧。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我们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勉强把穷富拉平，任意抽调生产队的财产是不对的，而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无论如何，较穷的社，较穷的队和较穷的户，依靠自己的努力，公社的照顾和国家的支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社和国家的帮助为辅，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摆脱目前的比较困难的境地，完全用不着依靠占别人的便宜来解决问题。我们穷人，就是说，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下中农，应当有志气，如像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的被人称为“穷棒子社”的王国藩社那样，站立起来，用我们的双手艰苦奋斗，改变我们的世

界，将我们现在还很落后的乡村建设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乐园。这一天肯定会到来的，大家看吧。

除了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以外，目前农村劳动力的分配也有很不合理的地方。这就是用于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劳动力一般太少，而用于工业、服务业和行政的人员一般太多。这后面三种人员必须加以缩减。公社人力的分配是一个重大问题。争人力，是目前生产队同社、县和县以上国家机关的重要矛盾之一。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级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否则所谓一盘棋，实际上只是半盘棋，或者是不完全的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最近各省都有干部下去当社员，这个办法很好。我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这个办法在去年已经行之有效，今年要更好地加以推广。总之，一定要不断地巩固我们同广大群众的联系。

采取以上所说的方针和办法，我以为，我们目前同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一定会很快地改善。广大农民从公社运动和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利益，他们坚决要求继续跃进和巩固公社制度。这个事实，不是任何观潮派、算账派所能推翻的。我们的干部在过去一年中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得到了伟大的成绩，广大群众是亲眼看到的。问题只是我们在生产关系的改进方面，即是说，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很明显，这种缺点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且这首先是由于中央没有更早地做出具体的指示，以致下级干部一时没有掌握好分寸。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公社化这样一个复杂的和史无前例的事业中是难以避免的。只要我们向广大群众公开说明这一点，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克服过去一段时间内工作中的缺点，那么，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广大群众就一定会同我们站在一起。必须估计到，一方面，那些观潮派、算账派将会出来讥笑我们；另一方面，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将会进行破坏。但是，我们要告诉干部和群众，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对于我们丝毫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应该沉得住气，在一段时间内，不声不响，硬着头皮顶住，让那些人去充分暴露他们自己。到了这种时候，广大的群众一定会很快分清是非，分清敌我，他们将会起来粉碎那些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进攻。经过这样一个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过程，我们同群众的团结将会更加紧密。在伟大的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多农民一定会更加心情舒畅，更加充满干劲。我们一定能够在一九五九年实现更大的跃进。人民公社的事业，一定能够在巩固的基础上蒸蒸日上，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959年，毛泽东、邓小平、王稼祥在一起。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1959年2月27日）

人民公社决议只提一句“按劳分配”。究竟如何按劳分配，没有完全解决。什么是生产责任制？马克思讲过“生产责任制”，怎样的责任制也未讲。现在要谈的问题是公社所有制问题，所有制问题即公社所有制要不要一个过渡来建立，是不是公社建立的时候就是集体所有制。我在山东看了一个公社——济南东郊人民公社，二万一千户，十二万人，一个生产队，距公社所有制很远，实际上是公社党委所有，这还得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很多人不通，就是要统多统死，就是过去地方讲我们的，现在不是下放了吗？公社有三级，生产队一级有七八百户，有一千多户的。所谓统多，就是多搞积累。所谓所有制，一曰土地等生产资料，二曰劳动力，三曰劳动产品，这些究竟归谁所有？现在公社党委、县委、地委、省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因此要统多统死。现在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不同，以鞍钢为例，一个工人的总产值一万八千元，除七千二百元，剩一万零八百元，工人收入八百元，个人消费占他的产值不足十二分之一，为国家积累很少，我们想积累，河南公社积累、国家税收、管理费用，公益金共占50%，生产费用占20%，农民实际所得30%。但农民要活，因此要瞒产15%，方法几十种，这是合法权利，而我们批评他们为本位主义其实是违反按劳付酬的原则

的。现在所有制实际是队所有制，生产资料、生产者归队所有，产品所有制也归队，农民现在站岗放哨，保卫产品所有制。为他的劳动成果而斗争，你分给他30%，他就加15%，实际上是45%。现在公社与生产队激烈斗争是两个问题，一是人力，二是产品，农民不怕把土地搬走，但怕把产品运走，农民往城里跑。现在财政部门把全部贷款收回，因此使人民公社无法维持，这是一种破坏生产、反人民公社的倾向，贷款全部收回的还要退还。卖猪、卖白菜的钱不给公社，白菜大批烂；拼命地吃，城里吃不到菜，原因就在这里，不完全是运输问题。现在顶牛，一方面生产队批评上边是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上边批评下边是本位主义。两种主义可能都有，但是我们在党内主要锋芒还要反“左”。生产费与积累占70%，消费只占30%。积累太多，猪卖了，各种物资卖了，都是归社，这种公社所有制是破坏生产的，是危险的政策。不应该批评他瞒产是本位主义，东西本来是他的，你不给他分，他只好瞒产私分。所有制的改变，少者四年，多者五至七年。富队帮穷队提高，穷队逐步向富队看齐。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苏联五千五百万吨钢，我们一千一百万吨钢，砍苏联二千万吨钢补我们不合理。一部分农民无偿地占另一部分农民的产品，不叫抢劫，而叫共产风。这与救济穷人不同。工业办多了，为什么积累这么多，财贸部门为什么把一切贷款都收回，就是办多了工业。中央、省、地、县、公社都想大办工业，看来各级的积极性过多了些。这点情有可原，情者合乎实际，因为土地、劳力、产品均属他的，中央、省、地、县、公社、管理区六级对付生产队和队，六级有权，但是农民人多。什么是一盘棋？现在不是一盘棋，是半盘棋，分配太少了。不承认生

产队的所有制，只分给人家30%，要拉平分配，这叫作半盘棋，大批人马调动，大批积累，这种权利是冒险主义的权利，只要共产主义，不要本位主义很危险，要正当地提积累，要正当地办工业，而不是为疯狂地提积累办工业，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本位主义，光要共产主义不行。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地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六中全会对积累问题分配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而不解决此问题，大跃进就无积极性。现在要出安民告示，现在人民公社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公社只部分所有制，公社和管理区实际是联系介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者之间，不出告示危险，今年库存减少，没有增产。反本位主义越反越收购不到，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为什么去年秋收那样粗糙，东西收不到，就是没有解决分配制度问题。河南新乡地委说，收柿子宣布谁收谁得，一夜完。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也说明我们无非是想搞工业化，工资级别死级活评，一个月评一次，多劳多得，一月变一次，工资总额不变，又叫上死下活。究竟公社要统多少？统三大项。国家税收、公积金、公益金。还有统购、计划、物价、教育，教育办得过多了也不好。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

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采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我写了几句话：一、所有制的问题。几年内，譬如说四五年内逐步完成由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过渡到基本上公社所有制。而目前在公社说来，只有部分的所有制，积累公益金等，产品所有也是这样。即“承认生产队的保守主义或本位主义”，这样我们的六级干部就可以和六亿人民打成一片。一方面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一方面批评他们的本位主义。去年秋前好像农民跑在工人之前，但秋后即瞒产私分，这就是农民的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是不是向农民让

步的问题？这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这等于按劳分配逐步到按需分配一样。在某一点上说，即对于过于积极办工业是一个让步。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的时间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去完成，而不可能在目前一下子完成，把它当成一个过程去看待。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从1953年到1956年），经过了几个步骤才完成，由高级合作社的集体所有制到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完成，可能也要经过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譬如五年至七年时间，要整过急的思想。问题是把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社大队多所以要有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即是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公社工业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与道德品质的提高，人民文化教育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的过程（我们计算四年钢可到五千万吨，明年拨一百万吨，后年拨二百万吨，大后年拨三百万吨，即六百万吨钢材装备农业机械化就差不多了。公社工业化有四、五、六、七年就差不多了），当然，这还是第一个阶段，以后还有第二、第三个提高的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十五年、二十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说，从1958年算起的三、四、五、六、七年内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并且可能有一部分人民公社或大部分人民公社转到全民所有制。

1958年粮、棉、油、麻等大丰收，但是在最近四月内（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有大闹粮、油不足的风潮，你说怪不怪，出乎意料之外，世界上天有不测风云。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和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即所谓瞒产私分。帽子一顶叫本位主义。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

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保卫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写条一张，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作法基本上不是所谓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基本上是合法的正当权利。

（他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嘛，他懂得点马克思主义。他们就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办事的。）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地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反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得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

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当然，共同积累不是当作消费资料，也不是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的建设资金，国家也是如此，这是对的。不从所有制问题讲道理讲不清楚，他们实际上是把公社当作全民所有制，只设想大集体所有制，不设想生产队所有制。

二、劳动分配问题。现在农民同我们的矛盾，一个是抢产品，一个是抢劳动力。现在土地、人力、产品三者名义是归公社所有，实际上基本上仍归生产队所有，目前阶段只有部分的东西归公社所有，即社的积累，社办工业，社办工业的固定工人和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点公益金。所谓社有，如此而已。虽然如此，希望也就在这里。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社有大型、中型农业机械，社办电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三、五、七年就可以把现在的这种所有制状况翻过来，即由基本队有，部分社有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的所有制。当然还会拖一个一部分个人所有制的尾巴，例如宅旁林木、家禽、家畜、小农具、小工具等，房屋在大规模建筑公共住宅以前，因为是消费性的，当然是私人的。现在农民不怕拉走土地，怕的是拉走人力和产品。要人要钱的积极性大，一压下去五亿农民没有出路，设法抵抗。去年农民拼命抵抗，把产品让它烂掉，甚至破坏，这抵抗得好，使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劳动分配，现在极为不合理，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分配太少，而工业、行政人员和服务行业的人员太多（有的多到30%到40%），必须坚决地减下来。过去八年只增八百万工人，

去年全国所增的工人一千万未算在内，（实际上是二千六百万人）中国从张之洞办工业以来产业工人只有四百万，解放以来平均每年增长一百万，即八百万，共一千二百万，而去年一年增了二千六百万，再加上各行各业转过来转过去的四百万，共为三千万，突然增加三千万，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上面这三部分人，都有大批浪费，必须坚决减下来，从事农林牧副渔，否则有危险。据说工业浪费20%，要回农村，服务行业要大减，行政人员只许有千分之几。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生产队与社、县、国家争人力是项严重的问题。

分配问题：分配是讲消费部分本身的分配，生产队大体上有穷、中、富三等，吃粮、工资标准都应有差别，吃粮也要有差别，和工资一样，队队不同，除征购外，多得多吃，少得少吃，工资实行死级活评，上死下活制度，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有国家、社、队的仓库），用粮（要有定量）制度，用粮要精打细算。去年大丰收，使我们麻痹了，粮食问题十年也不要说解决了，每人每年有三千斤粮食也不要说解决，要大反浪费，生产永远也不能满足浪费的需要，旧的需要解决了，新的需要又发生了。1958年积累多了一点，也是好心肠，有鉴于此，应当向群众公开宣布。1959年公社积累不超18%，连同国税7%，总共不超过25%，以安定人心，提高生产积极性，有利于春耕。

最后讲讲下放当社员的问题。各级干部分级分批下放当社员，每年至少三十天，多者四十五天。一部分下厂、下矿当工人。这样我们可以和群众打成一片，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了。过去历来第一是国家，第二是公社，第三是个人，现在我们倒过来，第一是安排人民的生活，第二是公社的积累，第三是国家的税收。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1959年2月28日）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在北京看了一些材料，就想这个问题。在天津、郑州找省委、地委同志谈，各地都在解决这个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个人主义，情有可原，赦你无错，不给处分。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11月以来，这股“共产风”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大米，几亿农民和小队长联合起来抵制党委，中央、省、地、县是一方，那边是几亿农民和他们的队长领袖作为一方。管理区生产队队长是中间派，动摇于两者之间。就是我们手伸得太长，拿得太多，他们就不得不瞒产私分。不上调粮食，不给予处分，实际上是承认他们有权。从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这个问题不很好解决，很可能会犯斯大林的错误，农业不能发展。河南公社生产费20%，积累、税收50%，农民只分到30%，瞒15%，实际拿45%，猪归公社，大白菜也归公社，平均主义就是冒险主义。我们的决议提了按劳分配，至于如何实行，没有讲。生产责任制提了，如何实行，也没有讲。谁料到大丰收出粮食问题。今年要出个安民布告，生产多少，征购多少，吃多少。生产队养的猪归谁？卖东西的钱归谁？一盘棋大部分是五亿农民，第一是安排社员的生活。第二是安排积累，公社积累18%，加上国家税收7%，共25%，现在

很多地方超过了这个比例，是很危险的，就会犯斯大林的错误。现在统得太多，公社至少有十统。一统税收，二统购，三统积累，四统生产费，五统公益金，六统管理费，七统工业，八统文教，九统供给、工资……我说，本位主义只能是部分的本位主义，不能都戴本位主义的帽子，几亿农民都戴这顶帽子不舒服，要去掉这顶帽子。能完成征购任务而不完成，可以安个本位主义，基本上大部分是基本权利，不是本位主义。

讲四个问题：一是所有制问题，二是劳动问题，三是分配问题，四是干部下放当社员。

一、所有制问题。公社集体所有制，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逐步完成由基本上是生产队（即过去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过渡到公社所有制。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要承认它合法，现在基本上是他们的所有制，公社所有不了，他们就瞒产私分。目前只能是部分的公社所有制，即基本队有，部分社有，过去没有搞清楚。农民有两面性，农民还是农民。上次郑州会议前，讲农民觉悟高，大兵团作战，共产主义风格。秋收以后，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应该如此。一下子搞共产主义不可能。有人说，这是向农民让步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向农民让步，但基本上不是让步，是我们要得太多。把卖猪、卖大白菜的钱交给公社去了，不给生产队。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现在的公社是联邦政府。要由联邦政府逐步过渡到统一政府。变秦始皇就危险，十三年亡国。隋炀帝三十一年灭亡。一不能统一拉平分配，二积累、社办事业不能过多，要有个过渡。现在社办工

业太多，社揽的事情太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羊是农民和生产队，要在农民和生产队上刮羊毛，所以产生对抗，站岗放哨。不要砍富队补穷队，而是要帮助穷队向富队看齐，这就需要时间。我反对平均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手伸得太长，用的劳动力太多，工业办得太多，竭泽而渔，可能影响农业三十年不能发展。所有制只能基本队有，部分社有，逐步转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由互助组到高级社，没有过渡不行。这样做，基本上不是向农民让步的问题，而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公社所有制只能经过几年引导农民一步一步地去完成，而不能在目前一下子去完成，要办就违背客观规律，请你自己缩手。由互助组到高级社，经过了四年（1953年到1956年），由高级合作社集体所有制到公社集体所有制，可能也要经过三四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公社一成立，就完成公社所有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问题是将穷队提高到富队的生产水平，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要有较多时间。

再一个问题，就是公社工业化、机械化、电气化、文化教育事业等，只能逐步发展，逐步有所发展，不能一口气办得很多很大，否则会犯冒险主义错误。扶助穷队向富队看齐，拉苏联二千万吨钢来补中国，生产者会反对的。这个过程就是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国家工业化、人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程度和道德品质的提高、文化教育技术水平提高的过程。当然，这还是第一阶段，以后还有几个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社所有制，也即接近全民所有制。在这整个过程中，其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其分配原则还是按劳分配的。但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内，从1958年算起，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现在是基本上队有，社只有部分所有。假

如现在什么都归县，什么都由公社统，就要统翻几亿农民。在三至六年内，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完成了可能有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到全民所有制。1958年，粮、棉、油、麻大丰收，但是，却在最近四个月大闹粮食、油料不足的风潮，中央、省、地、县、社、管理区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反本位主义，我走了三个省，觉得是保护正当权利，幸得有此一手，情有可原，或者是初犯，或者是宣传工作没有赶上），即所谓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则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进行反抗，保卫他们的产品，反批评公社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共产。我以为生产队和群众的作法基本上是合理的，而且是合法的。他们基本上不是不合法的本位主义，而是合法的正当权利。因为土地劳力是他们的，劳动结果——产品，应当是他们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穷队、富队拉平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是由穷队无偿占有别的一部分劳动成果，这是违反按劳分配原则的。二是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业总产值7%左右。不算太多。农民是赞成的，但是很多公社和县从公社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积累占26%，如税收7%，共33%，占总收入的1/3。这是农民对国家的投资。这还不算修铁路、水库等义务劳动，以及很低的工资（如修三门峡大坝）。再扣除1959年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管理费，就达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这个数目太少了。

公社1958年秋季成立，刮起一股“共产风”。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其中有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的桌、椅、板凳、锅、盆、刀子、碗、筷归公共食堂（还要算废铁无偿收去），以及自留地归公。这几项“公”，应当加以分析。

有些是正确的，如大部分自留地归社，这是正常的，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食堂房屋和桌椅板凳，有些则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如全部的猪、鸡、鸭。有一部分猪作价归社是可以的。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我们曾经无偿剥夺过帝国主义的财产，但只限于德、日、意。英美是打日本的同盟国，并没有剥夺过。其中有些是征用的，有些是挤垮的。我们曾经没收过地主的生产资料，侵犯过地主的一部分生活资料（粮食、房屋）。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不过拿回来而已，所以不叫侵犯劳动成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采取赎买政策。对富裕农民更要谨慎，我们怎么可以对农民采取无偿占有呢？当然，公共积累不是对消费资料的无偿占有，而是为了扩大再生产。

我的基本思想不是给队给农民戴本位主义的帽子，使县社干部不顶牛，而是去掉包袱，团结一心，讲明道理，不算错误，把政策搞清楚，这是关系到联系几亿农民的小社以上干部的情绪问题。中央、省、地三级比较超然，而县、社首当其冲，下面是大队、小队和广大群众。我们拿多了一点，也要讲清楚，是好心建设社会主义。主意不好，过分的那一部分，得承认手伸得长，其性质是冒险主义。办法是要开六级干部会议。

讲讲党的历史。我们党中央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委员会，山头很多，一军团三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其他各根据地、白区又各有小山头。在延安曾说，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然后才有可能最后消灭山头，不要骂人家是保守派主义。现在的山头是生产队（过去是穷村、富村）。

公社搞什么？一、拿出几百万吨钢装备农业，七年可以机械

化。二、搞公社工业。三、搞多种经营：林、牧、渔。这些全民性部分，将来是会发展起来的。三至六年之后这些东西多了，相形之下，队生产的东西就少了。

山东吕鸿宾社先以条子、秤、“帽子”去对付，后以一把钥匙（思想），讲明政策，一个楼梯、双方下楼，用这三个办法去对付。

历来讲国家、集体、个人，实际应该是个人、集体、国家。一盘棋应该先安排五亿农民、安排适当的粮食。

我们党中央逐步建立权利，从前教条主义，强制执行，实际脱离群众，并没有实权，想多统又统不了，把革命统垮。中央有权是一个过程。工业过去统得太死太多，十大关系提出以后，才逐步调整。适当的集中，适当的统一。要逐步，不要希望一步就集中起来。半路中间，怎么来个这样的“干老子”——公社。工业也要分级管理，才有地方的积极性。反对绝对集中统一。不要乱戴本位主义的帽子。

富队、穷队还有中间的队。吃饭标准、工资标准应该不同。吃粮食四百、五百、六百斤，工资按劳分配。也允许有多有少。如河南省有富队，按劳能分220元，结果只分给130元，砍了90元。这就是无偿占有了人的劳动成果。

二、劳动问题。土地、人力、产品，三种东西，现在名义上归公社所有，而实际上基本上仍然只能是归生产队（即原合作社）所有，现在（1959年以及以后还有一段时间）只有部分的归公社所有。就是说，社的积累，社办工矿场的固定或半固定工人，此外还有一批公益金、一批管理费如此而已，还有一批生产费，不过是过过手而已。这里讲的是人、物，没有讲计划。社的权利还包括统一计划等。雄心不要太大，不要揽权太多，他们的权力只有这样多。

我主张权力只搞这样多，要教会公社书记这样做。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年年增加积累，年年扩大社办工业，公社有大型、中型的农业机械，社办电气站，社办学校等等。有个三、五、七年，就可以将现在实际所有状况反转过来，由基本上队有，部分的社有，变为基本上社有，部分的队有，就接近于全民所有制。那时当然还会拖一个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尾巴，如极小部分的宅房土地，果树、小农具、家畜家禽等，还为个人所有。公社范围有个人所有，有小集体、大集体，而房屋在公共宿舍大规模建立起来以前，当然是私有的。现在农民一样不怕二样怕。不怕公社拉走土地，因为知道搬不走，怕的是人力产品随便被人拿走——共产，农民就叫“共产”，虽然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要人要财，这是争执的问题。

现在劳动力分配极不合理。农业（农、林、牧、副、渔）劳动力分得太少，工业、服务业、文工团、学校、行政人员分配得太多。一个太少，一个太多。太多的部分必须坚决减下来充实农业。工业方面多了20%至30%，山西有一个公社立即减少了30%。服务业人员要大减，一百个人中十个人的比例太大，有的一个伙夫烧十个人的饭。行政人员只允许千分之几，而不是百分之几。山东历城12万人的东郊人民公社，只有13人脱产，15个管理区每区5人，154个生产队每队3人不脱产（不包括财贸人员）。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业余的还是可以。生产队与社办工业、与县、与国家争人力，石家庄一个公社跑出去1.1万人。争人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重心是把向城里、工业、服务业跑的人赶回来，加强农业战线。

三、分配问题——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队有三等——穷、中、富。粮食、工资的分配应该有差别。社办专业队的工资应该统

一。工资可以“死级活评”一月评一次，上死下活。今年要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要严格地杜绝浪费，大反浪费。新乡收棉籽号召谁收谁有，结果一天收光。滦县收花生放假三天，谁收谁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解决了。还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去年丰收，反而用粮不足，去年粮食收得粗糙。主要是分配制度问题，反本位主义反不动，制度一万年也还是需要的。要分出国库、社库、队库、堂（公共食堂）库，都必须有制度。一般说来，1958年公社积累搞多了一点，有鉴于此，1959年应向群众宣布：公社积累不超过18%，加国家税收7%左右总共不超过25%左右（占工农业总收入），以安人心，以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利春耕。

四、干部下放当社员、工人的问题。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生产队当社员，舒同当了9天。每年至少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一部分下放到工厂当工人，也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中央、省、地、县、社、区六级，要讲清楚六级只有几百万人，另一级是几亿农民及其领袖小队长和生产队长，是大多数，这两方面要打成一片。在若干年内基本实行队所有，分期分批做到公社所有。这样一来，就一定可以达到发展生产、改善关系的两大目的。目前的紧张关系是队和社，有点“国际紧张形势”，主要怕共产。一经济，一政治，以便舒舒服服搞生产，两方面下楼梯，区以上干部“左”了一点，生产队小队长一般无罪，我们要向公社党委和小队长讲清楚，帽子只扣一部分，该卖给国家的不卖，是本位主义，这样就可以取得广大群众的同情，剩下来的观潮派、算账派就会孤立起来。

三月十五日开会不变。[1]同志和地委同志和县委同志研究讨

[1] 原文如此，疑缺字。

论，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松一下，让农民多生产，也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些。

对山西省委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的批语和注文

（1959年2月28日）

一

即刻印发各同志。这是一个好文件[1]，值得一读，借作参考。这里印的，斩头去尾，第一节、第六节、第七节略去了，中间二、

[1] 指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1月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经修改后于2月17日印发的关于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的决议，共分七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指出，整社必须从生产入手又落足于生产，动员广大社员为成倍地增长工农业产值而斗争；工业生产要和农业的发展密切配合，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服务；要大大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和增加公社的现金收入。第三部分指出，要解决好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问题。各人民公社首先要合理地确定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关系，全省一般以各占百分之五十为宜；工资部分可以采取评工记分的劳动日基本报酬制和死级活评的等级工资制两种办法；在不同的管理区之间，应允许有不同的工资标准和差别；实行新的分配制度，要走群众路线，批判“左”、右倾错误思想。第四部分指出，在这次整社中，必须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使所有干部都懂得，发展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着不断地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目前，在生活问题上，要根据大集体和小自由相结合的原则，办好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和敬老院。第五部分指出，在这次整社中，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和健全人民公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管理制度。

三、四、五段，是精华。着重地读第三、第四、第五节，是讲得很好的。

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于郑州。

二

毛注：这里应当加一句：又应当批判只顾国家和公社大集体，而不顾生产队小集体和社员个人（全国共有几亿人口之多），公社积累过多、社员分配过少，社办县办工业过多因而抽去人力过多，使生产队人力过少、妨碍农业任务完成等“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必需承认，目前实际上还是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1]

三

毛注：农业应放在第一位，要占有最大部分劳动力，在没机械化以前，应当如此。[2]

---

[1] 决议第三部分最后一段讲到，要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批判只顾公社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或者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公社利益的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和顾全局、识大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公社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必须根据工农业并举，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方针，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服务事业所需要的劳动力，作统一的安排，规定适当的比例。”毛泽东在其中的“农业”之后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四

毛注：很对。[1]

五

毛注：这就对了，行政人员、服务人员就有了限制，不致浪费了。[2]

六

毛注：这是大事，有关积累，不可等闲视之。[3]

---

[1]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在1959年，我省用于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一般应当占到农村现有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每个公社的行政管理费，全年不得超过总收入的千分之四。"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3] 决议第五部分讲到："必须严格控制非生产性的开支，防止和反对因为丰收而发生铺张浪费现象。"在此之后，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语[1]

（1959年2月28日）

一

此件印发各同志。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1958年是如此，1959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

[1] 这个批语写在1959年2月19日编印的《经济消息》第九期《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旁边。该文指出，中共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他们一怕粮食不实行“三包”办法，而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调剂余粮；四怕别队不报实产，自己吃亏。因此许多基层干部带头瞒产私分，形成群众性的闹粮风潮。查清问题的真相后，县委和工作组立即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向干部和群众反复说明分配和统购政策，明确宣布1958年的收益仍以大队（原来的农业社）为单位进行分配，实行“三包”，超产归队，统购任务以农业社为单位结算，绝不无代价地调拨粮食，私人存粮一律归个人支配。结果使不少大队的闹粮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

毛泽东

1959年2月28日

二

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注[1]

[1]　《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一文讲到，“由于宣传工作没有做好，一些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后一切都要归公’”。在文中的“一些”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在《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一文上的批语[1]

（1959年2月）

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正义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

[1] 新华通讯社1959年2月2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六七二期以《杜勒斯谈如何抵挡东风》为题，全文登载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毛泽东的批语，就写在这篇报道的旁边。

在河南九县讨论郑州会议讲话情况报告上的批语[1]

（1959年2月）

还有集中过多思想，即集中起来的权力、物力、人力过多了一点。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河南省委四级干部会议办公室1959年2月27日夜整理的关于巩县、太康等九县干部讨论毛泽东当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报告上。报告说，绝大多数干部听了主席指示的传达后，都表示非常拥护，讨论特别热烈。但由于大家思想没有准备，还存在着不少顾虑和糊涂认识。有人认为，生产队成了一级核算单位，这下不背大包袱了，但统一种植计划不好办了，工业化机械化速度慢了，抽调劳力不好办了，因此对人民公社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优越性发生怀疑。有人认为，这样搞公社还有什么权？生产队的权力大了，本位主义会更大。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这些情况而写的。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1959年3月1日）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赵尔陆和王鹤寿之间也有一个交换关系。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仅存在于公社内部，也存在于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之间，实际上生产资料各部门之间也有价值法则起作用。人不吃饭，怎么拉屎拉尿，不拉屎拉尿怎么有饭米，骨头还是归于地球。自然一部和另一部交换，大体上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不吃别的也不行。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收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现在银行不投资农业，我建议每年增加十亿元，十年搞一百亿元无息长期贷款，主要支援贫队，一部购买大型农具，十年之后国有化了，就变为国家投资了，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实行了集体福利、公共食堂、劳动与休息。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我提议请你们开一个六级干部会，找一批算账派参加。共产党就是反反复复。

1959年3月1日，在郑州会议上讨论进一步纠正高指标、“共产风”等错误。图为毛泽东等在列车上召开会议。

十二句话应再加两句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适当积累，合理调剂，收入分配，由社决定，多劳多得，承认差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去年郑州会议，就吵这个问题，拉死人来压活人。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铜烂铁，无代价献宝。这在战时是可以的，无代价或者很少代价。战勤只给饭吃，不给代价。这也不是长期的，否则也会破坏生产。

今年你们要节制，尽最少放“卫星”，如体育卫星、诗歌卫星、

银行卫星等。

要讲爱国、爱社、爱民。过去河北提出“要管家，种棉花”，我们给它改为“爱国发家，多种棉花。”

东鹿县收棉花，总结了三条：不问来源，不咎既往，现金交易，谁卖谁得；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另加一条政治挂帅、敲锣打鼓。

每个公社组织一个专业运输队，改良工具，从现在工业战线抽一批人下来。至于运输队的大小，按照需要。省、专、县商业部门都要组织运输队。

劳动各方面要有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目的，各方面的平衡：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工业还要细分，有国办、地方办，都搞社办，很不方便，比如修配、磨粉。养猪都由社养不好，大部都应由生产队、食堂养。

共产主义是不是推迟了？早已推迟了，六中全会决议讲了十年到二十年，还有五个条件没有完成。现在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想早一点，我看越想搞越搞不成，越慢一点，越可以快。用“无偿”来搞共产主义不行。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了。凡是劳动，总要等价交换的。

积累18%不低，应该有个幅度。

过去一盘棋，强调上面，现在一盘棋，要上下兼顾。

专业队归哪个搞？几级都要有专业队。逐步考虑得利大的采取国营，搞全民所有制。比如在东湖打鱼，收入特别多的县可以搞全民所有制的试点，县可以搞个把，不成功不登报。

穷队向富队看齐，把穷队提高到富队。要使社办工业、企业都办起来，提高公社的基本所有制，房屋不是不建了，要经济、美

观、实用。

我看要使社干部不怕，把观潮派搞出来，让地、富、反、坏、观潮派攻击，无非是我们一平、二调、三收款。

发工资问题，可能有发不起工资的情况。

公社所有制，包括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各计盈亏。

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安国文件值得注意，往年闹粮，主要是富裕中农带头，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收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

河南会议鸣放的文件，可以发给各地看，开头两三天不要发，让他们思想混乱几天；到四五天后分批发给他们看，其中有些内容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六中全会的具体化发展补充。

山西文件精神是管理区与管理区之间，允许有不同的差别。而不过早地消灭这种差别，正是为了从发展生产中消灭这种差别。现在允许它，正是为了将来消灭它。人民公社发展生产，提高积累，应当对落后社有适当的照顾。但是如果在工资标准上一下拉平，就会减少较多生产水平的管理区的收入，就会减少积累，就会使落后的管理区不注意经济核算，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不行，不是照顾富

社，而是照顾穷社，暂时保存这种差别，才有利于增加公社积累，有利于穷、富社都发挥积极性。公社的积累增长得越快，这种差别的消灭也会越快。问题是把穷队向富队看齐，问题是公共积累增多。两方面一来，就会使生产发展得越快。然而由于管理区之间管理工作好坏和生产水平不同，这种差别会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对的。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自然条件与主观努力，千差万别。地球的中心与外部温度就不同。消灭差别的过程，也是由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过程，也是机械化、电气化过程，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公社与队的所有制，互相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逐步过渡，有些队可以先转变为全民所有制。

明年100万吨钢，后年200万吨钢，也许多一点供应农业搞机械化。

钱的补贴确定10亿，作为农业投资。

工资由公社确定，由管理区发。公社的权力究竟统几个什么东西，开一个账。这不是公社权力小，而是包而不办。

各省、地、县搞一个示范章程，各个公社也要搞一个章程，各省要选择最好的两三个分给我。每一个县着重搞一个，每一个省集中搞一个。了解一个公社不要很久时间，一个礼拜就行了。又要实际，又要超产，无非是一些要点、关节。麻雀这样多，只能如此，但是全无印象也不好。

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不普遍戴本位主义的帽子。是则是，非则非，是本位主义还是要反，还是要事先订条约，要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教育是必要的。贫、中、富队各定

多少，国家、集体、个人，全面安排，三者兼顾。个人首先照顾集体、国家，国家首先照顾个人，应该批评本位主义，但是要先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引起积极分子来自我批评，发动多数人自我批评，孤立那些真正本位而不自我批评的人和贪污的人，贪污结合整社来搞，推迟一点，先把积极性搞起来。

郑州会议[1]期间给刘少奇、邓小平[2]等的三封信

（1959年3月1日、2日）

一

少奇、小平同志，各位同志：

我建议此次会议开到明天，即三月二日散会。三日各同志回去。在各省、市、区召开一次六级干部会议。会期十天。六级干部：省级、地级（三人左右）、县级（三人左右），每社党级〈委〉书记一人，每社来一个管理区（大队）总支书记及一个生产队支书，总共六级。大省可有3000～4000人，中省2000～3000人，小省1000人左右。最好另外从省、地、县、社四级共找算账派1000人左右参加会议。会厅小的，分开房间开。有十天时间，尽够将问题的道理讲清，政策和办法也规定得完整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时机。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各省市同志们：请你们即在这里用电话通知你们自己的省、市召集上述六级干部会议如何？会期，可定在三月五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日各省市同时开会，三月十四日同时结束。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参加）推到三月十八日开，开十四天，三月三十一日完毕。十四天中，末尾五天，可考虑召开七中全会。四月一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准备全国人民代表会的文件，时间尽够。难道二十五天之久还不够从容准备文件的起草和政治局讨论批准吗？文件还可在人大会期之内精审修改，不愁不会完善。人大开会日期，定于四月二十五日代表集中，二十六日开幕，跨月份开，四月末尾两天五月头两天共四天休息，实际开十四天，五月十二日结束，可以认真讲解、讨论、研究今年形势、任务、计划和总结的主要问题。如感不够，再加三天，共十五天，尽够尽够了。政协与人大同时开，开一次团结、热烈、舒畅的大会，以利动员全民为今年大跃进而奋斗，并向国外人民群众澄清一些问题，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志气。此信请少奇、小平二位同志提向今天上午的会议，议一下，看是否适宜。有不适宜的地方加以修改。听了昨天十位同志的意见，我感觉有一些同志对我讲的那一套道理，似乎颇有些不通，觉得有些不对头，对他们那里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感觉我的道理有些不妥。当然还待商量。我可以这样说，同志们的思想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我的观察和根本思想是不错的，但是还不完善。有些观点需要同志们给我以帮助，加以补充、修正及发展。我的这一套思想，是一月二月两个月内逐步形成的。到天津、济南、郑州，跟三省同志们交换意见，对我有极大的启发。因此到郑州，就下定了决心，形成了一套，虽然还有些不完善，还有些不准确，还有些需要发展和展开，需待今后再观察、再交换意见，再思再想。我准备三月十四日到上海。我要看一看河南六级干部会议的进展情况，还须呆四五天，看看他们想些和讲一

些什么。武汉、长沙、南昌、杭州、上海各有几天商谈。建议请同志们认真、仔细、热情地读一读河南此次六级干部会议的详细记录，二月廿七、廿八两天的记录，极有味，极有益，其中有许多批评我右倾和倒退的意见。同志们如能再呆两天可以多带两天的记录回去。我已叫省委办公厅在今天九时左右将头两天记录送给你们，请你们收到即读，两小时即可完毕。读完再举行会议，讨论我所提出的人民公社问题。吴芝圃[1]同志：今天晚上不要看戏，改在明晚看。因为我要在下午和晚上，跟同志们商量已经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请你安排三月三日在郑州我跟拉丁美洲各国同志们会见，请他们二日由武汉飞到这里，三月〈日〉上午请吴芝圃同志替这些外国同志安排一次参观，看看人民公社，我要在三日下午或者晚上才能见他们。此信请胡乔木[2]同志替我在会上宣读一遍。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

二

少奇、小平，各位同志：

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2]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耽〈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同志们要求有时间，我想可以。增加一星期，到三月二十日为止，在省城开完六级（是六级，另加若干算账派）干部会，会期从三月十一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中央会议改为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四月五日完，开十二天。人大仍定四月二十五日报到，看几天文件，月底只作报告，五月三日才开始进行讨论。起草文件有20天时间尽够了。是否可行，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上午四时半

三

少奇、小平同志，各位同志：

我已请恩来、陈云、陈毅、德怀、富春、一波、肖华、定一、康生[1]等九同志于今日来此，到即参加你们今日下午和晚上的会

---

[1]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肖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定一，即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议，共同审定我的讲话稿[1]和你们议定的十二句话[2]，以昭慎重。

我的讲话稿，即刻付印，你们收到，请即逐字逐句加以审改。今夜我还要修改一遍，要明（三）日上午才能再次印好，交与各同志带回去。因此，各省市同志明日起程时间，请推延到中午或下午二时左右。

吴芝圃同志：今、明、后三天请不要安排任何晚会，因为我和大家都不能出席。

小平同志：今天我不能见任何外宾，明天（三日）才能见他们。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日上午八时

请你们阅读昨天（一日）河南六级会议的记录。吴芝圃同志：今天（二日）你们的六级会议记录，请于明天（三日）上午发给各省市同志，使他们能够带回去。以后几天的记录，请用“航快”直送各省、市、区及中央。

---

[1] 指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稿。

[2] 指当时议定的关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方针的十二句话，后经进一步讨论，扩充为十四句话，写入《郑州会议纪要》。

祝贺柬埔寨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

（1959年3月3日）

柬埔寨王国诺罗敦·苏拉玛里特国王陛下：

值此陛下寿辰和柬埔寨王国国庆之际，我谨代表我的国家和全体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祝中柬友好万古长青，祝柬埔寨王国繁荣，人民幸福。祝陛下万寿无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3日

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

（1959年3月3日）

中国刚刚开辟了建设的道路。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高。我们人口那么多，只有那么一点钢铁。我们在工业化中刚走了第一步。我国人民还很穷，需要继续努力，要有许多年时间才能发展起来。我们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你们要监督我们，看到我们不好的地方要说，看到我们进步得慢也要说。你们要监督我们向前进步。中国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也是世界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中国的事业是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我们要团结成一体，全世界人民要大团结。你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事业的一部分，你们每有一个胜利，我们就高兴。我们很高兴看到拉丁美洲的斗争在不断发展。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大部分。这三个洲的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后方。这个后方现在已经不稳固了，它的空气比较稀薄，比较容易冲破帝国主义的统治。当然，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现在还在统治这些地方，好像过去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统治中国一样。为什么说它的空气比较稀薄呢？因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占主要地位。过去俄国就是这样，它的空气也比较稀薄。在这些地区，无

产阶级有广大的同盟军，社会民主党[1]的影响不如在西方国家那么厉害，工人阶级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不那么深。因此，这些地区的革命斗争特别旺盛。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蓬勃地开展起反帝斗争了。非洲人口有两亿多，他们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拉丁美洲也是处在反帝斗争的前线。

帝国主义已经为这三个洲的国家造就了强大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也在这些国家造就了知识分子队伍。帝国主义为了它自己的目的，造就了工人阶级，造就了知识分子，结果将是由它造就出来的人把它自己推翻。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旧社会总是会创造新社会的因素的。

你们知道去年的金门事件[2]吗？那个岛只有八万人口，现在已是世界有名。美国的方针是把金门、马祖两个岛交给我们，以此作为交

---

[1] 社会民主党，也称“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工党”等。大多成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时期。1889年各国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了第二国际。第二国际早期曾对工人运动起过积极的作用，以后由于内部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以外，大多数社会民主党都被机会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它们公开维护资本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2]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嚷“反攻大陆”，并不断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严惩国民党军，反对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开始对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和炮兵阵地等军事目标进行炮击，封锁了金门岛，中断国民党军的补给。9月初，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派军舰、飞机直接为国民党军运输舰护航，公然入侵中国领海。为打击美国的侵略行径，人民解放军前线部队又于9月8日对金门国民党军和海上舰艇进行全面炮击。至1959年1月7日，共进行7次大规模炮击，13次空战，3次海战，击落击伤国民党军飞机36架，击沉击伤军舰17艘，毙伤国民党军7000余人。

换条件，让它继续占领台湾。这生意不好做。我们要留蒋介石在这两个岛上，要不我们就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全部拿回来。

美国在全世界钉了许多桩子，把它自己的腿也钉在桩子上了。我们面前有台湾、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美国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钉住了它自己的腿。这是西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在美国看来，好像西太平洋不是我们这些居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人的，而是美国人的，你们讲讲这公道吗？这是你们的邻居干的事。我们西太平洋地区的人民帮了你们一些忙。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牵住了美国不少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美国的主要力量还在西欧，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牵住了它的力量，西德、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牵住了它的力量。中东、北非地区也牵住了美国的力量，分散了它的力量。它在地中海有一个舰队，就是第六舰队，比它在西太平洋的舰队更强大。

此外，它又不能不顾到拉丁美洲这个后方。这是你们对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帮的忙。古巴革命[1]就发生在美国的旁边，那里有六百多万人口，美国投资有十亿美元。美国眼看着古巴革命，望洋兴叹，一个手指也不敢动它。有些人说，美国厉害得很，有原子弹呀、氢弹呀，但是去年五月尼克松去看你们，你们却对他不客气，赶走他，他也没有办法[2]。人家一个副总统来看你们，你们不

---

[1] 1959年1月1日，古巴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任总统的独裁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

[2] 1958年4月28日至5月14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8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好好招待他，还用石头、烂鸡蛋、唾沫招待客人，使他那样难堪，对客人那样不讲礼貌啊！

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它承认我们，我们也不那么高兴。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好不好，我们也考虑过，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我们同美国现在这样的状态，对于我们和你们国家的人民都有利。

我们国家没有美国的外交代表，我们很舒服。大概是因为我们破破烂烂，客人不想来。他们要等我们建设好了才来。比如说，美国现在年产一亿多吨钢，大概要等到我们年产两亿吨钢的时候才来。那时，我就要跟各位商量商量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一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更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也可以建造大房子，因为有了更多的钢铁。这个方针，也许你们不赞成。

现在美国不怕中国，它主要怕苏联。它知道中国只有几块破铜烂铁，而苏联是强大的国家。西方国家不承认我们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因此，我们也就可以“无法无天”，不受约束。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1]，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国民党同我们打了几十年仗，我们还在继续

---

[1] 杜勒斯（1888—1959），美国共和党人，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1956年1月，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这种主张被称为“战争边缘政策”。

打国民党。国民党没有饭吃，美国给他们吃。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我们以“战争的边缘”来对付“战争的边缘”，结果他们不敢前进，只到战争的边缘为止。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动，他们看我们，我们看他们，看了两个多月。我们帮了美国民主党的忙，十一月，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利了。我们的帮忙是无代价的，是义务劳动。帮了民主党，整了杜勒斯。

我算了一笔账，从去年五月起有六件事情整了美国，使杜勒斯处于被动地位。把委内瑞拉推翻希门尼斯[1]算在内，就有七件。加上非洲一件事，就有八件。如把伊拉克革命[2]和黎巴嫩事件[3]分开算进去，就有十件。我说的是最显著的大事。十件事中有三件发生在拉丁美洲。一月份委内瑞拉人民赶走了美国的走狗希门尼斯。五月你们用烂鸡蛋欢迎尼克松，这件事有世界意义。七月发生了伊拉克的革命，使美国大吃一惊，这件事也有世界意义。几天以后发生了

---

[1] 希门尼斯（1914—2001），1948年任委内瑞拉总统。执政期间，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采取亲美政策。1958年1月23日，其政权被人民起义推翻。

[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拉克费萨尔王朝一直执行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残酷镇压人民的反抗运动。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将军为首的爱国军人，在伊拉克人民的支持下发动武装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

[3] 1958年5月，黎巴嫩各地发生了反对政府执行违反民族利益的政策的起义。7月15日，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在“保护美国侨民”和“保卫黎巴嫩主权”的借口下，派遣武装部队在黎巴嫩登陆，武装干涉黎巴嫩内政。在黎巴嫩人民、中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下，美国侵略军于同年10月25日被迫撤出黎巴嫩。

黎巴嫩事件，美军登陆，闹得全世界都反对美国。这是第四件。接着就是金门事件。我们不想叫美国休息，在联合国通过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向金门岛开炮，闹得全世界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也忙得很，从东太平洋调动兵力，兵力不够，又从地中海调。杜勒斯自己讲，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的集中，美国把它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开来了。这是第五件。第六件是十一月美国举行了选举，民主党胜利，共和党失败。第七件是北大西洋集团的四分五裂[1]。形式上他们有所谓的团结，实际上他们保持不了团结，你要吃我，我要吃你。第八件是赫鲁晓夫丢出了一颗柏林事件的炸弹。他也不想让美国休息。美国现在忙得很，柏林事件不好解决。第九件就是你们搞的一件好事，搞古巴革命。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第十件是今年二月间以刚果为代表的非洲人民爆发了反帝斗争[2]。也不能

---

[1]　1949年4月，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意大利、丹麦、冰岛和加拿大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同年8月24日公约生效，北大西洋公约军事集团建立。希腊和土耳其于1952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1955年正式加入该组织。1958年12月16日至18日，该组织在巴黎召开理事会会议，在军事集团的领导权、美国要求在各盟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以及贸易等一系列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和纠纷。

[2]　1908年刚果正式沦为比利时的殖民地。1958年12月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召开以后，刚果民族运动党领导人卢蒙巴明确提出实现独立是刚果人民的基本权利的口号。1959年1月4日，卢蒙巴在利奥波德维尔人民集会上又提出刚果独立的口号，比利时军警对集会进行镇压，造成多人死伤。此后形成全国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局面。1960年6月，刚果获得独立。非洲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民也兴起了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把它只看作是反对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斗争，反对的主要锋芒是针对美国的。刚果的外国资本中美国占很大数字。苏伊士运河事件[1]不算，这是前年的事了。我只从去年一月算起。

现在美国的调子一天比一天低了，大规模的报复不太讲了。

制造国际紧张是美国的一个手段，国际紧张到底对谁利益大，对美、英利益大或者对我们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大，这还是一个问题。美国逐步看到国际紧张对它不利了。因为紧张的局势可以使全世界人民想一想，可以动员全世界人民，动员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能多增加几个共产党人。

由于历史和社会习惯的影响，人民中间迷信的人还很多，要做艰苦的说服工作来破除迷信。在我们这里，过去亲美、崇美、恐美的人很多，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劳动群众，他们不喜欢美国人，但是怕美国人。要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帮助他们逐渐消除这种恐惧心理。

崇拜美国的人说美国科学和工业都很发达，了不起，什么都好，甚至有人说美国的月亮也比中国的好。后来经过慢慢说服，他们知道美国的月亮不一定好，也许中国的月亮还好一点。

在你们那里可能存在同样的问题。是北美的月亮好呢，还是中

---

[1]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的东北部，是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国际通航运河。它处于欧、亚、非三洲交界地带的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869年正式通航后，英、法两国垄断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绝大部分股份，每年从中获得巨额利润，英国还在运河地区建立了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人民为收回苏伊士运河的主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中国政府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发表声明，支持埃及的正义行动。同年10月，英、法和以色列发动侵略埃及的战争，妄图重新夺取运河，结果遭到失败。

南美的月亮好？有人迷信美国的月亮，说美国人文明，说我们比他们野蛮。文明国家把军舰开到西太平洋来，这能算文明吗？美国还把军舰开到中南美去，你们国家派了军队到美国去吗？这样看来，谁文明一些呢？我们要文明一些，因为我们没有派军队到美国去。

要翻过来，也许他们野蛮一些，我们文明一些。西方世界是野蛮人统治。当然西方国家的人民不野蛮，他们只是受了欺骗和蒙蔽，不觉悟，共产党和有觉悟的人不算在内。西方世界的统治者是野蛮一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要文明一些，这也要除掉帝国主义的走狗，例如中国的蒋介石，美洲的希门尼斯和巴蒂斯塔，他们是美国的走狗，野蛮人的代理人。

他们说我们野蛮、不文明，这要翻过来。我的证据是我们没有侵略美国，是美国人侵略我们；非洲没有侵略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西班牙，而是这些国家侵略非洲。到底谁文明，谁野蛮？谁有礼貌，谁没有礼貌？在文明与野蛮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迷信。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了同志们很高兴，很亲近。我们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相同，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经济发展水平也差不多，同是所谓不发达的国家。我看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就高兴。你们接触过非洲人没有？我最近会见了非洲一些国家的青年代表，有肯尼亚、喀麦隆、几内亚、马达加斯加的代表。马达加斯加人的肤色和我们比较接近，介于黑种人和黄种人之间。我从前一个也不认识，但是见了面觉得很亲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些国家在世界上处在同样的地位。

你们不要以为中国解放了，和你们不同。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记忆里，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除了解放一事外，我们大体和你们相

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受帝国主义的欺负等方面，都差不多。

我同你们相处感到一种平等的气氛，我相信你们也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西方国家就不同了，除了一部分进步人士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外，那边的人看不起我们，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身体脏，月亮没有他们的好。没有办法，谈不来。他们不以平等的态度待我们，轻视我们。拉丁美洲的人，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外，也会有同样的感觉吧！

工人阶级要取得胜利，要和两个阶级结成同盟。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相同。农民不剥削别人。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也不剥削别人，他们是手工业者或小市民，或者只有轻微的剥削。另一个是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又剥削人，还恐惧共产党。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有共同之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可以建立统一战线。第一个联盟是工农联盟，是我们的基础。工人受人剥削。农民不剥削别人，其中贫雇农受人剥削，中农基本上不剥削别人。第二个联盟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也有民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剥削阶级，但有反帝要求。共产党如果搞得好，可以而且应当与他们结成同盟。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1959年3月5日）

放一大炮是否灵，放对了没有？

要拿王国藩穷棒子社对穷户、穷队、穷社，解决穷社、穷队、穷户问题。一是贷款，二是公共积累。国家每年拿出十亿解决这一问题，社工业少办，主要是解决这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过去汉族同少数民族是不等价交换，剥削他们，那时不等价还出了一点价，现在一点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军心也就不安，甚至征购粮款也被公社拿走，国家出了钱，公社拦腰就抢。这些人为什么这样不聪明呢？他们的政治水平哪里去了？问题是省、地、县委没有教育他们。整社三个月没有整到痛处，隔靴抓痒，在武昌会议时，不感到这个问题，回到北京感到了，睡不着觉，九月就充分暴露了。大丰收，国家征购粮完不成，城市油吃不到了。赵紫阳的报告和内部参考中的材料你们看到没有？我就不相

信长江、珠江流域马克思主义就那样多？我抓住赵紫阳把陶铸的辫子抓到了。瞒产私分很久了，开始在襄阳发现，刘子厚谈话对我有很大启发，河北一月开党代会。开始搞共产主义，倾向于一曰大、二曰公，二月十三日就感到有问题，决心改变主意，但还没有接触到所有制问题。到山东谈了吕鸿宾合作社。开条子调东西调不动，就让许多人拿秤去称粮食，群众普遍抵制，于是翻箱倒柜；进而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了，他也不在乎，这一着神经战也不灵，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三不灵后才受到了教育，才用一把钥匙，解决思想问题，但也没有接触到所有制，河南说“虽有本位主义情有可原，不予处分，不再上调”，安徽说“错是错了，但不算错”。什么叫情，情者情况也，等价交换也，不是人家本位主义，而是我们上级犯了冒险主义，翻箱倒柜，“一平、二调、三收款”，一张条子，一把秤，一顶帽子，这是什么主义？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四方”哪里有钱就往哪里跑。你不等价交换，人家人财两空，吕鸿宾改变主意，一张安民布告，一个楼梯下楼，要下楼，首先要下楼的是我们，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如不愿不等价交换，就叫没有共产主义风格，什么叫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没有钱嘛！不是抢是什么？什么叫一曰大、二曰公？一曰大是指地多，二曰公是指自留地归公。现在什么公？猪、鸭、鸡、萝卜、白菜都归公了，这样调人都跑了。河北定县一个公社有七八万人，两三万个劳动力，跑掉一万多。这样的共产主义政策，人都走光了。劳动力

走掉根本原因是什么，要研究。吕鸿宾的办法，还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办法，现在要解决根本问题——所有制问题。

整了三个月社，只做了一些改良主义工作，修修补补，办好公共食堂，睡好觉，一个楼梯，一张布告之类，但未搞出根本性办法。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我是事后诸葛亮，以前还未看到这个问题。在批转赵紫阳的报告时，就有此思想。六中全会有好处，农民不怕中央了，认为中央好讲价钱，中央雇工是拿钱的，购粮油是拿钱的，征购不多，注意生活福利，八小时工作等。仇恨集中在公社，第二在县，县也调了些人，调了些东西，县、社办那么多事干啥？所以，要对公社同志讲清楚，公社不要搞太多，十大任务做不完。你们有经验，你们过去不是骂中央统死统多吗？现在你们当了婆婆就打媳妇，就忘记了。现在中央已经改了。去年权力下放，说了不算，拿出一张表来你们才放心。现在你们领导之下的公社，就实行“一平、二调、三收款”，调，一曰物、二曰人。当然出卖劳动力，不是出卖给资本家，而是出卖给中央、省、县、公社，但也要等价交换。过去长沙建筑工人罢工，我们叫增加工资，他们叫涨价，那是1921年的事，到现在38年了，我们还不懂涨价这个道理吗？劳动力到处流动，磨洋工，对这点我甚为欣赏，王任重很紧张无心跳舞，一夜才转过来，放一炮，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上千万队长级的干部很坚决，几万万社员拥护他们的领袖，所以立即下决心瞒产私分。我们许多政策引起他们下决心这样做，这是合法的。我们领导是没有群众支持的。当然也包括桌椅板凳、刀锅碗筷，去

年工业抗旱，大闹钢铁，献工献料，什么代价也没有。此外，还要拿人工，专业队都要青年，还有文工团都是青年，队长实在痛心，生产队稀稀拉拉。这样下去一定垮台，垮了也好，垮了再建。无非是天下大笑。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要穷队赶上来，穷队变富队，穷变富每个省都可以找到例子，像王国藩那样，最大的希望是穷队，不能把苏联的钢砍给我们二千万吨，如果这样，苏联也好造反，世界上的事没有不交换的，人同自然界作斗争，也有交换，如人吃东西，吸空气，但要拉屎拉尿，新陈代谢。吃空气，一分钟十八次，有吸必有呼，你交还自然多少二氧化碳。皮肤散热，这也是等价交换。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大鱼的屎，重工业各部门之间也要等价交换。赵尔陆造机器要原材料，就是粮食，机器就是他拉的屎。纺织工业出纱要棉。基建也是如此，吃投资就能出工厂，总要相等就是。王鹤寿不给他交换焦炭矿石，就拉不出钢铁。物质不灭，能量转化。要科学。夏热冬寒，一切都等价交换。国家给钱，就是公社不给钱。犯了个大错误。□□同志讲，云南提出供给与工资比例是三比七。这个原则在武昌会议是讲了的。六中全会的东西现在有许多没有执行，就是否定价值法则，所谓拥护中央是句空话，起码暂时还难说，其实是不通。无代价的上调是违反中央的，要搞工业，不搞农业，未到期的贷款都收回了，是不是中央不两条腿走路？相反，今年要增加十亿，一部分是可以收的，贫农贷款是四年，1960年才到期，现在就收回了。我看这可以给人民银行行长戴一顶帽子，叫做

破坏农业生产，破坏人民公社，也不撤职。全部退回，到期不到期的都退，你们可以打个折扣，到期的可以不退。我为了对付你的全部收回，我就来个全部退回，你要“左”倾，我要右倾。就是到期还可以延长。

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不能拦路抢，李逵的办法，文明的办法叫做“剪径”，绿林豪杰叫“剪径”，现在绿林豪杰可多了，你们是否在内。对付剥削者无罪，绿林的理由叫“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如生辰纲，我们也干过，叫打土豪。后来者文明一点收税。成吉思汗，占了中国，不会收税。叫“打草谷”无代价抢劫人民，结果打走了他们自己。辽金也如此。蒙古是世界第一个大帝国。除了日本、印尼外，占了整个亚洲和大半个欧洲。第二是英国，日不落国。第三是希特勒，占了整个欧洲，半个苏联，还有北非。现在是艾森豪威尔最大，实际控制整个西欧，整个美欧、澳洲、新西兰、东南亚、印度，对印尼也在天天增加投资。科伦坡国家也在旧金山开会，可厉害了，美国控制的地区超过成吉思汗。伊拉克7月14日革命成功，美国15日占领黎巴嫩。我们8月23日打炮，他立即调部队集中太平洋，杜勒斯说是最大一次集中。他的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对付我们。我们也可以学一点，你边缘我也边缘。打了三个月，他失败了，我宣布领海十二海里，他只承认三海里。我警告三十多次，他国内外都不满意，我说一千次也不打，记一笔账，这是对付流氓的办法。后来挂了三十几笔账，他就不来了，手忙脚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干，我们是十个指头按一个跳蚤，美国是十个按一百个跳蚤因此都按不住。中国、伊拉克都按不住。中国是一个“大跳蚤”。

打土豪大概从打草谷学来的。美国统治时，后来有人建议打草

谷不如收税，收税才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不知比打草谷强多少倍。现在公社党委实际上是恢复蒙古打草谷的办法。落后的抢劫办法。过去打土豪是正确的，“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和宋江一样，现在对农民能这样吗？唯一的办法只能等价交换，三级之间要有买卖关系，劳动必须出工资，义务劳动切不可太多。

王安石创始免役法，把服劳役改为征税，由政府雇人，出工资，做各种服役的事业，这是很进步的办法。我们退到王安石以前，退到司马光的办法了。司马光是代表大地主，反对王安石的办法的。公社可办对社有利的工业，但雇人要出工资。一种是固定工人；另一种非固定工人，这部分人不能太多，技术工人要有较高工资。亦工亦农的，待遇应与农民不同。工业、教育、体育只能一年一年地发展，量变有一个过程。写诗不能每人都写，要有诗意才能写诗，如何写呢？叫每人写一篇诗，这违反辩证法。专业体育、放体育卫星、诗歌卫星，通通取消，遍地放就没有卫星了，苏联才有三个卫星呢！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浪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沙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点，粮食产量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衷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任何大跃进、中跃进、小跃进也不

可能，生产就会停滞。

搞三、五、七年，来个过程，基本上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等价交换，不能乱开条子。队与队是买卖关系，若干调剂要协商。灾队、穷队没有饭吃由省里解决。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抵制，河南分配给农民30%，瞒产私分15%，共45%，否则就过不了生活，这是保卫他们的神圣权利，极为正确。还反对人家本位主义，相反应该批评我们的冒险主义。真正本位主义，只有一部分，主要是冒险主义。钱缴给公社不缴队，他们抵制，这不叫本位主义。给他钱，他不缴，才是本位主义。

安排时应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在前面，要占百分之几十，人民生活，公社积累（15%～18%）、国家税收（7%～10%），应同时安排，义务劳动要减少，公共积累要减少。多给一些社员看到的东西，减少供给部分，增加工资部分。粮食供给要坚持下来，“无竹令人俗，无肉令人瘦，若要不俗又不瘦，除非冬笋炒肥肉”。多种经营，副业生产都要归队办。

大问题是把六级干部会开好，公社党委来一个书记，管理区来二人，生产队来二人，都要一穷一富。河南简报要看两遍，这是现场会议。对穷队要讲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鸡鸣村区，穷棒子王国藩社现在是一个大社，很富了。开始只有廿三人，三条驴腿，无车无粮。他的章程就是不要国家贷款，不要救济，砍柴卖，从此出了名，变为几十户、几百户。现在多少户了？各省都可以找出这样的例子来。自力更生为主，外援为辅，由贫到富的社，各省都有。国

家投资，第一是扶助工业，第二是扶助穷队。四六开或三七开。穷队占六到七成。十亿人民币，三亿交公社，七亿交穷队。一是靠本身，二是靠公社，三是靠国家。穷人要有志气，送给我，我也不要，穷队有依赖思想，何应钦不发钱，我不搞生产如何行。

我们党过去有很多山头，逐步联合成为统一的党。军队也有几个山头，一方面军有两个山头，二方面军两个山头，陕北两个山头，四方面军四个山头。在延安党校，夕阳西下，散步时也分山头。上馆子吃饭也分山头。山头之内无话不讲，话不好给别的山头讲。在陕北甚至躲飞机时，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也分两条路走，要命时也不混杂。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要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山头是历史原因和地区不同造成的。现在看山头消灭得差不多了。当时的共产党有个共同纲领，中央实际上是联合会。这些人都是好人，不是什么托洛茨基。教条主义者到处整人，苏区、白区都怕钦差大臣。批评人家为机会主义，夺取了党、政、军、财权，他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不准说敌强我弱，不准说泄气话，只能讲壮气的话，曾几何时（三年半）长征了。整得人人自危，怎么能有积极性呢？斯大林搞托洛茨基，反复几次，赫鲁晓夫不敢让莫洛托夫当中央委员，我们对待教条主义，采取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方针。七大之前七中全会决议，会前搞清问题，大会是开团结大会，错误让他自己讲。除了王明是个未知数，其余信任他们。

现在讲的是生产队山头。每个生产队是一个山头，不认识，不承认，不照顾，就不能基本消灭山头。英国是第一个帝国主义，现在美国超过了它。世界在变化。穷队也会变化，穷的搞得好，大多数会变富的。公共积累办的事业一年一年增多，将来可变为基本的

社所有制，部分队的所有制永远会有的。作为一个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没有分析，在武汉时没有分析，一、二月才分析。谢谢几亿农民瞒产私分，使我来想这个问题。要使公社一般懂得这个问题，这是客观法则，违反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说服他们，还是这样犹犹豫豫，公社就会垮，人就会跑。供给部分要少，工资部分要多，不要一县一社（修试除外）。一社统一集中分配，任意调人、调东西，很危险。要迅速讲清楚；办法是开六级干部会。有人说富队会搞资本主义，我不信他能离开地球吗？如欲取之，必先予之，现在他就跑了。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没有动刀枪，会不会离心离德？照现在的情况有脱离太阳系的危险。现在我赞成跑，这样可以使我们警觉，将来就不会跑了。

已发文件作为初稿，我在河南取得经验，然后到武汉去，你们不要等，放手去做，基本观点不会变的。六中全会，缺少三级管理，队为基础，社与国家、社内队与队等价交换，这是认识问题。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才能解决矛盾。发现是感觉，分析是理性，要有个过程，开头是接触，所谓分析就是揭露，解决是综合阶段。

一盘棋要三照顾。生产队有五亿人口，千万干部（队长、会计），得罪他们不得了。过去70万个小社，一社50个干部，则是3500万干部。瞒产私分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劲，决心那么大，因为有五亿农民支持他们，我们则脱离了群众。认识这个问题，时间有五个月之久，相当迟，客观实际反映到主观，有个过程。

文件还要修改，但基本观点就是这样，你们可以照办。里面供给和工资问题没讲，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也未讲。

工人寄钱问题，中心是说服公社，不能拦路劫抢。军官寄钱回去，公社扣了，军官有很大反映。财产权利必须神圣不可侵犯，这

样反而建设得快。要说服公社，懂得发展过程，懂得等价交换。邵大哥三支钢笔，将来不止三支，共产主义可能有十支。

城市办公社，我就想不通。天津人说，要办就办一个，人民代表大会就是人民公社嘛。企业学校都是全民所有制，至于要办食堂随你办，至于家属就业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已经是国有制还办人民公社干什么。小城市和县城还可以办。

有些东西，不要什么民族风格，如火车、飞机、大炮，政治、艺术可以有民族风格。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输出，自己吃，这是马列主义，没有修正主义。公社倒是有修正主义，拦路劫抢、不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收款”，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想快反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未执行，等于放屁。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郑州会议纪要[1]

（1959年3月5日）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在郑州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了七天，三月五日结束。到会者，中央二十人，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二十七人，共四十七人。会议的主题是人民公社问题。首先由毛泽东同志讲了他的意见，然后进行了几次讨论。结果如下：

（一）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二）规定了如下十四句话作为当前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十四句话是：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

分级管理，权力下放；

三级核算，各计盈亏；

分配计划，由社决定；

适当积累，合理调剂；

物资劳动，等价交换；

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三）起草了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

[1] 这是毛泽东为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的纪要。

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1959年3月）

什么叫建设社会主义，集中表现。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要不要一条线？还是要一条线的。斯大林同志划了一条线，指出三个条件，先决条件，这是对的，缺点讲得不太具体，四十条中提得就比较具体了。许多问题斯大林没提到：并举、全党全民办工业、群众运动、政治挂帅、整风。

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很复杂，不要怕慢，但要采取积极态度。

对农民问题：大跃进时对农民积极性估计不足，大跃进以来仍是农民问题，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究竟是鞍钢是老大哥呢？还是徐水是老大哥呢？还是工人阶级，鞍钢是老大哥。有些“理论家”一遇到实际问题就打折扣，他们就回避资本主义留下来的东西：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在于怎么认识，看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就利用，为我们服务。要利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

过早宣传全民所有，国家就要调拨，是实质上剥夺了农民，农民会不高兴的，谁高兴这样做呢？台湾，唯恐天下不乱。

公社也可以办赢利较多的工业。（斯大林不敢把拖拉机交给农庄）

有人把农民当成工人，这不对。

不要怕商品生产，问题要看同什么样的经济相联系。

不能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父子关系，而是平等关系。破除不平等，但仍然要有差别。

钢铁、机械、电很重要，林业很重要，也要成为根本问题之一。

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只是计算工具。

人民公社实行了全民所有制不算共产主义。

苦战三年，再过十二年就可过渡到共产主义。

关于传达湖北省委贯彻郑州会议[1]精神的情况报告的两个批语

（1959年3月8日）

一

湖北省委三月七日的这个报告[2]，现在请中央书记处用电话方式，立即传达给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以作参考。湖北的特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7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近几天来，省委紧紧地抓住一条，即迅速、广泛、深入地把郑州会议的精神贯彻下去，召开了一系列各级干部会议，并定于3月11日在武昌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加上各地600名观潮派、算账派，参加人数将达3500多人。目前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正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和传达后的反映，进行讨论，写出文件草稿，交六级干部大会进一步讨论。这次扩大会议提出：一、根据郑州会议精神，在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之后，还要解决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种作风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党整社。二、从湖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原农业合作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上交公社的部分不宜太多，1958年为50%，1959年为10%左右，最多不超过15%。生产队的积累仍为8%左右。三、对原定的地方工业规划和基建工程计划做必要的调整。四、有关人民公社的具体政策问题，正在搜集、整理、研究和讨论。

点，就是快，有准备，有步骤。他们从三月三日到十日，以八天时间，做准备工作。这种准备工作，是生动活泼的。四五天内，一下子弄通了省、地、县三级和少数几个典型公社的多数同志的思想，作了调查、研究，并且着手起草文件，以便提交三月十一日开始的有全省3000多人参加的六级干部大会。这个大会，有几百个观潮派、算账派参加，多么好啊！我认为，湖北省委的总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郑州会议的精神的。他们的各项细节，我现在不准备发表评论，湖北的同志们会弄得好的。我准备于三月十日到武昌，研究他们六级干部大会的情况。

毛泽东

1959年3月8日于郑州

二

吴芝圃[1]同志：

湖北省的这个报告，请你印发六级干部会议各同志，每人一份，以为参考，以壮士气。不要吝惜3000多份纸张，各省交流经验，可以启发思想。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9年3月8日上午8时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对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讨论情况的综合材料的批语[1]

（1959年3月8日）

一

此件发各省、市、区党委。很值得一看。

毛泽东

1959年3月8日，于郑州

二

河南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个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1959年3月6日。根据此项材料，起草了一个《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

[1] 本篇一是转发河南省六级干部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分配问题、穷队富队问题和几项具体政策意见问题的综合材料的批语。本篇二是毛泽东为这一材料写的标题和说明。

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1]和一个总结提纲[2])。

---

[1]　这一规定（草稿）的主要内容是：一、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公社必须实行权力下放，恰当地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合理解决产品分配和劳力使用问题，克服平均主义和统得过多过死的现象，进一步调整国家与公社、公社与生产队、队与队、队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巩固公社制度。二、人民公社的管理制度。（一）应当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实行权力下放，以大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分级管理制度。（二）生产队的职权范围。（三）县联社的职权范围。三、关于若干政策问题。（一）公社要正确确定各大队的收益分配比例。（二）公社分配给社员消费的部分，必须坚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制度。（三）公社对劳动力的分配，在现有生产条件下，应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四）对穷队社员要进行自力更生教育，同时从经济上解决其生产困难，对富队社员也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五）宣布征购工作结束。（六）对建立公社时的经济遗留问题，根据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原则处理。（七）公社在体制变化之前所欠的外债，原则上仍由公社负责分期归还。（八）公社必须贯彻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2]　指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全省六级干部会议准备的《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草稿）。

党内通信[1]

（1959年3月9日）

一

小平[2]同志：

附信[3]，请你看后，立即送交少奇同志看一下，叫尚昆[4]务于今夜（三月九日），用电话发至各省、市、区，西藏除外。

听说，湖南定于三月十六日召开六级干部大会，太迟了，故写此信。

毛泽东

三月九日上午三时

乔木正在帮吴芝圃同志修改大会的两个文件[5]，迟一二天方回你处。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即本篇二。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5]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

二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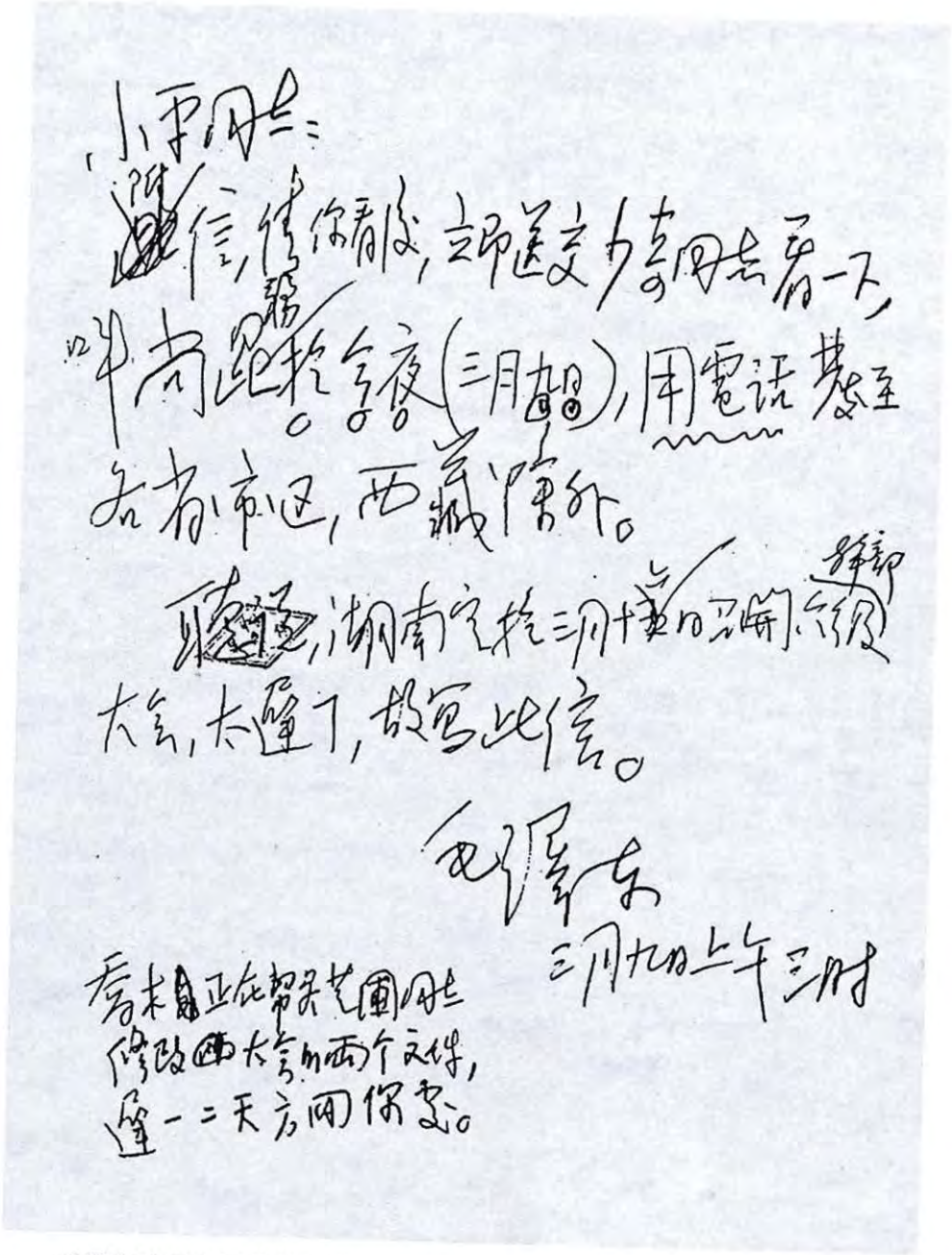
中央定三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们都要到会。各省、市、区党委根据此次郑州会议决议精神，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而召开的六级干部大会，大约需要开十天左右。因此，应当立即召开。例如湖北省委定于三月十一日开会，是适当的。太迟了，不利。时间太短，问题的分析、揭露和讨论，势必不充分，解决得不会很适当和很彻底，就是说，不深不透。各省、市、区大会应当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将这两个文件立即发下去，使下面获得明确的根据。而这样两个文件的思想形成和文字起草，需要时间。假如三月十一日大会开幕，可能要开到三月二十日或者二十二日才能结束，各第一书记才有可能抽出身来，于三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开会，这样就从容些，不至于太迫促。河南的六级干部大会，三月十日可以结束，他们的一个决议，一个总结性讲话，三月九日可以最后定稿。这两个文件，中央将在三月十四日以前用飞机送到你们手里，以供参考。河南的下一步，是开县的四级干部大会，传达和讨论省的六级干部大会的方针，讨论各县、社、队的具体执行方法。县的四级干部会议的出席人是：（一）县级若干人；（二）公社级若干人；（三）生产大队级每队一人至二人；（四）生产队级每队一人。外加若干观潮派、算账派。共计少者千余人，多者二千余人。会期七天至十天。河南各县定于三月十三或十四日同时开会，三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以前结束。三月份还剩下一个星期，

留给公社、大队、生产队去开会。总之，三月份可以基本上澄清和解决人民公社问题中一大堆糊涂思想和矛盾抵触问题。四月起，全党全民就可以一个意向地展开今天的大跃进了。我希望各省、市、区也这么办。各省、市、区的六级干部大会，如果能像湖北那样在三月十一日召开，三月二十日或二十二日以前可以结束，三月底可以结束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四月十日以前可以结束社和队的讨论，比河南也只迟十天左右。有些同志或者会认为仓促、无准备，大会召开的时间应当推迟。我认为不宜如此。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把六级干部迅速找来，把方针即刻放出去，三几天内就会将大小矛盾轰开，就会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我们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说。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也不过几天而已。三几天后，就会想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作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几天时间也就可以了。从三月四日至十日，有六七天时间作准备，还不够吗？顶够了。拖长反而不好。

以上是我的建议。是否可行，还是由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去决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小平同志：

信，请你看看，交邓、万、李同志看一下，以便商定。今夜（三月初四），用电话召集至京有关同志，西藏除外。

现在，湖南、广东、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山西、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沈阳、长春、呼和浩特、太原、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拉萨、成都、昆明、贵阳、南宁、广州、长沙、南昌、合肥、济南、郑州、石家庄、天津、太原、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哈尔滨、南京、杭州、福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西宁、乌鲁木齐、拉萨、北京、上海、重庆、济南、郑州、合肥、南昌

毛泽东起草的《党内通信》的手稿。

介绍安徽的经验[1]

（1959年3月9日）

曾希圣同志三月八日二十四时报告九日上午收到。安徽六级干部大会定三月九日开始，十八日完毕，比湖北还早两天，非常之好。安徽大会人数竟达一万多人，内观潮派有一千多人，手面很大，没有怕鬼思想。共产党人如果怕鬼，那就不像样子了。此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以为参考，西藏除外。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上午十二时

[1] 这是为转发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1959年3月8日24时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写的批语。报告主要谈了安徽省委召开六级干部大会的计划和县以上三级干部讨论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的情况。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关于湖南报告的意见[1]

（1959年3月9日）

一

小平[2]同志：

此件[3]请用电话于今夜发各省、市、区党委。下附湖南八日报告[4]。

毛

九日十三时

---

[1] 这是对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给中央的简报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即本篇二。

[4] 中共湖南省委1959年3月8日给中央的简报说，最近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传达讨论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指示。由于当前正是春耕备耕和培育春收作物的紧张阶段，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必须要求在思想方面尖锐和深入地解决问题，同时又必须继续鼓足正在展开的生产跃进运动的劲头。为此，省委决定：（1）根据中央分级分权精神，布置当前生产工作。（2）各县正在开会传达今年农业生产跃进计划，首先将生产锣鼓打响。（3）3月13日召开全省六级干部大会。（4）省委、各地市委立即各搞一两个试点，摸清干部、群众思想情况，提出如何贯彻执行郑州会议精神的具体方案。

二

湖南省委三月八日的报告，九日上午十二时收到。六级干部大会宜早不宜迟。先布置生产，很对。县、社、大队和队，都有一二个强的领导者留在当地指挥生产，农事决不能误。但全省大会宜早开，分两批到省，第一批四级，第二批两级，一开始就是大会，河南就是这样开的。大会有公社三级干部，把方针一放，立即轰开，情况暴露，就是最好的调查。不必事先做调查，以省时间。很多同志做了几个月的调查，开过不少的大会小会，结果对于大量存在的事物，却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原因是方法不对，找不到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读过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办起事来却在长时间内不认识公社的集体所有制要有一个由小到大、由量到质的变化过程，几乎普遍否认价值、价格和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这不是很奇怪吗？但却是事实。现在已有了郑州会议的方针，只须将六级几千人召集在一起，把方针一放，几天工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于农事也有利。

毛泽东

1959年3月9日下午一时于郑州

介绍广东的经验[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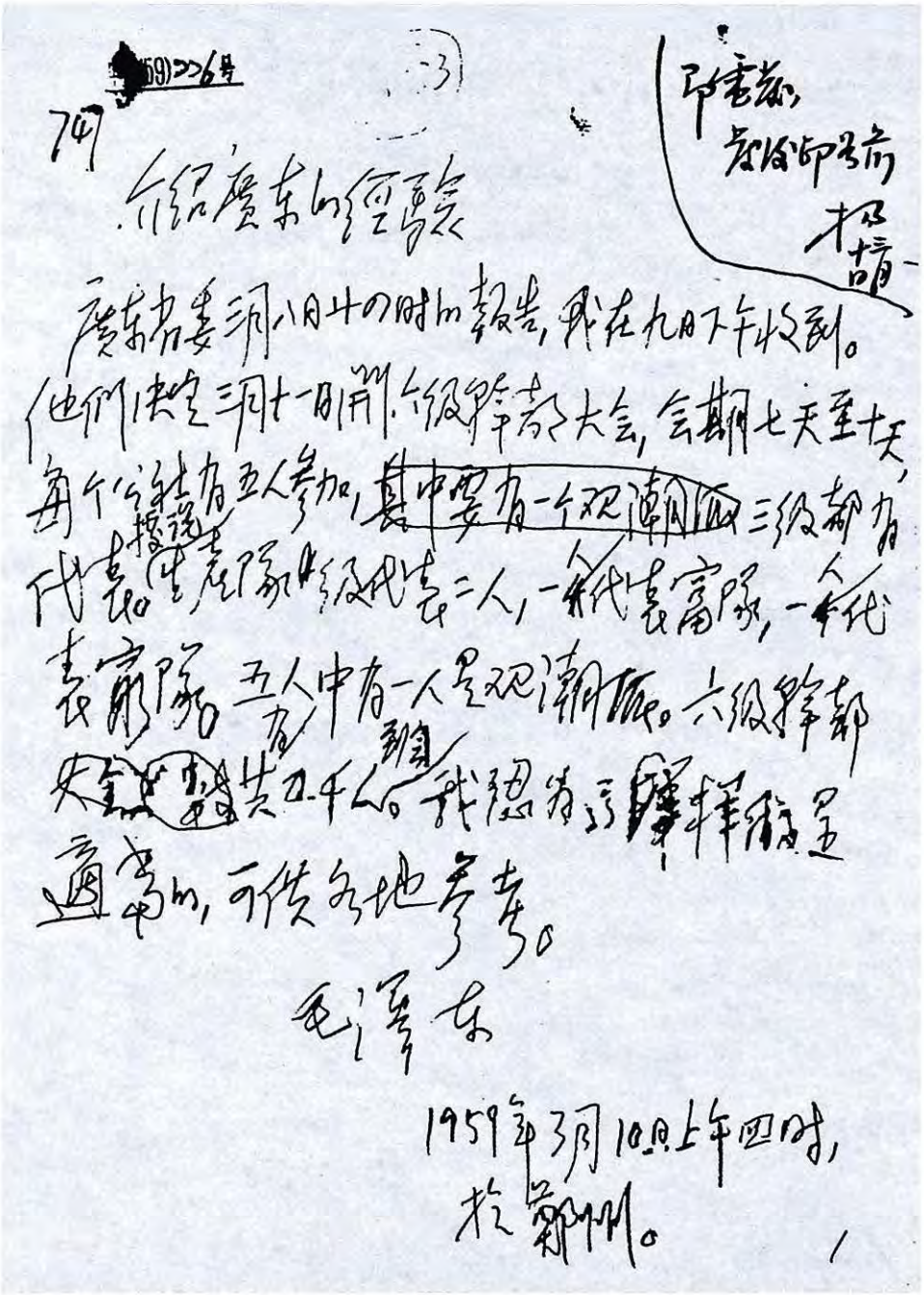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10日）

广东省委三月八日廿四时的报告，我在九日下午收到。他们决定三月十一日开六级干部大会，会期七天至十天，每个公社有五人参加，三级都有代表。据说生产队级代表二人，一人代表富队，一人代表穷队。五人中有一人是观潮派。六级干部共有五千人到会。我认为这样做是适当的，可供各地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10日上午四时，于郑州

[1] 这是为转发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贯彻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广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报告的批语的手稿。

祝贺丹麦国王生日和国庆的电报

（1959年3月10日）

丹麦王国国王斐德烈九世陛下：

欣逢陛下寿辰和丹麦王国国庆，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名义，向陛下和贵国人民致以热诚的祝贺。祝中、丹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进一步的发展。祝丹麦王国繁荣，丹麦人民幸福和陛下身体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10日

接受缅甸联邦新任驻华大使貌貌觉温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9年3月12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中缅两国自古以来就是亲密的邻邦。在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长期斗争中，两国人民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从两国各自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压迫以来，两国人民在新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友谊有了不断的发展。我深信，在中缅双方坚决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情况下，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今后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从而对亚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转发广东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精神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3月13日）

小平同志：

---

[1]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11日23时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汇报。汇报说，为了抓紧生产季节，广东省委决定在农村普遍实行“三定”“五放”。所谓“三定”：一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有些即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几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或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二是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是定1959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所谓“五放”，是为了使新的基本核算单位能立即进行生产，把必须和可以迅即下放的立即宣布下放。主要包括：（一）下放劳动力，即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一次清理，放回原生产队，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二）下放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由其进行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汇报最后说，我们准备在本月十二日晚八时半召开全省各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参加的有线电话会议，将上述规定布置下去，安定人心，推动生产。

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很好，请你用电话方式，于今日立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广东行动迅速，一面开会，一面即将方针直达各生产队长，毫不拖泥带水。湖北的方针[1]三月八日即下达各生产队，广东于三月十二日下达，也是很快的。各地宜仿此，一面开会，一面迅即下达方针。广东的“三定五放”，符合郑州会议精神，请各地研究，酌情采纳。

毛泽东

1959年3月13日上午五时，于武昌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接见黑人领袖杜波依斯博士。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和杜波依斯、斯特朗亲切交谈。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和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伊斯在武汉东湖畅谈。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同美国友人、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伊斯和美国女作家斯特朗合影。

《老友重逢》（中国画）

党内通信

（1959年3月15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1]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大队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三月八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的规定[2]，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该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周小舟[3]同志来此，和王任重[4]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小舟，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即以生产大队（管理区）

---

[1] 指《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和《中共河南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总结提纲》。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

[3] 周小舟（1912—1966），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4] 王任重（1917—1992），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为基本核算单位。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三月十一日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1]。“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全省原有二万三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不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作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南两省均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北、广东两省均主张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哪一种主张较好呢？或者二者可以并行呢？据王任重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

---

[1]　“三定五放”，是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11日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的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的。“三定”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定领导人员，迅速搭起组织与管理生产机构的架子，加强领导，组织生产。（三）定1959年生产计划和粮、油、猪等商品包干任务，任务不要定得太高，防止层层加码，生产队（或大队）完成任务后的其余部分即归队自行支配。“五放”是：（一）下放劳动力，使生产队（或大队）的劳动力固定下来。将原来从生产队抽调出去的劳动力迅即进行清理，抽回一部分给原生产队，投入农业生产。（二）下放生产资料，土地、耕牛、农具等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并管理使用。（三）下放畜牧业，一律归生产队（或大队）所有和经营管理。果树及鱼塘等亦可同样下放给生产队经营管理。（四）下放原有的肥料厂。（五）下放粮食，食堂粮食消费由各队自行安排。

（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即原高级社）支书绝大多数或者全体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觉这个问题关系重大，关系到三千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觉得勉强，则宁可采用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作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县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1]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有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究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于武昌

[1] 这个记录是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形成并下发的。记录共三部分：（一）《郑州会议纪要》；（二）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三）《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

在安徽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上的批语

（1959年3月15日）

小平[1]同志：

安徽三月十一日简报[2]很好，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他们收到后，可以印发正在开会的同志们每人一份。此外，广东的第二次简报[3]，山东第一次、第二次简报[4]，都很好，请同时转发各省、市、区大会，予以印发，供他们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上午六时于武昌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3月13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3月11日讨论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简报。简报说，安徽六级干部会议，11日继续分组讨论。讨论中，社队干部一方面进一步认识到公社化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认识到其中一度存在的问题。绝大多数人对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已认识清楚。在检查缺点时，社队干部分析去年“共产风”刮起来的原因有三：一是

自己认识糊涂，把“共产风”当“好风”；二是害了“传染病”，互相传染；三是省里有关部门传下去的。讨论中，公社一级的干部发言不多，省委已专门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再一次说明责任主要由省委负，解除他们的顾虑，但也要他们注意检查自己的经验教训，大胆发言。毛泽东在批转这一简报时，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安徽的经验》。

[3] 指中共广东省委1959年3月11日23时关于贯彻郑州会议决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汇报。

[4]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9年3月10日关于贯彻执行郑州会议指示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3月12日下午4时关于山东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续报。山东省委的报告说，本月5日至8日，我们召开了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传达郑州会议精神，为六级干部会议作准备。会上大家一致反映，听了主席的指示，找到了解决当前农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从所有制问题入手，重视生产队的所有制。过去公社统得过多，“一平、二调、三收款”，否定生产队的所有制，主要是有一种急于实行共产主义的思想。许多干部听了传达之后，思想上豁然开朗，纷纷打电话回去，要求停止反本位主义的做法。但讨论中也反映出许多错误认识和思想顾虑，对以生产队还是以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争论也比较多，这些问题有待于六级干部会议进一步解决。舒同的报告说，我省的六级干部会议从本月9日开始，已举行3天。听了郑州会议精神后，群情振奋，绝大多数基层干部认为主席的指示非常正确，抓住了主要矛盾，照此去做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紧张局面。粮食问题、生产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矛盾也都将迎刃而解。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回去，要求家里好好生产，纠正过去的错误做法。为了把会议搞深搞透，我们提出分两阶段进行：第一段，谈心事，摆矛盾；第二段，解疙瘩，订章程，起草有关公社管理体制及若干政策问题的文件。会后各地可以一直回到公社去开会，结合正在展开的整社运动将郑州会议精神贯彻下去。县的会议可放到后面视情况需要再开。

关于注意给达赖复信问题的批语

（1959年3月15日）

中央：

十四日以谭冠三[1]名义，答复达赖的一封信，很好，政治上使我处于主动。看他反应如何。如有复信，不论态度怎样，均应再复一信。以后礼尚往来，可再给信。这些信，准备在将来发表。为此，要准备一封信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2]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以上请考虑。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下午四时

---

[1] 谭冠三，当时任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

[2] 指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十七条。主要内容是：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等等。

转发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草案等材料的批语

（1959年3月15日）

小平[1]同志：

湖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2]，及王任重同志的报告[3]，今天上午已送100份去北京，请你即看一下，看是否可以转发各地作参考。主要是《决议》，主张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3月8日的这一决议草案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坚决地以相当于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队或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因为人民公社是在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而来的，这样做有利于解决大集体和小集体的矛盾，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团结、生产和人民公社的巩固、建设。第二，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建立人民公社后已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第三，少数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过小，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可以继续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第四，公社要对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或管理区）加强领导，配备领导骨干。第五，公社对于公社化以后的各项账目，应建立专门班子加以清理。

[3] 指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9年3月11日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与河南的办法[1]有所不同。如你认为可发各地，请于今晚或明（十六）日办一下，或用电话，或用电报，或用飞机送去。

毛泽东

1959年3月15日下午六时

[1]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的规定》（草稿）指出，根据我省目前情况，应当在公社统一领导下，实行权力下放，以大队为基础，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分级管理制度。

关于召开县以下各级干部会议等问题给王任重[1]的两封信

（1959年3月16日）

一

任重同志：

今日上午，请找各地委第一书记及几个县委书记商量一下：省的会议以后，是否应以几天时间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会议，此种会议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然后再开公社代表大会，应到些什么人，应开几天，是否应选举社的管理委员会（其成员如何组成）。下午，我们再商量一下。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二时

[1]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二

任重同志：

送上文件24件，极有味，好读。我劝你于今天上午看一遍，一气看完，有3—4小时就够了。

下午你再找地委书记少数县委书记座谈，谈县、区、乡、村如何开会问题。我们晚上再交谈。以为如何？花费这一天，不是于湖北工作没有用的，你试一试看吧！

毛泽东

三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党内通信

（1959年3月17日）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关于县和公社的会议问题。

各省、市、区六级干部大会即将结束，是否应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呢？我的意见应当开，并且应当大张旗鼓地开，只是一律不要登报。河南各县正在开四级干部大会，开得很热闹，很有益。河南省级负责同志正在直接领导几个县，以其经验，指导各县。湖北、广东、江苏，均已布置全省各县一律开会。江苏省的江阴县委，已经布置开万人大会。河南有两个县是万人大会，多数县是四五千人的。我建议县应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即县委一级，公社党委一级，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一级，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一级，生产小队（即生产组，又称作业组）一级，每级都要有代表参加，使公社的所有小队长、所有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所有管理区的总支书记和生产大队长以及公社一级的若干干部都参加会议。一定要有思想不通的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参加，最好占十分之一。社员中的积极分子，也可以找少数人到会。使所有这些人，都听到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因为他的讲话，比一般公社第一书记的水平要高些。然后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放大鸣，有几天时间，将思想统一起来。要使三种对立面在会上交锋：一种，基层干部与

他们上级（公社和县）之间交锋；一种，思想不通的人与思想已通的人之间交锋；一种，十分之一的观潮派、算账派（有许多被认为观潮派、算账派的人，其实并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被人看错了）与十分之九的正面人物之间交锋。辩论有三天至四天时间就够了。然后，再以三天至四天时间解决具体问题，共有七八天时间就很够了。县的五级大会一定会比省的六级大会开得更生动，更活跃。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1]，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2]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县的大会在三月下旬即可完结，四月一个整月可以不开公社的代表大会了，忙一个月生产，开些小会，解决些具体问题，由各生产队在工作余暇，召开党员大会，再开群众大会，形成全民讨论。因为每个公社都有几百人在县里开过会了，问题已讲透了，可以直接进行工暇全民讨论。湖北已有些县在进行全民讨论。到五月间，全国各公社抽出三天时间（三天尽够了），开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

---

[1]　一平二调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主要表现，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县、社两级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某些财物。三收款，指银行将过去发放给农村的贷款统统收回。

[2]　王任重，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17—2011），江苏溧阳人，当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代表要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正面的、反面的（不要地富反坏，但要有富裕中农），讨论一些问题，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建议一年开四次，每次一天，二天，至多三天。公社第一书记要学会善于领导这种会议。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公社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是原来高级社）的领导骨干。以上只是当作建议，究竟如何处理较为适宜，请你们考虑决定，迅即施行。县开会时，公社各级都要留人领导生产，或交替到会，不误农时。

毛泽东

1959年3月17日上午七时，于武昌

转发河北省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3月17日）

小平[1]同志：

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的报告[2]，很有参考价值，请即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3月16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河北省六级干部会议昨天下午结束。会议决定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原高级社已分为几个生产队的，必须作为一个经济核算和分配单位；原来一个村有几个高级社的，经群众同意，尽可能合并为一个经济核算和分配单位；村庄较小的高级社，经群众同意，也可与邻村合并为一个经济核算和分配单位。关于分配问题，会议讨论确定：公社和生产队的扣留比例（包括农业税），一般占总收入的40%左右。在扣留部分中，除农业税外，公社所得大体占总收入的4%至10%。为加强公社和生产队的领导，省委还决定要坚决地下放一批有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公社去，公社、管理区从原高级社调上来的干部，应一律放回生产队去。

转发《山东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17日）

小平[2]同志：

刚才请你转发河北省委三月十六日报告[3]，认为很有参考价值。现在又看到山东省委三月十六日下午八时的报告，认为同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也请你迅即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在目前时

---

[1]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9年3月16日晚8时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三次报告。报告指出：（一）关于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原则上以相当于原高级社的生产大队（管理区）或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至于原高级社小于现在的生产大队、大于现在的生产队的，采取两种办法分别处理：（1）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的，经群众同意，即以现在的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经济条件悬殊较大、群众愿意分开的，即以原高级社为基础把生产大队适当划小，作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关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我们认为，大体上各种扣留可约占总收入的47%左右（国家税收和上缴任务占7%左右，公社积累占18%左右，生产费用占22%左右），分配给社员部分约占总收入的53%左右。目前，公积金主要用于农、林、牧、副、渔等基本建设方面，由社和大队或生产队分级管理使用，一般社占2/3，队占1/3；公益金主要用于公共福利事业，一般社占1/3，队占2/3。在公共积累中，县联社可以从公社本身提取的部分中抽调3%至5%，最多不超过10%。毛泽东在批转山东省委的这一报告时，将报告题目改为《山东的经验》。

[2]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指中共河北省委1959年3月16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二次报告。

期，积累不可太多，而且公社三级都要有积累。湖北规定积累比例，有高有低，一般为百分之十八。此百分之十八，分配到公社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管理区为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生产队为百分之八，而县则不抽积累。此种办法，值得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下午三时

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国家自己来管[1]

（1959年3月18日）

你在北京的演讲词，这次你和张奚若的共同声明[2]，我都看到了。只要是有远见的人，就知道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美国有些人，尤其是美国当局，他们的观点在我们看来，只是看到很近的地方。比如他们说，西太平洋他们要来管。我说西太平洋要西太平洋的国家自己来管。他们的军队要从西太平洋撤走，要撤的地方很多，如日本、菲律宾、朝鲜，还有台湾。杜勒斯说，我们要把他们赶出西太平洋。好像我们犯了什么错误，好像西太平洋是他们的。我看他们的道理就讲不赢。他们终究要走的，他们的占领是暂时的。现在日本政府和美国站在一边，我们不高兴。但我们看来这也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要起变化。可能他们有另外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存在是暂时的，蒋介石的存在是长远的。按照他们的观点来看，那末我们的共同声明是错的了，社会党的观点是错的了，中国的观点也是错的了。我们和他们的看法不同。我们有信心，时间和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

中日关系暂时地、一时地中断是不好，但这是暂时的。现在我

---

[1] 这是毛泽东和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谈话的一部分。

[2] 指1959年3月17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和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的共同声明。

们不是又在来往了吗？社会党的做法很对，打开这条往来的道路。

贸易总有一天要重开的，不能一万年不做生意，但是在日本政府现在这种做法之下，我们只好如此。这是我们唯一能够走的路。岸信介[1]一定要把政治、经济分开，一定要和蒋介石打交道，好，那就按照他的办法办，让他去和蒋介石打交道吧。我们可以等他多少年的，要等多少年就等多少年。我曾经要廖承志[2]同志把岸信介敌视中国的言论列了一个表。现在，我们是按岸信介的办法做事。他和蒋介石、美国站在一起，很好，就按他的办法办，他还不同意吗？

我们两国的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我们两国都有好处，所以你们的方针不错。也许回国后，你们政府的人不赞成，说你们说空话，和中国人说把美国赶走，等等。我们说你们对，美国可以赶走，也应该赶走。它有什么道理把我们的土地、把你们的土地占领着呢？它所以那么猖狂，就是因为它比别人多几吨钢。美国人也是两只手，没有什么三只手。美国就是多几吨钢，但是，这是谁都可以做到的。别人怕它，以为它是真老虎。说它是真老虎，我也承认，但它是要变质的，从真的变成纸的。你们日本的历史也是这样。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3]开始时，也就是说九十年以前，你们有

---

[1] 岸信介（1896—1987），日本自由民主党前总裁。1957年2月至1960年6月任日本内阁首相。他在任期内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2] 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1949年至1959年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3]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1868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什么钢，不是也没有？也受外国欺侮，也没有科学文化。就是这九十年你们发展起来了，经过了一些曲折，现在又受美国欺侮。但是，这也是暂时的。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

1959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会见浅沼稻次郎书记长率领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

1959年3月，毛泽东、刘少奇等在列车上出席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分别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1959年3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东湖客舍接见日本社会党访华代表团团长浅沼稻次郎。

转发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经验的批语

（1959年3月18日）

小平[1]同志：

河南荥阳县四级干部大会的经验[2]，值得各省、县参考，请即发给各省、市、区党委。请各省、市、区党委仿照河南省委的办法，在各县举行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时，抓住一个典型县，取得经验，指导全省。

毛泽东

三月十八日

---

[1]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中共荥阳县委1959年3月16日9时关于四级干部会议情况给郑州市委并报河南省委的第八号简报说，我县的四级干部会议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首先传达主席指示和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的决定，采取虚实并举，先务虚后务实，大胆放手鸣放辩论的办法，解决思想问题，紧接着解决体制和政策问题。第二阶段讨论1959年生产计划（着重解决包产指标），安排当前生产。开会的方法主要是县里会议与公社会议相结合、干部会与群众会相结合。做到上下配合，内外呼应，一放到底，说办就办，因而会议开得很成功，干部和群众的情绪都很高。根据我县的经验，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还必须有意识地解决实际问题，这样可以使党的政策与群众见面快，思想通得快，改善公社干部和基层干部的关系，使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见出席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代表。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向出席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挥手致意。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接见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代表。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和出席湖北省六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握手。

祝贺突尼斯独立纪念日的电报

（1959年3月18日）

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布·布尔吉巴阁下：

值此贵国独立纪念日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阁下和突尼斯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祝阁下和突尼斯人民在维护民族独立和谋求国家繁荣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祝中国和突尼斯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18日

毛泽东等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电报

（1959年3月19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值此匈牙利人民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敬意。

四十年前，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下，继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匈牙利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虽然它只存在了一百三十三天就在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是这次革命斗争充分表现了匈牙利人民的革命精神，对当时正在争取自由解放的各国劳动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并且丰富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

匈牙利人民经过长期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在十四年前，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重新赢得了解放。匈牙利人民继承了过去光荣的革命传统，以辛勤的劳动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很短时间内，匈牙利已经变成了一个先进的工业农业国。近年来，匈牙利人民在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一贯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并且对制止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维护欧洲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匈两国人民早就在革命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兄弟友谊。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中国人民一向以极大的关怀注视着匈牙利人民的斗争，并且为他们的伟大成就感到欢欣鼓舞。在纪念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的历史性的日子里，我们坚信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保卫和平的事业中将不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并且衷心地祝贺中匈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1959年3月19日于北京

对《四川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19日）

四川省委三月十四日报告（简报第五号）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这是一个很可供各地研究和酌量采纳的文件。

毛泽东

1959年3月19日上午10时于武昌。我今日去长沙。

---

[1]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3月14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第五号简报，毛泽东拟题为《四川的经验》。其主要内容是：一、关于公社的管理体制。我省绝大多数是一乡一社，因此，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相当于原来农业合作社的联社和部分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队（相当于原来农业合作社）三级，实行三级管理；一般以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为公社的基础（约200户到300户农民）。二、关于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国家税收平均约占6%左右，公社和管理区扣留公共积累约17.5%左右，生产费用约占20%至30%，管理费占0.3%，分配给社员的消费部分约占50%左右。三、关于粮食的分配和征购。拟按每人平均产粮1500斤为基础计算分配，留口粮600斤，征购300斤，饲料粮300斤，种子粮150斤，储备粮100斤，工业用粮50斤。四、关于劳动力的问题。第一，在保证农业生产所需劳动力的前提下，实行统筹兼顾。第二，为

了节约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等机构。五、关于国家对公社投资和收回贷款工作中的有关问题。我省拟将去年银行收回的贫农合作基金1200万元，作为国家向公社的投资预支使用。六、对公社各项账务问题的处理原则，一般的可提倡不算旧账，但有些账还必须算。七、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公社问题的处理。对已建立的公社不宣布取消，但对公社的各项具体问题，仍可基本上按照原高级农业合作社的一套办法处理。

介绍河南的经验[1]

（1959年3月19日、24日）

一

河南改变方针[2]，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得到广大群众拥护，请各省、市、区党委注意。

毛泽东

三月十九日下午九时于长沙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3月18日关于如何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给毛泽东、中央并发各地、市、县委的报告的批语；本篇二是对中共河南省委3月19日转发的洛阳地委关于公社体制讨论的简报（第八号）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在写这一批语时拟的。

[2] 中共河南省委1959年3月18日的报告说，省委六级干部会议原定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这次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生产队、作业组和大多数社员则坚决主张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省委在接到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表示完全同意以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并在向各地委、县委传达时指出，省委原规定可以改变，要走群众路线，听取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

二

此件[1]很好，即发各省、市、区党委，转发各地委、县委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24日

[1] 指中共河南省委转发的洛阳地委1959年3月18日21时给各市委、县委并报中央、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关于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各县生产队长和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主张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但县委、公社及相当多的管理区干部，则坚持以大队（管理区）为主。其实有些县委干部是了解群众情绪的，之所以不敢改变政策措施，主要是怕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加上省委曾有“以大队为基础”的规定，因而采取了一面执行一面又拖泥带水的态度。17日晨传达了主席关于这一问题的指示后，以高级社为基础这条方针定了，会议都开得很顺利。河南省委在批转这一报告时说，洛阳地委关于公社体制问题讨论的简报很好，请将它向公社和大队干部作一次传达，让他们注意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取大多数人，特别是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正确的判断，问题的界限就会弄清楚。

和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谈话提纲[1]

（1959年3月）

公社管理委员会的选举[2]

小队部分所有制[3]

大协作

---

[1] 1959年3月20日，毛泽东召集中共江西省委和部分地、市委负责人座谈，了解江西省六级干部大会召开的情况，并作了重要谈话。这是毛泽东写的谈话提纲。

[2]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4月主要搞生产，到5月再开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只选现在公社这批人很危险，要选一批管理区的人当委员，一个管理区一个。大事一定要开管理委员会决定，不能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社主任两个人决定。这些人脱离群众很久了，群众观念很薄弱。他们的积极性是有，就是向群众要粮要猪的积极性。他们不懂得群众的心理状态，就是脱离群众。两头的话都不听，特别是下面的话不听危险，五亿农民啦！公社党委也要经过选举，要把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一级的干部选到公社党委来，他们要占很大一部分。公社党委决定的大事，要他们参加决定。

[3]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小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有道理的。食堂在那里，土地在那里，耕牛农具在那里，小队不负责任、没有积极性怎么行！

如何过渡[1]

供给制[2]、工资制

重点在穷队[3]

食堂太大不好[4]

敬老院[5]

破坏程度（牛少30万头，母猪少1/3，鸡少2/3）

山林破坏大（下放到队、组去管）

居民点（不要大，要便于生产）[6]

---

[1]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小集体如何过渡到大集体？总要有一个过程，我看不要急忙过，搞几年再看。现在还不能过，将来也不能用这个办法。我看要另一种办法，要使得每个人不吃亏。将来是不是一下子过渡到公社所有制？也可以先搞以乡为单位的集体所有制，现在一个公社一个区，几十公里，看都看不见。而且还要自愿，一时不愿意统进来的要让他们看几年。就是到了以公社为单位的大集体所有制，生产队恐怕还是一个核算单位。大工厂里的车间，也算一个核算单位吧！

[2]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对供给制你们有什么意见？有的地方提出搞半吃饭不要钱，也有的提出老人小孩不要钱，青壮年要钱。吃饭不要钱这个办法不能变，变了贫农、下中农不赞成，我们中国人太苦了。你们现在不要动，可以研究一下，摸一个底，进行一些试验，多想点办法。

[3]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过去省委、地委、县委的重点都是在富队，现在要反过来，要以穷队为重点，帮助穷队搞好，使穷队逐渐变富。当然也不是根本不理富队，现在那些富队也是政府帮助他们翻过身来的。

[4]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食堂也不能办得太大，跑几里路吃饭，吃饱饭走回家肚子又饿了。

[5] 在谈话中，当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汇报有的敬老院强迫老年人入院时，毛泽东说，这些人真是冒失得很！搞敬老院，也能把老头子捉得来？

[6]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居民点不要太大，几百户就差不多，不然种田还要走很多路。总要有利于生产。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提纲

（1959年3月）

县、社会议如何开？

生产队太小，例如只有几十户。一百多户是可以的吧？

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是否应当承认？不承认，怎样？

如何当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

这两级不通的人，有多少？如何办？

半粮食供给制（例如250斤），是否应当正式规定，范围多大（是否占全省25%的食堂）？

非农忙时食堂散伙，在一部分地方，如何？

富裕中农不参加食堂，如何？

对大片麦、棉、油料、烟、麻、菜的种植计划，是否有不利之处？

对大协作，是否有不利之处？

具体问题的解决，有无文件？

宣布三、五、七年就可以由小集体到大集体过渡，有些人不想种果树了，不想植树了，不想搞长远计划了，怎么办？

多种作物安排问题，关系甚大。

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安排，每队都要并举，按季节，作物参差不一，有利于劳动力的调节，有利于经济。

地、县、区、乡的重点问题：

过去说，抓两头，带中间。实际只抓了富点；现要转过来，抓穷点，要学枣阳县委1958年提出口号：大战五条冈，结果：棉花增两倍，粮食增一倍。

关于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的批语[1]

（1959年3月20日）

这个经验有用，可转各地。对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少讲空话，多讲办法。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1959年3月17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第四十八号上。这辑简报登载了中央办公厅曹幼民发自济南的一封信，信中介绍了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对公社管理体制、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今年小麦的分配、粮棉油统购等政策的意见。来信还谈到，关于怎样以最快的方法向群众贯彻上述意见，山东省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已摸到了一些经验：一是向群众贯彻得越快越有利；二是不要光摆解决思想问题的架子，而要着重把怎么办讲清楚。

对《山西省委的经验》的批语

（1959年3月20日）

此件[1]转各地参考。其中粮食分配问题（50斤粮食按劳动分给个人，450斤给食堂，按人定量，吃剩的余粮归自己）和生产小队应当有部分所有制问题，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于江西

[1] 指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17日关于山西省委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的电话汇报，载于中央办公厅1959年3月18日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第五十三号上。毛泽东批转这一报告时，将题目改为《山西省委的经验》。

对河北省委关于贯彻郑州会议[1]精神的十二条措施[2]的批语

（1959年3月20日）

此件简单明了，可转各地参考。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在郑州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指中共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情况简报》（六级干部会议专辑）第四十三号上登载的河北省委办公厅1959年3月16日的电话汇报。汇报说，河北省六级干部会议于3月15日结束，省委根据郑州会议决定的方针，提出了十二条措施：一、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1）人民公社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2）原有高级社已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并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不得再分开。（3）由原来几个过小而经济条件又大体相同的高级社合并的生产队，只要干部和社员愿意，可合并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二、原来属于高级社的生产资料，原则上归由原社建成的生产队集体所有和使用。生产队所有的产品、劳力等，应等价交换，不得无价调拨。三、1958年和1959年的分配比例：（1）生产队每年上缴国家的农业税、公社积累和本队扣留部分最高不超过45%，其余分配给社员。（2）在上述扣留比例中，农业税大体占1958年总收入的7%，公社积累占40%，其余由生产队支配。四、工资部分和供给部分的比例。1958年工资部分一般不能少于消费总额的50%，1959年一般应占到60%以上。五、社员工资要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多产多分的原则。六、所有人民公社和生产队都要及早确定1959年生产、收入的奋斗目标。七、搞好粮食征购。八、积极扶持困难的生产队。九、合理安排农村劳动力。十、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充实领导骨干。十一、妥善清理公社化后的账目和资产。十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祝贺巴基斯坦国庆的电报

（1959年3月21日）

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将军阁下：

欣逢巴基斯坦国庆，我代表中国人民，并且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和巴基斯坦人民表示祝贺。祝巴基斯坦国家繁荣、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1959年3月21日

关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过渡问题的批注[1]

（1959年3月23日）

一

此件[2]可以发到县委，以供研究和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23日

---

[1] 本篇一是为转发桐城县委1959年3月19日晚关于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给安庆地委并报安徽省委的报告写的批语；本篇二是在转发这一报告时写的一条批注。转发时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为《桐城县的经验》，将批语拟题为《介绍桐城县的经验》。

[2] 中共桐城县委的这一报告说，我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在开法上注意了五点：（1）会前从县委到社队的各级组织，都分两套班子，一套开会，一套抓当前的生产和生活。（2）大会套小会，先重点解决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思想问题，使他们成为领导会议的骨干。（3）从县直机关抽出一些有水平和经验的干部帮助生产队一级干部领会政策精神。（4）抓住三级所有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先讨论，求源追根，把思想问题解决深透。（5）对各项实际问题认真研究出解决办法。

二

至少在二十年内，不是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不可能这样快。在大约五年至十年内，也还不是在整个国家内就能完成由集体所有到全民所有的过渡问题，而是只能看情况，逐步地完成由基本的小集体所有制首先过渡到以一个乡为范围的大集体所有制。然后经过若干年的发展，情况表示确有可能又有必要的时候，才可再考虑实行过渡到以一个区为范围的更大的集体所有制。过渡的时候，一定要使每一个小集体都不吃亏，而且都感到比不过渡对于每一个小集体每一个个人都更为有利些，要是出于各个小集体和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否则谈不到这种过渡。不管过渡到乡或区的大集体，目前生产队这种小集体总还是一级核算单位。

毛泽东注

三月二十三日

转发《四川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24日）

四川的经验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四川的公社是以乡为单位建立的，公社党委即乡党委，相当于别省的总支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四川省委1959年3月20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简报（第七号）。主要内容是：（一）对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补充意见：1. 关于公社权力下放到以哪一级为基础的问题。多数地区确定以管理区为基础，个别富队坚持以小社为单位分配的，不勉强合并。2. 关于积累比例问题。拟调整为管理区留30%到35%，公社留60%到65%，5%左右给县联社，生产队因系原来的小社，不需另提积累。3. 关于林木的处理问题。按不同情况分别划归公社、管理区、生产队三级管理。4. 关于工资问题。为了保护穷队的生产积极性，原则上尽可能使这些穷队不降低现有工资水平。5. 关于房屋使用问题。确定今后公社使用私人房屋应给少量租金。（二）对县的五级干部大会的具体安排：1. 各县一律召开五级干部会议。2. 会议采取大张旗鼓的开法。3. 要加强会议领导，同时注意照顾生产，做到会议生产两不误。（三）规定了目前工作中的几条具体措施。毛泽东在批转这一报告时，将报告的题目改为《四川的经验》。

转发《福建的经验》的批语[1]

（1959年3月24日）

福建的经验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其中第二、第三两段所说的问题[2]，应当引起充分注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

[1] 指中共福建省委1959年3月20日晚9时关于公社所有制和分配问题的意见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毛泽东在批转这个报告时，将题目改为《福建的经验》。

[2]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中第二、三段所说的问题，即关于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和人民公社总收入的分配比例问题。报告指出，解决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原高级社下属的生产队）的关系，即解决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问题，是广泛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积极性的一个重大问题。但这种生产队又不能成为三级所有制的基本核算和分配单位，因为它规模太小、力量薄弱，在许多方面不便于生产的发展，而群众也习惯以原高级社作为统一的分配和核算单位。因此生产队的部分所有制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关于人民公社总收入的分配问题，福建省委同意中央指示的比例。公共积累部分，1959年拟提高为15%左右（公社10%，生产大队和生产队5%，生产小队由小型副业收入中另外积累百分之几）。社员的消费部分，坚持按劳分配，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供给部分今年不可过多，工资部分应当高于供给部分。

对浙江省委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的批语

（1959年3月24日）

一

此件[1]简单明了，发各省、市、区党委和地、县委参考。

毛泽东

1959年3月24日

二

请尚昆[2]用电话发各省、市、区党委，另印发到会[3]各同志。

---

[1] 指中共浙江省委1959年3月22日下发的关于整顿人民公社的十项规定（草案）。主要内容是：（一）定基本核算单位。原则上应当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原来的生产队应当作相应的调整。（二）定领导人员。各级领导人都必须经过群众同意，经过群众选举，方能正式担任领导职务。（三）定任务。公社对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收购任务，必须保证完成，同时制订自己的生产计

划，和国家收购任务一同下达到各基本核算单位。（四）定分配计划。人民公社应将国家税收、公社积累分配到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据此制订全年的分配计划，使干部和社员都心中有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五）定集体福利。（六）定劳动计酬方法。人民公社应按照“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来计算劳动报酬。（七）定劳动力。目前农村中用于农业的劳动力应占到总劳力的80%以上，尽量减少非生产人员。（八）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在安排生产、使用劳力、管理财务和收益分配等方面，应给生产队以必要的权力。（九）定工业管理体制。公社现有工业，应根据规模大小、技术水平、服务范围等条件，分别确定由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管理。（十）关于账目结算、土地、耕牛、农具、资金、种子、口粮、肥料等其他问题，也都作了政策性的规定。毛泽东在批转这一规定草案时，拟题为《浙江的十项规定》。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即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上海会议[1]上的讲话提纲[2]

（1959年3月）

（一）组织章程

（二）小队部分所有制

（三）吃饭不要钱

（四）算账

（五）五月普遍选举

（六）今年分配、明年计划，年底搞一次

（七）35亿元（公粮及附加）绝对数问题

（八）县不要积累

（九）收款放款问题

（十）国家投资问题，10亿元

（十一）开会方式问题

（十二）管理费和不脱产干部的补贴问题

（十三）重点放在穷队

（十四）何时过渡，如何过渡？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这个提纲的前6条原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拟写的，毛泽东修改时增写了后面8条。1959年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了其中的前12条。

关于请上海会议[1]各同志阅读薄一波[2]发言稿的批语

（1959年3月26日）

少奇、小平[3]同志：

薄一波的发言[4]印出来了，我正在看。今天上午，请将薄的发言印本，发给各同志阅读，先有一点印象，下午三时或四时开会，大家听一波宣读他的讲稿，就会『有』获得一个较好的启发和理解了。须知有不少人是没有接触过这个问题的，心理状态各不一样。请照办为盼！

毛泽东

三月廿六日上午二时

---

[1] 指中共中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2] 薄一波，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指薄一波准备在上海会议上作的关于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计划执行情况和第二季度安排的发言稿。

介绍安徽的十项规定[1]

（1959年3月26日）

一

这个文件[2]，较之他省有许多新鲜东西，又是切实可行的。写

[1] 这是对中共安徽省委1959年3月24日关于六级干部会议15日至20日的情况简报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中共安徽省委的这期情况简报，题为《安徽的十项规定》。简报说，我省六级干部会议于3月15日至17日学习了中央关于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并结合安徽情况制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定，要点如下：一、关于以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按三种情况执行：（1）现在的大队就是原来一个高级社的，即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2）现在的大队是过去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的，仍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3）现在的大队由原来规模较大的高级社划分开的，一般不再合并，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二、公社的机构编制要进行压缩，行政管理人员要精减下放。三、工业、副业、基建等事业的经营管理范围，原则上应根据它们的性质、规模和公社各级的力量进行安排。四、关于包产问题，除生产队仍按以往办法实行包产外，生产队对生产组也应实行包产。五、关于收益分配问题，规定上缴国家7%，公共积累18%，生产费用20%，社员分配55%。六、关于伙食供给问题，采取供给制和补贴制两种办法。七、对过去的财务账目应结算清楚。八、对穷队首先应教育社员下决心，立大志，自力更生赶上富队，同时，国家在贷款、投资等方面予以支持。九、关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确定用于农业的占84%到86%。过去安排不合理的应及时调整。十、公社的各级干部都要参加劳动。

法也是一项改革，用口语，使人一看明白，较之现在相当流行的半古半今、半文半白、使人硬是看不懂，或者勉强懂了但是过眼即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那种文体，要好得多。

毛泽东

1959年3月26日

二

即印发。然后，用电话传至各省、市、区党委。

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批语和修改

（1959年3月27日）

一

少奇、小平同志：

新闻公报已改好[1]，请你们约集常委及其他几位同志，于今日上午看一下，斟酌文句。然后，叫吴冷西，连同政府命令[2]，军区布告[3]，用电话发至北京，译成藏文及外文，准备于三月二十八日用汉藏英俄各种文字广播，廿九日见报。政府命令应署明发布时间（廿七日）。命令和公报均有人名须查实填入。

毛泽东

三月廿七日上午三时

---

[1] 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公报》稿的修改见本篇二至五，其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2]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稿，后来发表在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3]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等于1956年3月20日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布告》。后来发表在195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

二

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规定，历来坚持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和西藏人民本身的团结，在西藏实行民族地方自治，这是西藏人民所热烈欢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早已于1956年4月成立。但是，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中反动分子的阻挠，自治区的筹备工作很少进展。十七条协议[1]中规定藏军要改编，西藏社会制度即农奴制度要按照人民愿望加以改革，这两项重要任务，都因为反动分子的阻挠，不能实现。中央为了等待这些反动分子的觉悟，还在1956年年底，就告诉他们，在六年内，即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可以不进行改革，也不改编藏军。

三

中央本着民族团结精神，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惩办叛乱分子，维护社会治安。但是，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这种仁至义尽的态度看作软弱可欺。他们说，汉人是可以吓跑的；九年以来，汉人动也不敢动一下我们的最美妙最神圣的农奴制度；我们打他们，他们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他们不敢平叛，只是要我们负责平叛；只要我们从外地调来一大批叛乱武装到

[1] 十七条协议，指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拉萨，给一打，汉人准跑；如果不跑，我们就把达赖[1]佛爷架往南山，聚集力量，举行反攻，夺回拉萨；最后不行，就跑印度；印度是同情我们的，可能援助我们；还有强大的美国，也可能援助；台湾蒋总统，已经积极援助；达赖是神，谁敢不从？美国人说过，中国人民公社闹得天怒人怨，都要造反了，现在是驱汉自立的大好时机；云云。这些反动派的灵魂，已经飞到九霄云外，简直要管领整个宇宙了。因此，他们非但不负责制止叛匪的骚扰，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进行叛国的阴谋活动。

四

中国政府方面认为，中国与西南邻国的关系，首先是我国与伟大友好国家印度共和国的关系，是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首次提出的，现在和将来，为了两国的根本利益，双方都没有任何理由不将这些原则坚持到底。中国政府人士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3月23日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声明，认为这个声明是友好的。中国方面从来没有干涉过印度的内政，也没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上谈论过印度的内政，并且认为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内政进行这样的谈论是不礼貌和不适当的。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学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出走印度。

五

为了彻底肃清叛匪，国务院已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在西藏各地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任务是：镇压叛乱；保护人民；保护遵守中国法律的外国侨民；受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的委托，组织西藏自治区的各级行政机构和组织西藏爱国人民的自卫武装，以代替腐败透顶、已经叛变、毫无战斗力、而且为数只有三千多人的旧藏军。拉萨市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已在3月23日宣布成立。其他各地的军管会，除班禅额尔德尼[1]领导的后藏地区的首府日喀则没有必要建立以外，都将陆续建立。拉萨和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都由人民解放军的代表和当地爱国人民的代表共同组成。现在拉萨以西的阿里，拉萨西南的江孜、帕里、亚东，拉萨以北的当雄、黑河，拉萨以南的泽当，拉萨以东的太昭、林芝、扎木、丁青、昌都、察隅等重镇和要区，都在人民解放军的坚强控制之下，当地人民的绝大多数是与人民解放军密切合作的。叛匪活动的地方，只是一些很偏僻的地区。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党内通信[1]

（1959年3月29日）

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省（自治区）委书记：

上海几个县的材料[2]可阅。

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城市各项事业每年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七级干部大会问题给中央各部委党委或党组书记、各市委书记和省（自治区）委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指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1959年3月28日报送的两个报告。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3月26日关于南汇、川沙两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南汇、川沙两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大体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大鸣大放，揭露问题，分析原因，提高认识；第二阶段讨论管理体制、政策和具体贯彻执行问题；第三阶段组织一次生产大高潮。目前两县会议都在讨论管理体制和政策问题，同时又向会外群众作了广播。事实证明，召开一竿子到底的会议，把政策交给群众，是最容易见效的。另一个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马万杰关于上海县和七一公社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其中说，这里的会议，在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讲话以后，来势很猛，时间只有一天半到两天半，放的东西直接、具体，放过以后，心平气和。群众的动态一是担心再变，二是顾虑下面的干部能不能贯彻主席和市委的指示，普遍关心工资问题。目前出勤的多了，干群关系也有变化，群众把干部当知心人了。

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每年这样的大会开两次，对于我们也极有益处，可以使我们明了情况，改正错误。这里说的是城市问题，乡村问题同样如此，我在前次通信中已经大体说过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对人民银行总行党组关于收回农业贷款中发生问题的检查报告的批语

（1959年3月29日）

此件[1]写得很好，有恰当的分析，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有交代，使人看得懂，不会头痛。

毛泽东

三月二十九日

---

[1]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党组1959年3月25日给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并转中共中央、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1958年冬季以来，银行在收回农贷的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错误和缺点，若干地方由于收贷过多，影响了公社资金的正常周转，给公社生产和社员生活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第一，有些地方去年在收购农产品的过程中，采用“放卫星”的方式收回贷款。第二，有些地方在改革规章制度中实行“存贷合一”的办法，公社一有钱存入银行，就自然地作为归还贷款，致使收回了一部分不应收回的贷款。上述错误的发生，从思想上来检查，主要是我们从业务上考虑问题多，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少。为了纠正上述问题，我们商定了以下四条办法：（一）对公社的农业贷款，取消存贷合一的办法，将公社存款账户与贷款账户分开。（二）去年12月以来收回的农贷中，属于未到期或不应收回部分，可以退还人民公社。（三）今后到期的农贷，应当收回的仍要继续收回，有困难的可以分期收回。（四）农业贷款指标，建议只用于农业生产（包括社办工业）。

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旧账一般要算等问题的批注[1]

（1959年3月30日）

一

此件[2]很好，很容易看。如有头昏病，还可以愈头昏。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

---

[1] 本篇一是对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及其附件的批语，毛泽东将这个批语拟题为《介绍山西经验》。本篇二至六是看陶鲁笳的报告时写的批注。本篇七是对陶鲁笳附送的中共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关于晋南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的批注。

[2] 陶鲁笳的报告说，山西省各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具有如下特点：一、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二、放手发动群众，形成大鸣大放的高潮，在此基础上，再采取领导干部进行自我批评与群众性的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相结合的方法，效果极好。三、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四、全民大讨论和当前的生产运动相结合。陶鲁笳在报告后面，还附送了中共山西省委1959年3月23日关于榆次市、太谷县五级干部会议开会方法的通报和中共晋南地委第一书记赵雨亭1959年3月28日关于晋南各县五级干部会议情况的电话汇报。

二

毛注：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竿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怀着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拾。[1]

三

毛注：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全消。本来没有鬼，只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做“怕群众”。[2]

---

[1]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事实上，各县在五级干部会议举行以前，所有公社对于郑州会议所提出的所有制问题和‘十四句话’的方针，已经展开了全民讨论。”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结合进行，一般有三种方法：“（1）开全县性的电话会议或者有线广播会议。（2）各个公社参加五级干部会议的人，一部分是固定的（每县平均四五千人），另一部分是不固定的。会内会外，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利用大字报，内外交流，互通情报。大字报的内容，有批评、自我批评的，有建议或表示不同意见的，有报喜的……（3）县委临时派出工作组帮助领导较薄弱的公社。”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四

毛注：很好，必须这样肯定。[1]

五

毛注：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法律。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2]

六

毛注：开大会将要妨碍当前紧迫的春耕生产，这也是一项迷信，已被群众打破。看开什么会。开一平二调三收款的会呢，还是开现在这样的会。前者一定妨碍生产，毁坏社会主义，毁坏人民公

---

[1]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各县县委都按照省委的指示，在五级干部会议的头一天，向大家宣布了'言者无罪''不戴帽子''允许任何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有反动言论的人，约占到会人数的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社。后者则完全相反。[1]

七

毛注：讲得很好，正是这样。[2]

---

[1]　陶鲁笳的报告讲到："各县的材料，都毫无例外地证明，五级干部会议和全民大讨论，对于当前的生产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思想运动的高潮，已经带动起了一个新的令人鼓舞的生产运动的高潮。"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赵雨亭的报告讲到："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开会不但不会影响生产，相反的，对生产还有很大的推动。开会的过程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过程，也是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发动群众的过程，同时又是组织生产高潮的过程。"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

（1959年3月、4月）

一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了郑州讲话[2]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解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

[1] 本篇一是毛泽东1959年3月30日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1959年3月29日关于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一个批注。本篇二是毛泽东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报送的省委书记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报告等材料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对王任重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写的批语。本篇四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谭震林1959年4月3日关于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的开法给毛泽东的信上写的批语。

[2] 指毛泽东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三月三十日）

二

这几个文件[1]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

---

[1] 指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报送毛泽东的四份材料：王延春等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湖北省委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在麻城县的万人大会上，县、公社、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带动基层干部也纷纷检讨，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检讨之后强调算账，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缺口粮的，立即供应；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三

此件[1]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四

各县、社四月不开大会。原定五月开社、队代表大会，可以考虑在五月上旬或中旬到县里开，彻底解决三月会议[2]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然后选举公社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社、队管理机关。就算账这个问题来说，三月省、县大会我们缺乏精神准备。郑州说的是一般不算，应翻过来，一般要

---

[1] 指王延春等1959年3月30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采取开动员会、小组会、个别谈话、搞试点和开广播大会等方式，交代政策，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在会上交代，承认错误。回去以后，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2] 指1959年3月间召开的部分省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

算。有些省已经翻过来了，如湖北，但也没有翻透。说的是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账，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首先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干部、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这个问题，如麻城县那样大规模解决，是最近几天才提出来的，才进入我们的认识领域。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并非最近才发生，但只有在一九五九年才能解决，只有在现在才能建立真正的群众监督。像这样一个群众性的大问题，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因此我建议五月的会到县里开。是否如此，请你们委员会讨论一下。

毛泽东

四月三日下午六时

关于同意董必武[1]辞去现职改换工作的批语[2]

（1959年3月30日）

我和大家同意此信[3]意见，改换工作。中央已建议董必武同志当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当主席，朱德同志当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这个建议，将提到中央全会去讨论，然后做出决定。这个建议，是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常委交换意见的时候提出的，有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和各大区区长同志们参加。到会人一致同意这样做，认为对党对国家都是有利的。这几位同志的新工作，责任大，荣誉高，名气也大，实际则是做苦工。我希望同志们勉为其

---

[1] 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2] 毛泽东将这个批语的标题修改为《董必武同志的辞职书》。

[3] 董必武1959年3月25日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中央全会将讨论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我去年10月曾函请小平彭真两同志转报中央，请求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再推荐我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并请求中央考虑我的能力和体力，不安排我担负国家机关的任何实际职务。我已当选为人大代表并列名政协委员，将来在政协安一个没有实际工作责任的名目就够了。这意思在1957年冬曾和彭真同志面谈过。特再恳主席在研究国家机关负责人选时支持我的请求为祷！"

难，为党担负这些担子，为人民艰苦地服务。

毛泽东

三月三十日上午六时

对班禅额尔德尼[1]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命令的电报[2]的批语

（1959年3月30日）

请小平[3]叫乔木[4]即予发表。

毛

卅日

---

[1] 班禅额尔德尼，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2] 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59年3月29日给周恩来并转毛泽东的电报说："我个人并代表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拥护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出示的布告。""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工作。""我将竭诚努力，团结西藏僧俗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满怀信心地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彻底粉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支持下所搞的一切无耻的叛国勾当。"这个电报后来发表在1959年3月31日《人民日报》上。

[3]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关于改变集体所有制体制的几条原则[1]

（1959年3月31日）

毛注：（一）不得群众同意不变；（二）变的时候，一定要以有利于生产队，不使生产队、小队、群众任何一个单位一个个人吃亏为原则；（三）以公社级大发展和穷队大发展为基础，这是从不使富队吃亏反而有好处这样一个原则出发的具体措施；（四）先变乡，后变区。三、五、七年之后，群众要变的话，先变到乡。何时变到区不能定，现在设想，大概要在十年、十五年或者二十年之后，才有可能变。因此，不要怕。

---

[1] 这是毛泽东在阅看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谭启龙1959年3月28日给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的信时写的批注。信中说，山东省济宁地区各县的五级干部会议，首先传达了主席的指示，检查了前一段工作中县委应负的责任，紧接着展开大鸣大放，发言非常热烈，干部们都说毛主席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现在开的是五级通气会、团结会。鸣放中反映的情绪主要是怕再变，有人说“共产党和孙悟空一样，多变”。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谭启龙的信中还讲到怕变的原因在于：一、办初级社不到两年，生产刚有劲了，就转高级社；高级社不到两年，就转公社。希望将公社制度和各项政策用法律固定下来。二、国家统购政策曾宣布三年不变，实际上年年变；每年夏收前说不变，秋后就变了。希望上面定任务时估计足一点，定下来就不要再变。

第一批反映[1]

（1959年3月）

一

印度处于被动，它的反映对我们最有利。[2]

二

美国限于所谓“深切的同情”，大说其空话。[3]

---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印度和美国对西藏叛乱事件的态度的一组批语和批注，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印度报业托拉斯1959年3月29日发表一则消息，报道了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事件公报说叛乱指挥中心在印度噶伦堡一事进行的辩解。这是毛泽东对这一报道的批语。

[3] 美联社1959年3月28日发表的一则电讯稿说：“美国星期六宣布，它对西藏人民遭到共产党中国的‘野蛮干涉’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是毛泽东对这一电讯稿的批语。

三

注：为什么不公开？谁也不知道印度政府有这样“友好”的措施，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人们才知道。[1]

四

注：可见六个月以前是有举动的。[2]

五

注：亲爱的印度朋友们，不要轻信那些西藏人，他们指挥西藏叛乱活动是秘密的，你们不知道，我们可知道呢！[3]

---

[1]　印度报业托拉斯报道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发言说：“来自西藏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住在噶伦堡，其中有些人是在过去三四年到达的。印度政府一再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应该在印度领土上搞任何反对一个友好国家的政府的宣传活动。”毛泽东在报道中这句话的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2]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最近一次警告大约是在六个月以前提出的。从那时起，这些人一直没有任何举动。”毛泽东在报道中这句话的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3]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接着说：“在噶伦堡或其他地方，这些人和其他一些人都没有进行非法活动。”毛泽东在报道中这句话的后面，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摘录）

（1959年3月）

一九五五年说过，不要多久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这句话现在看来不对……生产关系不仅包括所有制，还包括人与人的互相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工作等等。反动派反共反人民，有他们的世界观，在政治关系上要复辟，推翻我们，当时没有料到来一个反斯大林风，五六年“反冒进”，五七年右派进攻。

出现马鞍形不要紧。波浪式前进是客观规律。错误在于不该“反冒进”……五七年有马鞍形，库存多。五八年才能跃上去……只要不“反冒进”，出现马鞍形并不是错误。马鞍形总是要有的……不能每天都是高潮……事物前进总是有波浪。飞机、汽车往前开，都有波浪声。光、电、水，都有波，这是运动的形态。事物前进总是一波一波的。

在上海会议上的讲话和插话

（1959年3月、4月）

三月二十五日的讲话

人民公社有几个问题。

组织章程问题。社、队、组都应有章程。来一次全民讨论。

小队部分所有制。

吃饭不要钱如何？要研究。供给制要和按劳分配相结合。采取按劳分配的原则来处理吃饭不要钱的问题。

算账问题。过去说一般不算账，现在要改过来，一般要算账，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边的。

公社委员的选举问题。委任制是危险的，应该由有生产经验的人当委员。要规定那些人不到场不能作决定。

征收要搞绝对数。多少议一下。多了不利。

县要不要积累？我看不要好。有些已经抓了一些。手很长。办工业赔了钱。两头抓，抓了财政部和人民，后者不要抓好不好？

银行贷款。贷款一律收回，其目的就是破坏公社，违反专款专用的方针。

投资，□亿元投资如何分配？投在谁手里，如何用？有些公社干部，以共产主义之名，行本位主义之实。要有利于人民。有利于

人民就有利于国家。

农业指标，要实事求是，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要留有余地，使下边能够超过，潜力让群众去发挥。

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计划是不是也有主观呢？

搞了十年的经验，才知道准备要一套一套地抓！

据说你们很忙，睡不成觉，忙什么呢？越搞越不落实。

老干部办工业。我看还如□□□，官这样做下去，怎么得了！去年□□搞□□□□万千瓦的发电设备，还不知道要合金钢管！

群众路线讲一万年。为什么不交给群众讨论？你们开会就找厂长、工业书记，不找车间主任，没有对立面。

我们党有一条群众路线。现在看来工业还没有，老是说不够。什么叫不够？秀才打官腔。

对事务的观察又深入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这个提法很好。

明年马鞍形，积蓄力量，后年来个大跃进！“天增岁月人增寿”，岁月过去了。经验还没有总结起来，余致力于工业凡九年，才知发电设备要无缝钢管。

搞工业，□□□□项。搞不成何必多搞！分散力量是破坏大跃进的办法。

运输力量不足。什么叫短途运输？短多少？

以物易物有两种，一种是正常的互通有无，一种是不好的。

来个狠，实事求是。你这个人不狠，听以不实。

一面搞钢铁，一面搞粮食。双管齐下，抓得狠，抓得紧，抓

得实。

世界上的东西没有废品，像打麻将一样，就是靠“吃”和“碰”。上家的废品，是下家的粮食。

什么“可否”？犹豫不决。这两个字改为“一定”。

国外市场，极为重要，不可轻视。节衣缩食，不可出口。自己少吃一点。

要搞增产节约。

全民办工业如何解释？全民办工业讲得太多了，全民办农业差不多。

工人阶级老底子是四百万人，大革命时（一九二六年）两百万人，经过二十三年增加两百万人。到一九四九年四百万人，解放八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每年平均增加一百万人。增加了八百万人。鸦片战争到一九四九年，一百零九年只有四百万人，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八年中间就增加了八百万人，去年一年增加□□□□万人，这是一种特殊现象。照这样搞下去，一年□□□□万。十年□万万，有人没有机器，一个人的事可能七八人做。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就业六百万人，包括“美国之音”等，只有六千万人。我们这样搞下去，十年□万万人，怎么得了！学徒一年二百一十六元，壮丁在城市赚钱，老弱在农村吃饭，壮者散在四方，留在城市，结果劳动生产率下降了，这同马克思主义不合，同社会主义不合。

对上海会议纪要修正稿[1]的批语和修改[2]

（1959年4月）

一

送田家英[3]同志酌办。

要在今天改好，晚上印出，发给各省第一书记带回去。

毛

---

[1] 中共中央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纪要的修正稿原题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后来进一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在4月2日至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通过。

[2] 本篇三至五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审阅上海会议纪要时加写和改写的文字。

[3]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二

三种指标不适宜，只要包产指标与争取〈计划〉指标两种。[1]

三

完成这个过程需要许多时间，急是不行的。要向广大的干部和社员群众讲明，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这种情况不能很快改变。在将来，在把基本上生产队所有制改变成为基本上公社所有制的时候，必须经济上不使任何一个生产队和任何一个个人吃亏，而只能使他们较之以前更有益处。变而对于所有的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有利就变，变而对于某些生产队和某些个人有损就不变。除了这个经济条件以外，还要一个政治条件，就是社员群众的自愿。

---

[1]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中“第八个问题”讲到1959年的粮棉生产指标时指出：“各地各级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指标的时候，应该注意要留点潜力给下面，以便下面超额完成。在计划指标之外，提出一个争取指标去动员群众，这也可以，但是，争取指标也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的基础上，超越了客观可能，就起不了动员群众的作用。至于在人民公社内，实行包产的时候，在目前的条件下，包产指标一般要比实际可能达到的产量低20%左右，使包产单位和社员群众可以从超产部分得到较大的实惠，这有利于刺激群众的增产积极性。”毛泽东在这段话旁写了这一批语，批语中的“争取指标”可能是“计划指标”之误。纪要后来修订为《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时，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删去了修正稿中关于“争取指标”的提法。

四

也有少数地区，是以几个原高级社合并成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这种做法，如果群众确实同意，也是可以的；如果群众不同意，就要改变，千万不可勉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要求办事。

五

不管具体的情况如何，由上面强制规定所谓增产技术措施，例如强制规定种植的密度，那是很危险的。

介绍麻城的经验[1]

（1959年4月2日、3日）

一

这几个文件[2]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值

[1] 本篇一是对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报送的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的情况报告等材料的批语；本篇二是对王任重3月31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二次报告的批语；本篇三是对王任重4月2日报送的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的批语。毛泽东转发这三个报告时，均将批语拟题为《麻城的经验》。本篇四是在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上写的一条批注。

[2] 指王任重1959年3月31日送毛泽东审阅的四份材料：王延春等3月27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和关于棉花技术措施问题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两个报告、王延春同日晚关于穷队赶富队问题给王任重的报告和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3月23日关于与基层干部座谈“吃饭不要钱”问题给王任重、王延春并省委的报告。其中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报告说，麻城县的万人大会采取县委的会议和公社的会议一起开的办法，把会内会外联系起来，把开会和领导结合起来，把干部开会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内外呼应，连成一气。会议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基层干部大受感动，也纷纷检讨，上下级关系更加密切了。检讨之后，最重要的是强调兑现，认真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兑现的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该支援的穷队，立即予以贷款。

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地退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

二

此件[1]极好，每一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

---

[1] 指王延春、姜一（中共黄冈地委书记）、吴德简（中共麻城县委书记）1959年3月30日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二次报告。报告说，两天来，会议情况又有新的发展。为了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账，县委决定：一、县委分别开动员会，表明算清账目的决心。二、分别开小组会，进行酝酿准备。三、交代政策，个别谈话，解决生产队干部和生产小队干部的顾虑。四、开会和搞试点发动群众结合起来。五、开广播大会，明确宣布1958年的收入，除上交农业税和上交公社的百分之几以外，余下的都归生产队，要求各生产队都把去年的账目算清，同时动员社员参加算账。在算账过程中，发现生产队许多干部贪污挪用现象严重，县委要求有问题的干部要在会上交代出来，承认错误，具体算账回去再搞，通过开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彻底算清。

三

此件[1]，连前两件[2]，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照办理。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下午

四

毛注：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3]

---

[1] 指王延春、姜一、吴德简1959年4月1日24时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给王任重并湖北省委的第三次报告。报告说，几天来，麻城县的经验，使我们认识到解决好小集体和社员的矛盾的重要性，它关系到党的政策能否一直贯彻到群众中去，而算清生产队的账，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因此说，算账是政治问题、政策问题、立场问题，一定要算，算到底。打开算账的局面，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思想动员，防止任何简单粗暴行为。要采取“两头挤”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对生产队干部的教育，动员他们交代问题；另一方面要发动小队长，依靠他们帮助队干部弄清账目。总之，要靠思想教育、靠群众、靠算账，三者结合，才能弄清问题。

[2] 指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一次报告和第二次报告。

[3] 王延春等关于麻城县万人大会情况的第三次报告讲到：“对待生产队的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在大跃进当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的人是好干部，然后严肃地向他们指出贪污多占的错误，诱导大家认识错误的严重性，是在于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在这后面，毛泽东加括号写了这条批注。

毛泽东等祝贺匈牙利解放十四周年的电报

（1959年4月3日）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卡达尔·亚诺什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伊斯特万同志，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工农革命政府总理明尼赫·费伦茨同志：

当匈牙利解放十四周年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和匈牙利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一年来，勤劳勇敢的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战线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目前正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和提前完成三年计划而进行着忘我的劳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匈牙利人民坚定不移地为维护和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斗争。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始终不渝地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对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阴谋、维护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匈两国人民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事业中始终是互相关注和互相支援的。中国人民对匈牙利人民在各方面获得的伟大成就都

感到由衷的欢欣。我们热烈地预祝匈牙利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祝中匈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于北京

关于是否担任政协名誉主席问题的批语[1]

（1959年4月4日）

我没有上届是名誉主席的印象。如果上届没有就不要增，请查一下。如果有，可以照旧。[2]

毛泽东

四月四日下午六时

---

[1]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1959年4月3日给毛泽东等写信，对八届七中全会上各组讨论《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草案）》的意见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讲到："毛主席仍应做政协名誉主席，这次也需要重选一次。"毛泽东的批语，就是针对这条意见而写的。

[2] 1954年12月，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1959年4月，政协三届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继续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

（1959年4月）

多谋善断。

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

我只是不同意反冒进，同意依形找〈势〉改变计划，如1956年十一月全会[1]，钱只有这『这』这么多，我是历来如此。

观察形势。

当机立断。

与人通气。

解除封锁。

一个人有时胜过多人，真理在〔他〕手里，不在多数人手里。

北戴河、武昌、北京、上海。

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

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2]为副帅。

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

[1] 指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举行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2] 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叫做秘书，三委二部[1]，然后再加几个部，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一点通讯员呢？

李锐[2]怕鬼，应改。

一机部较好，冶金部较差，希望改过来。

都是好同志，我无偏心，但要批评，使同志们找一个较好的工作方法，如果你们不投我的票了，拉倒。

1959年4月2日至5日，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并号召学习海瑞精神。图为毛泽东等在主席台上。

[1] 三委，指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二部，指冶金部、第一机械工业部。

[2] 李锐，当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生产增长速度有高有低，是波浪式的前进[1]

（1959年4月5日）

我们过去反对“马鞍形”，重点是再反对“反冒进”。一九五七年不搞“马鞍形”是不行的。因为一九五六年搞了一百四十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库存用枯竭了，一九五七年不得不调整一下。那一年这样做是必要的，不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完成。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央全会的时候，我完全赞成调整。钱和材料（钢材、木材、煤等等）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

“马鞍形”这种事情将来还会有的，但是不要“反冒进”，“反冒进”不好。生产增长速度，可能一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两年高一点，一年低一点，或者三年高一点，一年、两年低一点，不能每年都是高潮。像我们开会，每天都是高潮是要死人的。波浪式地前进，这是个工作方法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给汪锋[1]的信

（1959年4月7日）

汪锋同志：

我想研究一下整个藏族现在的情况。（一）金沙以西，构成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包括阿里），人口据说有一百二十万人，是不是？（二）面积有多少平方公里？（三）农奴制度的内容，农奴与农奴主（贵族）的关系，产品双方各得多少？有人说二八开，有人说形式上全部归贵族，实际上农奴则瞒产私分度日，对不对？（四）共有多少喇嘛，有人说八万，对否？（五）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贵族是否有杀人权？是否私立审判，使用私刑？（六）喇嘛庙对所属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七）喇嘛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有人说对反抗的喇嘛剥皮、抽筋，有无其事？（八）西藏地方各级政府及藏军每年的广大经费从何而来？从农奴，还是从贵族来的？（九）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有无百分之五？或者还要多些，或者少些，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何者为是？（十）整个剥削阶级中，左、中、右分子的百分比各有多少？左派有无三分之一，或者还要少些？中间派有多少？（十一）云南、四川、甘肃、青海四省各有藏人多少，共有藏人多少？有人说，四省共有二百多万至三百万，对否？（十二）这

[1] 汪锋（1910—1998），陕西蓝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四个省藏人住地共有面积多少平方公里？（十三）青海、甘肃、四川喇嘛庙诉苦运动所表现的情况如何？有人说搜出人皮不少，是否属实？以上各项问题，请在一星期至两星期内大略调查一次，以其结果写成内部新闻告我，并登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如北京材料少，请分电西藏工委，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四个省委加以搜集。可以动员新华社驻当地的记者帮助搜集，并给新华总社以长期调查研究藏族情况的任务。

毛泽东

四月七日

对印度新闻社关于西藏叛乱的两篇报道的批语

（1959年4月7日）

一

即送周总理阅。

这个新闻社的这两篇报导[1]，是不利于尼赫鲁[2]的，我看可以全文发表[3]，请与吴冷西[4]一商。

毛泽东

四月七日

---

[1] 指新华通讯社1959年4月5日编印的《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上登载的《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和《印度新闻社记者报道西藏叛国分子谈几年来准备发动叛乱情况》。在这两篇报道的目录旁边，毛泽东还分别批有“可阅”字样。

[2]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3] 《人民日报》1959年4月23日以《印度新闻社提供的事实再一次证实，噶伦堡是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的中心》为题，转发了印度新闻社的第二篇报道。

[4]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二

向字似乎是从字之误，从噶伦堡发出的报导[1]。

[1] 新华通讯社《参考资料》第二七九二期上登载的《印度新闻社报道西藏叛乱情况》一文说："印度新闻社的记者昨天向噶伦堡报道。"在这旁边，毛泽东写了这条批语。噶伦堡，印度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

关于发表国外对西藏叛乱反应的材料的批语

（1959年4月8日）

刘、周、邓[1]：

此件[2]可以发表，似有益，请你〔们〕研究一下，是否可行？

毛泽东

四月八日上午十时

此件发表后，再将上月卅日至今日的动态加以分析，在报上发表。

---

[1]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指外交部新闻司1959年3月31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上登载的《我公布西藏叛乱事件后的反应（之二）》。主要是介绍了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3月30日关于西藏问题的讲话和印、美、英报刊对西藏局势的估计。1959年4月3日，《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尼赫鲁在印度人民院再谈我国西藏局势》的报道，对尼赫鲁3月30日的讲话内容作过详细的介绍。

关于西藏平叛[1]

（1959年4月15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

---

[1] 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17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19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 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1938—1989），青海循化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

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1]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1935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1]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

[1] 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5%）。从1956年起支付定息。1966年9月停止支付。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1]。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2]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

---

[1] 1956年12月30日，周恩来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毛泽东主席让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2]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后，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支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1]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2]。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

---

[1]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2]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1948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

---

[1] 1954年4月29日，中国和印度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定明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并以此确定了促进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贸易及便利两国人民互相朝圣往来的各项具体办法。主要内容是：双方互设商务代理处；双方商人、香客在指定地点进行贸易和按惯例朝圣，并经一定山口、道路往来；关于两国外交、公务人员及国民过境事宜的规定等。协定1954年6月3日生效，有效期8年，1962年6月期满失效。

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

---

[1]　指《人民日报》1959年3月30日发表的达赖喇嘛3月11日、12日、16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

[2]　指周恩来总理即将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3]　尼赫鲁（1889—1964），当时任印度总理。

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1959年4月15日）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越南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切成就感到极大的高兴。

"越南人民非常渴望祖国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曾经并且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当愿望一定会得到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一贯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进行着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和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1]，为保卫印度支那地区和世界

---

[1] 日内瓦协议，是1954年7月20日至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各国和平的各项协议的总称。包括《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等文件。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与会国尊重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它们的内政；上述三国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不容许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法国从印度支那撤军等。

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援，亲密合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视同越南人民的友谊，并且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两个批语

（1959年4月15日、16日）

一

恩来同志：

《政府报告》[1]已经基本上修改好，已照你的意见立刻付印，上午印好，下午请你立即分发国务院会议成员们阅读，明十六日上午可阅完，请他们签注修改意见。明十六日下午，请你召集国务院会议当面征集意见，晚上即交田家英[2]（不交乔木[3]，他有别事）开夜工修改，十六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与田家英核对一次，十七日上午交你最后审定付印，十八日下午即可向大会作报告。以上特告。

毛泽东

四月十五日上午八时

---

[1] 指周恩来准备在1959年4月18日至28日召开的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2] 田家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毛泽东的秘书。

[3]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二

田家英同志：

第一页，第七页，第十二页，第二十五页，第三十七页、三十八页、三十九页、四十页，第五十页，都有一些修改[1]，请注意。

毛泽东

四月十六日上午七时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这次会议就准备向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员名单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图为毛泽东等在会议上。

[1] 毛泽东在这几页上所作的都是一些文字的修改。

中央转发吴芝圃[1]关于分期分批召开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4月16日）

一

此件[2]即转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仿照办理。

中央

四月十六日

---

[1] 吴芝圃，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

[2] 吴芝圃1959年4月15日请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转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任重同志转达的主席关于召开公社社员代表大会等问题的意见，我们在省委全会上作了传达、研究和布置：（一）同意从现在起分期分批召开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一般在账已基本算清和县的五级干部会议开过后再开。（二）人民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干部，错误比较严重或没有能力担任工作的，一般占5%至6%，有的地方占8%至10%，甚至更多，需要在整社中予以撤换或处分。（三）严重违法乱纪应给以刑事处分的干部，一般县有3至4人，个别较严重的县有10人左右。经过严肃处理，既教育了干部，又平了民愤，效果极好。

二

刘、邓[1]即阅，尚昆[2]办。

毛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关于解决春荒缺粮问题的批语

（1959年4月17日）

总理：

此件[1]我已全部看了。建议：（一）将此件（实为两件，一件是十五省的表，一件是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立刻印三十份，以十五份，在三日内，在〈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我相信，有些地方已经或正在处理，例如山东济宁、聊城两专区；有些可能当地领导人还不知道情况，因而还未处理。（二）由你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分发文件一份。如同意，请即办。文件可安一个总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下午十一时

---

[1] 指国务院秘书厅1959年4月6日关于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及处理办法给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并总理、副总理的报告和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4月9日关于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从上海回北京途经山东时，下火车在田野散步。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视察山东历城县大辛庄，查看小麦的田间管理。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在山东历城县大辛庄听取小麦管理情况介绍。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大辛庄的社员亲切握手。

1959年4月13日，毛泽东视察了历城县东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第二生产队麦田管理区。图为毛泽东看麦苗生长情况。

195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武清县豆张庄查看小麦的长势。

转发周小舟[1]关于处理少数违法乱纪干部的意见的批语

（1959年4月17日）

尚昆[2]：

此件[3]请转各地方同志。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

[1] 周小舟，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周小舟1959年4月14日请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转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我们日内即将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执行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条指示。会后即可分批召开县的六级干部会议。对于少数违法乱纪的干部，完全应该依法严肃惩处，现已处理了少数分子。但是我们认为不必集中在一次会议上处理，而以实事求是精神调查清楚后随即处理比较适当。至于某些不称职的干部，在公社代表大会上应该尽量改选掉。

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

（1959年4月19日）

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西藏叛乱[2]，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中国有句老话：虱多不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骂得太多了，也就不痒了。你们了解西藏问题吗？

巴叶塔[3]（以下简称巴）：我们想我们是了解的。这对我们说来并不奇怪。西藏的事在西欧不会有巨大的反应。有人想把西藏问题与匈牙利问题相比是困难的，因为二者不能相比。一八七〇年罗马教皇还是罗马国王，意大利资产阶级为了占领罗马，曾向教皇开炮。现在西藏的教皇向共产党开炮并不奇怪。意大利国内在西藏事件上的宣传运动是人为的，没有群众基础的。

毛：炮开得好。

---

[1] 这是谈话的一部分。

[2] 西藏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发动叛乱，公开宣布“西藏独立”。17日，达赖喇嘛和一些主要叛乱分子逃往印度。19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很快平息了拉萨地区的武装叛乱，之后又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3] 巴叶塔（1911—1990），当时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巴：当初是意大利国王指挥的，反对罗马教皇。

毛：四月十八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与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1]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两年经过了党的工作才转变过来。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也有些人看不清楚。大部分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西藏事件很好，我们很乐观。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这倒不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们放慢改革，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平叛总是要大叫大骂的，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实际上是他们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很，内蒙古是蒙古族人，维吾尔族是突厥族系的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在中国六亿七千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万人。不仅一百二十万西藏人不是汉人，其他三千四百多万人也不是汉人。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马克思说过民族自决，但是叛乱分子的“民族自决”就是站到外国那边去。马克思主

[1] 匈牙利事件，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义者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西藏一共有一百二十万人。讲民族自决，是由一百一十八万人自决呢？还是由两万反动派去自决？他们要的是两万农奴主反动派的自决。我国有的少数民族过去有自己的武装。武装应该是劳动人民的武装，不是农奴主的武装。现在的问题是要把枪从农奴主的肩上换到劳动人民的肩上。这个问题引导到一个理论问题，即阶级斗争最后总是要打一仗，要和平过渡很困难。西藏这么一小块地方，反动派只有两万人，这么少，还是要打一仗，他们要同我们较量一下。所以我同外国同志们谈话，总要讲，要做好思想准备，不要在精神上解除武装，不要想不打一仗就能夺取政权。公开讲，我们要从两方面提，首先提愿意和平解决问题，和平过渡夺取政权。第二，资产阶级向我们开炮，我们就要打。

1959年4月19日，毛泽东、刘少奇出席中意两党会谈公报签字仪式，邓小平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贾恩卡洛·巴叶塔分别在会谈公报上签字。

工业界的新事[1]

（1959年4月）

一

此件[2]印发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阅『阅』，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于北京

二

请尚昆[3]照上次样印发。[4]

毛

---

[1] 本篇一是对冶金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王鹤寿报送的冶金工业部党组1959年4月16日关于华北地区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及附件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写这一批语时拟的。本篇二是对冶金工业部党组4月19

日关于华北钢铁系统五级干部会议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第二次报告的批语。

[2]　冶金工业部党组1959年4月16日的报告说，到目前为止，钢、铁和钢材的计划都完成得很不好。为了把这个迫切问题直接和广大基层干部商量，以便迅速发动全体职工，扭转生产局面，我们于4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了华北地区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议，参加者有部、司局、厂矿、车间、工段五级干部1400多人。王鹤寿代表冶金部党组作报告，指出只要彻底地走群众路线，就可以争取完成今年的钢铁计划。目前计划完成不好，不能只归咎于客观条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求到会干部解除顾虑，大鸣大放，大胆揭露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各种妨碍生产的消极因素，提出各种积极措施。报告在后面还附送了4月16日各小组会议情况的综合简报。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报告时，将报告题目改为《冶金部党组报告华北五级干部大会情况》。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4]　这个批语写在冶金工业部党组1959年4月19日的报告上。报告说，华北钢铁系统的五级干部会，现在正以企业为单位，分组大鸣大放。总的看，各级干部都想努力完成任务，有些群众发动较好、生产任务完成也较好的企业干劲很足。同时大家也反映了企业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在批示印发时，将这个报告拟题为：《第二次报告（华北钢铁系统五级干部大会》。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大会上。

1959年4月，毛泽东和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在一起。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选举刘少奇为国家主席。图为毛泽东和刘少奇走出会场。

对陶铸关于广东召开公社代表大会部署的报告[1]的批语

（1959年4月20日）

尚昆[2]：

请以电话告陶铸，赞成他的意见。

毛泽东

四月廿日上午二时

[1]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1959年4月18日给毛泽东的这一报告说，从上海开会回来后，即按照指示布置全省各公社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接到主席在杭州的指示后，省委决定进一步加快进度，已通知各地、县，要各县立即召开一个社的代表大会，地委派人帮助，县委亲自掌握。省委在潮安搞的公社代表大会试点，已提前进行。5月初省委在潮安召开地委书记现场会议，交流经验，为全省全面铺开、分批召开公社代表大会作好准备。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4月21日）

一

此件[1]值得各省、市、区党委同志们参考、仿行。

中央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

[1] 中共江苏省委1959年4月18日给中央、上海局并各地、市、县委的这一报告说，我们在4月11日至14日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中全会精神，讨论了当前工农业生产、整社工作和城乡人民生活安排等问题。在生产方面，要求各地在抓紧整社的同时，抓紧夏熟作物的后期管理，不违农时地完成秋熟作物的播种，加强春播作物的田间管理，继续大力开展积肥运动。在整社工作方面，经济账必须算，思想作风账也势在必算。首先解决县委书记的思想认识问题，然后由县委直接领导公社，彻底把账算清。在生活方面，要求各地安排好夏熟前的社员生活，防止部分地区可能发生的夏荒。为了完成今年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走群众路线，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今后三个月内要紧缩会议，全力搞好生产、整社工作。

二

刘、邓[1]阅，尚昆[2]办。

毛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在陈赓[1]关于一九五九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安排情况报告上的批语

（1959年4月21日）

此件[2]阅过，很高兴。努力奋斗，以求实现。

毛泽东

四月廿一日

[1] 陈赓，当时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2] 指陈赓1959年3月24日关于1959年常规武器试制任务安排情况给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等的报告。报告说，据初步统计，在1959年需要安排试制、仿制的项目共达340余项，相当于1958年的123%。其中仿制项目下降到58%，自己设计项目增加到42%。这说明我们已经开始研究、设计适合自己情况的装备，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在李先念关于吕泗洋风暴事故后最近情况报告[1]上的批语

（1959年4月24日）

退总理。唐人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气象预报及收音机，要认真解决。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1] 指国务院副总理兼第五办公室主任李先念1959年4月20日关于吕泗洋发生风暴事故后最近综合情况给周恩来总理并邓小平副总理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吕泗洋发生风暴事故后，上海、浙江、江苏等省市委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渔民情绪已逐渐稳定，生产情绪也有很大提高。预计到本月21日，出海渔船可占总船只的70%。目前急需修船补网，所需物资，各省市正根据国务院通知，由本省市拨出，就地解决。国务院五办、水产部也正在予以协助。4月21日，周恩来将这一报告送毛泽东等批阅。

关于调演豫剧《破洪州》给周恩来的信

（1959年4月24日）

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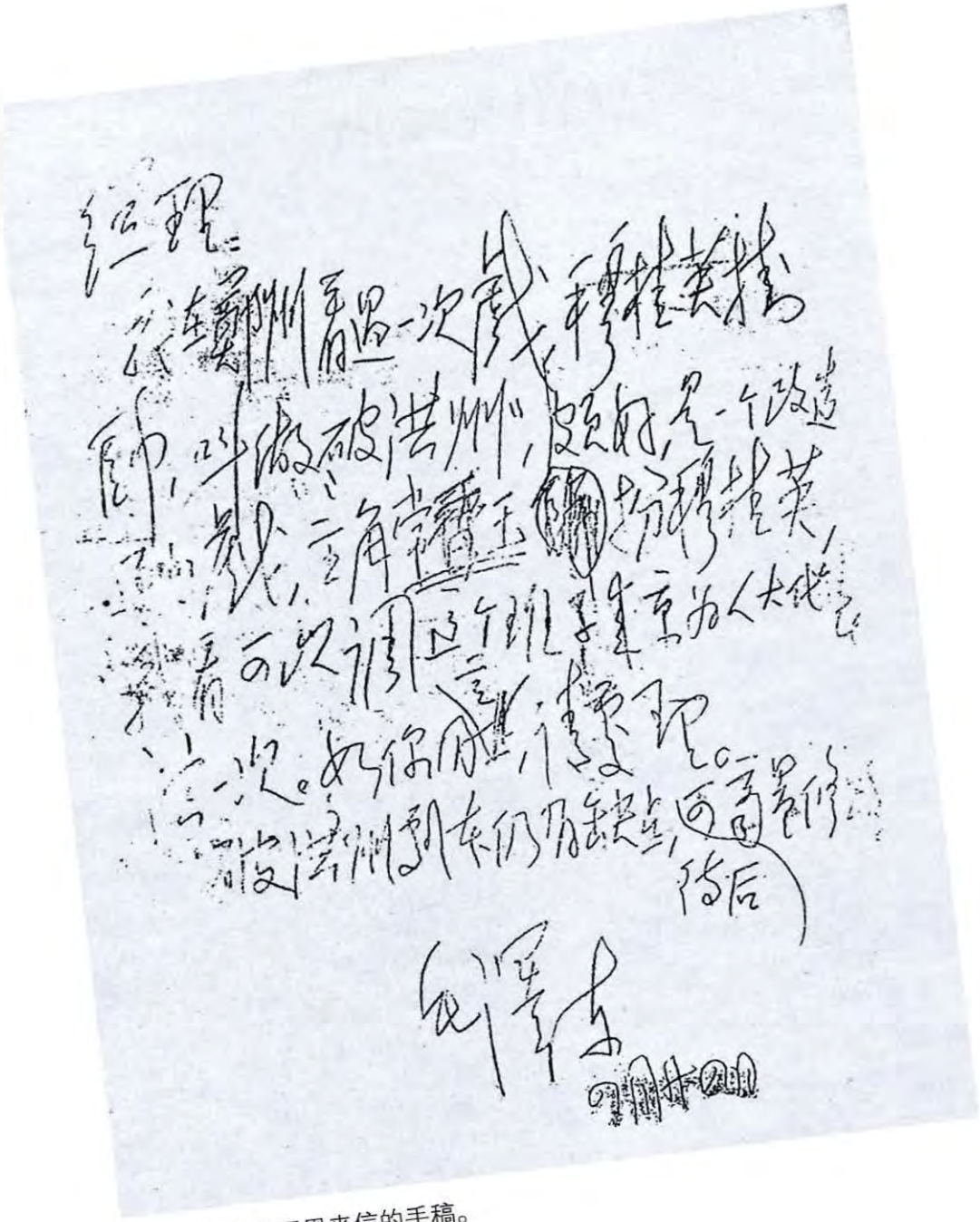
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1]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

《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毛泽东

四月二十四日

[1] 常香玉，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的手稿。

为阅看《关于〈三国演义〉》前两部分给林克[1]的批语[2]

（1959年4月24日）

林克：

请你替我找《关于〈三国演义〉》的（一）（二）两节[3]，我想看一看。

毛泽东

四月廿四日

---

[1] 林克，当时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

[2] 这个批语写在1959年4月23日《北京晚报》第三版上，该版登载了吴组缃撰写的《关于〈三国演义〉》（三），主要是就《三国演义》来谈历史和文艺的关系。文章认为，《三国演义》以“拥刘反曹”为总的倾向，把刘备和曹操处理成矛盾对立的双方。不能表面地认为这只是反映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那是历史；作为文艺作品，它实质上还反映了封建时代广大被压迫人民跟统治势力的矛盾，反映了黑暗时代人民群众的民主要求和爱国思想。在这里，文艺和历史必须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拥刘反曹”的倾向有正统历史观，就否定它的民主思想。

[3] 《关于〈三国演义〉》（一）（二）分别载于1959年4月9日和15日《北京晚报》第三版。1959年5月13日，《北京晚报》又连载了《关于〈三国演义〉》（四）。

关于西藏叛乱事件的宣传报道问题的批语

（1959年4月25日）

一

乔木、冷西、彭真[1]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2]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

[2] 这里的“18日”可能是20日之误。《人民日报》1959年4月21日发表了新华社政治记者20日的一篇评论，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讲到：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1]短评[2]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3]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4]，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二天发表[5]。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

[1]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第六版登载的三则新闻：《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污辱毛主席像》《锡兰一群僧侣兴风作浪，竟到我驻锡使馆无理取闹》《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2] 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的《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两篇短评。

[3] 指195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

[4]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5] 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印度报业托拉斯关于尼赫鲁24日同达赖喇嘛会见前后的几次谈话的报道。尼赫鲁说，达赖喇嘛告诉他，给谭冠三将军的几封信是真的。尼赫鲁还表示，和平共处原则仍然是好的。4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员题为《读尼赫鲁总理的谈话》的文章。

二

刘、邓、周、林彪、陈毅[1]阅。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对外交部就印度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给驻印使馆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4月25日）

一

周、陈毅[2]同志：

太软，要极端强硬。对挪威[3]也要这样办，但硬性可略为降

---

[1] 本篇一是对外交部1959年4月23日给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指示稿的批语；本篇二是对这一指示稿的修改。外交部的这一指示稿说，4月21日电悉。印社会党人去我孟买领事馆示威并侮辱我主席像事，同意由你馆和孟馆以备忘录形式分别向印外交部及孟买地方政府提出，指出这是对我国元首和我国人民所敬爱的领袖的莫大侮辱，当暴徒进行侮辱时，警察在旁非但不干涉，且将围观者拉开，让记者拍照，显系纵容行为，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愤慨，特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印度政府对此事迅速进行调查和作必要的处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样的事件。

[2] 周，指周恩来。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指挪威执政党工党机关报《工人报》1959年4月20日发表由挪威总工会主席诺达尔和挪威工党主席基哈德森署名的“五一”文告，对中国平息西藏叛乱进行公然的诬蔑和攻击一事。

低。对锡兰[1]也要如此办，硬性更要降低些。

毛泽东

四月廿五

二

要求印度政府对侮辱我国家元首的事件迅速予以处理，并予速复。这件莫大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首的事件是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极端地不能容忍的，必须弄到一个合理的解决，否则不可能罢休。如果印度当局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奉命申明，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向印度政府再度提出这个问题，不达圆满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永远不能停止，就是说一百年也不能停止。

[1] 指锡兰十来名来历不明的僧侣1959年4月10日下午到中国驻锡兰大使馆提交所谓“抗议书”一事。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关于妥善安排渡过春荒的批语

（1959年4月26日）

此件[1]发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区』党委。请你们对这个问题，务必要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地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六日

---

[1] 指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1959年4月23日编印的《救灾工作简报》第十七期上登载的内务部关于各地加强工作春荒有所好转的报告。报告说，河南的春荒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发展，但还有少数食堂没有吃到省委规定的吃粮标准，灾区的地、县委，正在组织干部对社员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河北省由于各地做了许多工作，春荒已停止发展，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缓和下来，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工作。山东省目前各地正在抓紧安排群众生活，大部分地区农民外流现象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的春荒仍在发展。

对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决议稿的批语[1]

（1959年4月28日）

一

即送彭真同志：

第二页上有一点修改[2]。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一时半

---

[1] 本篇一写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初稿）上；本篇二写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彭真1959年4月27日夜送审的决议修改稿上。

[2] 决议初稿第二页讲道："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毛泽东修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至叛匪向拉萨人民解放军驻军发动进攻以后，才命令人民解放军讨平叛乱，才命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并在旁边批示："解散政府应放在讨平叛乱之后。"

二

送彭真。略有修改[1]。

毛泽东

四月廿八日

[1]　毛泽东对决议修改稿主要是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1]

（1959年4月28日）

【新华社廿八日北京电】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美国反动记者艾尔索普说，平叛是不行的，要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供应，道路修阻，工具缺乏，所以平叛无望。台湾反动文人头子胡适说，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胡适的家乡安徽省徽州府地方，山不甚高，水不甚深，日本人不敢去。西藏的地形〔特〕别的高且复杂，像喜马拉雅山、雅鲁藏布江（只有若干小段通皮船），共产党如何能打叛军呢？胡适在这里实行了他的所谓“大胆的假设”，可是看不见他的所谓“小心的求证”。胆则大矣，心亦甚粗。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西藏的地形很高，空气较薄，也吓坏了很多对于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乐坏了世界上大部分资产阶级。前者说，恐

[1] 这是毛泽东为新华通讯社写的一篇电讯稿，题目是毛泽东拟的。后来没有公开发表。

怕有些困难吧，汉人帮助藏人进行平叛战争，进行社会改革，实行必要，困难必多。后者说，一定不行，至少是『是』长期的。朋友们，敌人们，你们都错的。寇能往，我为什么不能往呢？这个世界屋顶共有十二万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万。住人的地方在丘陵、溪谷，并不很高，拔海三千多公尺而已，为什么不能住人呢？叛乱前，我们只有二万人在那里，分布在一百二十公里中的若干要点，包括军队和工作人员在内。叛乱后增加了两个半师及一批干部，只有二万多人。连前总共五万人，合于艾尔索普认为必须要有二十万人的四分之一。干部中有近万的藏族青年干部，他们干劲十足。平叛以后，要组〔建〕藏族劳动人民的自卫武装，少数是正规的，多数是不脱离生产的民兵。到那时，人民解放军留下一个师就够了，主力可以撤出。我们的印度朋友没有惧怕的理由。我们家事还忙得『不得』不亦乐乎，还有闲工夫〔管〕别人的事吗？何况我们是共产党人，原则上不许可干涉别人内政『政』。但是也请你们不要管喜马拉〔雅〕山以北的闲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无益的。你嚷我必嚷，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这里有一个文件，是人民解放军一三四师政治部向北京的报告[1]，讲的是人民群众帮助平

[1]　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三四师政治部1959年4月20日给总参、总政、中共西藏工委等的报告。报告说，我师自4月6日、7日开始向山南进军以来，沿途所见居民除个别地区外基本安定，基本群众对我军平息叛乱甚表欢迎。群众对叛匪十分痛恨，渴望解放。这进一步证明山南叛乱，还是上层问题。从现有材料分析：第一，基本群众从长期的反动统治带来的深重灾难与我军入藏八年来处处为人民办事的对比中，提高了觉悟，大部分是靠拢我党我军的。第二，中、上层人士中的进步分子，由于我党几年来的统战工作和祖国繁荣昌盛对他们的影响，大部分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第三，一般的头人，先前大都跑了，经过我党我军的宣传，现在也陆续回来了。由于向官兵进行了较深入的政策纪律教育，我师这次进藏以来，大部分分队遵守政策纪律，取得了群众的信任。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上送俘虏时对叛匪骨干分子捆绑过紧等，已分别予以严肃处理。

叛的故事。照录全文，一字不改。我军政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应当改正。

转发西藏工委关于西藏各阶层最近动态的报告的批语

（1959年4月28日）

尚昆[1]同志：

（一）此件[2]转发各地和各党组，如前示；（二）请送一份给尤金[3]同志转送赫鲁晓夫[4]同志看一看；（三）以上两项处理，请告刘、邓、周。

毛泽东

四月二十八日

---

[1]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 中共西藏工委1959年4月24日给中央、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并发各分工委的这一综合报告说，自拉萨平叛胜利和国务院发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以来，拉萨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左派，对国务院的命令是积极拥护的；中派总的趋势是向左靠；右派目前的主要表现是无可奈何和恐慌不安。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派普遍情绪很高、很兴奋。昌都地区上层中的左派，听到国务院的命令后也大声叫好。群众的反映一般较好。在已平叛地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改革、生产、生活等问题；在尚未平叛的地区，最关心的则是平叛问题。宗教方面，喇嘛们普遍认为大势所趋，盼望早日安定下来。

[3] 尤金，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

[4] 赫鲁晓夫，当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对《光明日报》发表《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资料的批语

（1959年4月29日）

乔木[1]同志：

此件[2]可看。人民日报、新华社也应发表此项资料[3]，还可说得详细一点，中外皆需要。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 指《光明日报》1959年4月29日发表的该报资料室编写的资料《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西藏社会制度》。这篇资料从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形式、领主对农奴的高利贷剥削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境况三个方面反映了西藏社会制度。

[3] 1959年4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国内资料组编写的资料《黑暗、落后、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

党内通信[1]

（1959年4月29日、5月2日）

一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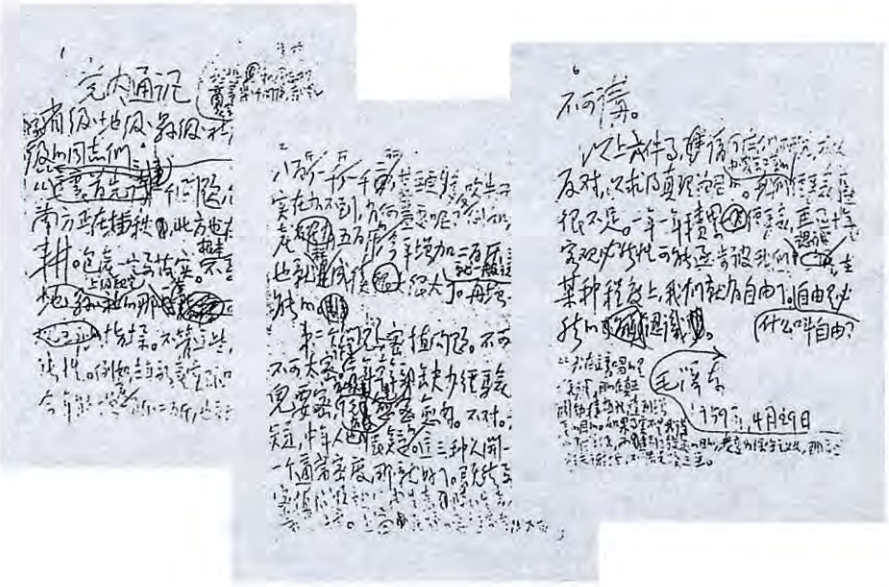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来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干部们的一封信；本篇二是毛泽东为征求对这封信的初稿的修改意见而写的批语；本篇三是毛泽东为下发这封信的修改稿而写的批语。本篇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级的同志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图为该信的手稿。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

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1]，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

---

[1] 八字宪法，指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农作物增产的八项措施，即土、肥、水、种（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

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二

刘、邓、周、陈、林、朱、谭、彭[1]各同志：

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信》，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谭，指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如有修改，请直作改动。

毛泽东

四月廿九日上午九时

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1]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2]。

毛

三

刘、邓阅后，交尚昆[3]同志：

---

[1] 柯庆施，当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曾希圣，当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省长。刘仁，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2] 曾希圣1959年4月30日对毛泽东的这封党内通信初稿提出两点修改意见：一、关于“密植问题”。他写道：“由老农和中年、青年三者协商的办法很好。我的意见省里可以提出一个幅度作为下面参考。因为老农过于保守，青年则有一点冒进，他们争论很大，要有一个幅度，容易使下面的意见一致。根据我们去年经验：麦子因地、因时和种子的不同每亩可用25斤到35斤的种子。稻子可插2×5寸到4×6寸的密度。”二、关于“吃粮问题”。他写道：“必须杂以其他代食品，不仅节省粮食，还有益于身体。但蚕豆、豌豆是经济作物（做粉丝、豆酱等），是否可以不作粮食定。”5月2日，毛泽东对这封信进行修改时，采纳了曾希圣的意见，在“密植问题”中，加上了“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一句；在“节约粮食问题”中，将“杂以番薯、青菜、萝卜、蚕豆、豌豆、瓜类、芋头之类”一句，改为“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此件[1]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

毛泽东

五月二日上午

[1] 指毛泽东1959年5月2日对这篇党内通信的修改稿。

工作方法十六条

（1959年4月）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这句话的重点在“谋”字上。谋的目的是为了断。曹操有个参谋叫郭嘉，他批评袁绍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不果断，结果官渡之战就打了败仗。所以有谋还要善断。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多方面商量。我们了解情况要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多看看各种材料，各种方案，善于判断，善于下决心。现在我们有些人就是少谋武断。根本不同人家商量，这是武断。有些同志不大愿意听不同的意见，只愿听相同的意见。与相同意见的谋得多，与相反意见的谋得少；与干部谋得多，与生产人员谋得少。他不是听听别人不同的意见，看看别人不同意见的材料，来做出判断。听听不同的意见才有好处。不一定相同的意见才正确，不同的意见就不正确。不同的意见也可能是正确的。有些同志在订经

济计划时不同别人交谈，不去多谋。为什么不跟秘书谋一下，不跟工厂的厂长谋一下？可以谋你左右的干部，也可以谋工人、农民，可以谋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他既然提过不同的意见，你就谋谋他，看看他的意见怎样。有些同志很主观武断，认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实践的结果，不行，还可能造成虚假现象。要听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不同的意见，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分析研究，才能多谋善断，订的计划才能正确。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多谋的方法很多，如开调查会、座谈会。

二、留有余地。俗话说要有后手。一切工作都要留有余地。我们在安排工作计划时，要留有余地。给下面点积极性。不给下面留有余地，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对上下都有好处。如农村包产问题，包产指标二千斤，就是没有给下面留有余地，也是没有给上面留有余地。过去我们打仗也是一样，要留有余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还要有个预备队，必要时把预备队拉出去。现在搞生产就忘掉了。计划工作要留有余地。长短期计划都应如此。要让实际工作去超过，要给群众超过计划的余地。生产队长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过去工作中间起码是个泄劲的办法。让群众超过反而会鼓舞群众的干劲。我们有些生产计划、经济计划，满打满算，不留一点余地，很容易造成虚假现象。我怀疑搞工业的同志是否懂得工业。留有余地是政治问题，也是工作方法问题。我第一次访问苏联与斯大林谈话时，问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有什么经验。苏联同志说：经济建设有二条经验。第一是留有余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留有百分之二十的余地，他公布的数目就少百分之二十。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公布七年计划，钢的生产指标九千多万吨，它实际生产不止这个数。农业生产也好，其他也好，都是留有

余地，实际超过了，人民群众心情更加舒畅；一点余地不留，将来完不成计划，就造成悲观失望。苏联经济建设的第二条经验是抓住重点。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要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钳制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不仅建设工作要有重点，打仗要有重点，就是舞台艺术、写文章、作诗也要有重点，留有余地。舞台艺术也要给观众留有余地，不要把戏都演完，演完戏群众还会想想，这样的戏演得才算成功。现在我们有些戏用不着去看，都是一个公式，开个群众大会，开个斗争大会，喊了几句口号就收场了。没有给群众留有余地就结束了。所以写文章、做诗、演戏都要留有余地，不要一下子什么都做完，要让群众去想想。

三、波浪式前进。过去讲马鞍形，其实不是批评马鞍形，主要是反对冒进。那时有人公开在群众中反冒进，反多快好省路线。一九五七年把基本建设压缩了一下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那么多，只能办那么多的事。今年计划也稍微降低了些。按速度来看，是增加了百分之□□，今年要确保□□万吨钢，煤有信心完成。农业指标，粮棉要很大努力才能完成，明年数字稍微再低一些。六一年再来个大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反对冒进。但是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这是泼冷水、泄气的办法。马鞍形将来还会有的，主要是不要反冒进。美国从一八六〇年到一九五八年的九十九年中间，也不过是七次生产高潮，不是逐年高潮，也是波浪式前进，并不是每年都是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比如钢的生产到一亿六千万吨，你还要翻一番就不容易了。少的时候翻一番可以，多了翻一番

就困难，也没有这个必要。这是波浪式前进。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做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

四、实事求是。不同意在群众中公开反冒进，但是要落实计划，要按照形势改变计划。形势变了，情况变了，人的思想也要跟着变，我们就要改变计划，计划不是不能改变的，武昌会议到现在就改变了。不根据情况改变计划，工作就被动。经过第一季度的实践，认为非改变不可，不改变就会造成困难，造成混乱，任务不可能完成。要根据情况变化，适应情况变化，按情况办事。脑子不要硬化，订计划要有多少材料，多少人，订多大的计划，不要主观地订计划。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脑子不要僵化，要注意观察形势，观察动态，了解情况。要提倡嗅一嗅政治形势，嗅一嗅经济形势。所谓政治形势，就是观察各阶级思想，观察他们立场变化。书记要观察，各委员也要观察。各委员不但要做好分管的工作，也要做好集体工作。北戴河会议时，指标订得高，后来我走了河北、山东，感到不行。六中全会决定（钢）降低为□□万吨，上海会议又压了一下，一步步落实。

六、要当机立断。只有观察形势正确，才能当机立断。把握形势的变化，来改变我们的计划。有的同志上不摸底，下不摸底，有的工作也有断，但断得不适当。优柔寡断是不对的，断的时候要下决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公社这个问题很明显，究竟几级管理，去年没有清楚，（再）经过一个过程，一月二十七日，就提出这

个问题。要感谢《内部参考》。《内部参考》给我很大帮助，登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材料。后来看了□□□同志的报告，又到天津找了□□□，到了山东找了□□□，到了吕鸿宾社，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条杆子，一杆秤，不同意的一顶帽子。一把钥匙，一张布告，一个楼梯。从这时才发觉队的所有制。这次会议明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有些同志三分怕上级，七分怕下级，因为他摸到了上面的底，有什么错误缺点，上级总是要掌握团结——批评——团结，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他怕的是群众，你要他开五、六级干部大会，几万群众参加，他就怕了，他就经不起检查。以后要来一个上级、下级夹攻中层。很多县委、地委的话不可听，尽是好话，不把事实情况让你知道。在工业方面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中级干部的话往往不能听，要听也得上下结合才能做出正确的结论。召开五、六级干部会，基层干部占多数，这样的会才开得好。要善于分析情况，抓紧时机，当机立断，下定决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方针政策。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上下左右，左邻右合，上上下下，都要通气。中央与地方商量通气。党委委员互相商量通气，与书记要通气。我们过去通气少了些，要想办法通气，现在采取了写信的办法。一个月写一次，这就是通气的办法。通气有好处，不通怎么了解情况？怎么指导工作？做工作，会议，不要一点空气没有，讨论之前，应该事先有个酝酿。有些会连题也没有。我讲这个问题讲了一百次，不通气不好，不要把问题独立起来，不要使人不摸底。决定问题要有个充分酝酿。

八、解除封锁。平时不向中央反映情况，开会才拿一大堆材料来，平时不下毛毛雨，到时就下倾盆大雨。他就是不给你反映情

况，不汇报，不请示，就是不给你知道，平时纸片只字不给你，开会就给你一大堆材料，要你作决定，下决心。要解除封锁，不要封锁中央，要把封锁消息的同志狠狠批评一顿，让他几夜睡不好觉，以后就会好了。杜勒斯封锁我们，共产党内部也有封锁情况的，不要封锁政治局，不要把中央委员和主席当作跑龙套的。对省委书记也不要封锁情况，报告中要有观点，一个事情要提出几种方案，要说明你那里的基本情况、不同意见、核心问题是什么。要把工作情况如实反映上来，不要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多数的时候是多数人胜过少数人，有时候又是少数人胜过多数人。就是说，有时候真理不在多数人这边，而在少数人或个别人这边。你们不要看开大会，大多数人赞成就是正确，就是真理。那不见得。往往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他（马克思）一个人手里。你们看过联共党史，有一次会议大家都举手了，就是列宁一个人不举手。列宁未举手是真理，其他人都不对。列宁讲，要有反潮流的精神。各级党委要考虑多方面的意见。既要听多数人的意见，也要听少数人和个别人的意见。在党内要造成有话讲、有缺点要改进的空气。批评缺点往往就有点痛苦的，但批评之后，改了，就好了。有些同志不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中庸之道太多了。不敢讲话无非是六怕：怕警告、怕降级、怕没有面子、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离婚。杀头，岳飞就是杀头才出名的。要言者无罪，按照党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过去朝廷有廷杖制度，不知打死多少人，但还有很多人死在朝廷[1]。有些同志生怕对自己不利，

[1] 原稿如此。

这就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这是痛苦的。但错误的意见提出来，还可以受教育。领导干部对极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很好地考虑，注意分析这些意见，不要马上顶回去，看看里边有没有真理。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计划变动，要经过一个历史过程。北戴河、（第一次）郑州、武昌、上海几次会议，原订的计划不是有了改变了吗？上海会议比较稳当，切合实际，可能会超额完成。粮食、棉花能不能超过，要做很大的努力。粮食把杂粮、地瓜加上去也可能完成。现在公布的四大指标不改变。去年放的“卫星”有的有好处，有的未放起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去年不去更正呢？一更正就会给群众泄气。但去年大跃进是确实的。每年增产百分之十是跃进，百分之二十是大跃进，百分之三十是特大跃进。事物是从发展中逐步认识的，不到今年一月下旬，也不认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武昌会议还没有提出所有制问题。也是（第二次）郑州会议才提出来的。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有些工业部门拿出来的文件，别人看不懂，问他，他自己也不懂。写文章、写报告，不能用加减乘的方法，即形而上学的方法，一定要有情况、有分析，切合实际。我怀疑搞经济工作的同志是不是懂得经济，有的经济学家是不是真懂得经济，如果真懂得了，一定会从意识形态上表现出来。自己还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别人当然也看不懂。为什么写的文章别人看不懂？就是没有钻进去，没有掌握材料，没有把每个问题都交待清楚。新华社关于西藏叛乱的公报[1]，就有个来龙去脉。写

[1] 此公报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写的。

文章是给人看的，一切问题都要有个交代，交代不出不要勉强，勉强写出来就不能说服人家。为什么会勉强呢？就是对事物没有真正的了解。有些文章没有说服力，说明你对业务本身不了解，不认识，不了解群众心理。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著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辞。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要有独特风格。不要怕毁誉，潘宗词写骈体文，不好读，专叫人看不懂。美国的新闻报道值得我们学习。美国新闻通讯社的新闻报道，凡是提到某一个议员的名字，必注解他是美国某州的议员。每次都这样注解，多少年也是如此，重复了多少次也是如此，就是怕其他国家的人看不懂。我们的新闻报道却不管人家懂不懂，自己知道，人家不知，又不注解，又不注释。有的人写文章不用口语。鲁迅写文章就口语化，《阿Q正传》里的阿Q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口语，一讲出去人家就懂。我不止讲过一万次了，从今天起要改过来。我们写文章是要给全国人民看的，要给一千三百万党员看的，要一看就懂，看不懂就退回去。这次工业部门有几份材料都退回去了。

十二、权要集中。权力集中在常委会和书记处。以后凡是小问题，政治局、常委会签字是可以的，凡是国家重大问题，一定要经过中央全会讨论。各经济部门的各种计划，先要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方针，然后才订计划。不能先动手，后做计划。（造成）既成事实，才送上来签字。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权在手，就可以把令下。要勇于负责。要服从领导。

十三、要解放思想。不要怕鬼，不要扭扭捏捏，要有骨有肉。有些同志中间空气不健全，前怕狼，后怕虎，思想没解放，怕挨

整。干部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不要怕穿小鞋，怕失掉选票。就是杀了头也好嘛，你是为了国家，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

十四、关于批评。我们都是好同志，对同志的批评也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找到好的工作方法，希望同志们敢于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要是你有缺点，我不批评，我有缺点，你不批评，造成这种自由主义的空气，不好。有些同志报喜不报忧，不把真实的情况反映上来。人家本来有困难，你反映上来说人家没有困难，人家有不同的意见，不好。[1]我们又不打击，又不报复，为什么不敢大胆批评，不向别人提意见？明明看到不正确的，也不批评，不斗争，这是庸俗作风。我们前代无冤，后代无仇，不打不相识嘛。

一个人如果没有人恨，就是不可设想的。

批评、自我批评是党教育人民的武器。

十五、集体领导。中央开会有了核心，各地都应办到。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两部（冶金、一机）的联系要密切。

---

[1] 此处可能有漏字。

党内通信[1]

（1959年5月2日）

一

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2]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

二

即送刘、邓、震林[3]阅，尚昆[4]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5]阅。

---

[1] 本篇一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1959年4月13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王绍飞的

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是：（一）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三）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所谓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即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着生产队的积极性。

[2]　即王绍飞的报告。

[3]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4]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5]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

关于反击挪威报纸侮辱我国领袖问题的批语

（1959年5月4日）

乔木、冷西、浦寿昌[1]同志：

这是第二件[2]，第一件[3]请找出一阅，都是对我们进攻的。第一件说，挪报第二次登出在中国主席面部打大白□的漫画，并说毛『的』是比希特勒还坏的独裁者，人能骂神，不能骂毛，毛比神还利害吗？如果中国不屈服，继续胡闹，那末，西方将有一千张报纸大骂毛的独裁云云。请你们找出前后几件都看一下，谈一下对策。我意应借此同西方不是一千家，而是一万家、十万家报纸挑战，让他们都在我的面上打白□，骂希特勒的更甚者，我认为如此极为有益，将此事闹大闹长，让世界人民注意，想一想，在西藏问题上和

---

[1]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冷西，即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浦寿昌，当时任周恩来办公室秘书。

[2] 指中国驻挪威大使馆1959年4月28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挪威报界对27日我国正式向挪威政府递交照会抗议挪威工党和报纸恶意攻击、诽谤我国领袖一事的反应。

[3] 指中国驻挪威大使馆1959年4月25日给外交部的电报。电报报告了挪威报界对我《人民日报》发表有关挪威工党和报纸恶意攻击、诽谤我国领袖的消息一事的反应。

革命反革命界线问题上闹清楚。这是好题目，不应放过。挪威两次漫画及其凶恶论点都应登人民日报，并加驳斥，引起挪报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报复，和我们的反报复。此种想法是否合理，请你们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再谈一下。此件你们三人看后，送刘、邓、林彪、周、陈、陈云[1]六同志一阅，然〔后〕退还我。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上午五时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关于注意逃缅蒋军配合西藏叛乱在我边境扩大骚扰的批语

（1959年5月4日）

克诚[1]同志：

（一）第三件情报[2]应发给云南省委、军区并转有关地区各级党政军直至基层干部，引起警惕，准备应付可能的变乱；（二）指示云南省委、军区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糊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毛泽东

五月四日上午五时

---

[1] 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 这份情报说，逃缅蒋军总指挥柳元麟今年2月中旬奉命赴台湾，蒋介石等亲自接见，指示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答应增加对所部的经费和补给，以巩固和扩充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部署，拟以云南西盟地区为重点，纠集匪徒，发动暴乱。在这份情报的题目旁边，毛泽东还批有“注意”二字。

接见苏联等十一国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的谈话[1]

（1959年5月6日）

毛泽东接着说，已经讲很多了，我再讲你们的肚子就要饿了。

主席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中国的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有狂生夜坐的故事。有一天晚上，狂生坐在屋子里，有一个鬼站在窗外，把头伸进窗内来，很难看，把舌头伸出来，头这么大，舌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把墨涂在脸上，涂得像鬼一样，也伸出舌头，面向鬼望着，一小时，二小时，三小时望着鬼，后来鬼就跑了。

主席说，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

---

[1]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陈毅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了来自苏联、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和蒙古11个社会主义国家的36个代表团的团长、部分团员和它们的驻华使节。外交部办公厅1959年5月13日印发了这次接见的谈话纪要。这是纪要中毛泽东的谈话内容。

狗、反动派。

主席说，尼赫鲁[1]是个什么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西藏问题成为世界问题，这是很大的事，要大闹一场，要闹久些，闹半年也好，闹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我们的策略是使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得到一次教育，使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学会不怕鬼。每逢大闹一次，都要引起反苏、反共的风暴，例如匈牙利事件[2]。那样的风暴，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是帝国主义巩固了，还是社会主义巩固了？匈牙利的同志们也在座，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比1956年10月以前更巩固了。那时骂苏联，苏联现在怎么样？骂倒了没有？究竟是以苏联为首的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而生气勃勃呢？还是帝国主义阵营有朝气？是事件以前的匈牙利有朝气呢，还是事件以后的匈牙利有朝气？那就是因为不怕鬼，把鬼打下去了。现在西藏问题闹出许多鬼，这是好事，让鬼出来，我是十分欢迎的。

主席说，今天请同志们来讲一点我们的观点，仅仅供参考。谢谢同志们。你们来中国访问，来看我们，这是非常好的友谊，非常感谢。还有兄弟国家大使馆的同志们，也感谢你们，好久未见，趁此机会见见。

中国人很多，要吃饭穿衣。这是很麻烦的问题。我们获得了相当一点成绩，也有不少缺点。对中国的事情要加以分析。我们的胜利是第一方面，错误、缺点是第二方面，都要分析。你们要回去了，不带一点分析的眼光来看就会不准确。我们经验少，才开始学

---

[1]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2] 指匈牙利1956年10月至11月发生的政治事件。

习经济建设。你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有个大先生，那就是苏联。至少还要十年，再看我们的工作也许比现在做得好些。五年、十年以后，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欢迎再来，再看看是否比现在稍许进步一点。

对中央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6日）

一

即送刘、周、朱、林、陈、小平[2]阅，请尚昆[3]于明七日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

毛

六日

---

[1] 本篇二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的文字；本篇三是毛泽东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的一句话。毛泽东还为指示稿拟了《关于农业的紧急指示》的标题。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陈，指陈云，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恢复社员的自留地，仍然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自留地不超过也不少于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百分之五。没有自留地不能大量发展私人喂养的猪鸡鹅鸭，不能实行公养私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三

以上五条[1]，请你们立即布置实行。

---

[1] 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指示稿的五条内容主要为：一、省、地、县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必须在五、六两个月内，以抓农业为中心。二、必须加强小麦后期管理，做好麦收的一切准备，保证丰产丰收，颗粒还家。三、扩大春播和夏种的面积。四、迅速扭转养猪头数大量减少的局面，集体喂养和社员私人喂养应该并重，对私人养猪要给以必要的安排和照顾。五、在群众中普遍传达、讨论和执行毛泽东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继续贯彻实行农业生产的八字宪法，把群众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一个春播和夏收夏种的生产高潮。

1959年5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贺龙等和参加乒乓球表演赛的优秀运动员合影。

1959年5月，毛泽东和刘少奇、贺龙、李富春等观看乒乓球运动员表演。

1959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乒乓球、排球、游泳、举重、田径等优秀运动员。图为毛泽东和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握手。

1959年5月，毛泽东和著名跳高运动员郑风荣握手。

1959年5月，毛泽东亲切接见世界冠军邱钟惠。

1959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打破百米蛙泳世界记录的运动员穆祥雄。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1]

（1959年5月7日）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索康、帕拉[2]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3]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多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

---

[1] 这是毛泽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阿沛·阿旺晋美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詹东·计晋美等的谈话。

[2] 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帕拉，即帕拉·土登为登，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3] 西康，即西康省，1955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1]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2]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

---

[1] 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今炎陵县）人。当时任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2] 荣毅仁（1916—2005），江苏无锡人。原为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当时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

甚至像刘文辉[1]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2]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3]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

---

[1]　刘文辉（1895—1976），四川大邑人。解放前曾任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兼省党部主任等职。1949年12月在四川彭县宣布起义。1959年时任林业部部长。

[2]　指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同年12月21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3]　铁棒喇嘛，是藏传佛教寺院僧职格贵的俗称。

治态度嘛！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薪巴”。）薪巴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薪巴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薪巴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薪巴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薪巴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

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1]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2]、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3]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4]，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

---

[1]　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2]　赤江，即赤江·罗桑益西，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武装叛乱的策动者之一。

[3]　指达赖喇嘛1959年3月11日、12日、16日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

[4]　指以达赖名义1959年4月18日和22日在印度发表的两个声明，主要内容都是鼓吹西藏独立。

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1]，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2]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西藏工委和军区的全部工作经费，完全由中央负责，不从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中开支。西藏无力举办的事，中央还可以帮助。西藏还是要收税的，谿卡、宗、基恰[3]和自治区政府的经费要由人民来维持。

---

[1] 噶伦，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主管官员。

[2] 阿旺嘉措（1894—1968），四川甘孜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副州长。喜饶嘉措（1883—1968），青海循化人，当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黄正清（1903—1997），四川理化（今理塘）人，藏名洛桑泽旺，当时任甘肃省副省长、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

[3] 谿卡，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宗（相当于县一级地方行政区划）以下或相当于宗的农村基层组织名。基恰，藏语，原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级地方行政官职，主管所属各宗事务，辖区相当于地区一级。

藏族人民是聪明、勤劳的。社会制度进行改革之后，西藏可能很快发展。你们的事业是有希望、有前途的。跑到印度去的人，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

全国各地你们都可以参观，有的人可以先回去，有的人可以迟一些回去。总之，国家年年在变化，发展很大。今年是建国十周年，再有十年，会建设得更好一些。

你们是国家干部，不要只管西藏的事，也要关心北京、天津、上海、成都、西安、兰州的事，关心全国的事。你们在中央有职务，经常工作在西藏，以后可以经常来北京，来一次不要久住，几个礼拜就行了。交通方便可以多往来。

达赖对我们的同志说，他担心他的生命有危险。他对陈毅[1]同志说，他主要怕的是索康和帕拉。达赖知道，共产党不会整死他。他怕索康，因为索康等人把他的父亲毒死了。有他们这些人，达赖的生命是没有保证的。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

[1]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对中央关于给社员分配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1]

（1959年5月7日）

一

昨天同李先念、谭震林、廖鲁言[2]三同志商定的。

毛泽东

五月七日上午二时

---

[1] 本篇三中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加写和改写的文字；本篇四是毛泽东在指示稿的末尾加写的一句话。毛泽东还为指示稿拟了《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标题。1959年5月7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这一指示。

[2] 李先念、谭震林，当时均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鲁言，当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部部长。

二

即送刘、邓、周、朱、林[1]阅，尚昆[2]用电话发去，另印如前示。

三

最近几个月以来，养猪头数大量减少，这对于积肥、猪肉的供应和私人零用钱的取得这样三件大事，都是非常不利的。要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采取公社各级集体养猪和社员家庭私养并重的方针，两条腿走路。鸡、鸭、鹅也是如此。

四

此事[3]要快，请你们早作决定，下达执行。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周，指周恩来。朱，指朱德。林，指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3]　指给社员分配一定数量的自留地，以便私养猪、鸡、鹅、鸭。经毛泽东修改后的指示稿说："要社员私养猪、鸡、鹅、鸭，就要给社员一定数量的自留地。自留地的多少，应当按照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的5%，也可以按猪计算，每头猪拨给一分或者二分饲料地，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自行决定。"

毛泽东等祝贺捷克斯洛伐克国庆的电报

（1959年5月8日）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诺沃提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国民议会主席兹·费林格同志，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理威·西罗基同志：

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十四周年国庆的时候，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向你们，并且通过你们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过去一年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目前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正满怀信心，为全面地实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目标而奋斗。一贯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热爱和平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伟大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人民十分感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和人民在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和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和外国干涉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我们深信，随着我们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中捷两国人民的兄弟友谊和亲密合作必将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从而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祝中捷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万古长青。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于北京

对中央转发湖北等省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工作情况报告的指示稿[1]的批语

（1959年5月8日）

即送刘、邓[2]阅，尚昆[3]办。

---

[1] 中共中央的这一指示稿说，正确总结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中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将使今年的大跃进更有保证。农业生产指标必须实事求是：经过一切努力能够达到的，必须力争达到；经过一切努力还达不到的，就应当修改，不要硬性往下派。春荒尚有一个多月至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基本上过去，决不要再忽视，还应当十分警惕可能发生夏荒。中央批转的文件有：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4月26日关于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和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讨论纪要，河北省委5月3日关于贯彻八届七中全会精神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广东省委4月28日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指示稿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5月10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这一指示。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对驻印使馆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的批语[1]

（1959年5月9日）

即送总理、陈毅[2]同志：

尼赫鲁[3]已表示歉意，对此事不要再追究了。再追究，印方必还是照样回答，我下文再不好作。请去电潘大使[4]，就此了事。

毛泽东

五月九日

---

[1] 这个批语写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1959年5月6日关于孟买发生侮辱我国元首事件的处理意见给外交部的电报上。电报说，我们研究了印方关于此事的复照，并与驻孟买领事馆联系，再度核对了事实，建议向印方再度提出照会。理由如下：（一）印方复照称，毛主席肖像贴在孟馆墙上“只有一二分钟”，暴徒向肖像上投掷的只是“几个”西红柿和“两个”鸡蛋，显与事实不符。（二）印方复照称，警察在注意到暴徒侮辱行为时“立即干预并设法制止进一步的恶作剧”，亦非事实，系有意推卸责任。对此，似应向印方再度提出照会，着重指出其歪曲事实，并就印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表示我们的遗憾。

[2]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3]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4] 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

中央转发湖北省委关于麻城县开展算账运动的情况报告[1]的批语

（1959年5月9日、11日）

一

即送刘、邓[2]阅，尚昆[3]用电报发去。

毛

五月九日一时

---

[1]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5月3日关于麻城县发动群众开展算账兑现运动情况给中央并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麻城县万人大会以后，以生产队为单位，放手发动群众，边算账，边兑现，全面地、彻底地贯彻政策，进一步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算账兑现后，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整个农村形势根本好转。政策兑现后，干部转变作风也开始兑现，即过好三关：第一关是在生活上和群众打成一片，在生产上和群众共同劳动，站在生产第一线；第二关是真正退还多分多占的东西，取得群众的谅解；第三关是打人骂人者，要当众检讨，解开和群众的疙瘩。干部过了三关后，轻松愉快，群众也心情舒畅，出现了一个扎扎实实的生产新高潮。

[2]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3]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二

各省、市、区党委，并转地委、县委：

此件很好，请你们仿照办理为盼！

中央

1959年5月11日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

（1959年5月10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2]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3]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

[1] 这是毛泽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一部分。

[2] 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

[3]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1]。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2]。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3]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4]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

[1] 1957年5月20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23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24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2] 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1954年12月2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1955年3月3日条约生效。1978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1980年1月1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3] 杜勒斯，1953年1月至1959年4月任美国国务卿。

[4] 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作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1959年，毛泽东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秘书长徐萌山亲切握手。

给周世钊[1]的信

（1959年5月10日）

东园兄：

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上午九时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1] 周世钊，又名东园，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正在北京参加1959年5月5日至14日举行的民盟全国工作会议。

中央转发孝感地委关于贯彻农业方面六个问题指示[1]的情况报告的批语

（1959年5月11日）

一

此件[2]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五月十一日

---

[1] 指毛泽东1959年4月29日关于农业方面六个问题的意见的党内通信。

[2] 指中共湖北省委1959年5月9日批转的孝感地委关于贯彻毛主席对农业方面六个问题指示的反映给省委的报告。孝感地委5月7日的这一报告说，5月3日下午接到省委传达的主席指示后，正在开县委扩大会的11个县都在会上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各县把文件都印发到了小队，干部群众反映热烈：（1）普遍认为说真话才有真干劲，说假话害死人。（2）关于包产问题，生产小队干部对主席关于能包多少就包多少的指示都举双手赞成。（3）关于密植问题，许多人认为密植权下放，又多了一个自主权。（4）关于多种的问题，群众普遍欢迎，许多生产队主动扩大了种植面积。（5）关于节约粮食问题，群众反映这是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过日子就是要节约。此外，还有一些小队干部和社员有顾虑，主要是怕领导干部不执行主席的指示。

二

即送刘、邓[1]阅，请尚昆[2]用电报发去，发到省、市、区党〔委〕一级。

毛泽东

五月十一日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分配自留地的规定的批语

（1959年5月11日）

一

此件[1]发各省、市、区党委参考。

中央

五月十一日

---

[1] 指中共山东省委1959年5月8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的规定。这一文件说，根据中央指示，对自留地的分配问题，特作如下规定：一、自留地由社员个人使用经营，长期不动，用于种植饲料作物和蔬菜，供家庭饲养和食菜的需要。二、自留地标准，应按照中央规定的标准，即根据原高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按人口计算，不超过人均占地的5%。三、为了迅速合理地分配自留地，应当宣布原来的自留地仍归原主经营。四、自留地应当留在村庄周围，以便于社员在休闲时间经营管理。五、原来的自留地，现在是集体经营的，可待收获后归还；或划归原主经营，收获后向集体归还工本费。六、社员应当首先服从集体生产劳动的需要，不能因经营自留地影响集体劳动。

二

即送刘、邓[1]阅，尚昆[2]用电报发去。

毛

十一日

---

[1]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1959年5月11日，毛泽东参观河北省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革命展览会。

1959年5月11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工业展览会上参观秦皇岛市焦化厂红旗2号焦炉洗煤机模型。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41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44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钉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